

CRITIQUE DE L'AIR DU TEMPS ITINÉRAIRES INTELLECTUEL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资本主义的危机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的危机

本书是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的两部著作的合集。

《时代旋律的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现阶段所特有的经济危机，
抨击“两极分化”现象到今天形成的史无前例的规模。

《心路历程——半个世纪的审视》：二战后半世纪精神上的自
传，记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ISBN 7-80149-858-5



9 787801 498588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858-5/D·149

定价：20.00元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的危机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彭妹祯 贾瑞坤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的危机/[埃及]萨米尔·阿明著;彭姝祎,贾瑞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149-858-5

I. 资… II. ①萨… ②彭… ③贾… III. 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危机—研究 IV. F0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214 号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的危机



著 者:[埃及]萨米尔·阿明
译 者:彭姝祎 贾瑞坤
责任编辑:严波 仇扬 许春山
责任校对:闫晓琦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电话65137751 邮编100005)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11

字 数:261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858-5/D·149

定价:20.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2-1714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ritique de l'Air du temps

Itinéraires intellectuels

© Éditions l'Harmattan

本书根据法国阿尔马唐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 15 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生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 300 年，即从 15 世纪初到 18 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 150 年，即从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 50 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说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2 资本主义的危机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母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几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

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

4 资本主义的危机

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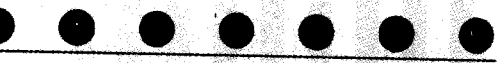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 目 录

一、时代旋律的批判	1
二、心路历程——半个世纪的审视（1945~1990年）	107
三、附录：作者著作一览表	329

一、时代旋律的批判

彭焱译



目 录

前 言	3
第一章 资本主义中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危机	7
第二章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致性及其变化	18
第三章 是多元因素还是单元因素决定社会的发展?	34
第四章 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	41
第五章 从经济统治到文化统治：价值规律的衰落和 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	47
第六章 后现代主义还是粉饰过的新自由主义空想	66
第七章 和意识形态别无二致的信息领域	88
第八章 纯经济学还是现代社会的巫术?	96

前 言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个幽灵一直在世间出没，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像所有的幽灵一样，它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灭，虽然有些时候，自觉受到其威胁的一些人也曾经暂时地清理了它的思想。在任何那样一个时刻，人们总是去参加有钱人一次又一次的如出一辙的狂欢，急着去独占更多的财富，填塞过量的食物，此外还要吞服一些药水以防止消化不良。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喋喋不休”地念叨着：“马克思死啦”，“历史完成了它的使命，再不会有任何改变啦”，“我们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其中一部分人相信自己的梦境会永远持续下去。另外一些人，不管怎么说多少还有点担心，环顾四周后悄悄地想：“得采取点儿行动，把他们从我们的聚会中赶出去，然后再把我们宴会上的残羹剩饭分给这些穷光蛋一点儿。”在数以万计的牺牲者阵营中，有些人在哀泣自己的毁灭，有些人采用记述过去辉煌斗争的办法来逃避悲惨的现实，但是他们并没有搞清楚自己失败的原因。还有一些人则认命了，他们想：“上帝是站在敌人一边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让这些牲口来怜悯我们吧，到分开敌我的栅栏跟前去吧，他们会从那儿扔过一些宴会上的残羹剩饭来。”但是，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冷静地号召大家重新团结起来，分析新形势，权衡两个阵营各自的优劣，努力弄清人民大众遇到的新挑战，他们是这

4 资本主义的危机

样为明天的斗争和胜利进行准备。

《共产主义宣言》发表 150 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对富人的欢宴。然而资本规律赢得的这种暂时的、单方面的胜利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的辉煌扩张，相反却是更加深重的危机。事实上，资本的阶级敌人出现一时衰弱之后，资本那永无止境的贪欲便彻底撑破了这个制度荒谬的不合理性。它奉行的不平等原则颠覆了它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消费被扭曲了，富人们奢侈浪费，但大多数人民和劳动者日益贫困，富人们想要把穷人纳入剥削制度中也越来越困难。资本的逻辑就这么把他们边缘化了，然后满足于管理危机。只要对手的社会力量还没有重新聚集起来，危机便可以继续管理下去。不过这一悖论——资本的胜利为危机的延长开辟了道路——仅仅是表面现象。读读《共产主义宣言》，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因为该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它自身的基本矛盾。

取消劳动者的既得利益，破坏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重新回到赤贫工资制度；把处在边缘地区的部分国家恢复成原材料供应者；减少它们发展成为工业生产者的机会；加速地球资源的浪费；这就是当今统治力量的计划。真是反动派的一片痴心妄想！它表达的是有钱人内心的欲望。他们要实现梦想的狂妄举动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爆发出来。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之际推出这本书，目的就是要指出反动派的这种痴心妄想是绝对实现不了的。

首先是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这种“纯经济”学之所以没价值，是因为它一心一意要证明无法证明的东西。它虽然自我标榜为新古典主义，而事实上它采用的方法与古典主义正好相反。它认为：市场有自动调节功能，它会造造成普遍的、自然的平衡，实现最佳社会组合。马克思则脱离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的这种病态忧虑：即证明其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确认这种制度是最终

的、无法超越的社会制度（历史的终结）。马克思只提醒我们说，相信自然平衡主宰社会纯属荒谬，研究它毫无用处。马克思用真正的问题取代了这个错误的问题，那就是分析社会制度的矛盾，研究那些决定了历史局限性的社会矛盾。今天，我们重读《宣言》一书，立刻就会被马克思的这一高见所折服。他的分析虽然诞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可比起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对一帆风顺的经济学所发表的言论却更接近我们今天的现实。“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与哲学建议人们只关注制度的日常管理，对该制度造成的日益深重的危机则视而不见。因此，它们只能是那毫无意义的经济学的乏味补充。资本主义利用自己的渠道来证明管理活动所必须的调节行为都属合理。这种管理把民主压缩为一种“低强度”的社会活动，把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降解为一种神经质的、空洞的、软弱无力的联系。

本书还有如下期望，通过分析表面获胜了的对手的弱点，了解我们采取措施、满足客观要求、对挑战给予人道主义回应的必要性。在今天看来，这种回应比 150 年前更迫切。劳动的社会化——1848 年时的劳动社会化与之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把价值规律的消亡提上了日程。资本主义短视的合理性提不出能被未来全球所接受的管理方式，所以才产生了现在的毁灭性后果，而这种后果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人们根本想象不出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现象从《宣言》的时代起日益加剧，形成了今天史无前例的规模。用资产阶级思维无法构想的手段和超乎资产阶级实践之外的办法，重新协调人类在普遍性层面和尊重各个民族差异层面的探索，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由于历史的发展，这些古老的问题以新面目出现，形成新的挑战，因此我们不能把《宣言》当成圣书来读。——对我来说，圣书是死书的同义词。这本书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出版的时代，今天人们仍然可以整段整段地引用它来说明现在的情况。因

6 资本主义的危机

此，它只应该是引导我们去继承其未竟事业的邀请书。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像所有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能够在它的扩张阶段克服自身矛盾的，但它留给后代的矛盾，其对立程度则更加尖锐。我在阅读中发现，论证是马克思常用的一种方法，我要进一步论证、指出的是：人类的进程仍然是有待确定的，它并不是由哪个和生产力发展相连的决定论规定好了的，或者是其他什么超社会的力量事先规划好了的。因此，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在两条对立的道路中做出选择：让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把我们带到某种类似集体自杀的境地，或者相反，大家一齐动手，共同发掘人类的潜能，从中释放出那个在全球飘荡的共产主义幽灵。

第一章 资本主义中的危机和 资本主义的危机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以规律的、持续的和不明确的方式出现的。因此，无论哪种形态的社会都必然由扩张阶段、停滞阶段甚至倒退阶段组成。当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突然的或意外的大变故时，我们就说这个社会出现了危机。这个概念适用于贯穿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并且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或者文化——来说也是适用的。从这么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讨论危机这个概念，就像讨论普遍意义上的发展演变问题，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

我们在这里将大大缩小思考的范围，仅限于讨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经济危机。

经济领域的诞生代表了资本主义开创的重大社会变革：经济要求以往社会中占统治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给它让出统治地位。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资本主义制度中事物顺序的翻转：财富是权力的源泉，而在以往的制度中则是相反的。或者说价值规律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就我们所谈的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明它最后形态的形成日期的话，工业革命的 1800 年可以算做起点。从那个时候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内在的社会矛盾驱使这种制度朝着一种永久

的趋势发展下去，既要“产品多到人们消费不了”，又要削减工资有助于产生能用于投资的利润，为了强化竞争，利润只能用于投资。而这些投资相对于满足最终需求而必需的投资来说总是显得过大了。从这种观点看，相对停滞是资本主义的慢性病。危机和萧条不需要特别的原因解释就可以明白。恰恰相反，各个阶段，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扩张才需要特别的解释。

这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不能回溯的，对漫长的资本主义过渡时期——1500～1800年，三个重商主义的世纪——也不适用，更不适用于过渡时期以前的时代。因此，重商主义时期的扩张、危机、萧条和周期现象属于另一种特殊问题，它们与资本主义最终形态的特点也不同。我们这里只讨论后者自身特有的经济危机。

“现存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800年算起，是生产力史无前例大发展的历史。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不断走向停滞的趋势被不断克服、化解。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非常有必要将经济机制、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全部纳入一个整体的答案之中。因为是它们在国家形成和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确定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框架。关于国家的、社会霸权的（社会霸权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和对外关系的学说（竞争和霸权、统治和依赖）奠定了种种最基础的国家理论和社会关系理论。它们和宏观经济（供与求、整体和局部）平衡（和不平衡）的种种理论使我们可以针对资本主义每一个标志性阶段所特有的积累现象，提出调节的理论。这些理论反过来还可以用来解释扩张的原因和扩张的机制、扩张衰竭的原因。我们在了解了重组、竞争焦点等导致扩张结束的那些危机的特点之后，又看到它们在走出危机后又为新一轮扩张创造了条件。

这些有关危机的分析和理论，我们可以展开来后从三个主要层面来把握。我们通常把这三个层面称为：“短周期”、“长浪潮”

和“制度的普遍（基本）危机”。

“传统的经济周期”由连续的两个扩张阶段和随后持续几年的萧条组成。

用经济科学的观念武装起来，我们不费多少力气就能建立一个经济模型，该模型通过运用乘数和加速器这两个已知体系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周期。

我们可以把上述模型改进一下：在这个模型上嫁接一个信贷回应周期和实际工资及利润的相关变化周期。这一模型可以放在一个封闭或开放的国民经济范围内阐述，也可以把它放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来阐述。它可以用传统经济学的纯经验主义术语来表达，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术语来表述。所有这些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实验，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格抽象范围内设计的，以便满足有效实验所必须的必要充分前提。有趣的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很好地描绘了短周期（平均长度为7年）的真实轮廓，短周期成了1815~1945年这段历史时期的特殊标志。二战之后，更积极的国家干预，对信贷、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支出的管理等等，使调节、控制经济环境成了当务之急和新时代的标志。除此之外，我们无须多费力气还可以建立一些围绕着股票的运动、周期波动时间更短的模式，这些模型同样也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可以用来分析经济波动的方式还颇行得通的话，那是因为这段时期内存在着一种特有的调节方式，它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1）通过对工资施加压力来管理企业间的竞争（这种管理方式与无论是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1800~1880年——还是与紧随其后的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都息息相关）；（2）处在形成阶段的多数民族国家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控制能力；（3）建立了通过控制货币和信贷管理国家的制度；（4）工业化了的中心地区和非工业化的边缘地

区之间的差异在整个阶段都没有本质变化。

既然从二战末期起，竞争的调节方式就让位给了劳资之间的历史妥协，这种妥协是福利国家以及凯恩斯主义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边缘地区也加入到了工业竞争中来，经济运动的周期性就消失了，让位给更短暂的、经过修饰的、频率更快的经济运动。

在这些用严格的经济学字眼所做的经济环境分析之外，是对长浪潮的研究，从事这种研究必须拓宽我们的概念，以便涵盖历史唯物论涉及的方方面面。

对工业革命开启的这个时代而言，在传统经济学（生产、投资、价格、收益）严格定义的范围内，我们确实能找到“长浪潮”（通常称做 Kondratief 周期）。事实上，价格指数的变化表明，1815~1850 年价格指数呈下跌趋势，1850~1865 年呈上涨趋势，1865~1900 年间又呈下跌趋势，而 1900~1914 年又回复到上涨趋势。然而在这一领域，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与周期的概念本身毫无关系。1850~1900 年的转折点实际上正好与人们在北美、其次是南非对储量丰富的新金矿的开采情况相吻合。然而在以与黄金兑换（盛行于 1815~1914 年）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绝对价格的变动长期以来一直表现出下跌趋势，同时它还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约。这一下跌趋势与采金业可能出现的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对照，这是因为在 1850 年和 1900 年，由于优质新金矿的开采，金矿的产量突然变得很好。而与此同时一贯的价格上涨效力则在 15 年内走到了尽头，长期走低的趋势又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

长周期对与投资运动必然密切相关的生产增长率会产生影响。在研究它的时候，我们并不过分注重这种研究归属哪种周期理论。这里，我们划分出了如下的 4 个历时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浪潮：

1790~1814	飞跃	1814~1848	危机
1848~1872	飞跃	1872~1893	危机
1893~1914	飞跃	1914~1945	危机
1945~1968	飞跃	1968~	危机

人们怎么能不一下子就觉察到，以上的每一个飞跃阶段都与一种主要革新系统的启动，同时又与一场以扩大市场为目的的政治革命相吻合呢？这些革新和政治运动依次是：（1）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战争；（2）铁路的出现，德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的内部统一；（3）电的发明，殖民帝国主义；（4）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化重建，汽车时代的开端。

虽然政治经济学被人强行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分离开了，但是，革新、新资源的开发、战争和对外扩张甚至阶级斗争的结果，都没有超出经济周期理论的因果关系范畴。因此，这种种社会现实也成了资本积累的表现。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引发任何周期理论的诞生。如果说经济要素演变的同时性假设能够成立的话，现实社会的种种演变则没有如此严格的规律可言。各种创新在周期波动的 A 阶段与 B 阶段聚集是值得怀疑的，实际工资的变化情况也是一样。世界贸易的强劲发展是各竞争中心对外扩张的表现形式，即使如此，世界贸易的活力同样没有遵循什么更严格的规则。

就社会而言，革新活动当然不会是中性的，因为革新成果的实际应用是与利润相联系的。革新会永远地、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这完全不是不可能的，因为革新导致了（分成小块的）资本竞争，而竞争本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则。一些重大的创新、突破能够启动一个长期的飞跃过程，当然事情也不“绝对”。例如，当铁路的问世或者围绕汽车工业展开的城市化运动导致了大规模的投资运动、改变了工业地理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革新运动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当今的技术革命没

有带来解决过剩盈余的方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资金都逃逸到了金融市场，用做了金融投机。在危机期间，创新之后紧接着就是势必导致成本下降的激烈竞争。这就是为什么表面周期的 B 阶段也具有增长率为正的特点，虽然这一增长率低于 A 阶段实现的增长率。

社会斗争不仅是经济周期各阶段问题的反映，而且是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的反映（雇员们为了在社会产品分配中享有更好的一份而进行的长期不懈的斗争，占统治地位的资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社会阶层的联盟，如：为了应对社会主义者的挑战而与农民的联盟）。社会斗争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建立长周期理论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经济周期通过它的内在机制，把历史唯物主义压缩到了初级经济主义的范畴。至于各竞争中心之间对抗的结果，以及它们在对外扩张中的成败得失，也不能进一步抽象成为某种周期性的机制。

最近的三次长期萧条，每次都有自己的特点。

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19 世纪末的大危机加快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直到资本主义制度要发生质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1800～1880 年）发展到垄断阶段。虽然垄断集团在国内外同时进行扩张，虽然有时它们相互渗透并且采取了世界主义的战略。但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仍然停留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集团时期。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凸显了国家之间的角逐，此外还为不列颠的霸权地位画上了句号。那是一个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时代。这种新出现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异性曾被希法亭（Hilferding，他强调资本工业金融资本的相互渗透是德国模式的特点）、霍伯森（Hobson，他着重分析的是英国资本的金融化及其在国际扩张中的世界主义战略）和列宁（他得出了一个政治性的结论，即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加剧拉开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分析过。虽然经济停滞是老牌资本

主义国家的特有现象，可是工业化却开始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德国和美国加速增长，危机通常伴随着金融化发生的情况下，金融化的发展则确定了金融和货币资本对生产资本的统治地位，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直接过程 $A - A'$ 对生产过程 $A - P - A'$ 的优势。

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显然构成了以两次世界大战和 30 年代的大萧条为标志的 1914~1945（德、美之间为继承英国霸权进行的 30 年战争）年间的主要特点。无论是一战以前短暂的扩张时期（1896~1913 年），还是 20 年代模糊的简短飞跃都没能使一种新的垄断—金融积累模式得到巩固。金融化只能以损害一些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使另外一些国家富起来，而只有生产扩张才能使人们毫厘不费地走出这种游戏。这种高利贷者—食利者资本主义（根据列宁和布卡里宁 [Boukharine] 的说法）加剧了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再分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甚至从此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强化了国际竞争。因为调节仍然是一种竞争型的，它施加压力迫使工资下降。凯恩斯在这一阶段末期分析的正是这些通货紧缩的螺旋型机制，它为二战以后飞跃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二战一结束，经济飞跃就开始了。60 年代末，又一次长期危机结束了这次经济飞跃。纳粹的战败为这次飞跃奠定了三个基础：（1）劳资双方的历史妥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国家凯恩斯政策支持着它，它用这种对积累进行调节的新方法替代了以前削减工资的竞争调节方式；（2）苏维埃主义，一个缔造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种“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计划，用于应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并且它的反抗刺激了资本主义；（3）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本国谋发展的国家计划，因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得以实现。

上述三种模式的成功强化了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各地区之间

的相互依赖，所以它们逐渐走到了尽头。我们的危机根源也就在此。苏维埃国家的垮台，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振兴计划无力抵抗强势资本的进攻，资本要把这些边缘国家统统变为自己的附庸，危机因此便增加了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

形成于 1873~1896 年危机期间的市场垄断曾经被广泛地用作国家政策工具，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则使市场普遍实现自治。公司各自制定自己的市场战略，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同时，各公司还要向国家施加压力，使之成为替自己服务的工具。因此，由战后美国霸权衰落而激活的国家之间的角逐，其展开的背景和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时的背景完全不同。

危机一如既往地表现为资本过剩。因为在生产系统的扩张中，资本找不到可带来足够收益的机会。以管理金融为主的危机解决方案弥补了赢利市场机会不足的缺陷。尽管这个办法不利于经济扩张，可还是得让它和金融安全占上风。浮动汇率、增加利率、私有化、给美国国际收支造成了巨大赤字的政策、优先处理第三世界债务的管理政策等共同构成了新型金融化的具体实施方式。这种金融化使世界经济一如既往地陷入了螺旋式的停滞，而且它没有为超越停滞做好准备。停滞——这个资本主义的痼疾确实也不过只打击了人类的一半，即那些优先实行金融管理危机方案的国家：美国、欧洲、日本首当其冲，拉美、非洲和买办性的中东紧随其后。相反地，东亚（尤其是中国），东南亚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却先后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从这个角度看，它们都没有受到危机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由一系列不间断的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危机构成的。这与以往各种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形成了对比。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同时又是其发展的动力：在两次危机之间，扩张的规模非常大。以往时代的缓慢发展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指数增长的非均衡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都是这

种扩张的特点。资本主义在极其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但又恰恰因为这种增长只是指数增长（就像癌症一样，指数增长只能导致死亡），所以它不能够无限期地延长。资本主义应该被超越，而且它的出现与存在应该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过渡，是一个为了创造物质和人文条件以便人们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了解社会而进行积累的过程。

我们是否必须历经通常所说的制度危机，或普遍危机、基本危机的危机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各种社会批判思想——空想主义、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特殊兴趣，这个问题的分野在于区分这类制度的危机和上述的体制中的危机。

对马克思来说，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积累法则应能迅速地征服世界、把整个世界的社会条件提升到同一个水准，甚至由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客观条件。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把资本积累看成了单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忽视了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对市场各个层面的整体整合（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要求。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各个市场都被整合进上述的前两个市场，惟有第三种市场（劳动力市场）除外。被篡改后的世界市场以及由此诞生的全球化价值观，反映了历史资本主义内在的中心/边缘单极发展的现实，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无法超越这个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本质特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疑问，并且使用了和马克思之后诞生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所不同的言语。

垄断市场的形成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出现使得列宁相信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将发动革命来反抗帝国主义战争，虽然革命可能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但它最终必然要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革命确实在俄国爆发了，但是它没有蔓延到西方，相反却以激进而彻底的革命（中国）和缓和的民族解放运动等不同形式转移到了其他的边缘地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中心/边缘单极发展特征也因此更加突出了。

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普遍危机论：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等论点，力图从理论上阐述历史会出现意外进程的观点。两次大战之间持续良久的大萧条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亚洲和东欧的确立似乎验证了斯大林的上述观点。但是，斯大林在立论中抹去了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个纲领的本质，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但是，这样的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又不可避免地转变为资本家掌握的资本社会。

由于资本主义表现出了惊人的弹性，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资本主义得以克服它的“普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和东方竞争的激励之下，同时也为了适应已经获得独立的边缘地区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又开创了一个辉煌扩张的新阶段。虽然它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苏维埃国家的垮台又丰富了这一成就——在二战之后的短暂扩张后，资本主义还是很快就陷入了长达1/4世纪之久的危机之中。是否标志着这次危机的、广泛金融化现象将成为新一轮的积累模式定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阶段？这次的排斥现象扩大到了整个大陆（如整个非洲大陆）——排斥与萧条相伴而生——人们能无限期地忍受它吗？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及其控制的边缘地区的冷清萧条，另一方面是东亚的飞速崛起，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开始弱化单极化发展方式？或是它将导致出现建立在五个新垄断中心（对技术、对金融、对全球自然资源、对大众传媒/信息和对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控制）基础上的，全新的单极化发展模式？一种新的、可能不再破坏地球生态的积累方式是否正在形成？这些就是当前制度危机

提出的重大课题。资本主义的韧性能否战胜它的意识形态桎梏和体制羁绊，开辟出意料之外、能超越它固有规划的康庄大道？或是由这些桎梏和羁绊导致最后的灾难？或是出现新的革命浪潮和创新浪潮重新规范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可惜我们在目前阶段尚难确定这个进程的特征。

第二章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体系的一致性及其变化

经济理论和所有社会科学一样，它的发展过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式完全不同。后者常常使我们感到震惊，因为总有更新颖、更准确、更复杂、更丰富的理论取代在新理论问世之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旧理论，并且旧理论至此就完全被抛弃了。这种发展方式并非不重视不同流派之间的冲突，也不是说一种理论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就像库恩（Kuhn）所指出的，认识的深化必然以产生新的范式为终结。科学这个概念与这种认识规律紧密相连，并由此表达出科学一词的全部内涵。但是，在对社会现实的认识领域里却不是这样的。在这个领域里，始终互相对立的各个流派都无法让别人全盘接受自己的观点。社会现实是各个流派共同的研究对象。流派和流派之间是以对现实社会的不同理解来互相区分的，有时候它们之间的观点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现实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而这种对立持续的时间比社会现实本身发展演变的时间还要长。这样它就难免背离了现实。各种流派中的佼佼者当然知道，要把这些演变及其所带来的新问题考虑进去。它们懂得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观察能力、磨锐分析武器。然而它们仍将保留它们各自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这种不同决定了科学分析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不同地位。我们知道人类，个体

也好、群体也罢，都在创造性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而人类却只看到了自然界的历史。科学（取其尊重事实的意义）和思想体系（取如下意义：认为因循守旧是合理的，或者反之，认为引起社会变化的运动是合理的）在这儿是不可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更愿意使用“社会思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求它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词，而不是简单地使用“社会科学”的原因。

对现代史、现代资本主义史来说，两个世纪以来，两种观点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它们不但一直相互对立，而且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的追随者。其一是保守主义的观点，它认可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其二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它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双方并非都在原地打转，不厌其烦地就同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地讨论。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特别的政策。保守主义（赞同资本主义）流派中最有趣的观点是成功地把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合法化了、并确认了政策实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问题减弱了或者消失了，另一些则突出了或者出现了新问题。彻底批判派中最有效的观点是主张权衡新挑战的观点。

因此，社会思潮总与社会权力问题紧密相连。要么它认可一种已然存在的权力，要么它提出一个新权力来反对现存的那个权力。在构成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全部论述中，能最好地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特殊阶段所要求的思想，自然而然就在思想领域获得统治地位，并因此成为当时的“惟一思想”。在批判阵营里情况正相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列举现政权的目的只是为了谴责它。因此这里盛行的规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也出现过例外。在1917~1990年间，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权曾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因此，在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中也出现了占据统治地位、和当权的苏维埃政府共生的主导思想。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凯恩斯主义、主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做为另一种“惟一思

想”采用圣经式的语言表述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一些启发。它们不但取得了与其他资本主义“惟一思想”共存的位置，而且也盛行于当代。苏维埃政权消失了，伴随它的社会主义“惟一思想”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丰富多彩、属于不同信仰、意义也不尽相同的彻底批判理论。不过它们还没有凝聚成新的批判思想体系，未能提出一些结构缜密的新思路。总之，它们还不够强大，不能有效地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因此资产阶级的惟一思想统一了天下，不再像二元意识论时期那样，还有个对手限制它、与它平分秋色。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新鲜：1800~1914年资本主义扩张期间，为了满足扩张不同时期需要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统一天下的惟一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言论就这么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次第登场了。虽然这些言论形式多样，但在基本观点和方法上都有一个不变的核心。只有认清这个硬核，并且抓住掩盖在形式各异的言论之下的真实含义，我们才能够区别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变的核心，什么是其各个发展阶段所特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仅在某个阶段临时出现的东西。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让在资本主义发展史先后出现过的各种“惟一思想”复位。

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思想体系始终具有经济属性，那些最后演变为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言论构成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不过这一点（资产阶级言论一旦变为经济理论就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还不能完全概括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特点。因为，这个具有经济属性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及政治哲学的产物。这种思想创立了个人自由的观念，并且确定了现代政治民主的实施范围。传统经济理论的特点和矛盾全都源于它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所处的那种模棱两可的位置。它陷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它试图超越现实社会的所有范畴，如国家联盟组织、政策的贯彻实施，国家干预等，建立一种“纯经济学”（这

是它给自己确定的属性)。据称,这种“纯经济学”只遵循它自身的规律,不理睬其他任何因素。受这种永恒倾向的驱使,传统经济学试图——根据它自己的标准——精确地制定出一套由市场自动调节功能演绎出的普遍平衡理论。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理论有意选择为当权者服务,以便启发当政者采取有效的行动,划分市场、巩固国家在世界系统内的地位。然而随着时空的演变,现实存在的政权不可能保证自己丝毫不变。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政权的缘故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政府必然要在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社会权势集团,乃至不同国家的权势集团去行使权力。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政府执行支持各社会阶层相互妥协、让步的政策。这时候的经济理论必然要迎合现实的政策目标,远离纯经济的抽象因素。

一般情况下,惟一思想都是通过第二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纯经济学”则归属经院派言论,对现实没有任何影响。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解释一下原因——惟一思想和经济学的见解很接近,有时候惟一思想甚至溶进了纯经济理论之中。目前我们就正处在这么一个时期。

这里,我不再赘述资本主义论调具有经济属性的原因。这个特点是客观要求造成的:资本主义必须颠倒政治/经济之间的顺序才能运转。政治统管经济的顺序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标志,现在它要求颠倒顺序,让政治服从经济。这种客观要求为某种“经济科学”的问世奠定了基础,这种“经济科学”就是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种种(经济)规律,而且资本主义再生产似乎确实得接受这些规律的支配,从这一点看,资本主义确实和历史一刀两断。颠倒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中的传统顺序,必然迫使人们去制造一种“纯经济理论”。

我也不再赘述这一理论的构成史。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资本主义一成形它就立刻产生了。它开始的表述形式很粗

糙，差不多就是无条件讴歌“市场”的颂歌（Bastiat，巴师夏），按日后马克思对它下的较恰当的形容词来说，就是庸俗经济学。后来人们将数学做为工具引进经济学来表述市场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于是便诞生了瓦尔拉（Walras）的普遍平衡理论。

资本主义言论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理论硬核，就是不仅要证明资本主义能够运转（它有效地运转着），而且要指出这种合理的运转符合人们的普遍需要。因此资本主义也是合理的，甚至应该是“永恒”的，它是历史的“终结”。这样进行推导，就必然会重新确立经济理论和社会及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就这样，一个推导过程中使用的经济学观点不断得到丰富，最终演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理论。

促成传统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哲学重新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有很多，这里我只谈两个对我们最重要的观点：价值理论和个人自由观。

倾向把价值建立在社会劳动之上或者是把价值建立在个人对功利的主观评价之上的倾向，直接源于两种对什么是社会现实的完全不同的解释。第二种概念则是在晚些时候才升华成为纯经济理论的。继马克思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的回应），它认为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仅此而已。它企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系列定理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运转，它导致了自然平衡，同时它是最优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合理的、永恒的。虽然它的阐述越来越诡辩，但是在我看来，它的上述企图完全没有达到。不过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相反，由于第一种观点以量化的数据为基础，所以后来产生了一系列用实证主义方法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分析的理论：有瓦尔拉（Walras）的普遍平衡说；该学说后来又 被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重新阐述过（他试图把市场之间有效的相互依赖和主体的价值综合起来），直到斯拉法（Sraf-

fa, 纯粹实证主义者)的思想体系。

实证主义思想活跃了传统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言论和反资本主义的诸言论、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种之间建立了沟通的可能,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将会看到。

各种形式的纯经济理论和崇尚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哲学之间的关系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这里我们谈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为了反抗旧制度,建立它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有效地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当然,仅仅用“个人自由”这一个概念是概括不了该思想体系的。但是这个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人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工作或者不工作,进行革新或者袖手旁观,买或者卖。享受这种自由就必须要建立这样的社会,那里普及了就业市场、企业市场和产品市场。

按照这个理论的逻辑,社会应该能创造出实施这种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全部条件,而且必然能创造出这些条件。这就是说,它认为个人联合起来组成团体(比如民族)、历史上的国家是不合理的,甚至私有财产都是不合理的,这种情况我们以下会看到。在这些条件下,构成地球居民的所有个体可以在市场上相遇,然后在一种无懈可击的平等中切磋并确立互相之间的关系,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享受特权,成为任意一笔资产的所有人。建立在这些个体之上的国家—行政—银行,当然是世界性的,将肩负着管理这个市场的责任。想承办该市场的人们向它兜售自己的计划,然后排队候选、等待招标。国家—银行向中标人贷款。其他的个人则向承办者兜售自己,谋求一份工作。所有的产品都将在透明的市场上交易。如果把这种逻辑演绎到极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就该害怕了。所以,人们极少这么做。相反,某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倒觉得这种逻辑挺合它们的口味。它们因此设计了这样一种计划市场,它很完美,比现存的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更完善。此外,它还绝对公平。因为它建立在全体公民(一国的或者

全世界的)一律平等的基础之上。这种社会主义——巴罗内(Barone)是其理论先驱——极像资本主义,它像一种“无(私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世袭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然而,它属于批判思潮中不把资本主义(离不开市场的那类经济学家的异化)固有的经济属性拿出来讨论的那一类。该思潮借用了实证主义者用“价值—劳动”概念表述普遍平衡论所使用的论据。这些素材有助它形成日后的社会主义市场观。我们回头再讲这个问题。

被(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纯经济学重新操起的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观念,是一种右翼无政府主义、反国家、反组织(其中包括反工会)的观念,原则上也是反垄断的。因此,这种观念在小企业层是广为人知的。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中产阶级构成了1920年的原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也能轻易地投入国家干涉主义的怀抱——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说明,“纯经济学”(及由此引发的“通过市场来管理社会”)是一种空想。在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假设中,既剔除了现存资本主义中对其言论不利的各种因素,如国家、民族、社会阶级、世界体系等。同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各种形式的真实竞争(垄断等)、自然资源的使用规则等也都避而不谈。被它抹去的社会现实不但会报复,并且实实在在地存在下去。

在纯经济学和市场的抽象论述后面隐藏着一个真实的完全不同的市场模式。这个模式具有两重性:从国家这一层来看,三个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融为一体,从世界体系这一层来看,只存在两个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没有劳动市场)。这种双重性由各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冲突表现出来。这种世界体系迫使右翼无政府主义的言论与民族主义言论混在一起。此外,做为经济学异化表象的资本主义乌托邦直接把自然资源当

做商品交换的对象，无论这么做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由于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存在，而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又没有形成类似纯粹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样子，纯经济学所特有的定理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由此演绎出的行为法则和建议就更无法实施了。因此，我们的空想理论家们应该接受如下事实：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并且竞争着，竞争的特点是卖方控制市场，私有制左右着收入分配等等。因此，人们后来用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充实了纯经济学的抽象论述。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政治经济学主张符合次优标准，其实它们根本与此无关。这些建议只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政治要求的外在表现。民族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内部在某个特定时期，特定阶级力量对比情势下，某个阶层的利益，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尽管那些人在原则上就否认这些利益的真实存在。

如此一来我们就明白了，资产阶级的惟一思想通常不像资本主义空想那样极端、近乎荒谬。在通常情况下，惟一思想会把市场、国家、民族、社会妥协等等因素融合在一起，经常采用强有力的、现实主义的、符合实际的形式来表述自己。

这里我不打算讲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惟一思想史，我只对出现在当代的那些惟一思想作个扼要描述。

从19世纪末期——大约在1880年左右——垄断资本主义（按照霍伯森 [Hobson]，希法亭 [Hilferding] 和列宁所给的意义）开始形成直到1945年，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惟一思想定义为“垄断的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通过自由主义一词，我想肯定在以下两个范围内，市场（自然是由卖方控制的市场）做为经济自动调节器所起的举足轻重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在当时国家实施的政策范围内；另一方面，是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施行范围内。民族主义改变了这种自由模式，并且使它们

各自都合法地在国家政策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世界体系内，国家政策是竞争的基础。同时，国家政策又与地方权势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通过与中产阶级及其部分阶层，或者贵族阶级及其部分阶层结成不同的联盟，同时孤立产业工人阶级来强化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我们对这种调节方式并不陌生。英国和德国就采用这种模式，分别保护贵族特权和容克（普鲁士的贵族地主）的农业是它的执政基础。法国也是这种模式，支持个体农业和家族企业是它的执政基础。同时，这些联盟在殖民地的特权又对它给予了补充和巩固。以这些联盟为基础建立的民主选举，使他们得以采用长期而韧性的谈判来解决再生产的条件问题。这种模式，虽然不是国家的直接干预，但不管怎么说，它和反国家的右翼无政府主义主张也是相互对立的。国家机器在那儿存在着，确保对权势集团的管理，规范和组织市场（比如给农民提供支持）、（通过保护主义和管理货币来）管理国际竞争。国家在这种意义上的积极干预不但被认为是合法的、甚至是必要的。当时的这种惟一思想与纯粹的资本主义空想就区分开来了，我们也从此告别了空想的时代。不过空想仍然存在，只不过退缩到了大学校园的课堂和学术界之中。在那儿，它们一如既往地指责历史错了。因为它有悖纯经济学之理。但是这种言论没有重大影响。

在1914年的危机到来之后，由于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陷入危机（经济竞争演变成了世界大战），垄断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惟一思想也发生了危机。我把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派生物——法西斯主义也列入这个范畴。法西斯主义抛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民主政治外衣，但它既不否认民族主义（相反倒更加强强调这一点），也不否认对垄断权力起了强化作用的国内社会妥协。因此法西斯主义思想构成了这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惟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是这一思想的病态表达。

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惟一思想不是建立在鼓吹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观念上的。相反，人们认为，它为了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权力、国家和立法都是需要的。然而它的民主观念非常有限：个人的权利仅仅表现为形式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和一定程度的结社自由，仅此而已。过后不久才问世的几项社会权益，是实现普遍社会权益的必要先驱（既不同于1917年之后诞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1945年后的资本主义模式），而在当时只是刚刚出现的萌芽。

号称能确保社会协调运转的经济理论被现实戳穿之后，自由民族主义的惟一思想也就陷入了危机。利用这段历史时期内集中产生的例证而诞生的这种经济理论（阿尔弗莱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可能是典型代表），主张“普遍协调论”。它号称已经证实（由恰当的国家政策所确定的范围内）市场是个自动调节器（就是说，市场在运作中消化了供求关系中的不平衡）。这次它不再满足于笼统而抽象的证明，而是具体、详细地论述了经济的各个领域。比如：它发展了一种周期与商情理论，使市场自动调节作用的机理具体化，后者也因此得到了完善。同时它还发展了国际收支波动理论，说明是它在确保世界范围内的自动平衡。此外它还创立了货币管理理论，旨在肯定市场机制的调节潜力。

然而，从1914年起，这个惟一思想许诺过的所有“协调”都不灵了，不过该思想仍然在强制推销自己，并且把自己的秘方——民族保护主义、激烈竞争的货币、为了应对危机而进行的公共支出和削减工资等等措施强制推行到了二战之间。真是因为学术界太懒惰丧失了创新力吗？在我看来，要寻求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沿着这个方向到经济理论界的争论里去找，而应该到做为该时期政策基础的社会平衡的现实层面去找。直到1936年实施罗斯福新政、法国建立人民阵线，工人阶级还处于弱小、孤立无援的

境地。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会做出让步呢？在各种观点交锋的时候，凯恩斯明确批评了二战之前的惟一思想。他指出，在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经济政策加剧了当时的危机。然而，这一批评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我们要一直等到二战爆发，社会平衡才被打破了，局面向着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的人民的方向发展，凯恩斯的思想才被理解并成为新的惟一思想的核心。

我这里所做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从 1945 年起，一种新的惟一思想取代了自由民族主义的惟一思想，并且统治世界舞台一直到 1980 年的原因。事实上，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的战败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朝着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该阶级不仅获得了合法身份，而且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地位）、独立的殖民地人民和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我更倾向于说苏维埃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这种新型的关系被三种“建设”遮盖着：由国家凯恩斯政策支持的福利国家的建设、第三世界国家的建设和实行计划体制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把这段时期（1945~1980 年）的惟一思想形容为“社会的和国家的”，它在有控制的世界化背景下发挥作用。

波拉尼（Karl Polanyi）是第一个弄懂了这种新思想性质，懂了它的意义何在的人。这种思想将成为战后时期的惟一思想。这里我不再重复人们对发生在 1880~1945 年间的那些战争灾难负有责任的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它直接抨击了资本主义空想的硬核，指出：如果把劳动、自然界和货币当做商品对待，此举的必然代价是人类的异化和堕落、对地球资源的无情破坏、助长金融投机、否定国家的货币权力关系。从 1980 年起，自由主义非理性的这三个基石又重新浮出水面。

因此，统治了 1945~1980 年达 35 年的惟一思想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构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定义为“社会的和国家的”原因，我在这里要强调，我是故意删掉了

“自由主义”这个词的。新的惟一思想，通常简称为“凯恩斯主义”，当然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没与自由主义的教义彻底决裂、而只是进行了部分改造的原因。劳动仍然被当做商品来对待，但把它当做商品对待的冷酷程度，因为以下三方面的措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集体协商、社会保障和工资报酬与生产率提高挂钩。自然资源成为人们加剧系统浪费的对象，这是荒谬的“未来贬值”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知道是“未来贬值”论确定了短期经济计算的合理性（而我们所需要的则是让未来增殖）。而货币则被置于政策的管理下，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或世界体系层面都是如此。（布莱顿森林体系的目标是稳定汇率）

我认为，我使用的两个修饰词“社会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和“国家的”，很好地揭示了惟一思想在那段时期所指导的政策属性，以及为此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本质。团结——表现为非常稳定的收入分配、充分就业和社会支出的持续增长——按设想，应该首先通过系统的国家干预政策表现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凯恩斯主义或者新凯恩斯主义都发源于此）。如果用“调整”（福特主义或者福利主义）这个概念来重新阐述以上政策，我们就能详细解释如此设计的国家干涉政策，为什么有效，为什么合理。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是极端的。因为它处在区域化建设（例如欧洲建设）和人们能够接受、甚至愿意，但同时又有所控制的全球开放（马歇尔计划、跨国公司扩张、联合国组织的南北集体对话、关贸总协定等）的总体气氛中。

建设福利国家的根本目的和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搞的现代化、工业化建设（我指亚洲、非洲的计划以及拉美的计划）的根本目的之间存在着相似性。这个相似性证明，惟一思想统治了除苏维埃地区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还存在着一个如何有效并有序地插进扩张中的世界体系，尽快缩短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问题。

这么一来，我们就明白了1945~1980年期间的惟一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由此引发的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同时还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计划。该计划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但确实是属于“社会的”。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已经在几项专门社会法规定的领域内，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落实一般法奠定了基础。就业权、劳动法、受教育权、健康保障权、社会保障、退休和养老基金的建立、为改变就业妇女命运而进行的薪酬制度的修订等等，始终被看成是扩张和发展本身的目标。但很明显，这些权利的实现程度不一样，并且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运动的强弱。

在战后40年的时间里，这一模式发展到了尽头，扩张潜力全部耗尽。与它并行的苏维埃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正是这场变革导致了全球性制度危机的爆发。自1980年起，在随后的10年间，构成危机前社会的三种子体系（福利国家、万隆计划和苏维埃制度）普遍崩溃，变革终于在1990年画上了句号。战后时期，“社会和民族的”惟一思想盛行，指导了“有控制的”全球化运动。而发生在现实中的这场制度危机是惟一思想崩溃的根本原因。崩溃显然不是“经济理论”论战造成的，更不是有人乐于让人们相信的那种在后台引人注目的、年轻的新自由主义学人（哈耶克 [Von Hayek] 的学生们，芝加哥的货币学派等）对抗“社会主义恐龙族”大辩论造成的。

战后扩张模式的崩溃宣告了一个新阶段的诞生，但是它还没来得及稳住阵脚。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分析它时使用“混乱”一词（而非“新的、国家和世界秩序”一词）来形容它，用“危机的管理”而非“新的扩张模式”来形容它的实践。

做出这样的观察，自然也就确定了我对危机催生出的惟一思想的修饰词。这种自称“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更确切地

说，应该叫做“在放纵的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社会的新自由主义”。但这么一来，它就成了非现实的，无法真正地、充分地付诸实践。它建立的教义太为大家所熟知了（私有化、开放、浮动汇率、削减公共开支、放开市场），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提它了。这些教条持久不了，因为它关死了所有能克服危机、通向新一轮扩张的大门，使资本主义陷入了致命的停滞。此外，我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还有如下的原因，这就是我同意斯维兹（Sweezy）和马格道夫（Magdoff）的看法：如果代表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反系统的社会力量不抵制单边收益法则的话，那将会导致致命的不平衡，即在结构上有利于“供”，不利于“求”。换句话说，与（纯经济理论的）资本主义空想的伪理论教义相反，市场不是自动调节器，它若想运转就需要人们对它进行管理。

新的惟一思想强加给人们的这些严峻出路不是在论战中取胜的理论的智慧派生品，它源于新的社会力量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方极为有利，工人阶级和处在边缘地位的民族则正在逐渐失去他们在法西斯战败后得到的地位。他们赖以发展的模式已经用到头了，但是人民群众还没来得及重新聚集在恰当的、能接受的、可行的社会计划周围。这种失衡导致金融化的出现。关于金融化问题，我在前面进行了分析。

如果说这些严峻出路在舆论上占了上风，但实际运用起来，却与其教义相左。这一点有时非常明显。它所鼓吹的世界主义被大肆删改，劳动力市场被众多限制移民的措施所累，处在不利的境地；对自由竞争美德的赞扬无法解释为什么系统禁止垄断的行动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世贸组织大力开展反垄断行为）。它宣扬的未来贬值论（金融化又强化了这一说法）使环保人士的警告变得毫无意义。最后，虽然它们宣称奉行反民族主义的原则，但是列强（尤其是美国）不断地在所有领域，军事的（海湾战争）、经济的（美国国际商法法典 301 条款等）炫耀实力。

当然，新的惟一思想和在它指导下制定的政策，一直在系统攻击使劳动者和民众阶级受益的几项社会法案，试图肢解它们。因此，该思想对民主的宣扬纯粹是纸上谈兵。在现实生活中，它用右翼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取代了有组织的公民民主。它也遭到了报应：面对缺乏效率的国家和混乱无序的市场，主张突出团体区别、种族差异、宗教差异的言论相继冒出头来。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惟一思想始终建立在帝国主义看待世界的基础之上，这正好与本质上推行不平等，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现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相一致。在自由民族主义垄断阶段（1880~1945年），帝国主义，这里我们应该把它变为复数，按照列宁的解释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的同义词。相反，在战后“社会的和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里（1945~1980年）它表现出如下两个特点：一方面，排在美国霸权主义之后的其他各帝国主义战略在趋向一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被迫撤离“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地区（苏联、东欧、中国），然后与民族解放运动进行谈判，商讨如何维持它们在亚、非、拉美边缘地区的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激进民粹主义的倒台，帝国主义又一次处在了进攻的位置。在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化）无比狂妄地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它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含有帝国主义特性这一事实的再一次确认而已。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全球化”一词就是帝国主义（一个被禁止使用的词）的同义词。

当然，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承认过，它的政治经济学里蕴涵了帝国主义本质。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连的物质好处——本质上说，是使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享受巨额利润——总是被宣扬“国家之间要互相竞争”的模糊言论所湮没。竞争的历史和这个星球一样古老。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竞争就已经存在了。竞争既能说明一切，又什么都解释不了。因为竞争不是由自然法

则（种族的不平等）或者伪自然法则（不同文化的特性或者经济学推荐的市场法则）控制的。竞争是由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实行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人民，按照他们特有的逻辑所采取的不同战略的集合体。

我已经试着把资本主义从整体和局部（其发展成熟的各个阶段）这两个方面都做了扼要的描述。面对鼓吹资本主义的言论，人们盼望出现一种缜密而有效的、反资本主义的言论吗？我不打算在这儿回答这个问题，它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我只想对资本主义的言论，只有击中资本主义的要害，也就是说，击中它永恒的、本质的特点，就是经济学主义的异化，这样的批判才是真正的和彻底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构想的意义即在于此。

部分反对系统（反资本主义）的言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就得到了发展。它们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没有它们的话，不管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南方的民族解放计划都不可能生存下去，也不可能迫使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接受历史妥协，迫使资方根据人民群众和劳动者通过上述三种方式表达出来的要求，调整政策。苏维埃模式来自这种不彻底的资本主义批判形式。因此，它事实上造就了“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一演变和惯例没有区别，它不是某种特殊理论观点（和马克思的建议相比，它被定性为“偏航”）的产物，而是社会各界应对实实在在挑战的产物、是这些社会本身力量对比关系的产物。一如既往，现实造就了理论而不是理论造就现实。

第三章 是多元因素还是单元因素决定社会的发展？

大家都熟悉阿尔特胡塞尔（Althusser）提出的多元决定论的概念。它直接来源于阿氏的结构主义社会系统观。虽然他没有明说，但起码也暗中提到过，在社会现实的不同需求中，同时起作用的各种决定论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因为它们同时，而且全都对社会制度的再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它们帮助一种制度调整自己，适应社会的发展演变以及可能爆发的危机，能促使该制度超越自己。经济决定论，能支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各种决定论的作用方向都是一致的，因此是“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了”社会运动。如果说一种变革最终在经济上是必须的，那么它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是必须的，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承认，在最后关头是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多元决定论就能轻而易举地使我们用唯经济主义的眼光来解读历史。也就是说，经济需求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其他方面的需求无非是为经济需求配套而已。

当然这可以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法，而且我也没有狂妄到拒绝承认它的地步，或者干脆给它扣上“偏离”马克思主义或“异端学说”的帽子。但至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对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我认为使用相同的字眼对历史不同时期不同需求之间的关系提问是不正确的。我说过，而且经常重复这一点：经济自主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在氏族社会中，经济需求是从属于政治的。这种观点应该不会与阿氏（Althusser）理论水火不相容，而且他的一些学生也已经把这个观点纳入了老师的体系之中，因为他们建议对“支配”和“最终决定”进行区分。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有益的，我自己也曾详细地考虑过如何来表达氏族制度（政治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区别。看过我就这一问题论述的读者肯定对我的观点已经非常熟悉，这里也就不再啰嗦了。

第二个原因和阿氏的结构主义理论完全不相容，和他的多元决定论观点也有冲突。我这样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任何一种需求都不受它自身特有的那种逻辑支配，不管它是属于最终决定因素（经济的）或是属于支配性因素（像氏族社会中的政治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因素，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文化因素占支配地位）。这些固有的逻辑都是独立的，它们之间不是互补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谁都没有必要补充谁，更无须自发地去补充对方。因此，它们陷入了频繁的冲突，并且我们不能先验地预见它们中的哪一个将会占优势。在我看来，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经济逻辑是其决定性特征，也就是说，经济逻辑是渠道，通过这个渠道，经济逻辑可以支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反过来我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历史上的其他马克思主义都没能就其他各种需求的逻辑问题做出过这样的有力分析。另外，我也不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外，在这些领域还有过其他的重大进展。

不同需求所特有的不同逻辑会表现为决定因素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历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是历史所特有的。这种冲突把历史与受自然法则支配的领域区分了开来。无论

是社会史还是个人史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由于存在着这种逻辑冲突，我们得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自由就是这么产生的。针对多元决定论的概念，我提出了“单元决定论”的概念。

这是否是说社会就不再连贯协调了？完全不是：逻辑冲突（多元因素决定）总能找到解决方案（例如一种逻辑支配其他逻辑），而且是众多可行方案中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斗争就是这样塑造着社会，迫使社会在众多可行方案中接受那个更体现社会连贯协调性的选择。

在当代的各种争论中，不同逻辑的独立自治问题，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共同体（它本身就很复杂）的自治问题，常常被这方或另一方提出来。但是，我没看到谁提出过真正的、足以令人信服的论点（至少没有让我信服）。人们指出了问题，但是没有提供答案。我们可以从频繁出现的、类似这样风格的句子中看出这一缺陷：“这种分析或者概念是唯经济论的，它忽略了政治因素或者文化因素”。没错，它是忽略了，但是怎么弥补这一“忽略”呢？如何使用弥补法（次决定论）或冲突法（多元决定论）把这些逻辑解释清楚呢？

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类似伯特里亚尔（Baudrillard）阐述过的观点，价值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统治系统的中心还应该考虑到，这些中心也在创造让所有人都接受的意义和符号。但是意义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我们所说的象征是什么呢？象征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这个领域的论述一直很含糊，虽然这儿、那儿也冒出过一些有趣的、有生命力的突破，比如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在他那个年代提出过的一些观点，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家长制的批判中透漏出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很难接受下面这种观点：各种强烈的文化逻辑，当然它们彼此互不相同，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够显现出来。

按布劳代尔 (Braudel) 的话来说, 就是它要经过一段发生了重大到足以称之为质变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时期。我批评了这种被我称为“文化主义”的观点。该观点在我们这个危机年代里春风得意 (关于这个话题, 可参看我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不是说我把它看做“反马克思主义”的 (我对这种神学辩论根本就嗤之以鼻) 所以抛弃了它, 而是我指出它曾经被历史揭穿过。比如, 在我看来, 这个或那个声称他们自己独有的 (“西方” 基督教的、伊斯兰世界的或者儒家世界所特有的) “文化特性”, 实际上在各种氏族社会里, 就已经具备了和今天极其相似的特性。因此, 它们虽然形式各异, 但其实都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同样, 我认为在欧洲文化史中, 资本主义代表的是欧洲文化的断裂而非延续。在这种意义上我断言——与塞尔热拉图诗 (Serge Latouche) 的《世界西方化》正好相反,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的文化不是“西方的”, 而是十足资本主义的。由此, 我首先想说的是, 这种文化——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富于反抗精神的动力论——既不是中世纪的, 也不是基督教欧洲的文化。在同自己的历史决裂后, 欧洲人又想否定这个事实, 总把神话虚构人物认做自己的祖先。而这些人本来应该是他们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当然, 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可参看我在《文化中心论》一书中就此所做的解释)。我还想说, 现代文化就是资本主义的, 这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文化动力论不是来源于积累动力论 (实际上韦伯 [Weber] 支持这种观点), 相反, 是积累动力论 (竞争给资本家带来的约束毫不费力地解释了这一点) 带来了现代文化。

在承认不能把不同层次的结构约简为 (经济的或其他的) “公分母” 的基础上, 对社会变化进行分析的种种企图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之外, 但是也值得一提。这里我尤其想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本书后面我还会谈到对它的批评。因为这些观

点在我看来代表了我们这个危机时代社会思想的全部特点。由于近乎病态地担心自己“落伍”（它们对“主流言论”的批评暴露了这一点，它们对概念化的歧视也说明了这一点），它不声不响地答应甘当其他观点的补充，目前的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的世界化观点）正需要它帮忙建立其合法地位。不管怎么说，后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说法，使我们了解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所特有的逻辑，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贫乏无力的。

如果说，对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常进行的经济主义指责是站得住脚的，可以接受的，那么，几乎发自本能的“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就值得商榷了。就算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像在经济领域那样，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建立相关理论——非马克思主义更没有那么做——但是马克思一直呼吁人们去做。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经济主义解释是存在的，我本人就与他们为伍。

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所有的“生产方式”，而在第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圣经中却是这样解释的）的各阶级不仅仅是由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分配）决定的。（按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还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异化的基础上，这与以往的社会制度不同。我进一步分析，觉得它还建立在其他形式的异化上（如意识形态）。对现代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异化的劳动是一个丝毫不比剥削逊色的重大因素。因此，超越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要“改变价值分配”（这么做只能导致产生“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幻想），而且要把人类从经济异化中解放出来。

把“经济效率”只看做是合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普遍的合理性，也不是合理性本身，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尽管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它遗忘了。我在这里提到的，是关于资本积累带来的环境问题，这个见解我在其他地方

发表过。

即便是在当今世界，即便是在先进的中心地区，社会阶级也绝不是社会现实的惟一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指出了现实世界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社会组合——如国家间的、社会团体之间的、不同集团之间的等等——的话，那么是否也要指出，除了经济逻辑以外还有其他的逻辑存在？在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逻辑的分析未取得决定性进展之前，我们这里先不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也不讨论这种社会组合和阶级组织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或者互补的问题。

由划分社会阶级起，我们要转而分析“阶级联盟”问题。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体系中，无论是中心地区还是边缘地区都有可能出现“阶级联盟”。对这个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提一下。因为我在其他的著作里已经着手讨论这个问题了。这里我只扼要地列举每个章节的主题。

①中心地区的性质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如果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话，中心国家（二战之后出现的福利国家）的社会调和就不是不可逆转的（证据是：新自由主义力图肢解它）。我们也不能把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非常重要）简单地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它同时也（可能）是对异化的抵制，并且以此号召人们脱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圈子。

②资本的帝国主义目标仅仅是经济属性的吗？我们是否需要国家对历史中的作用也做一番思考？当然，我不认为提这个问题就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相反，它满足了人们的更高期待：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

③如果新自由主义继续下去并且最终达到了目的，新的全球化是否会在中心与边缘地区恢复积极的武装联系——在中心和边缘建立后备军，并重新赋予工人阶级革命的角色（阿里基 [Ar-

righi] 这样建议过)?

④苏维埃模式是一种国家形态 (这个例子说明, 一个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政治组织起来), 还是一种“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 它是否注定不会被反对它的资本主义暴动推翻, 而是, 就像目前事实表明的那样, 自然而然地发展演变, 最终成为“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⑤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本质是买办阶级。它算得上资本主义吗? 或者只是一个买办政治阶级而已?

第四章 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

如果说，单元决定论而不是多元决定论是各种支配社会因素的逻辑发生冲突时的特点，那么所有的社会革命（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中发生的革命）也必然是文化革命，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因为支配这种需求的逻辑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停滞），也就不可能有社会革命。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史很好地证明了我提出的这一假设。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只看做一个经济范畴，用普及的劳动产品市场（工薪阶层、自由职业者）和资本市场（这里理解为生产手段，它们也是社会劳动的产物）等字眼就可以加以概括；甚至也不能从更基本处着眼（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方法论），用特定的生产关系总和，这些关系总和又和更上层的及特定的生产力结构发生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经济异化的特殊性，它们对经济生活自治本性的确认以及意识形态对其他因素的支配能力——也同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我不能只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而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圣经》来读的人却常常这么做。我这样来表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复杂的特点：价值规律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而且也支配着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得更远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特有文化之上的（因此我把这种文化称为资本主义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它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1）个人自由（资产阶级对自由观念的理解）；（2）从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并获得独立的理性（前资本主义时代，理性与宗教信仰的调和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主要的问题）；（3）理性与解放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后者已经被严格的资产阶级术语（法治国家、法律上的平等等等）概念化了。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真正的文化革命的时代及其非凡成就：文艺复兴时代，然后一个世纪的启蒙运动及它在经济领域的表现（重商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建树（与以前的封建制度相对立的绝对君主制的建立），以及社会契约的形成和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新型国家（典型代表是美洲革命和后来的法国革命，后者尤甚）。这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三四个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从工业革命起，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最终成型了。

这一历史当然要对社会理论提出质疑。乍看上去，社会革命很晚以后才在经济（以工资制为基础的工业）和政治（多多少少实行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领域发生。上文提到的文化革命真是先于社会革命发生的吗？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待历史的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就受到了质疑。文化运动应该决定经济和政治运动。这就是韦伯的观点（新教产生了资本主义）。但这不是我对历史的理解。我看到的更多情况是文化、经济（组织经济生活、重商主义已经是向资本主义过渡了）和政治（绝对君主制已经是对封建制的否定，并且它还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阶级利益的历史性妥协）分阶段共同演变。在我看来这也是马克思的看法。

不管以什么方式，社会理论一直是人们质疑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把处在从重商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确切地说从

1492~1789年),位于大西洋沿岸、欧洲大陆的经济生活称做“原始资本主义”的话,那么,除了晚些时候的中世纪“西方”外,其他先进的氏族社会,如伊斯兰世界、中国和印度也存在过种种原始资本主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完成,似乎并没有同时发生有利于该革命的文化运动。那么如何解释欧洲历史进程的这种特殊性呢?

因此,我们迫切想用文化主义的观点做出解释。在基督教文化和封建欧洲文化中一定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因素(即特异性),是它们使得文化运动的逻辑和经济变化的逻辑奇妙地、奇迹般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在别的地方应该没有。因为其他地方的文化特性和它不同。

文化主义号召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上文提到的古代西方文化的特异性问题上。人们曾经使用过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一些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另外一些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有人认为使用以下方法便可以揭开谜底,即历史在其普遍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沿着两条道路前进,也就是说有两种发展方式:一种是亚洲式,生产方式是其中的主导因素,这种方式会“堵死”社会变革的机会。另一种先后表现为奴隶—封建制。它们赋予私有财产种种特权,特权使社会产生了变革的动力。在历史马克思主义范畴外,其他的一些文化主义分析,要么热衷于探究西方诸神(理性、普罗米修斯、民主)青睐的希腊祖先,要么则潜心探讨基督教的美德。我对以上这些以欧洲为中心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批评。有鉴于此,我的研究重点一方面是关于神话创造古希腊祖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各种宗教都普遍具有的灵活性问题。人们曾经错误地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有这种灵活性。其实,这种灵活性对各种宗教来说都相当普遍,因为我们在其他宗教中找到了相似的例子。总之,我注意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和当时的伊斯兰教(还有其他宗教)一样关注宗教信仰

和理智的协调问题，而资本主义文化革命一出现，这种协调就消失了。

于是，我对欧洲历史进程的特异性做出了我自己的解释，它从本质上来说一点儿也不符合文化主义者的目的。我把重点放在边缘地区氏族制社会生产方式的灵活性上，它正好与中心地区生产方式的僵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分别是封建时代的欧洲与日本）。由此我提出了历史上各个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假设。该假设与我提出的单元决定论的观点相互呼应。位于中心地区的氏族制社会，文化逻辑一统天下。有可能导致经济革命的逻辑则不敌文化逻辑，处于较弱的地位。相反，位于边缘地区的氏族制社会（我们称之为封建制的），它的文化逻辑因所在地远离中心地区而减弱。所以面对经济扩张的压力，它们就比较容易做出让步。

社会主义革命退出了现阶段的世界舞台。在我看来，它未竟的历史肯定了文化革命对历史的重要推动作用。

按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同义词，而首先是另外一种人类文明。我认为，引导人们创造一个新人（用“人”这个词是为了避免光提男人而忽略了女人）不是空洞的口号。如果没有新人类，或者谦虚一点儿说，没有更先进、更好的人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因此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新人应该是比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观拥有更多自由的人。因为超越了商品异化，社会会变得更加透明。当然，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历史的终结，因此上文提到的透明也是相对的，就像数学语汇里的草图，是在一定范围内的透明。首先是经济和政治决策透明——就是说，掌握了控制结果的知识。此外，民主也要求透明度。就是说，施行民主同时也承受自由可能带来的风险。在这些前提下，社会主义设计的自由比启蒙哲学定义的自由内容要宽泛得多。

但是，无论是1917年革命，还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都没能承认新人类的必要性。社会主义首先是理想主义。因为它自己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必要列举客观证明了。1917年革命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诞生。这以后所发生的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而是一场悲剧。苏维埃社会主义获得了热情的支持，但是它不可能不受外界制约，自由地实现先驱者的构思。它遇到了一个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回避了的问题，即现存资本主义固有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无法回避的“追赶”问题。苏维埃社会主义为“追赶”问题逐渐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从此建设新人类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斯大林时代电影人物的身上就表现出了这一点。人们逐步从新人类沦为享有社会优待（一种与社会民主主义无甚差别的观点）的工人，或者更糟，沦为了顺从而幸福的“小资产者”（难道还有其他更合适的形容吗？）。晚些时候，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它的应对方式不像苏联那样充满讽刺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做“宫廷”政变纯粹是荒谬的欧洲中心论！）

1968年：文化革命计划的又一个标志性时刻。这一时刻的到来绝非偶然，在其后创记录的整整两个年头里，它紧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8年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性：首先应该学会造反，造反运动需要触及“高层干部”方能罢休（出于现实需要，对“一代领袖”的崇拜，不知是否与这个斗争方向并存不悖？或者根本与它背道而驰？）；应该把劳动从经济异化的链条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代价吧，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必将被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文明建设所取代。

到此为止，文化革命计划和有待实现的社会革命计划还从来没有并存过。是什么原因使两者不能并存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释平淡无奇：中国文化大革命相对于它发生的时代来说是超前了。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最主要的现实问题和1917年后的

苏联一样，是“追赶”而非“超越”。“空想共产主义”劈头碰上了这些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尖锐问题，而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扩张政策的内在特点。由于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发现这一问题，不平等发展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但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又在其他地方冒了出来，确切地说它们出现在“被社会帝国主义腐蚀了”的、受“永恒”（为了对应“历史的终结”一词）的商品异化法则支配的中心地区里。这里，在这种否定商品异化观念的启发下，诞生了一些重要的想法。绿党成员、女权主义者、极端家庭及性自由主义者可能对这种观点加以吸收、利用。因此，不管怎么说，它都有效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中一些不可忽视的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惜这些所作所为发生在西方！

最初的一幕共产主义革命的悲剧根源于下列悖论：直到目前为止，文化革命意识和以变革生产关系为目的的社会运动意识没有互相配合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开辟的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创造了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持续时间短暂的俄国革命和其后比它持续时间长得多的中国革命都曾经声称要由此进行文化革命。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实现它们的梦想。此外1968年发生在西方的革命就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凭此就能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和它所设想的新人类是毫无希望、毫无前途的空想吗？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其先驱者的设想长得多的过程？凭直觉，我强烈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超越了资本主义局限的、做为人类历史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将由文化需求来主导吗？我将在以后的章节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第五章 从经济统治到文化统治： 价值规律的衰落和 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

我认为，目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展开新的讨论。讨论的主题应该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①如何从本质上来定义被人们当做社会和文化革命目标的共产主义？

②现代社会在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朝上述目标发展？换句话说，人们有没有把共产主义当做必须实现的目标而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③面对这一挑战，社会是朝着这个方向做出有效答复呢，还是将朝着更棘手的方向发展？

④在现实前提下，从资本主义过渡到上述目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怎样才能重新引起大家讨论呢？在这些思考的启发下，我们能有步骤有阶段地制定出一些相应措施吗？这些措施又是怎样的呢？

当代社会非常关注生活中的文化问题并有大量讨论，但其中大部分言论极端混乱、含糊。这种状况是一个时代信号。按我的理解，它首先是抗议这个时代的信号。这些言论的字里行间充满

了怀旧情绪。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边缘地区，而且也存在于中心地区。对前者来说，资本主义扩张造成的全球化最终导致了损害人民利益的两极分化；在后者那里，至少从1968年起，打了胜仗的重商主义就一直受到人们的非议。

之所以说它含糊，是因为迄今为止，这些抗议性言论除了激起怀旧情绪外，根本就不去展望未来，不锻炼自己用一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全球眼光去规划未来。相反，它们认为全球观点只能由资本主义提出，所以建议放弃它并试图转向过去。在我看来，逃避到过去不仅不可能而且极端危险。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团体主义者、宗教基础理论研究者，同时还有绿党和后现代主义者等等）采用“文化主义”战略完全可能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战略吸收利用，因为新自由主义已经世界化了，并且在现阶段大行其道。因此，无论是呼吁人们民主地尊重文化（团体主义、后现代主义）差异也好，还是宣称另外一些文化（种族或宗教神秘主义）完全不相容也罢，其实都不很重要。因为无论哪个主张，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面前都显得束手无策。此外，他们还认可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因为他们认为，问题出在其他地方并认为能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

然而，在这些普遍都有“复古”倾向的言论后面，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没有什么新鲜的。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初反抗不是也表现为对封建时代的怀念吗？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它们的暧昧含糊。

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文化的担忧有它积极的一面：它们预感到（未来的，有待建设的）“最好的社会”首先应该从文化建设开始。就像资本主义的建立是通过颠覆了以前的政治经济关系顺序，把政治对经济的统治变成了有利于经济（价值规律）发展的经济对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统治。在我看来，如果文化（我强调的是文化而非意识形态）不代替经济（我想到了价值规律的衰落）起

主导作用的话，共产主义就无法想象。

我强调是文化取代经济和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在谈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把重点放在了政治上。以下不乏暧昧的论述把这一点儿表露无疑：从长远来看，国家（做为一个阶级社会权利的表现）将会消亡，“对事物的管理将取代对人（当然也包括女人）的统治”。从中期看：在过渡阶段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的赞誉；值得商榷的苏维埃国家形式；被毛泽东主义更新后推出的文化革命论（政治统管一切）等等，一切最高尚的形式都在直接肯定政治的功能。

用劳动者（这里指工人阶级、工农联盟或者“全体人民”）的权力来取代资本权力的政治观点伴随“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逐渐成型，这一点绝非偶然。计划经济体制在崩溃并且重新让位于市场无政府主义之前，使这个“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计划有了具体形态。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仍然保留了“经济”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保留了价值规律的统治地位，斯大林在1950年承认了这一点。

价值垄断——它是经济统治的基础——和那种在政治舞台为国家张目的言论并非不相容。这种言论讴歌国家，讴歌国家为人民建立的计划体制。这种表面矛盾在政治贫乏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答案。而政治贫乏最终蜕变为为了“真正的政治”，也就是说，在（价值的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的并且最终无论何物的）“客观要求”的借口下玩弄权势。为政治恢复名誉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就必然要针对做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文化基础的价值垄断进行彻底批判，价值做为经济领域的基础和经济决策的基础是不用批判的。这种观察不单适用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残暴的价值专断同样摧毁了政治。因此，为政治正名、恢复其地位，借用德国朋友的话，必须向文化靠拢。它号召我们去

设想一种新的文明，一种不以价值约束为基础，不以与价值结合为一体的权力观念为基础的新文明。

走出行使权力的狭隘疆域，政治统治就变成了文明统治或文化统治，也就成了价值规律专制走向衰亡的同义词。但是，它出现在可行的日程上了吗？它是社会演变必须完成的客观目标吗？

（一）价值规律的种种变形

①马克思在著作中区别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概念——就这么短短几个字——也就是说交换价值，意味着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彼此独立的生产单位。生产单位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其所有权必然归属个人或者集体（土地、生产资料、劳动成果），虽然私有制在历史上是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国有或合作社所有的独立生产单位也能承担同样的功能。因此，这种独立性包含的意义仅仅是指：由各个零散的生产单位制造出来的“产品”是用做交换的，它具有一定的价格，该价格可以由买、卖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自由决定（当然要在一定的法规约束之下）。因此，产品就是一件商品，一种用于交易的、有物质形态的物品，或者一项服务。

包含在价值中的社会现实当然是可以感知的。因此，我们可以凭体验去把握它。但是一如既往，要深入而科学地认识事物，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可以直接凭体验感知的现象）。

这就是两种价值理论的分野。在资产阶级哲学里、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哲学中，经验主义的方法占统治地位。它只注重表象，在经济领域它只看到了价格的存在，把价值理论变成价格理论。

马克思的方法建立在社会劳动和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两个概念上，社会运动通过价格反映出来。生产是社会产物，也就是说，社会生产量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可以计算出包含在社会总产品量

中，直接和间接的社会劳动量。劳动的社会分工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在各种生产劳动之间，在构成各经济部门的独立的生产单位之间进行的社会劳动分配。价格间接体现了价值，价值是决定价格的最终因素。说它是最终因素，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尤其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资本归属、垄断程度（它使各种各样的资本受益）等都影响着价格构成。马克思的方法并没有忽略直接经验把握的现实——价格。在价值分配体系和价格分配体系中存在着单义的对立关系。只要根据既定的价值体系，加上影响价格的其他因素，如平均利润率，我们就可以把价值“转化”为价格。

如果人们（在计算价格的时候）希望得到的利润率与该产品增值部分体现的利润率相同，那么这种转化就不可能了。虽然设定这样的条件是荒谬的，但是我同意说这个假设条件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后者认为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利润率。如果上述利润率不是这样的话，内在的现实和肤浅认识所看到的现实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也就没有唯经济论的异化了。

这里我不再深入展开这些前提，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辩护。在该理论框架内，我要在后面展开的内容，旨在说明价值观念正在经历什么改变，这些改变为价值观念消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试着给出答案。答案的前提是假设各个生产者之间并非互相独立。

②价值规律表现为如下事实上：商品，也就是说由化整为零的社会劳动的产品，按照价值确定的价格进行交换。

因此，只有当商品满足两个条件时，价值规律才起作用：（1）能用明确的物质数量来表示，比如：一米印花棉布。（2）做为社会劳动的成果，它的生产单位能区别于其他的生产单位。比如：一家印染厂从其他单位买进棉纱，卖出印花布。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有效地计算出生产一件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量。这

里我不涉及关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转化的争论。

对于一个独立的企业，就该企业某条生产线上的制成品而言，产品处于生产的中间环节时，它就不具备商品的特征，因此也就没有实际的价值，没有实际的价格。例如：一个纺织厂具有纺线和织布能力，那么它从其他生产者手中买来的脱籽棉花就是商品，它既有价值又有价格。而它自己制造的棉纱却不是商品。如果在这家联合工厂旁边还有其他棉纺厂，那么这些工厂生产的纱既有价值又有价格，并为联合工厂提供了参照，以便计算工厂的内部效率。

但是，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个机构，它囊括了所有的生产线，那么价值规律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让我们这样来设想：假设每一件终端消费品都由一个工厂生产，该工厂能全部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间产品失去了商品特征。制成品通过市场实现其价格，市场是生产商的“供给”和最终消费者的“需求”相遇的场所。那么消费者的主观“喜好”是否会成为主导商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呢？完全不会。因为，如果消费者凭主观喜好压低了商品价格，使它低于其转换价值，那么这个综合生产厂实现的利润就要低于其他人。这时资本就会转移，压缩过剩生产能力。价值规律继续支配劳动的社会分工。

当然，这一派的假设站不住脚。因为生产部门之间互相依赖，不可能把所有的生产线都合并在一起。假如非这样的话，那么各个生产部门就得同时自己为自己生产机器设备。这样一来，成品生产需要的社会劳动分工便和技术分工逻辑发生冲突。只有把所有的技术单位都整合进一个工厂——国民经济（它是一个完美的封闭体）里，这种一体化的生产才能够想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中间产品——机器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在这些技术单位之间以及这些技术单位内部的流通，就不再是商业性的了。而成品则仍然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它有明确的报价，根据

这个价格，消费者可以自由决定买或者不买。这样我们又回到先前的假设。滞销是商品报价太高的信号，而黑市则是要价过低的信号。

根据不同的理论，我们可以设计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这种一体化经济。

第一个理论：我们承认劳动的社会分工应该继续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为了使该声明有效，我们应该承认技术生产单位的自主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它们所实现的利润率来评价它们。各个生产单位在计算参考价格的时候，其他生产单位向其提供的设备及其他生产投入也必须都考虑在内。这些生产投入或者由一个中央集权机构进行分配，或者在市场上随意购买。而参考价格决定了上文提到的生产单位要实现的利润率。如果把某些生产单位得到的补贴和另外一些单位缴纳的附加税忽略不记的话，那么消耗了一系列投入后的成品价格就应取决于该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中间产品的参考价，它不是别的，正是变化了的价值。所以说价值规律绝妙地决定了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经济亦如此。

第二个理论：我们否认必须把劳动的社会分工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经济计划当局为一系列的生产投入制定了参考价，并且顺理成章地用行政命令来确保这些投入在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的分配。按照这些价格，后者可能会实现一定的利润率，也可能实现不了。届时根据具体情况，中央政权或者发放补贴或者征收附加税（使用利润的转移支付手段）来暂时应付局面。在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之后，最终制成品的价格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它能或不能消耗掉中间的一系列投入，经济计划当局都将再一次通过补贴或者附加税来削峰平谷。毫无疑问，这种体制的效率要差一些：一些生产单位可能实现不了预期的计划，另外一些单位则可能处境顺利。作为做观必然的价值规律用它自

己的方式对否定了它的中央政府进行了报复。

③让我们重新回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具有双重的社会性。首先，因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产品是众多劳动者集体劳动的成果。他们之间的劳动技术分工以及一系列不同的资格要求当然都是由社会标准而非价值规律来决定的。由此我想说的是，工资级别代表的不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关系。复杂劳动是具有一定资格的劳动者的行为，培养他们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或者学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几倍。如果说这种关系曾被做为划分工资等级的标准，那么该等级的差距也只可适度而不能过大。假如一个人一生中可以劳动的时间是30年，而培训的最长时间可以是15年的话，那么它大概就是1.5~1的样子。当我们计算生产一件产品所包含的直接（简单）劳动或者间接劳动的总量时，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如下结论：简单劳动力的价格（非技术工人的基本工资）总体上低于其价值，而复杂劳动的价格则高于其价值。干部们当然不参与创造剩余价值，但他们却参与了分配。如何解释实际的工资等级呢？经济理论在这里显得既无能为力又啰嗦。从整个教育系统来看，不同资格要求的劳动的供求本身就是生产产品，是劳动者的社会劳动结果。这里，“边际生产能力”对工资的决定作用本身，同以往一样是纯粹又简单的同语重复。把劳动者的集体劳动成果变为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价值规律就这样只对工厂敞开其活动的大门。

价值社会性的另一层含义是，一个单位的生产离不开其他单位的合作，后者向它提供设备、投入；为其商品提供运输和商业服务等等。价值规律表现了这种互相依赖的调节方式。

然而价值的社会内涵是通过个性化的供求价格来体现的，也就是说，它表现在形形色色的买方和卖方所追求的价格上。这些价格可能会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价格的实现有赖于各种各样的前提：有时它取决于一个特别的生产单位自身的特殊状况；有

时又取决于所有单位与该单位的产出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一致还是不一致，平衡还是不平衡。

虽然这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并且存在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阶段，这个矛盾更尖锐了。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产品销售由分散的自由竞争变成了由卖方控制市场的垄断。垄断导致了价格的扭曲，价格不再是由利润率转化而来的价格。当众多垄断同时介入长而复杂的生产链时，这种扭曲效应就更加明显。以前，价格是价值规律运转是否合理的反映，现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种意义，而且它也几乎不再只是工厂进行核算时的内部参考价。

第二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马克思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只划分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两个部门，第一产业生产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第二产业生产消费品。）为了消化不断增加的过剩，第三产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其他著作里有专门的探讨，所以就不再这里继续讨论了。我支持斯维兹先生（Sweezy）提出的观点。我只提醒大家注意第三产业在结构上不均衡。它包括了用于购买物资（首先是军备）和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等）的公共开支。

此外，各种服务本身也有质的区别。一些服务和物化的产品没有区别，做为生产投入服务于商品的制造过程（如运输和销售服务、对企业的金融信贷服务等等）。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们当做能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来对待。另外一些服务参加社会交换则是为了赚钱，也就是说，卖方提供它们是为了供买方直接消费。相对于生产物质财富的行业来说，目前整个服务业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可以说其发展是一日千里，欣欣向荣。

第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入。对这个问题我也不再进一步探讨，因为我曾就世界范围内的积累问题做过专门论述，而全球化问题是它的核心议题。这里只介绍我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在现

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世界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起作用的价值规律不是我们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推导出来的抽象的价值规律，而是世界化的价值规律。它系统地扭曲了价值规律，因为在生产效率相同的情况下，位于边缘地区的劳动报酬低于中心地区。如此一来，原本应当是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核算参照的世界价格体系，成了双重价值变化后的产物。

④现在我来着手讨论价值规律的一个新范畴。这个新范畴的出现为价值规律运行增加了新形式。生产的自动化则是它出现的直接原因。所谓自动化就是指：直接劳动减少，间接劳动增加——工人只负责监控、维修自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自动设备本身也是由另外的自动设备生产的话——该假设自然是以当今的技术水平为前提——那么，劳动似乎就从物质生产中消失了。这种消失意味着价值和价值规律的消失吗？或是相反，意味着社会化的彻底实现、至善至美？

我的问题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即整个物质生产从头到尾全部自动化，其中包括自动设备本身的生产、中间消费资料及最终消费资料的生产。

这么一来，我们就得考虑四种产业，如下。

生 产					
投 入	1 生产资料	2 成品	3 中间服务	4 最终服务	总和 均衡的物化量
生产资料	P1	P2	P3	P4	P
中间服务	S1	S2	0	0	S
普通劳动	0	0	T3	T4	T
社会管理工作	T'1	T'2	T'3	T'4	T'

(1) 第一产业：生产生产资料：机械材料（自动设备），其他中间资料（原材料）等等，假设为全自动化生产。

(2) 第二产业：生产成品。假设为全自动化生产。

(3) 第三产业：服务业。该服务做为生产投入为前两个生产部门服务：比如研究和开发自动生产线（为新产业部门服务）；为老经济部门的生产提供服务（运输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等等）。由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后者也部分实现了自动化。

(4) 第四产业：生产服务。这类服务的本质属于提供个人和集体的最终消费品。该部门也部分实现了自动化。

根据前面的假设，第一和第二生产部门都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即所有的生产线都是自动化的，那么这些部门消化的直接劳动就等于0（事实上，还存在一些必不可少的劳动，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我们把拿薪金的劳动者分为两类：普通劳动者（全都具有一定的资格，但层次不同，不过他们之间的差别不是无限的，而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和从事“社会管理”（如生产机构、决策机构等等）的劳动者。假设第二类劳动者的工资是第一类人的四倍。

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表：

第一行：做为中间消耗品物质单位（自动机械和原材料等），分布于全部四个产业部门（P1, P2, P3, P4）。

第二行：S个单位的、做为中间消耗品的服务，分布于第一和第二产业部门（S1, S2）。

第三行：普通劳动的分布，T百万劳动者/年，全部就业于服务部门（T3和T4），因为有形的物质生产已经被假设实现了全自动化。

第四行：社会管理工作的劳动分布，T'百万工人/年，从业于全部四个产业部门。

我们赋予每个物质单位如下的单价：

(1) 一件机械设备的价格： p_1

(2) 一件消耗资料的价格： p_2

(3) 一项中间服务的价格： p_3

(4) 一项最终服务的价格： p_4

(5) 普通工人年薪： w

(6) 社会管理工作的年薪： $w' = kw$ (假设 $k=4$)

① 机械设备的生产，即第一列的总和 ($P_1p_1 + S_1p_3 + T'_{1w'}$) 被全部四个产业部门 (第一行的总和： P_1p_1) 的需求所消耗。

② 中间服务的生产，既第三列的总和 ($P_3p_1 + T_3w + T'_{3w'}$) 正好符合人们对中间服务的需求 (第二行的总和 S_2p_3)。

③ 工资总和 (工资： $T_2w + T'_{2w'}$) 被人们物质 (第二列： $P_2p_1 + S_2p_3 + T'_{2w'}$) 和服务 (第四列： $P_4p_1 + T_4w + T'_{4w'}$) 的最终需求所消耗。

我们介绍的目的是不是要探讨这一线性方程 (平衡在其中得到了表达) 是否能成立 (如果不成立就没有答案)? 它确定 (就是说对价格体系只有一个解, 即一种解决方案)、或者不确定 (指有无数解, 即无数种解决方案)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也不是要讨论有否可能来计算经济总量, 更不是要讨论这类系统是否具有协调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能力。事实上, 我赞成这个广为人知的观点: 光有经济理性产生不了人们想要的平衡, 更别提稳定的平衡。因此, 如果说现实或多或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平衡的话, 那也是经济逻辑和不可或缺的其他逻辑诸如社会、政治逻辑等共同作用 (互相冲突或者互相补充) 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试图论证纯经济是荒谬举动的原因, 想用它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企图也是徒劳无望的。

以上介绍只是为了举例说明, 经济制度演变带给价值规律的种种变形, 由于价值规律的社会性在不断加强, 所以严格的经济

理性再次受到了质疑。

自动化对价值和价值规律构成了挑战。社会管理工作从其主要的本质方面来看，既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地服务于生产性劳动，它只属于对剩余价值的使用。

价 值					
投入	设备资料	成品资料	中间服务	最终服务	总价值
1 设备资料	$P1p1$	$P2p1$	$P3p1$	$P4p1$	$Pp1$
2 中间服务	$S1p3$	$S2p3$	0	0	$Sp3$
3 一般工资	0	0	$T3w$	$T4w$	Tw
4 社会管理工资	$T'1w'$	$T'2w'$	$T'3w'$	$T'4w'$	$T'w'$

在上表中，国民生产高达 $Tw + T'w'$ ，其中 Tw 是劳动者的工资总额。而剩余价值—— $T'w'$ 则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了组织、管理生产，并从中提取好处的管理人员和领导。这种新型的资本报酬形式代替了旧的利润形式，它与各工厂控制的资本成正比。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认为，（垄断的工厂）在实际计算产品价格的时候，除了要加上生产投入的花费和劳动力费用外，它还加入以工资形式支付给了管理人员和领导的资本报酬（与资本成正比，但比率到底是多少要视具体的竞争情况而定）。在这笔资本报酬之外的纯利则变成了可忽略不计的（在我们的表中它为 0）价格成分。请注意，在整个剩余价值中还包含有（按照斯维兹先生 [Sweezy] 和巴朗先生 [Baran] 的理解）生产过剩部分。这里，它们被终极消费服务消耗掉了。其中一部分消费是个人行为，但主要部分还是集体消费（公共支出）。

如果我们把物质生产部门与其他部门分离开来观察的话，该物质生产部门投入的生产性劳动就是零。由于生产过程中不再需

要具体劳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凝聚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只有中间服务型的（尤其是教育、对自动设备的研究和发明工作）间接劳动，劳动剥削现象就消失了。只有把第一、第二、第三三个产业部门整体当成经济构成来考虑的时候，劳动剥削现象才会重新显现出来。但即便是在这个范围内，也仅有一小部分的劳动者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有联系。大多数的受剥削者受雇于终端服务的生产部门，从事终端服务的生产。这些服务一部分直接针对个体消费者，另一些则是消耗生产过剩的方式。因此，这些劳动者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剥削的，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传统意义上的被剥削者的社会地位是完全类似的。

看起来，重新分割整体收入是剥削的主导方式。价值只有在这个融为一体的整体范围内才有意义：社会产品在普通劳动者构成的无产阶级和社会管理层构成的资产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当然，价值规律的变种在这个规模上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社会效应和决定性的政治作用。

只有社会处在唯经济论影响下，保持着异化状态，价值规律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的出发点，他把价值和商品异化联系在一起。只有换一种观点和方式来管理事务，让管理层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管理层，我们才能克服异化。换句话说，就是要成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权力机构，人们通过它用集体协商的方式来决定生产方针问题，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由那部分表面顺应了经济规律而获得合法权利的少数人（他们不但决定给自己开支，而且拿高工资！）决定，尽管他们也是以集体的名义。

如果办不到这些，价值规律的变体就照旧支配社会，通过垄断公司之间的竞争继续统治世界。

资本主义的内部演变使生产具备了社会性。但是，最后的关键一步它还没有迈出。这最后一步意味着变革意识形态、政治体

制和社会体制，创造出摆脱掉商品异化的民主社会。只有这样的变革才称得上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无法实现这种过渡，我们社会的许多层面将向上述的那种社会靠拢，公司丧失独立性，融为一体成为国家财产，最后变为绝对垄断，然后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主要形式。我们从中不难看到苏维埃的影子：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个社会中，一个资本家代表了全体资产阶级。

（二）结论：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思考

我在最近出版的《世界化的挑战》一书的结论里，已经大谈特谈了过渡问题。我这里就不再重复已经讲过的论点了。我只想扼要地指出，资本主义具有三大基本矛盾（经济主义的异化、世界范围内的单极化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它们标志着资本主义劳动剥削方式的特性），只有我们的经济政策、政治和文化计划能削弱这些社会矛盾、而不是加深它们的时候，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的行动才开始启动。根据过渡期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观点，在过渡期内，无论是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同一个社会内试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和我们称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会产生对抗。这种看法与以往社会主义者提出过的传统过渡形式完全不同。

根据唯意志论的既有词义看，我提出的过渡战略不是唯意志论的（它是非现实主义的同义词）；但是它建立在以下观点的基础之上：历史永远都可能有若干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不但变动的地点会变化，冲突的地点和实现那些得以确定他们信誉和合法性的社会计划的地点也会变化。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意思来理解，这种可能性就是客观必然性，它来自我在第三章提出的单元决定论的观点。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把这种特殊的可能性（同时也是人们期

待的)发生的条件和不同的发展道路(未来的发展规划)混在一起讨论。当然后一种讨论也是必须的,因为它提醒我们注意,目前正在战场上对抗的各种力量是如何影响着未来的。我看到这个或那个提出了若干极端不同甚至对立、但通常都有一定成分的假设时,丝毫也不感到奇怪。

最悲观的一种看法认为: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建立另外一套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内在规律、即以上提到的三种矛盾支配的人类文明。根据这种观点,历史将继续它曾经走过的道路,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将是人类历程中不可超越的阶段。按照福山先生(Fukuyama)天真的说法,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这种事先预见人类只能重复以前的发展轨迹的可怕观点只能让我们联想到战争,除此无它。战争只能以死亡告终,而人类也只能无可避免地奔向这一悲惨结局。相比之下,米歇尔·勃德(Micheal Beaud)的看法虽然也不乏忧虑,但其中积极的成分更多一些:他指出(很遗憾他的论述的确有说服力)当地社会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技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有效统治着大企业、跨国垄断集团的资本经济逻辑、造成商品异化的文化力量和各种政治手段,假设其中部分是民主的——还没有发展到要用尽其毁灭人类和破坏自然的全部潜力的地步。在我看来,这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许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其中就包括刚才那个可能马上会发生的,尽管它是我们能够设想到的所有情形中最糟糕的一种。

我们始终沿着从抽象到具体这个路径走下去,再下一级就会提出如下的具体问题。

①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类似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心吗?它们能够削弱单极化现象,同时又不触犯经济异化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②是否会有趋同运动发生,使中心区(朝向不发达)与边缘

地区（采用相同的语汇应该说，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靠拢，由此开辟出均衡发展的世界化，这仅仅是前奏，紧随其后的将是对其资本主义实质的超越（乐观的假设），或者是不不可避免地走向野蛮与灭亡（悲观的假设）。

我已经说过，这个的也好、那个的也罢，总之无论谁的观点都不容忽视。我们不知道下述问题是不是有学术价值：对时下不断高速发展的那些经济实体（尤其是东亚地区），几个孤零零的现代化小岛能逐渐缩小包围着它们的“不发达地区”吗？或者它们继续保持孤立，并陷入一种新的从属于人、与世界脱节的境地？这种状况正是边缘地区在当今仍然呈两极分化的全球系统中所处地位的真实写照。这不是毫无意义的那种经院式问题。断定哪个答案最可能符合某些中等国家（韩国、可能日后还有泰国和马来西亚），或者大国（中国和日后的印度）的具体情况，不能算是进行了无用的讨论。相反，这是我们日后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出发点。现在我不打算具体论述这些领域里的种种政治经济学论点，我只说明我的观点。我认为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积极答案——也就是说形成新的中心——的可能性不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解释过的中心区掌握的“五种垄断”。它们不仅会用新形式制造，还会加深资本主义的单极化发展。当然，还有其他人也持有我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具体分析强化了我的论点。（比如吉川先生 [Yoshikara Kunio]，黛·奥克海齐女士 [Diana Hochraich]）

对同样的问题，利比滋先生（Lipietz）和阿里奇先生（Arighi）做出了另外一种极端对立的假设。他们认为：新一轮的世界化把中心和边缘地区的发展模式拉近了。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旨在肢解美国和欧洲的“福利国家”，从福特的规范化模式退回到以通过削减劳动报酬强化竞争的泰罗非规范化模式根本算不上是理论假设。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它会像利比滋先生（Lipietz）冒

失地影射（它势必引发人们的思考）的那样，把美国变为另一个墨西哥吗？阿里奇先生（Arrighi）曾经说过：经济全球化沟通了常备军和后备军，无论是边缘地区还是中心地区，今后二者都会无处不在，它们在地缘和政治上的分离状态到此也就结束了。这里我不再详细评论这些论点，因为我在其他的著作里有专门的论述。据我看，这些观点太短视，推论走得太远了。在我看来，虽然处于集体消费阶段的社会集团会调动强大的力量来抵抗“倒退”，但还是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例外情况：一个世纪以来，阿根廷不就是发生持续衰退的典型吗？我的论证走得更远：与这种发展相关的经济模式走进了经常性的消费不足/金融化危机的死胡同。因此，它维持不下去了，它还因此再次为斗争创造了条件，使人们得以反抗它赖以存在的逻辑。斗争的矛头也会指向经济异化吗？它会拒绝世界的单极化和对自然的破坏吗？有这种可能。

这么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担心的主要问题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漫长过渡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始呢？

科技革命（信息化—自动化）已经使交换价值开始慢慢发生变化，这样一步一步发展下去，交换价值的专断地位就可能走向衰落。今后劳动的社会化将会进步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做为财富衡量尺度及分配标准的价值规律的经济理性衰竭了。塞柏先生（Sebai）和维尔塞洛先生（Vercellone）曾经及时而有力地引用了马克思所设想的“普遍智力”观念来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该观念相对于它被提出的年代来说，超前了整整一个世纪。届时，公民资格所得会取代劳动力价格工资，并将做为一种客观现实普及开来，这正如戈尔（Gorz）先生所描述的：“工资的分配不再与其付出的劳动数量相关，不再有劳动和劳动者一说，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和应该受到酬劳的公民。”

但这儿的问题是，是哪个公民的收入呢？人们迫切渴望以政治国家为参照，来定义公民资格收入。如果要推行公民资格收

人，一定属于政治国家范围内的措施。然而，如果只局限于国家这个范围，就又与价值的世界化构成了冲突。哪怕这种局限性只是局部的，它还是会削弱生产系统内错综复杂的依赖关系所具有的意义和效力，生产系统的“自动集中”性也因此受到了削弱。虽然支撑着价值的市场已然支离破碎，价值已经具有了世界性。具体点儿说，如果不是为了造福于本国公民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搜刮资源，中心国家的实际工资还会是它现在的样子吗？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我们谈到的公民资格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公民资格了。公民资格收入应该被看做是地球上所有人的收入，或者至少也该部分如此。因此，公民资格构成的国家收入就应该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权利及价值的再分配。

从战后到目前的危机（1945~1985年），人们采用的策略以三个历史性妥协为基础，既西方的福利国家（福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东方的苏维埃主义和南方的民族发展计划。三者全部建立在价值规律支配领域的扩张上。其中福利国家的情况突出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它的传播以受价值支配的生产扩张为基础。南方国家的民族发展计划也未尝不是这样，而苏维埃模式也难免此“俗”，虽然在它那里价值的专断作用被国家计划体制粉饰掩盖住了。

未来起始于今天，我们为它构想的策略不应该再是过去的“重复”。它一开始就应该以推广非商业化的社会活动为基础，并且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展开。只有从这种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构想出一种有一定约束的世界化，这种世界化能够削弱单极化现象（这样看来，北、南合作堪称这种类型的世界化），认真考虑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只有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发展才有意义、行得通。

第六章 后现代主义还是 粉饰过的新自由主义空想

在第二章里，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先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起过主导作用的种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

我选择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心来展开我的命题。保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言论连贯的硬核是自由主义的空想。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不仅是现代社会受人欢迎的调节器，而且它还具有自动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它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起作用而无需外力的介入。但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才表现为这么一种极端唐突的形式。实际上，两类与单边逻辑无关的因素左右着现实资本主义的运转：其一是社会各种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做为资本主义永久标志的劳资矛盾由此诞生。其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先后标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只有满足了上述关系的客观需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体系才行之有效，也就是说，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繁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提议把主导思想史理解为以下言论的总和：自由民族主义言论、社会和国家的言论、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言论。

我虽然要重点分析这个基本范畴，但是我不认为一个时代的

社会思想能简单地归结为这几种思想。社会思想必然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它必须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考虑进去。因此社会思想必然是分散在不同领域的，了解了不同领域各自的特点，社会思想才能得到发展。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换来认识的提高，仔细而睿智地观察了现实世界才能算是付出了获取知识的代价。剩下应该做的就是，针对从个别领域进步中引出的结论，随时了解它们是否都相容。从中得到的知识是否是零散的，且无望超越这种状态呢？或者能否重新组合知识，把那些零散的知识加以梳理后重新组织在一起，赋予它们新的力量，乃至在与它相关的敌对观点中汲取知识。

对这个永恒的问题，人们给出了极富哲理的答复。古代的所有哲学都以该问题为核心，以一种固定的形而上的形式展开的：宇宙间存在着一种秩序，统治着社会与人类。哲学的责任至多是通过先知的口去发现或了解这个大家必须服从的秩序。

与这种哲学的决裂促成了现代性的诞生。从此，我们迈进了自由的年代，但同时不安全感也随之而来。神权的解体，世界的觉醒为人类张扬理性开辟了道路。人类从此被唤醒，开始懂得是他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他能够并且甚至必须这么做，为此他得做出选择。现代性就是由这一决裂所确定的。通过决裂，人类摆脱了宇宙秩序的统治。我本人和许多其他的把这种决裂称为进步的人都认为，这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秩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此外，我还认为——并且经常说——古代形而上学的异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也称之为氏族制社会的社会制度的再生是必须的。而超越这种异化则导致了社会制度的质变：由氏族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这里我使用“超越”而不用“废除”，因为我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虽然穿越了漫漫历史，人类依然是崇尚玄学的动物。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我们这里姑且不论。

因此，这次意识形态的超越就是肯定自然与社会的分离，有

人甚至于要求必须把受自然规律支配的领域（它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和受社会“规律”支配的领域完全分离。因为人类自己创造历史，所以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我一直坚持对这两者做出区别，并且以后还将继续这么做。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不断提到。有些人不接受该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向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靠拢。但是，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可行，而且会导致社会科学的扭曲、变形。所以，我建议大家采用社会思想的说法而不说社会科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用“科学”一词就可以在社会思想研究中抛弃科学精神。

在我看来，现代化的定义不是别的，正是我上文提到的哲学决裂。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定义。因此，现代化既没有完成也没有结束；相反，朝向未知领域的大门一直敞开着。随着人类社会知识的增加、积累，大门外面的未知领域渐渐在缩小。不过我们对社会的认识永远都不会穷尽，现代化也永远没有尽头。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挑战方式和回应的方式不同，现代化的形式也就不尽相同。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思想总是徘徊在两种企图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它希望把人类塑造成自由撰写自己历史的作者；另一方面，它又确认，客观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非接受不可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的统治地位表现在经济成分的自治性上。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自然界里那些按客观规律行事的物体。占统治地位的言论总是讲，要服从这些大名鼎鼎的、他们所谓的不可回避的经济规律（按其庸俗的说法就是市场）。它们同样也谈做为客观力量的、人们必须加以接受的自然规律，甚至“自然状态”。但谈论的方式更含混，并且通常更粗糙。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先有启蒙运动才有现代化。否定自然状态是现代化的定义。它号召人们从自然法则的淫威下解脱出来、把全部权利赋予享有立法权的公民。但是，正如人们在后来看到的，向后

退缩，退到服从所谓的自然要求始终隐藏在资产阶级思想深处。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基因学到用神经学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企图，社会思想领域的偏颇一直持续不断。不过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鉴别。

如果说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命题是现代化诞生的标志，那么，它虽然为社会思想确定了提问的范围，但却没有对这个疑问做出相应的答复。谁是历史的主体？个人，全部个人还是其中一些人，社会各阶级，性质与地位各异的团体与组织，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民族和社会？这部历史是如何写成的？这些历史的主体调动了怎样的现实呢？它们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为什么？对这些策略的效力进行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又是什么？它们的行为改变了哪些现实？这些改变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与它们事先确定的目标相一致？又在什么程度上与其相左？所有这些永远有待人们解答的问题只是提醒我们注意下列事实：现代化是个永恒的运动过程，它不是一种已然定型的社会制度，因此也就不不能给它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

然而，历史并不是沿着一条事先已为人知的直线，朝着一个不变的方向发展运动。这样一些阶段组成了历史：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前进，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或者干脆走入死胡同，以及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

按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平稳的发展阶段就是保障其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再生的积累阶段，每到这种阶段，人们都会倾向把历史看成是一帆风顺的发展直线。在这个时期，历史好像理所当然，不可逆转地沿着已为人所共知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时期，社会思想似乎能够结晶出一些有分量的东西，既被处在危机中的社会思想所嘲笑的某些“宏伟论调”（资产阶级民主计划、社会主义计划、民族建设计划等）。现实社会某些领域的特殊知

识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融进了这些宏伟的建设计划中去。

相反，如果保证社会稳定再生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形成以后，社会的发展方向一时又看不清楚，危机就会在这些表面给人安稳感觉的庞大建设坍塌之后爆发出来，后者的弱点也会随之暴露无遗。该阶段的社会思想也因此变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这种分裂状况滋生出了种种流于偏颇的学说，重新整合思想界混乱状况的任务就变得困难重重。

按我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史由第一种类型时期的交替组成，它结束于我们目前所处的危机阶段。因此在第二章里，我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先后具有的形式进行了分析。这里，我想对该分析做些补充，我认为二战以后，历史进入了现代性诸形式逐步解体的时期。

现代性真像日常大家津津乐道的那样已经过时了吗？我认为根本没有。因为，如果说现代性只是意味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话，那么它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被超越的地步。当然，处在我们目前的深重的危机时期，人们常常被诱惑着往后退，退回到现代性以前的阶段里去，并且辩解说，人们相信或者是曾经相信自己创造历史的说法，或者说人们能够自己创造历史。但是，历史的发展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发生的一切让人压根儿摸不着头脑，更别提去采取什么相应的行动去适应它或者对它进行建设了。因此，除了建议人们退回到胸无大志的状态中，就是尽力管理好这个毫无意义的历史。尽力管理好就是对多元化进行最基层的民主管理，建设人们所说的《舒适环境》，改善这个或提高那个，仅此而已。但做为交换，人们必须从本质上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现有的一切，特别是市场决定一切的规则、也就是说接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明白之所以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因为前段历史中某些宏伟蓝图、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有民族国家建设及其他的一些宏伟计划的枯竭甚至破产，造成了不小的混

乱。但是，对中个缘由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更不意味着这种状况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显然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然而在我看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论点就是这样几条内容。现代性的基本观点——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不意味着历史上任何时候，人类（整个人类或其中一部分）的行为都必然符合某些计划的逻辑，并且这些计划又是历史（应该或者能够）发展方向的具体表现，也不意味着该计划（或者这些互相冲突的计划）都必须是有行之有效的。否则就显得要求太过分了。即便这种诱惑确实存在，并且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还有突出的表现。现代性基本命题的全部含义只限于说明，社会行为能够赋予历史一定的意义，仅此而已。

然而，对后现代主义这种最新的表述持否定态度是站不住脚的。这就是为什么各个社会对要求它们悄悄地尽量后退的要求表示不满的原因。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极具影响力的现实运动相伴而生，这些运动号召人们回到过去，回到以前的年代。

伊斯兰基础理论研究为这种号召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它居然胆大到说，除了上帝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立法者，社会应该停止创造管理社会的法律。我已经说过，这种态度来源于伊斯兰社会在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败。停止制定法律的要求会使社会陷入绝境，因为它意味着拒绝寻找失败的原因、拒绝采取措施应对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拒绝面对现实承担起创新的义务。从全球角度看，这种“脱离历史”的企图只能把它自己置于无法解脱的边缘化的下降旋涡之中，为更惨重的失败埋下祸根。“脱离历史”既不是伊斯兰社会的特产，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随着革命力量的后退，反动势力往往便开始嚣张，这种荒谬的野心就会随时出现。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约瑟夫·德迈特（Joseph de Maistre）就曾经宣称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放野心是应该抛弃

的空想，应该放弃现代民主立法的疯狂想法，因为“只有上帝是合法的立法者”，遵守其法律的传统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抛弃。

在某些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对后现代主义的摒弃采取了另外一些表现形式，也许不那么惹眼了，但丝毫没有改变对它的否定态度：龟缩在民族、反民族或者种族团体里是这种态度天天可见的明证。然而，这种退缩与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通过管理日常事务把民主付诸实践的真诚期望恰恰相反。它孳生了因循守旧和敌对仇恨，以及各种各样蔑视民主的沙文主义。（参看《在种族问题攻击之下的民族国家》，阿明著，L‘HARMATTAN，1994年出版）

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消极的空想（与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改造世界的建设性空想相反）。它表达的始终是屈从现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要求这样一种意愿，总试图以“人道”的方式——空想——来管理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后现代主义之前还存在有“一大论调”，它断言：“现代性失败了。”就凭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说该论调极为浅薄，它没做任何分析就枉下结论。现代阶段同样是人类获得了最大限度发展的阶段，它的发展步伐是现代化以前的年代根本无法比拟的：首先，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科学认识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其次，在民主建设方面也成绩骄人，虽然不足仍然存在，甚至有时还出现倒退；此外，人类还取得了社会进步（哪怕它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种族的进步（以下观点都是现代性的产物：人类的全部生活都是不可替代的；个人的幸福，集体成员，种族成员都无法取代的个体生活。）当然这些进步——我斗胆使用这个已经不再流行的词——的取得并非一帆风顺，人类是通过斗争才获得的，而且它们始终受到威胁；而后退的危险也一直存在着，比如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触目惊心的累累罪行等。但是，由此就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泼出去并且说……还是以前好……，或者

只是动嘴说，由于出现了这些“败笔”，我们应该放弃斗争，别再斗胆向前进了，管理好现状就行啦等等，在我看来同样是既无必要又无用处的鲁莽言行。

正如人们所写的那样，因为曾经出现过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断言现代性的破产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希特勒不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他公开否定了启蒙运动的所有思想。希特勒废除了启蒙运动取得的成果，取消了公民和民主观念，想代之以文艺复兴前的集体秩序。我们应该说希特勒是基督教的产物，因为纳粹主义诞生于基督教土壤，或者说诞生在白种人或雅利安人的土地上。诸如此类轻巧的笔战论据对任何一种略为严肃的分析来讲都毫无价值，但其意义恰恰可以被反民主的敌人立即捕获并利用，它助长了主张回到文艺复兴以前去的怀旧情绪。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完整主义者就立即控制了它们，并且反过来说“我们早就说过，现代性一文不值，应该回到传统秩序中去”！这类言论滋生出的混乱恰恰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所不希望看到的后果！

现代性永远有待完成，只要人类存在它就存在。今天，构成其局限性的根本障碍仍然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后现代主义所不愿意看到的是不断的发展使人们产生超越资本主义的愿望，即使这种愿望是不可能立即实现的。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现代性的种种“败笔”和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等现象，不仅是上文提到的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产物，而且还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阶段，虽然它自身充满矛盾，但它仍然是进步的同义词。因此人类目前仍然面临的抉择还是：要野蛮还是要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概念和启蒙运动是理性和现代化的同义词。因为后现代主义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概念，所以，那些和它对抗的著名论断对它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当然，所有这些“宏伟论调”都建立在解放——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另一种说法——这一

抽象的观点之上，并因此分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放计划。启蒙运动在理性和解放两个概念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对应关系——它甚至把两者变成了同义词：理性如果不服务于解放就丧失了意义；而解放如果不以理性为基础也无望实现。然而，这一共同点还不足以使我们混淆以下两个计划：资产阶级为其公民和个人制定的民主解放计划及对等的社会主义计划。前者的实现方式，是建立法治国家、大兴教育，但前提是尊重资本主义的根本要求（财产、企业、工资制、市场规律等等）。后者则明确打算要克服前者的缺陷。同样，我们也不该只满足于确认两者的失败（资本主义大众化和与此相关的民主的欺骗性；社会主义计划的误入歧途），然后下结论说，我们再也不愿继续给历史确定方向了。可能谁是这一意愿主体的问题将永远有待回答。它不意味着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主体（比如无产阶级）都保持不变，也不意味着我们一下子就能给一个解放计划确定好最终目标（“全部、立刻”，就像人们在1968年说的），而忽略了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现实挑战，这些挑战将决定它在不同阶段的前进方向。此外，它还不意味着苏维埃主义的失败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社会主义的失败。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更精密、更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些失败——但不能就此否定它们，或者看轻它们的意义。不能把它们说成是荒谬的解放观点的必然结果，而是要把它们和现存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状况结合起来看。只要以这种精神为指导，即便是苏维埃主义的失败也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客观的交代：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还是一种形式特殊的资本主义（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的失败？它的失败是否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

但是，我们应该再进一步。当人类宣称自己创造历史的同时，就给行而上学鼓吹的安全性——或者虚假的安全性——画上了句号。但是，没有风险焉能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在

创造了最好的同时也滋生出了最糟的原因。面对纳粹主义和被斯大林篡改过的社会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想提醒人们，关注现代性所特有的矛盾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思考，但不幸的是当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浅薄言论把它导入歧途。启蒙运动缔造了法治国家，但也造就了萨德（Sade）（甚至还有尼采）。当然，对他们的著作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但把它理解为对暴力的歌颂也是确定无疑的。道德秩序的捍卫者们总是到处搜罗自由带来的种种矛盾，然后用它们来攻击自由。但是“肉欲”——我们这里借用伊文·本诺（Yves Benot）的说法——却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可以说它穿越了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在现代社会以前就已存在。虽然道德秩序的捍卫者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掩盖这一点。因此，对上文提到的“肉欲”（超现实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对此无疑都有过一定的贡献）保持最清醒的认识始终都很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地与之斗争或者限制它的负面效应。无论如何，事实摆在那儿并且向我们表明，如果把“过分自由”（比如性自由）所招致的危险与过分压抑带来的社会危险相比较，显然总是后者更要命。事实上，在后一种类型的社会里（比如阿拉伯半岛），形形色色的原始暴力行为始终比被斥责为“道德堕落沦丧”的“西方”世界发生得更频繁！从最基本的事实来看，全世界生产的全部色情印刷品有一半都被这些地区消费，大家知道吗？道德秩序从来都没有奏效过。自由万岁！

同样，我们也不要吧解放计划的宏伟蓝图和解释社会运动的普遍理论相混淆。的确，只有社会实践一帆风顺时，理论才能让人信服，而社会一旦陷入危机，理论的影响力就大大降低。在目前的危机到来之前、即在战后的阶段里，某些普遍理论的确取得了胜利，尽管它们互相之间都相去甚远：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等等。不过这些理论的社会地位并不相同。与

资产阶级主流思想相关的那些理论试图解释社会，但不想改变它。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即如此，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想在内的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个基本立场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甚至因此无愧于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的称号：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挺合适，他们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以某种方式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在它们眼里该制度无法超越。而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这样。它当然也在解释社会，但它更想改造社会。这一特征从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的社会思想区分了开来。但是，仅凭这个特征并不能保证它分析社会现实和制定社会改造策略时，就能够避免错误和不足。和所有的社会思想一样，面对现实世界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经常接受批判性的检验。因此，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放在赋予了它生命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进行批判性检验，正如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所做的那样。在这个前提下，苏维埃马克思主义就能在社会理论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现代性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它们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有些是你先我后，有些是同时并存；有些是互相补充，有些则是彼此矛盾。仅仅饰以“新”或“后”的前缀就想表明它们各自的时间、面貌或观点，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使用这些前缀——甚至于是滥用——通常只表明缺乏足够的分析。它无力解释为什么上文提到的诸种形式的现代性一些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却失败了。我倾向推出一部现代社会思想批判史，尝试以这些言论为一方，现实世界的挑战及它们各自的认识为另一方，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从这点来看，先后统治过美国政治舞台的一系列方式非常有教育意义。美国似乎在战后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具备了发号施令的能力。从1959年起，C. 怀特·米勒（Wright Mills）开始撰写《我们进入了后现代阶段》一书（书名完全是《社会学畅想》一书中的原话）。而他为此所做的解释我

们于1/4世纪后，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的笔下居然又见到了：现代性的双重失败。在他看来这一方面是指西方社会的大众化（及与此相连的民主的欺骗性），另一方面是指斯大林主义血淋淋的专断。

20世纪50年代推销到美国去的现代性只是一个简单的版本，毫无神秘性可言，战后高涨的经济形势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它：社会冲突减少（充分就业）、城市化加速以及成绩更加突出的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成绩共同造就了一大批史无前例的中产阶级（“消费市民”类型）。虽然左翼抗议这种体制造就的大众化（如米勒的抗议），右翼反对所谓官僚主义的国家干涉——被认为“无法忍受”，但是这种方式不仅得到了广泛认可，而且还出口到了欧洲（甚至于以它的方式出口到了后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又反过来在发展方面给了第三世界很大启发。

资本主义扩张（大众化、殖民战争）的现实，众所周知，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大发展，并于1968年达到了高潮，并从此为现代化的自信画上了句号。这次经济运动要求获得日益广泛的自由，并因此争取到了巨大的进步。从1968年起，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范围广泛的变革。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变化逐渐深化。到目前为止，虽然这种势头因受到反对派的强大攻击转而处境不利，但在我看来，它仍然没有发展到要穷尽其潜力的地步。不过在1968年，人们没能成功地出台一个新的总体计划。对此我的解释是1968年出现了一种谎称反苏维埃教条主义的模式，虽然受到毛的批评，可当时的苏维埃模式尚未穷尽（因此在当时的西方很流行），该批评本身也欠充分。对此，我们同样可以把中国当时社会本身的客观条件与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结合在一起分析，找到答案——哪怕我们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

舞台就是这样搭好的，为后现代主义观点能够轻松地在社会中找到回声准备了一切条件。由于现代化遭遇了双重失败（事实上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失败），并且在现实中又遭到了批评（该批评受到了苏维埃主义分量的制约），所以人们只好以相对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纸上的计划和现实的行动，该号召可能会轻易地说服人们：我们绝不可能立刻就做得更好。

当该后现代主义论调继续成功地在欧洲推进时，似乎它在美国已经气喘吁吁、步履蹒跚了。紧随其后的新现代主义保留了它的某些重要特征，尤其是其论点的凌乱和判断上的相对主义态度。不过由于它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中心论点，所以可能也同时泄露了后现代主义的正宗使命，它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目前已经世界化了的新自由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发展的逻辑要求罢了。由于后者的脆弱，我认为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新现代主义都没有多少前途。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时下的精神，即后现代主义精神是殷勤而仁慈的，这当然不是缺点，相反地倒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优点。相对的意义和对那些不怀好意的宏大建设的怀疑曾经有效地促进了迄今为止尚未开发或者甚少开发的诸领域的创新行为，比如新方法的发明、先锋派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

但是，反过来害怕搞错——或者上当受骗——的思想对系统化的普遍思考产生了消极的不利影响，因此几乎从来没人操心去把四分五裂的思想重新组织在一起。此外面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学，评论界也显得太腼腆。支离破碎、缺乏连贯、在现实中的统治制度与权利面前表现怯懦，这就是当代社会思想的主要特征。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大危机和大混乱的年代才具有的全部重要特征。同时这样一种普遍气氛很容易孳生出偏差的思想，而且由于其意义的反动，这些思想有时候会非常危险。

鉴于篇幅有限，所以我不打算在这里对我们这个时代做或多

或少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该时代的标志性思潮不仅非常丰富多彩，而且十分庆幸还互相矛盾，我们甚至不能统统冠之以后现代主义的称号。该称号已类似“雨伞”，其下聚揽着形形色色、互不相同的政治立场、理论观点及利益中心，它们的共同之处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对包罗万象的“后现代主义”说法提出质疑。同时如我简略指出的那样，在某些特殊领域，在使用后现代主义为参照的前提下，现代社会思索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它们尤其希望通过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来丰富政治经济学，以配合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演变。

因此，我们进行思索的目的当然不是交换对所有这些所得的看法。此外对我不信服的观点，我也没有发展到随心所欲加以“鞭笞”的地步，而是始终努力去发掘其中能称之为有趣的东西、甚至新颖的成果。因为通常情况下所涉及的具体情况都难免特殊，而且，各种理论论点（在我看来，它们是身处顺境的自由主义空想的理论基础）与其提出者的政治立场也不一定必然吻合。当然我们曾经目睹过后现代主义的捍卫者在电视上慷慨陈词，讨伐1995年10~12月间在法国发生的、人称“ringarde”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他们看来，该活动今后就是完全拒绝服从正在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拒绝后现代主义的称号。他们采取了不那么反动的政治立场、或者甚至明确表示反对自由主义空想。

这里我有意把重点放在被媒体大肆炒作的、为培养主导思想而强加的对时代旋律的解释，而不是本书使用的题目，对时代旋律的批判。我当然要避免过于简单地与经过渲染的粗俗的圣经交战，就像“新哲学”不用几天就倒向传统右派或中左派，然后被人民迅速忘却。我也不想进一步长篇大论地谈论充满北美精神的社会学，该学科到了欧洲之后就惊人地丧失了批判精神。这种描述性的社会学无疑影响了当今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化，如生产方式

的震动、信息化、城市的扩张、教育的拓展、传媒文化等等，它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与资料。同样它也很好描述了从以前的阶段继承来的组织方式所具有的社会及政治形态的危机，如民主危机。但它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它不想对这一社会的未来加以过问，而仅仅满足于对它进行日常管理。因此我不会重视这些先后具有过主导形式的言论，虽然——这很显然——它们的成功总是由于媒体的欢迎而立刻得到了确定。所以我将把我的讨论重点放在社会思想领域里的一些细微贡献上，或者像通常那样，只满足于做前卫式的思考。我们要理清这些建议的不同（有时甚至相反）影响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重点放在它们对语言的贡献上，我们可以看到：对语言是权力工具的说法或者说语言的解构为社会思想开辟了新的道路。由此产生的一些想法、甚至发现也已经被我们算到了它的功劳簿上，而且这些想法与发现含有远远不会耗尽的巨大潜力。说到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米歇尔·富古尔（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米歇尔·富古尔，通过长长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让读者相信——或者至少说让我相信——语言是权利、统治和镇压的载体。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为某种有关人类解放的彻底批判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完全不容忽略。不过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非常小心谨慎，没对上文提到的权利的来源和权利存在的原因做出区别。是这个事实显而易见，因此没有必要费劲说明呢？还是相反，超越很少引起讨论的平庸问题，论证工作又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因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异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而言，在权利所特有的逻辑支配下的特殊的异化问题我们搞得更不清楚。我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但是这么一来我为他没能再勇敢地前进一步同样感到遗憾——此外他的政治立场一直非常大胆并且对现行的统治制度持敌视态度。他是因为害怕自己也沦为概念化

的牺牲品吗？——以后我们将看到，概念化的肆虐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醒目标志，因为该时代是危机遍布的时代。

在其新作《马克思的幽灵》一书里，雅克·德里达不仅对新自由主义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并对其表现的资本展开了破坏性进攻，而且还大胆地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定义，他使该定义与追求某种彻底批判相类似。当然这一定义我是最欣赏的，因为它把重点放在了理性—解放这一对同义词上，而这正是我的分析中最本质的地方。

但是解构主义却要明确地捍卫他所最担心的：概念及概念化的大行其道。从这一点来看，它的确属于我们这个对批判哲学传统思想持怀疑态度的时代。由于号召人们放弃从研究事物的本质着手，所以它不愿违背相对主义、并且不得不停留在对事物的感觉上。毫无疑问，超现实主义是这种语言及艺术创作批判的鼻祖——小说和诗歌创作，但同时也是摄影和绘画创作，然而不幸的是它所表现出的革命潜力被人们大大遗忘了。

面对概念化和彻底批判精神，由于表现出了比别人更强烈的不信任态度，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 - Francois Lyotard）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弄潮儿。上面我所谈及的所谓的现代性的失败（它曾经造就了希特勒和奥斯威辛）、对后现代主义称为“宏伟论调”言论的否决和最终公开放弃解放的希望都直接源于利奥塔尔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他自身的演变。他从《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偏离》一书起发生变化，该变化以非常轻松的《向孩子们解释后现代主义》一书而告结束。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误入歧途的思想，它自我局限，无法相应地做出前瞻、表现出意愿和采取行动。它不信任系统思想，并且用一种被瓦迪莫（Vattimo）形容为“软弱无力”的思想取代了它，并做为自身的特征。这种“软弱无力的思想”基本上准备接

受一切，因为它把所有的假设相提并论，而客观真理却不再存在。其实这种态度并不新鲜，它构成了我们在任何一个危机深重的时代都能看到的特点。这里瓦迪莫（《现代性的终结》，第28页）再一次以下列非常清晰的语言揭示了导致这种偏颇的原因：“在消除价值交换，只注重使用价值的环境中，所谓重新适应问题，再造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失败，而且在实践上也彻底破产。因为重新适应的观点一旦失去了它的理想含义，就像尼采的上帝，成了纯属多余的观点。”

放弃意愿——用我们的彻底批判精神去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意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虚无主义。但是我们有提问的权利：这种虚无主义表现了什么样的危机？它将把我们带向何处？

我在这里辩护的观点是：这种危机是十足资本主义的，它是一种既不是商情经济危机，又不是长期结构性危机，即制度内的各种形式的危机的危机，而是制度本身的危机，是做为该制度的本质性标志的制度自身的危机，即经济的异化。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为超越它自身创造了客观条件，以我的分析来看，它为以价值规律衰亡为标志的必要的文化革命开创了条件。然而，这种超越不会像“自然力量”那样让人们觉得非有不可。也就是说，人们不会自愿地加以接受。我提出的左右着社会领域的单一决定论的观点（与结构主义提出的多元决定论观点相反）意味着选择的限期，在这里要么是明确地通过这种“捺除价值交换后再造存在的方式”来超越资本主义，要么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历史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但已经显而易见的是第二种选择必然会导致社会的自我毁灭。这种局面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3/4世纪前就已经凭直觉预见到了，他说选择的结果是或者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回到“野蛮”状态。以此来分析，后现代主义的选择归根结底是自我毁灭的虚无主义。而且，由于后现代主义源自一种预先把现代性仅仅

看做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产物的狭隘观点，所以它所看到的这种现代性的结局取代了它躲躲闪闪不肯对其原因、形式及症状做出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结局。

虽然我在这里对后现代主义做了以上的评判——说它是危机时代的意识形态、让理性低头的意识形态以及反动地抛弃了不可或缺或解放观点的意识形态，但我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说整个当代社会研究都没有价值，虽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时风”的牺牲品。相反地，从1968年起，占统治地位的相对主义就以一定的方式为社会思想某些特殊领域的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曾经鼓励大家从因循守旧中走出来。

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可能政治经济学从自由精神中获益更多、更广，而自由又是在当代相对主义启发下诞生的。比如，除了不友好的政治经济学外，创新社会学或者组织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发展。不过人们却没有从这些研究中得出多少普遍结论，这使我感到非常震惊。比如，传统经济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理解要求：它没有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相挂钩，因此它也没有解释清楚后者所面对的挑战的性质。而调节理论在它那个时代就这么做了。再比如，在集体心理学领域，该领域对理解我们这样的时代来说，作用至关重要。把投机现象做为研究重点，这么做可能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它们的运动机制，但是对解决我们的主要问题却毫无帮助：为什么投机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从最基础的角度来研究微观历史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该研究和我们的世界一样古老。因此，它的绝对必要性永远不该受到质疑。但是今天在我看来，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更像是出自一种偏见：一种时下流行的文化主义对真理相对性的偏见（在我看来该问题很重要，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然而经济学仍然被强烈的数学化倾向所左右。不过我们在这

里依然有必要详细区别它们。传统宏观经济计量学并不新鲜，它可以追溯至1930年。以前它是做为一门经济管理技术发展起来的，原则上不探讨经济现象的社会和历史基础，后来它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前进。在这个严格限定的范围内，它求助于模型和统计及数学工具不仅完全合理，而且绝对必须。而此类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这里我就不讨论了。

相反，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里它是要野心勃勃地用一种纯经济学来取代做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纯经济学想证明两个基本命题：（1）市场是自动调节器；（2）它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过这一企图也不新鲜：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瓦尔拉（Walras）。尽管从那时起，人们就百般坚持、万般努力，这两个命题却始终没能得到证明。这种徒劳的举动——以其越来越复杂的阐述方式——掩盖了空洞无物又处于统治地位的那种偏见。仅此而已。而真正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无为之举却常常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桂冠！不过这种掩人耳目的纯经济理论又反过来作用于宏观管理计量经济学，后者的大部分模型都来源于它的启发。因此，当大师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预期效果被现实打破时，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奇怪，而应该像良师冯·哈耶克（Von Hayek）那样说是历史错了。谁让历史不遵循纯经济学所设定的合理性呢。传统经济学家们看到了失败。但是却没有从他们坚持不懈地捍卫着的、地位类似宏观管理经济学一类的东西中汲取任何教训。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幸读到了数学家乔吉·伊斯哈艾尔（Giorgio Israel）和贝尔纳·盖里彦（Bernard Guerrien）针对它们所做的毁灭性批判：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将把社会科学带进死胡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数学工具应用上欠缺缜密。

人们继续逃避，希望彻底埋葬社会思想中的理性和对解放的追求。模糊数学构成了研究领域里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分

支，它已经为人类更好地了解某些自然现象的发生（如气象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无疑将继续下去。在我看来，这些发现有可能对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受投机规则支配的股市行情等做出解释。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人们去证明这些发现也能有助于管理社会变化。

我认为在以上印象主义图像外，有必要提示大家注意那些在方向上流于偏颇的社会研究。人们所说的“神经主义”，就是说，主张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人这种动物行为举止最终决定因素的研究，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且始终很危险的偏颇。但是，这种偏颇并不新鲜。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就取得了广为人知的成绩，进入20世纪后，它又把研究领域推广到了刑事犯罪领域。兰布罗索（Lombroso）则相对收敛一些，他认为自己发现了“生来就是罪犯”的那些人的生理特征。

由于统治思想散布恐惧，由于对现实制度内敌对主义的羞涩而带来的理论危险成了广泛关注的焦点，我同意其中的部分担心：新简约假象的危害、敌对主义与个人主义虚假对立的危害、相对主义的危害、文化主义的危害以及理论不连贯及否定客观性的危害。

在我看来，这些危害中文化主义的危害最严重，因为它带来的顽固立场会妨碍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挑战做出民主的、广泛的回应。我想通过文化主义来肯定两点：一、人类共同享有的各种文化都具有一些即便穿越了重重历史也不会改变的因素。二、不同的文化在价值上都相同。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它是1968年的不幸产物，是对狂妄的欧洲中心论进行合理反抗的糟糕回答。伊利奇（Illich）曾经给了它确定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他的声望。

当代精神的所有不足都客观地集中到了发展方向问题上：它们强化了在目前危机中统治着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空想。它要求人们服从市场规律，反国家的右翼无政府主义又强化了这种服从。做为交换，它答应以意识形态的结束为前提建立一

种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致、达成共识、没有敌人、其乐融融的社会。但是，这种许诺只能说服那些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社会的人。而对我，就像对卡斯妥里亚蒂（Castoriadis）一样，我从中看到的更多是“无价值的上升”，它构成了管理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现实方法，仅此而已。对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我们已别无他求。它存在着，却再也不担负正常情况下所有社会都逃避不了的义务：证明自己合法。不过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无法持续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想，这里已经扼要描述了它的主要特征，必须顺应对立面的道理：社团的退却、非理性的胜利（各种宗派和邪教）、暴力的上升（各种性质的盲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试图通过某些手段从它还没有取得明确胜利（总是留待将来去争取）的社会（比如东欧）里蒙混过关。比如，它声称自由主义仅仅是暂时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污染”。其论据，以及它无法回避的肤浅（资本主义在亚洲的胜利，导致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强化而不是削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自由主义将削弱世界各地之间的差别。但是，分析了其运作逻辑后我们发现，它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加剧两极分化现象。或者更厚颜无耻一些，就像利奥塔尔（J.-F.Lyotard）一样，它声称社团的退却是保护自己不受“解放思想专制”的一种方式。他就这样通过一个近乎文字游戏的借口摆脱了困境。但是，在这个简单的文字游戏下面却是理性和解放两个基本概念的分离，它为当代的反攻倒算开辟了道路。

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采取的消极态度的确为削弱民主实践的影响帮了大忙。在我看来，这是最严重的。日复一日的，听命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管理堵死了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由此导致的“低强度的民主”也变得极端脆弱，法西斯主义的重新抬头悲哀地表明了这一点。

对我而言，我认为所有这些令人担忧的发展从整体上把一种社会理论观点，即对社会进行持续的精神再建设的观点，推入了

危险的境地。毫无疑问，出现在现代史前某个阶段的因果关系形式，已经被部分地超越了。现在我们很难相信，就像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在18世纪所宣称的那样，以理性为基础建设黄金时代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但是，我们因此就应该抛弃客观世界这个概念吗？我们是否可以因为犹太人或其他民族曾经相信过或目前仍然相信某种创世纪说，就可以把神话和量子物理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同样的“真实”呢？

我认为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从科学的担忧中摆脱出来：理解、解释，是把局部合为整体，掌握现实的敌意特征，通过分析统治着整体的逻辑来认识局部。

把社会看成自然界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既已如此，科学的精神就应该为事业服务，也就是说在它不可回避的伦理学范围内，清楚明白地为一项可行的事业服务（科学的认识，假设它是相对的而且永远没有尽头，为这种可行性提供了标准）。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缺乏科学依据。

回到我们的出发点，那就是我说的应该承担风险，它是自由的代价。当然，这意味着我们要和给人以虚假安全感的目的论保持距离。它对历史有着致命的影响，而且它混淆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在我们看来必然要发生的情况。在这种意义上，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古典言论和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说得过去的圣经化）的批判不仅受人欢迎，而且必不可少。相对于多元决定论而言，单元决定论更及时地提醒我们注意社会和自然的区别：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该从迷信必然性的时代过渡到相信可能性的时代。“历史上的意外”，无论是好还是坏，也就是说，所有那些人们没有事先料到、没有事先单方面地从某种理论中推导出来、而是事后才做出了解释的事件都证明了我们所提出的单元决定论概念非常有用。但请注意：这里的决定论概念绝不是模糊数学中的同名概念。

第七章 和意识形态别无二致的 信息领域

信息领域是当代社会优先考虑的重要领域之一。为此我们专门留出这章来详细讨论它。该特殊领域中的各种观点与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最能说明时代精神、社会困惑、它的沉默以及它的偏颇的典范。

交流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相反，它是一种永恒的、人类亘古以来就有的社会生活要素。事实上有人类就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信息的获取与传播（或者保留）以及为了储存并传播信息而发明的工具及其使用。语言是最古老也是主要的信息储存与传播工具：所有的知识都得通过一种语言来传播。因此，所有的语言都是“本乡本土的”（这个形容词对某些语言来说纯粹是可笑的重复）。书写及其载体——印刷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人们储存知识和进行交流的主要方式。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下列事实：由于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加速发展（这是现代性的标志）以及经济关系的商品—资本化（这是现代性的基础），现代化使从事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活动的各色人等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发明新的通讯技术以满足社会延续的需求。广播电话、摄影、电影电视、传真电脑、互联网等等的问世都是这种发展需求的反应。我们很快就发现，人类在通讯领域

的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更大的财力物力及更复杂的组织手段的投入。因此相关设施的建设费用以及这些设施的使用和控制就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信息的“生产”，也就是说信息的收集、筛选及传播也因此成了组织整个社会的要害之所在。

从这一点来看，费用的大幅度攀升将是主导未来信息交流的重要特征。“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把存贮在 CD-ROM 和 CDI（存贮可供传播的文字、声音和图像信息的光盘）中的大量信息互相连接在一起而投入建设的物质网络。在目前的科学认识及科技应用水平下，建设信息高速路有两种方法：发射卫星或者铺设光缆。这两项技术各自的成本与优缺点人们都已经做了仔细的比较与核算。似乎美国多少倾向于优先发展第一种建设方式，不过实际应用进展似乎并不快，比如该领域的克林顿 - A1 - 戈尔计划就几乎以失败告终（国会拒绝为该计划提供财政支持）。法国根据从前在实践（Minitel 系统）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选择了第二种建设方式，迄今为止，它已经建成了总长为 30000 公里的庞大光缆网，其中大部分为公共服务部门（法国电信、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所建，也有一小部分是私有企业的成果（如：里昂水利总公司）。

但是以上两种技术都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只有富国和多国集团才有这种投资能力。不过 20 世纪初广播电话网的建设，乃至更近一些时候的电视网的建设，也曾经出现类似情况。

人们为了控制上述两种通讯技术，首先以国内市场为主，然后扩大到世界范围，展开了竞争。

首先人们在国家范围内（或者有时是紧密联系的国家集团，如欧洲联盟立志成为的那种）面临如下选择：假设信息的生产和储存多多少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除了费用、尤其是财政费用之外，它不受其他条件的限制），那么信息的传播是靠某个公共服务部门（比如国家邮政部门）来实现呢？还是靠私有企业？或者

两者兼有？我们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信息传播的自由吗？还是对它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比如伦理的，甚至政治等等方面的限制）？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精神倾向于靠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信息因此被当做了商品，信息的传播也因此被看成了服从市场规则的商业活动。市场规则将决定谁可以拥有信息，就是说，谁支付了信息费和信息传播费，谁就拥有信息。从信息的源头看，消费者将通过钱包来决定，哪些知识和信息是值得收集的（即卖得出去的），哪些不是。相反，公共服务的准则可能会改变消费者群体的构成。因为它分摊了通讯费用，迫使人们接受它制定的、更能保障平等享有（至少减少不平等）信息的准则。这不但涉及信息的收集与分配准则，也涉及民主使用信息的条件（客观性、多元化等）。

这些利害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多国集团从中看到了潜在的丰厚利润。在经济活动总量中，信息、电信和视听这三者已经占到了全球产品总毛值的8~10%，超过了汽车工业所占的比重。并且这个比重还有上升的趋势，而且上升的速度很快。今天全球每5个工人中就有3个使用的工艺涉及信息。迄今为止，法律规范和公共服务部门仍然是通讯领域的管理主体（虽然实际情况因国而异）。私人资本高举人们熟知的口号（私人的效率等）大举进攻电信业，力争解除该领域的法律规范，目的只是要涉足这个利润丰厚的领域，仅此而已。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则想看看国家之间的界限是否应该取消，以便私人资本或者可能的话还有公有资本把它们的经营范围拓展到全球？或者看看国家是否应该成为这一领域的游戏主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所倡导的解决方案是取消各国对该领域的法律限制，这对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事实上是除了美国/加拿大、欧洲联盟、日本外的全世界）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因为，除了上文提到的三大中心或隶属于它们的资本主义集

团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在他们本国的国土上与美、日、欧的多国集团竞争。然而，后者所关注的市场绝不仅仅局限在只代表世界人口 20%，集中了全世界消费 80% 的市场（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在中心国家，有活力的少数周边国家占一小部分，边缘国家的份额更小）。完全出于这个原因，我才把这种信息与通讯垄断看做“五大垄断”之一。通常情况下，这种符合世界资本主义扩张要求的垄断方式，在可见的将来将加剧而不是削弱世界范围内的极化现象。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中心地区还是边缘地区都倾向于由公共服务部门来组织市场（或者伪市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够保证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现象就能够因此得到矫正。边缘地区的公共服务部门（它们同时还肩负着通讯管理任务）财力、物力匮乏，也缺少必要的组织手段。因此，中心地区的私有企业甚至公共服务部门就会同心协力地乘虚而入，对边缘地区进行掠夺以牟取暴利。这一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自然趋势是造成两极分化，加剧两极分化。只有在法定规范的基础上，用相互制约办法才能够有效地抵制上述倾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各个领域，有系统、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关注资本从中心地区转移到边缘地区，参与那里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的政治经济系统，逐渐削弱全球的两极分化现象，开辟条件，保证人类有一个持久的、众望所归的、民主的发展。我这里不再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我在别处有专门讨论）和方案的细节。

然而，主导言论完全避而不谈“交流问题”中这些真正的利害关系。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完全都归顺了主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后现代主义者，新现代主义者以及其他什么主义者都乖巧地服从了这种政治经济学。它们用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言论，取代了对真正的利害关系的讨论。这种言论被

菲利普·布雷东 (Philippe Breton) 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交流的空想”。

在这种空想言论中，因为“交流”要不断地把什么都说明，它就成了一个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词。人们总使用“交流”这个词，但是从来也没有明确过它的具体内容、含义。人们因此就把它葬送掉了。人始终没能逃脱能“自言自语”动物的属性。在这个属性后面掩藏着某种对人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人受外部因素的支配，他对多得让他生厌的外部信息做出反应，但却不能根据自己的内心需要来行为做事，也就是说，不能按照“人”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正是广告公司求之不得的理想消费者啊。如果人类退化到这么一种地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既然人自己已经变成了机器（电脑），那么把活生生的人与人造的人混为一谈也就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了。（人们可以发明智能机器，它至少和这种白痴一般的人一样聪明，千真万确！）

因为该言论对此问题绝口不提，所以它也就根本没有涉及以下这个中心问题：是什么样的知识与什么样的信息？它们为谁服务又出于什么目的？当然当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与信息量与遥远的、哪怕是最近的过去年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必要搞清楚知识与信息的区别。过多毫无意义的信息会把人淹死，并且在它们的影响下我们会丧失理解与分析能力，若没有这种能力也就没有知识。媒体对这一点了如指掌并且很知道如何利用它们。有关交易行情的大量信息可能会对投机者有用（不过这一点在我看来也非常值得商榷），但是它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呢？

在如今我们这样的商业化社会里，人们会不可避免地认为有必要优先收集和出售的信息是那些在最大的企业（或者是主要的多国集团）眼里对市场管理有用的信息，大企业（或者是主要的

多国集团)认为能“适时而及时”地控制生产与市场的决定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样地,强大的现代通讯技术还为我们提供了对商业利益有用的其他可能性。比如,工作的非集中化(某些航空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甚至律师事务所施行的电话工作)就已经开始为削减薪金政策效力了。

当然科技进步、新技术发明本身始终是人们所希望的(我可不是那种激发怀旧情绪或提倡回归乡情野趣的人!);但是搞清楚人们用它们来做什么、出于什么目的也始终是最重要的。历史的发展不像麦克卢汉(McLuhan)天真地认为的那样,直接受科技进步的支配,历史更多的是围绕科技使用权而展开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归根结底是社会斗争、阶级斗争以及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以使技术服务于社会进步以及个体和全体人类的解放。非常庆幸,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且发挥着作用,事情的进程并不总是按照统治制度的希望发展的。传说电话的最初发明是为了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歌剧。但后来老百姓掌握了它并拿来派了许多其他的用场。法国的家庭计算机查询系统也曾为老百姓所占有,但正如人们所知的,愿望与结果大相径庭。此外,人们好像一开始也不知道传真有什么用处,因此大大推迟对它的改进与完善。我们当然知道以后发生了什么。这些中立的传播工具的成功应该增强我们的乐观情绪:人们、使用者应该获得这些工具的使用权,并让它们为自己确定的某项战略服务。如果说以上这些中立的传媒工具无需有组织的干涉就能得到的话,另外一些通讯工具的获得却没有这么简单,要得到使用它们的权力需要有力地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斗争。该斗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让电视服务于民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组织起来获得信息高速路的使用权,把人们可以接受的、对社会有用的服务强行推广到各国乃至全世界则是目前我们的战斗核心。

言论对上述的利益冲突缄口不言,因为它做了一个愚蠢的假

设（我们经常在那些自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看到这些假设）：假设某种以社会各界的默契与共识为基础的、没有冲突、和平安宁的社会差不多已经存在了。该言论很容易使人民群众和各个国家放松警惕、放弃战斗，它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接受取消国家的法律限制，不再束缚跨国集团的手脚，因为他们已经“别无其他选择”（就像它对几乎所有的事情所做的断言那样，尤其是它对市场作用的断言）。它以这种方式对制度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实行言论上的恐怖统治，它剥夺人家的民主权利，它试图瓦解这块或那块土地上的斗争，因为它要在全世界强制推行一种确实令人满意的世界秩序，而这些土地一块都不能少。

交流空想并不是什么真正新鲜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一直存在于整个战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中，只是由于我们当代此起彼伏的浪潮骤然出现了暂时停顿，它才被推到了最前台。我们没有忘记四五十年代的控制论孳生出了在那个年代起主导作用的言论（和幻想！）。美国的控制论（维纳 [Wiener] 和西埃 [Cie]）曾自认为在数学工具中发现了支配着自然和社会的所有规律的共同点（又是一次混淆）。由于该发现自称找到了对宇宙间所有元素之间的关系起支配作用的法则，所以显然它应该使人类超越互相冲突的逻辑，转而创造一种完全适应环境、打消了反抗念头、没有内心世界（也就是说可以任人摆布的）的新人类。这无非是当今言论的过去翻版而已。像曾经飞快地占据过媒体的头版头条一样，它也飞快地被人忘得精光。六七十年代控制论让位于所谓的信息革命，后者将转过来通过普及电脑知识这么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建立民主，因为电脑的普及可以使每个公民消费者（为自己在超市的购物或者政治选举中）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目前有关信息高速路的言论难道不是在至少一个方面不是什么别的而正是这种天真言论的旧词新唱吗？

信息化手段以及随着互联网的问世，人们使用信息化手段的

日趋频繁当然不是非现实。但是我们再强调一遍：不管这些工具多么有力，它们是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或者是美好的或者是骇人听闻的）社会秩序的。它们是争斗的目标，为了实现不同的未来，所有人都力图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轨道。谨记这点，永远别忘。

第八章 纯经济学还是 现代社会的巫术？

现在的所有大学都开设一门奇特的科目，叫做经济科学或者干脆就简单地叫做经济学，就像我们说物理学一样。其研究范围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它立志要对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特征做出科学的解释：价格、工资与收入、利率、汇率、失业率等等。

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而奇怪的是经济学却采用一种对现实不予理睬的原则立场来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这种观点采用以个体为核心的方法论，认为社会可以被看成是构成社会的个体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则因其行为的合理性而被经济法则定义为“经济人”。我们不太清楚，根据这种“科学”的意图，从个体行为互相作用出发建立起的想象世界应该构成一幅近似现实的图画呢？还是由它提出一个标准模式，设定理想社会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说无论什么类型的社会，基本构成要素都是单个个体的话，那么谁还会否定这种平庸的看法呢？问题是有什么理由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呢：现实社会不是由个体行为的直接较量构成的，它始终都比这复杂得多。因为在它内部还有社会阶级、民族、国家、大公司、社会计划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等等的较量。可是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不感兴趣。因为这妨

碍了他们建设“纯经济学”并发掘它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反映了在一种假想的、抽去了其他社会范畴的纯粹经济领域内，由个人计划和个人之间较量所产生的法则。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纯经济学是令人开心的某种思想的杰作，可是它和现实有什么关联呢？这就好比一个医生有意忽略各种器官（心、肺等）的存在，而只从构成人体的惟一基本元素——细胞——来着手“重塑”人体机能！还好，医生们还没有像“纯经济学家”那样也制造出一种“纯医学”。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可真是万幸。不过，即便细胞经过最最复杂的相互作用能够形成类似人体一类的东西，这种概率和一只猴子坐在打字机前，用爪子胡乱敲打键盘就居然凑成了莎士比亚全集是相同的！仅仅通过 50 亿人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就能够达到普遍的平衡——而且还是最佳平衡——它实现的概率和细胞变人、猴子打字的概率是一样的。

为了证明以这种荒谬立场为出发点的正当合理性，社会上出现了惊人的玄学长篇巨论。哈耶克（Von Hayek），我们这个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良师，强迫自己对民族、国家、社会阶级及其他社会现实视而不见，而仅满足于从中发现某些剩余的“非理性”的东西。因此，他不是尝试对社会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是醉心于创立某种虚构的合理性。

人无疑是一种理性动物，而他的行为举止——即便是最奇特的——也是可以解释的。而解释的前提是将隐藏在行为后面的特殊理性动机重新纳入与之有关的环境，然后再说明事物发生的机理和影响。换句话说，从整体事实（公司、阶级、国家等等）出发进行推理、思考的立场才是科学的，才是可行的理论出发点。史密斯和 Ricardo，马克思和凯恩斯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政治这一形容词不是无中生有）就都采用了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

此外人类还是智慧的，会按照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纯经济学的行为反应模型应该建立在集中各种反应后

再得出的理性基础上（如果我认为价格还要大幅下降的话，我就克制不买），而不应该建立在某些愚蠢的、暂时的合理性上（如果降价我就多买）。把所有这些个人“资料”都集中起来建设纯经济学是可行的吗？这是问题的关键呢，还是无关紧要？

如我们所知，身陷孤岛的鲁宾逊，以如何选择即时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行为启发了纯经济学。但是，这些新鲁宾逊并没有就此止步。经济学家们假设全球社会由 50 亿个鲁宾逊组成，于是就有了这样惊人的开篇。开篇写到：这 50 亿个配备了馈赠物资的（和鲁宾逊一样拥有一筐物品）基本单位都是“纯粹的消费者”，他们在一个完美的竞争市场上尝试用自己富余的东西去交换自己短缺的东西。

寓言故事的风格在这里清晰可辨。我们知道，寓言通常假借动物虚构一些合乎情理的行为，从中得出道德的古训教育，警示人类。经济学完完全全是以这种模式构建起来的。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引进一些合乎情理的行为假设，佐证它希望说明的事理。

这种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方法论带来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证明这些合理的个人行为在相互作用下，再加上预期愿望能共同导致出现确切的平衡？就是说，导致出现一种可以描述出特性（以价格、收入分配、失业率、失业率的上升等等）的系统，而且只能有这么一个系统。显然，这里借用数学工具是绝对必须的。

但数学工具恰恰证明，一般情况下这系统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个这样的方程系统（这里涉及的是几十亿个方程）先天就是不相容方程。就是说，这个方程没有解。如果加上多种假设条件的话，它可能还有几种解，但都是无法确定的解（即有无穷解）。只有增加更多的假设条件才能产生确切的解（也就是说只有一个解）。

因此，纯经济学派的专家们尽力扣除所需的假设条件，以便

实现其目的。然后他们就借此做出如下结论：某些曲线呈凹陷状，某些曲线呈凸起状，根据事业的需要让收益保持平稳，上升或者下降。为了在每一个阶段都能举出例子来证明其论点，他们就见机行事地编造出一些合适的寓言故事。

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式是纯经济学引以为荣的典范。它表明，在放弃了前述的最佳假设后，人世间至少存在着一种普遍平衡。但是，这个普遍平衡必须以完善的竞争为前提。然而完善的竞争意味着这将是一位掌握了一切供求信息 的拍卖师。有趣的是，这一模式竟指出，一个对这 50 亿被管理者的行为为了如指掌的中央计划者能够采取措施以实现它们孜孜以求的平衡！这一模式并没有指出，目前这样的自由市场能够实现这种平衡。极端自由派的纯经济学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大哥》^①，才是解决他们这些问题的办法。仅凭这一点就够大家开心了。很显然，因为拍卖师不在那儿，由于个人行为在市场上较量的结果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所以这一制度也时时刻刻都在变。平衡——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而且即便实现了也是出于偶然——也只是演变过程中的产物，而不是行为人合理性的特征。不过这种平衡可能永远也不存在。此外索纳思凯因（Sonnenschein）的定理也证实，我们不可能从如此众多的行为中推导出供求曲线的形状。但是，即使严肃的数学能证明纯经济学误入歧途，又有什么用呢？正如我们以后看到的，问题不在这里。

如果出现奇迹，供求关系通过市场碰撞实现了平衡，这个普遍平衡也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它什么都没告诉我们，我们既不了解就业水平，也不了解生产增长率。失业的确不是纯经济学感兴趣的话题，它始终把失业看成是一种自愿行为。显然，这个假设与事实不符。传统经济学家除了荒谬地声称单靠市场（它是自动

^① 见《老大哥》，George Orwell 著，董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5。

调节器)的作用就可以实现普遍平衡外,还说了一些关于失业的废话,他们刻板地将失业归因于“工资过高”。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但堂而皇之地忽略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事实,而且忽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逻辑内,工资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普遍平衡的所有已知条件。

人们接下来就声称如此得来的普遍平衡可以实现“社会最佳配置”。这一断言构成了纯经济学的第二大命题。但是,他们“证明”该命题的依据是毫无意义的最优化定义:如果不恶化某个人个人境况,就无法变动这个平衡的任意一个参数。换句话说:任何一点改变只要恶化了一个人的境况,比如地球上50亿居民中最富的一个亿万富翁,那么目前这个使40亿人注定只能勉强度日的平衡就是最好的。

为了回应马克思的分析,纯经济学从19世纪末就开始凭空创立自己美妙绝伦的理论建筑。但是,它一开始就忽略了货币,而真正的经济活动都掩盖在货币的帷幕之下。鉴于货币的真实存在,纯经济学无论如何也要在建设过程中把它穿插进去。最愚蠢的数量理论则是它惟一可行的办法。步其后尘,货币论做为纯经济学的最后嚎叫声称货币和其他物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它擅自在50亿个个体的供求方程中加入了他们的货币需求方程。而供给则被假设为一个外原数据,其数量可以由中央银行决定。但对货币发行做过科学的基本分析后,我们便可以证明货币和别的商品不一样。因为货币的供给取决于对货币需求,而货币需求量则由信贷利率和经济活动水平共同决定。此外,由于中央银行具备决定货币供应量的神奇能力,所以人们希望它们在管理上保持中立与独立(独立于谁?),但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它们不能这么做,它们不可能影响货币供应量,而只能通过制定利率的办法,部分地且间接地影响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这么一来人们便忽略了利率会反过来(通过投资活动、延时消费等)影响经济活

动总体水平，并因此影响构成经济平衡的所有已知条件。货币纯经济学拒绝所有对立的分析，也就是说，根本不考虑我们这里所谈的金融逻辑（及与其相关的资本逻辑）与生产性投资逻辑（资本战略）之间的差别。因此，他们拒绝寻找利率之所以如此的真正原因。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以纯经济学为代表的如此荒谬且贫瘠的理论活动是如何让有着正常智力水平的人们感兴趣的。我们本来应该努力去证明，社会思想领域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偏见、利益以及为了证明它们合法所进行的种种徒劳的探索，这一切将摧残科学的批判精神。如果办不到的话，除了发明纯经济学之外，我们也不见得能做得更好。

纯经济学自称像物理学一样，是一门科学，但其实它不是。因为它想要否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殊区别。它想忽略以下事实：社会是自己产生的，它不是什么外力造就的。然而，尽管有以上的原则性声明，它还是立刻就自己戳穿了自己的谎言，因为它引进了期望的概念，而该概念恰恰证明被它当做客观事实来对待的个人是能动造就历史的主体。

纯经济学只是一门伪科学，它对于社会科学就如同伪心理学之对心理学。然而像所有的伪科学一样，它什么都证明，无论正反、不分黑白。“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吧，然后我给你发明一个证明它的模式。”您是不是想重新把利率从 6.32 提高到 8.45，或者降到 4.26？或者干脆让它保持目前的水平？我给您制造一些理由，它们可以乔装打扮成某些模型的样子。瞧，这就是它的威力：它是一种为统治资本服务的工具——屏风，统治资本可以用它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失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等等。因为它不能用来描述自己的真实面目，所以它在其他方面变得有用起来，比如用它“证明”自己是一种有益的方式，能够带来经济飞跃与充分就业，明天我们可以免费刮脸喽（喻诺言永远

不会兑现)……

因为是伪科学，所以经济学只可以调动一些业余数学家为它服务，就像伪心理学对心理学家们所做的那样，既然结论是否正确对它要证明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证人们要强制推行的论点——那么证明过程是否无懈可击又有什么关系呢。该“科学”雇佣了那么多的、任何一个物理实验室都用不着的平庸数学家，这实在会让人感到奇怪。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德布鲁 (Debreu)。但总的来说，这些人都选择了临阵脱逃的路。他们从传统的纯经济学转向去研究对弈理论，研究包括预期行为在内的战略较量的规则。该理论对促进智力开发的作用当然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它还能促进数学工具自身的进步。然而，对弈理论每取得一个进步就远离社会现实一步。我对这个现实不能不感到震惊。混沌数学理论中的逃逸现象和上述现象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中，社会现象仅仅是个借口而已。丰富数学理论是真正的目的，当然该目的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对今后提高人们在众多其他领域的认知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数学家，如数学家乔吉·伊斯哈艾尔 (Giorgio Israel) 和贝尔纳·盖里彦 (Bernard Guerrien)；正因为他们不是业余的，所以必然由他们完成了这项论证工作，说明纯经济学的荒谬和缺乏逻辑。

在特例之外是默默无闻的模型制造者军团。他们通常是贫困而操劳的大学教师 (尤其是美国的教师)。他们的事业取决于其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这些论文通常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而且也不想说明什么问题。在领导阶层，纯经济学奉承着工程师和专家出身的高级官员，这些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真诚地认为——自己权利无限，是他们的决定造就了社会现实。

魔法和巫术并存是必然的。妖术披上“科学”的外衣，也会一步步论证自己的结论。为了让自己具有说服力，它首先得讲一些合乎情理、说得过去的事情，但目的是从中得出符合其巫术的

结论。在其他的社会形态中，离我们久远的年代里，巫术—魔法师占据着前台。聪明狡诈的大巫师都知道国王对他的期待，所以总会按照国王的心思去说。在我们这个异化社会的经济领域里，纯经济学恰恰扮演着现代巫师的角色。它用类似的手段发挥着类似的功能，语言的深奥晦涩（今天非数学家对数学的使用）就是其中的主要手段。

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巫师。他知道人们想听什么：工资太高了（即便是在孟加拉也是如此），而收益则始终不足，所以无法刺激富人去投资……他虽然头脑糊涂（他差不多什么都说，而且常常自相矛盾，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学术上不诚实却照旧取得了成功。甚至可以说，这些不足恰恰是赢得大巫师称号所必需的品德，因此诺贝尔奖也非他莫属。

和巫术一样，帮派在理论界也大行其道。小巫师们分宗别派地集结在大师们的身后，大师们则把属于自己这个门派的弟子们组织起来。这里我发现，经济学家的帮派活动和伪科学—伪心理学的拉帮结伙是一组平行的标志，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潮流的一方面。

大政客利用“纯”经济学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不久以前的国王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巫师。小政客们则相信纯经济学，如果他们眼光更差的话还会加入其中的一个派别，就像他们常常相信伪心理学那样。

关于现实社会及其经济，最平庸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版本都比库存的所有纯经济学模式谈的多。但是，如果说社会理论需要经常性地接受批判性检验的话，如果始终有必要对现实社会里的新鲜事物加以关注，并因此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的话，如果这一争论始终应该保持公开、自由、无偏见的话，那么纯经济学所开辟的道路就是死胡同一条。事实必定如

此。因为这种理论完全是反历史的，它不想了解社会现实的任何领域，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它也不想了解未来发展的任何情况。它只认识“个人”，而这个“个人”纯粹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粗俗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喜欢的寓言是孤岛上的鲁宾逊——被放逐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人——的缘故。它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社会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自己改变自己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靠规定了个体的游戏规则就能办到的。

被马克思恰如其分地形容为“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更不必说它的极端表达形式，毫无证据地自诩为“新古典主义”的纯经济学。它完全是为了解决“市场”法则而构建起来的，它要证明“市场法则”就是自然法则。它不仅能带来“普遍平衡”，而且这个“普遍平衡”是可能实现的各种平衡中最好的，即能保障社会充分、自由就业的“社会最佳配置”。这个“市场法则”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本需求的表达，既证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让资本主义成为“理性”的同义词。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理性的完整内容就是：个人追求商业利润合乎人性天理。以这些可疑的论点为基础，资本主义可以自称“永恒”了，自称就是“历史的终结”了。然而，经济学不仅从来没有以科学的态度证明过它的基本命题，而且其论证方法也已经被证实不可能让它做到这一点。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言论的真实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让资本的自由活动合法化。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这种非科学的言论形成强烈对照。它们完全摆脱了要为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它不是理性的同义词的）辩护的偏见，提出了社会发展中的真正问题：阶级斗争是如何每时每刻决定了做为当今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物的“平衡”？社会的基本矛盾，如：劳资双方的斗争；统

治阶级内部金融投资商和生产型投资人之间的对立；企业管理人员和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垄断寡头间的互相对立等等，上述这些基本的阶级斗争和各种统治集团（阶级联盟和社会妥协）在其社会、政治逻辑支配而采取的种种国家干预，共同决定了实现平衡所需的所有条件，尤其是第一（生产生产资料）、第二生产（生产消费资料）部门之间，或者这两个部门与第三生产部门（消化剩余）之间的平衡，决定了就业水平（我们不能事先宣布就业是充分的）、相对价格的结构与收益、利率、作用于普遍价格水平上升或下降的压力以及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决定竞争力的相对优势。可以使社会走向普遍平衡的假设，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事先预定出来的。阶级斗争不干扰真实存在的、转瞬即逝的平衡，或者非平衡。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现实主义的，而纯经济学则不是。它对现实（阶级、国家、世界体系）视而不见，并将它从自己的言论中删除干净，因此纯经济学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寓言。

纯经济学一般都没能占据社会思想史的前台。它通常被流放到学术界的殿堂里，而政治界和社会生活界则傲慢地忽略了它。人们只是时不时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揪出它的这个“观点”或那个“结论”来用一下。为了把这种反动空想推到前台，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必须集中所有的特殊条件，为了资本单方统治的利益打破所有的社会平衡。哪怕是引用上述反动的空想，资本的单方统治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它统治的结果和反动空想所鼓吹的完全不同（它鼓吹的内容概括为一句话：没有管制、没有限制、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将会保障它取得最辉煌的进步），它除了造成更深刻的社会危机之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因此，纯经济学几乎成了治理这种危机的良方，因为它可以延长有利于资方的社会失衡状态（目前指全球化的金融环节），而绝对不可能帮助社会走出失衡状态。如果社会需要步出危机，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

来确立新的平衡。在这个新的平衡中，阶级、民族、国家、公司等等，也就是说，纯经济学忽略了的所有现实将重新找到它们的位置。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听到人们谈论纯经济学，它将被遣送回它在学术殿堂的流放地。

二、心路历程

——半个世纪的审视(1945~1990年)

贾瑞坤 等译



目 录

前 言	109
第一章 战后时期（1945~1992 年）	113
第二章 政治体系的布局（1945~1957 年）	125
第三章 资本积累理论——形成与演变	151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性质的世界扩张	182
第五章 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路线的盛衰	209
第六章 对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 分析（1955~1990 年）	250
第七章 体制的危机：三十年间对苏维埃 主义的评述（1960~1990 年）	272
第八章 体制的危机：资本主义调节机制的 崩溃	296
第九章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315

前 言

本书并不是要对二战后半世纪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而是要创作一种精神上的自传。因此，我想试着谈一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但若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先把这部传记定位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中。我描述了这段历史中一些前后承继的时刻，一方面我以今天这个时刻为出发点进行回顾，另一方面我也曾亲身经历过那些时刻。然而，由于从未记过日记，恐怕免不了会有一些前后观点的不一致。

幸运的是，由历史构成的本书的各种观点，都可以在我以前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中找到。在书中，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对于作者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是绝对的，它都是相对某一个它们所在的历史时刻而言的。我试图解释已经过去的事实和我的推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的思想自传是建立在几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上的，这些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一直试图解答的问题。

早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社会现实，并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惟一可行的、解决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我对它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所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为什么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就是两极分化的历

史？在这种扩张中，为什么不是反过来逐渐缩小“发达的”中心地区与“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差距？我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后来又多次提出，每一次都不断地深化，这部作品中也涉及了这个回答。

在这个问题上，我进行了两种考察。

一是，我一直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问题，就是说，从狭隘的经济机构和经济规律范畴走出来。

二是，我的回答一致涉及十分重要的政治推论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在资本主义范畴内消除两极分化。对于这个问题的积极回答意味着在边缘地区进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斗争总是涉及这个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或清楚、或模糊的、各种各样的回答，引发了不同的态度和政治立场。

在可见的未来期间内，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否有可能促进边缘社会的进步，缩小两极分化的程度？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永远是否定的。它的核心就是我的论文中所提出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两极分化不是什么具体、特殊情况的产物，而是世界范围内的积累规律所决定的。我从这个总结论中发展出了许多政治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历史的必需”。需要弄明白的是，这是否意味着，要实现一个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框架中存活的目标，而“缩小差距”也就等于，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发达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生产力，从而逐渐消除两极分化的历史影响。从这个角度上看，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与一种发展中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种生产力勉强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相当。对于社会主义尝试与未来的理论分为好几个阶段，而且不断演变，这一切都来自于我对下面这个矛盾的预测：“缩小差距还是建立另一个社会”。这个问题与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历史挑

战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如果说资本主义固有的两极分化为边缘社会创造了无法忍受的社会环境，为什么人民对此的反抗如此的片面、失败和令人失望。我个人连续参与了埃及、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对于这些运动的分析也是以解答这个问题为目标的。

在这部自传中，我试图重塑出我理论形成的每一个阶段。

我所关注的东西，从来就不是跟那些大学学究一样的。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社会主义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战士，并运用自己在思想成熟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尽量服务于这个目的。所做出的这些分析，对我来说都是政治态度和选择的结果。因此，这些分析，和它们所在的政治历史时刻，以及行动选择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的论点永远都是我生活的方向指导。

因此，在本书中我试图揭示出本人观点的发展过程与世界局势的演变之间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因此，我指出了可以显示各个阶段特征的历史里程碑事件或时刻。

我的态度涉及我的写作态度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狭义上的学术态度。我写作的数量一直很大，因为我认为写作是与其他行为同样重要的社会行为。我从来不像许多大学专家那样，试图创作出一篇大家认为有“决定性”意义的作品，相比之下，我宁愿我的作品可以成为无限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可以被它自己和其他理论延续下去。我也从不试图通过对知识和材料的堆砌，特意去说服那些学术阶层。在这一点上，我对我的毕业论文就非常满意，因为我在后来一直不断地对它进行发展。在写作的时候，我总是以一群投入革命的知识分子做为自己的目标读者的。

我一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导致的这种客观局势，需要对世界范围内相应的挑战做出回应。在资本国际化的局势下，人民群众只有也建

立起自己的国际主义才能有效地应对这种局势，这同样也是对于国家文化和其他局限（如宗教）的一种普遍主义的超越。然而，我要从边缘资本主义世界出发，尤其是从非欧洲文化的亚非世界出发，来看待这种普遍主义的视角。并不只是因为我本人就属于亚非世界，而更是由于这个世界是“现行资本主义”的主要牺牲品。因此，由两极分化带给人民的种种不幸，构成了人类所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但是，我从来都不是“第三世界主义者”。我觉得用这个词来形容万隆会议时期（1955~1975年）的一些西方左派十分的贴切，它们期待着救世主的到来，以为能够用“第三世界人民”来取代“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尽管对它们的处境十分同情，但我还是意识到了它们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对所面临的挑战分析不足。

第一章 战后时期

(1945~1992 年)

—

从现在起刚刚过去的这半个世纪，在一定时间距离中来看，构成了一个完结的、封闭的历史周期。我们现在或许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而这个周期呈现出了与刚结束的这半个世纪截然不同的特征。这又一次说明了，只有站在一定的时间距离中，我们才能够对已完结的这个周期进行评价，因为在仅仅几年前，我们大概还不能进行这种评价，至少不能以如此细致的方式进行。

从我这方面讲，我把战后系统的特征归纳为它所基于的三大“支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特主义，东方国家的苏维埃主义，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主义。在这里，我将简要论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这些支柱如何决定了它所涉及地区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以及地区之间的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意识形态上的某种平衡；二是，这些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体系如何逐渐地互相渗透、侵蚀，直至最后，纷纷崩溃于本历史周期的尾声，并以此宣告了这个历史周期的结束。从这时起，世界进入了

一个混乱的时期，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重组调整，以及重组中一些可能出现的、涉及新秩序的环节。

因此，我要在这里推荐以下三部关于这些所谓支柱的著作：(1)《关于调整》(1992)；(2)《1960~1990：三十年来关于苏维埃体系的批评》(1991)；(3)《万隆会议三十年》。这些作品所涵盖的内容，使我们不必再回过头来对这些“支柱”的意义进行解释。

国际秩序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特征，而该秩序本身就是世界各级亚体系的主要力量之间，不断爆发利益冲突的结果。

战后的这半个世纪还可以按下面的这种方式，再次细分为三个相互承继的阶段：

二

1. 1945~1955年：该体系在各个方面的建立时期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其走出了30年代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阴影，通过普及始于20年代的“福特模式”大大加快了生产系统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取得了在各个领域的领导地位，但可悲的是，这种领导地位是在1945年8月对广岛、长崎的轰炸中体现出来，并以核垄断为标志的。然而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的发展滞后，却由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而表现得更为戏剧化，这种滞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开始显现出来，随后，1919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和后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又使其状况进一步恶化。

然而，欧洲和日本的社会基础还是十分坚实的，因而避免了1919年时那种激进的革命倾向的反复出现。相反，欧洲从1947~

1948年（马歇尔计划）开始，日本从1951年《旧金山条约》开始，相继进入了一个“福特模式”的加速发展阶段。1919年时，意识形态的调整所基于的劳资双方的历史性妥协并未完全达成，尽管早在19世纪末，特别是从1914年以来，针对于帝国主义资本家阶层的工人阶级大团结已为其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从这个角度看，我所讲的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就是结束于1914年）。1945年，实施这种妥协的各种条件均已具备。于是，虽然仍然存在着旧殖民体系所带来的一些口舌之争，这种高速的“现代化—美国化”模式在美国霸权主义的框架下发展了起来（这种霸权是美国于1949年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获得的）。这种体系的建立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伴随着日本的脱离和欧盟创建的着手实施（1957年的《罗马条约》）。

苏维埃主义于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些自相矛盾的愿望和需求：是应该把“缩小差距”这一愿望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模仿，还是应该以“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无阶级的社会）”这一目标为中心呢？从1930年起，俄国做出了倾向于第一种选择的决定，整个社会体系逐渐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主义目标。

随后，苏维埃主义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与纳粹的交锋中赢得了胜利，并在战胜纳粹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战争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苏联仍于1945年享受到了巨大的繁荣，使其经受住了美国以冷战形势发起的第一阶段新型战争。这是因为1945年时，苏联处于防守地位，从战略角度上讲，还需要很长时间——直至60年代末——才能赶上它的对手美国。因此，我把这种美苏争霸的“两极化”国际体系归纳为波斯坦体系，而不是像人们经常所做的那样，把它过于轻率地看做是雅尔塔体系。（在雅尔塔会议时，美国还未拥有核武器，于是不得不接受了苏联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所提出的建议，即在东亚建立一个防

卫前沿地带，以防止有可能发生的德国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而波斯坦会议时，美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确信于自己的霸权地位，于是便把令人筋疲力尽的军备竞赛强加于苏联头上。）

从战后直到斯大林去世，是苏维埃主义的发展时期，此时，它严格地坚守着战略防守的原则。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凭借着与第三世界正在上演民族独立运动日益密切的关系（1955年得到了万隆会议的正面支持），苏联开始着手进行反攻。但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义与苏维埃主义之间的分歧，一方面由于对第三世界国家斗争前景的看法不同，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1957年开始，这两个东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二战结束后，位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周边的亚非社会仍然处于殖民政体的统治之下。这种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从1800年起就呈现出一种与殖民主义相应的、工业化地区与非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反差。经过了围绕着民族独立运动进行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运动于1945年爆发。在随后的15年中，亚洲、非洲相继重新赢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通过万隆会议的思想，使新“发展主义”得以解释为：独立，现代化，工业化。这样，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与苏联之间的一种战略联盟开始形成，而这也使苏联得以走出孤立境地。

2. 1955~1975年：万隆时代

我以这个主要特征来定义战后周期的第二阶段，并不是出于某种“第三世界主义”的偏见，而是因为世界体系的发展，的确就是围绕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而进行的。

现代化和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然这也是在不同程度上的改变——本书将对这种程度的不同展开

深入的思考。今天和明天的世界，将不再是以往五个世纪中那个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世界。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已经呈现出了新的特质。

我所讲的万隆时代，是“发展”思想取得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建立在一种共同的、表象上的坚定信念之上，这种坚信虽因每个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却都同样深深植根于一些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中：凯恩斯主义，依靠苏联国家的“社会主义”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神话，通过第三世界之间的互相依存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神话。

不言而喻，这些统治人们思想的神话也受到了一些批判性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在当时仍然属于少数，很少被人了解，或是经常被人误解。

整个“第三世界时期”，就是一个不同发展路线之间，对抗不断上演的舞台。这些路线在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激进程度不同，而1965~1975年间的毛泽东主义则代表了这些路线的一个极端。

这个时期也是苏联介入国际事务的时期，它凭借着与处于上升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盟，打破了自己的孤立处境，并以此给世界体系带来了一种由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所左右的、两极争霸的表象。而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一种表象。在美国所强加的军备竞赛中，苏联被逐渐拖垮。苏联介入国际事务——即促使大西洋联盟解体——的这一战略目标，既不是要“攻占”欧洲，也不是要向外传播其“社会主义”，而仅仅是要结束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然后代之以多极化世界中的和平共处。这个战略最终遭到了失败。

在整个这个时期中，甚至在更久的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直紧紧团结在美国身后。这并不是出于对苏维埃扩张的恐惧（西方统治阶层深知这种扩张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仍不断地在

公众面前把这种危险做为谈论的话题)，而是由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积累的相互渗透所决定的。尽管欧洲和日本的发展十分迅速，但他们与美国之间，并没有面临像以往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

3. 1975~1992年：经济危机和各个体系的崩溃

以上所说的三大支柱即为当时各国内部秩序和国际秩序存在的基础，而战后时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三大支柱的崩溃时期。

经济危机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并使人们对这种“无限发展”的神话产生了怀疑（1968年就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随后的几年里，西方社会的左派似乎得到了一丝复兴的希望，而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他们一直沉溺于一种“亲帝国主义”性质的联盟中。但是由于政策的不一贯性，左派的这丝希望很快就化为了乌有。从1980年起，他们开始走上一条“反自由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并没有引领他们把西方社会带出经济危机的深渊，也未能帮助他们重建“无限发展”的梦想。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北南关系”开始恶化，从而再次加快了第三世界“发展主义”梦想的破灭。各种激进派政体纷纷崩溃，并在西方压力下，从80年代起，开始实行“结构性调整”政策。当然，这种崩溃并不是外部力量对原本健康的机体进行侵蚀造成的结果，而是“万隆规划”自身局限性和矛盾性的产物。这一方面是由万隆会议本身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部力量进行新一轮进攻的结果，这种进攻是伴随着世界格局的颠覆而开始的。“万隆规划”的失败也同时体现了苏维埃同盟的脆弱性。

战后体系的第三根支柱——苏维埃主义——的崩溃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苏维埃主义的社会结构从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稳固，以

至于那些保守派的观察家们曾经认为，这种结构是完全不可颠覆的。而事实上，它早已病入膏肓，并在几个月内轰然倒塌，留在它身后的只有一片混乱。这里我要再次指出，这种崩溃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始于半个世纪前的、向正常资本主义的演变在此时突然猛烈加速；二是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取得了成功。

三

历史是永远没有终结的。就像其他所有时刻一样，战后这一周期的历史可以永远被人们看成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

二战后，做为世界体系，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现出了两个由历史问题造成的基本特征：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及社会框架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孕育而生，并且在各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国家生产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资本控制和管理的）。这些国家共同组成了该阶段世界秩序的核心。

——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地区（即发达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这使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即不发达国家）^①的两极分化状况更加严重，并反映为中心地区的工业化与边缘地区的非工业化之间的绝对对立。

然而，在战后周期中，这两个特征被逐渐削弱：

——重新赢得了自己的政治独立后，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地区也开始进入了他们的工业化时代。但是，这种工业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最初，由于对工业化的共同欠缺，这些国家之

^① 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在本文中泛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在后面的章节中，这两个名称不断出现，但表达的意思不变，因此译者将不再进行解释。

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一致性。然而随着工业化过程，这种一致性开始让位于一种发展的差异性：即半工业化的“第三世界”与还未展开工业革命的“第四世界”之间的差异。

——随着资本在所有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间的渗透，国家生产体系（即限于本民族内部的生产）宣告解体，各国之间开始重新组合资本，使每个国家的生产都成为了世界化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把战后这一时期看成是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过渡时期。但是，由此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评价这一新体系，如何定义该体系的本质特征，如何处理其自身矛盾，如何建立起一个调节系统，以及什么是其发展的动力源泉。除新体系的这两个本质特点外，一些主要的挑战也开始浮出水面，这些挑战也正是理论分析与社会实践产生矛盾的地方：

——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开始造成了一种地理角度上的、资本主义的扩展，但是这种扩展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得到了缓解？或者是这种两极分化又有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势？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第三世界中的、还未开始工业化发展的“第四世界”，是否仅仅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中的一个落后地区，而这种落后是否仅仅是由于这些社会自身的因素造成的？或者，这是否恰恰说明了，正是一些深刻的发展规律使两极分化中的边缘地区更加落后，并把其中一些地区推向更边缘的状态？

——限于本民族、本国家内部的生产效率渐渐减弱，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新的政治管理系统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我们是否已经处于对这个系统的建设过程中？什么是这个系统的特征和运行规则呢？

四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解答，必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资本积累规律的分析，二是分析这些社会成分在经受挑战时所做出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应，资本主义的扩展规律自身就体现了这种分析的结果。由此可知，未来永远都是不确定的，因为，为了解决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总是会制定出一些不同的政策，而现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得不根据这些政策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

在这里，我非常乐意简要地重述一下，我在以往几年里所提出的一些关于上述问题的要点：

——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结束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在我看来，这种分化是现有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固有的。然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确实从其他一些方面转变了这种两极分化的机制和形态。这些机制和形态是由财政上、技术上、文化上、军事上的各种垄断所支配的，而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地区”则一直受益于这些垄断。这种工业化进程并没有重演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化过程。这里要指出的是，当初的西方国家，是经历了漫长的大机器工业的准备，并且不断进行农业革命，通过向美国移民解决了欧洲的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依靠殖民掠夺获取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从而造就了一个有利的运转环境，最后完成了社会转型后，才迎来了福特主义（即福特模式）。福特主义的出现巩固了劳资双方的历史性妥协，这种妥协也受益于发达国家预备役部队的缩减。与此相反的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不存在上述这些有利条件，也就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在其内部发展的野蛮无序。一支迅速壮大的常备部队与一支强大的预备部队的共存，使其社会冲突更加尖锐，并有可能上升为革命性

质，因为这些冲突主要发生在被沉重的经济负担所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周围，而正是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贫苦大众组成了国家的预备部队。这种局面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周边地区”的一大特点，它为民族同盟和人民同盟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政治条件。

——在缺乏工业化发展的第四世界国家中，社会制度的形态走向了极具讽刺性的极端。处在社会边缘的穷人和未进行农业革命的农民所组成的预备部队，构成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面对这样一个广大的群众阶层，掌握政权的极少数人根本无法实现一种历史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这种边缘化现象导致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斗争十分软弱无力，从而使社会的各种冲突转化到文化层面。这种斗争的软弱性是危机的征兆，同时也不能应付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在发达的西方世界里，资本在国际间的相互渗透削弱了国家内部生产的效率，而政治制度和思想制度的持久性正是建立在民族实在性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来，资本渗透的必然结果，就与制度的持久性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出于世界霸权地位，而这种霸权仅仅在军事领域体现了它的有效性；欧洲试图通过欧洲共同体建设来营造一个不受政治附属条件制约的“超级大市场”，这个市场的建立则需要一个真正的、联邦性的政权。然而在不断恶化的局势下，欧洲内部也呈现出了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例如德国在生产方面的主导地位）。因此，无论是美国的霸权，还是欧共体的建设，都未能有效回应时代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目前来看，苏维埃政体的垮台是资本主义扩展所需要的。以西方模式为榜样的社会民主意识，在此时还不具备形成的条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战后这一周期内的政治争端和交

替出现的各种进步政策，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种历史局限，就是由上面所讲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东方的苏维埃主义，南方的民族解放理想。当然，在此后不久，人们就开始渐渐超越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左派观点。

在欧洲，70年代中期，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为左派的复苏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开始重新描绘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这个前景既摆脱了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信条（民主社会的成功并不与战后的现代化发展有直接联系），又摆脱了以往苏维埃的教条理论。但是，这丝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衰退便利了旧的右派势力重新上台，至少至今仍然如此。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关于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而且经常表现为激烈的冲突。温和派思潮控制着在万隆会议指导下建立的各个国家政权，而激进派则宣称，只有激进化道路才有可能解决民众主义的倒退，并阻止这种致命的倒退再次出现。这场论战成为了今后发展的一个大背景，本书也将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这场论战始终围绕着以下一系列核心问题展开：现有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它是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究竟是什么？当然，这就自然而然地对苏维埃主义提出了质疑。从50年代中期起——更确切地讲，是从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起，斯大林主义开始遭到了批判。从赫鲁晓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在苏联的这种批判仍然是一种右派性质的批判，然而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和他的拥护者则试图从左派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

现在，这些问题再次被提出，而且，战后神话的迅速破灭也使我们能够把它剖析得比以往更加深入。如果说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第一阶段发展，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从俄国革命开始的第二阶段发展也已经宣告结

束。

只要各种意见没有在社会主义新抉择这个问题上达到足够的统一，只要各种社会力量和进步思想还没有成为斗争的有利武器，并以此确保上述抉择的实现，就不会有新的世界秩序诞生，即使资本主义自身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就像新自由主义者向各个政权所宣称的一样，现阶段产生的，只有一片灾难性的混乱。

第二章 政治体系的布局 (1945~1957年)

—

战争时期和随后的十年，正巧是我的童年时代和大学时代。因此在本章中，我将以我的个人经历为基点进行阐述，这使我得以再次置身于那个时代。

我是1931年在开罗出生的，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法国人。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萨伊德港（Port Said）度过的。在当地的法国学校读完了中学课程后，我在1947年通过了高中联考，因而得以前往巴黎攻读大学课程。

二战爆发时，我正在念高中。那些战争岁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而清晰的印象，尤其是引导我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开始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原因。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对于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反感，这种不公正，在我看来，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甚至是不人道的：例如那些穷人的孩子所承受的悲惨命运。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孩子，把所拥有的物质享受看做是理所应当的，尽管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可我却决定要投身于社会革命运动，以此改变这个世界。我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

我接受的家庭教育所决定的。这种家教教会我，不能向不公正的命令屈服。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向俄国人那样”去做，他们通过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解决了“不公正”这个问题，而所有其他问题也在这个新社会中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大概是从1942年起（我是通过回忆斯大林格勒战役才想起了这个时间，那是一场令人痛苦的战役，但后来终于还是取得了一个欢喜的结局），我开始宣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尽管那时只有11岁，甚至连共产主义的确切含义都不知道。然而，我确实明白它的一个基本的意义：社会应该确保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所有人们都享有真正的平等。我从未放弃过这个理想，只有它，才能防止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陷入机会主义的深渊。

因此，历史课大概是学校里最让我激动的一门课，因为从这些知识中，我渐渐找到了一种精神武器，用来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它的演变过程，了解改变它的方法。在当时的法国学校里，我们都接受了非常良好的历史课教育，这种教育是非常开明的，也是极具进步性的。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埃及的法国文化所处的地位和立场所决定的。我的祖国以前是被英国所占领，1922年后正式取得独立，但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外国力量的操纵。尽管法国也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在埃及的影响力已经被它的英国竞争者所消灭。因此，这里的世俗学校所传播的教育，并不是以培养未来政治干部为目的的，而是恰恰与此相反，它一直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观察这个社会，尽管这种批判是十分谨慎和有限的。而此时的埃及官方学校，或是那些更糟的学校，则仅仅是以英语语言的教学为使命的。更值得强调的是，我们所在的这些世俗学校，经常像赞颂法国大革命一样极力渲染埃及光辉悠久的历史，这种教育激励我们去争取国家的独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种独立是理所应当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采取一种进步的态度来观察世界。渐渐地，我开始明白，埃

及人民悲惨的社会地位，是国家屈服于帝国主义统治造成的结果。在自封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不久，我很快又成为了一名“反帝战士”。

因此，我读的书也大都是关于这方面的。在在于勒·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年纪过去后，我便开始沉浸于左拉的作品，这些著作所揭露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对我触动很大。而后来所读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描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画面，以及资产阶级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都使我感慨颇深。然而，从14岁起，也就是在高中一年级，我便无法抗拒地，被那些政治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所深深吸引。在开罗的一家书店里可以找到这类的书籍。于是，完全是出于对了解历史的渴望，我开始了一本又一本的阅读：《雾月十八日政变》、《法国内战》、《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高二时，我甚至决定去读《资本论》。高三时，我读完了《资本论》，不过可想而知，那时的我并没有读懂多少。

在中学里，绝大多数和我一样大的埃及青年都是“反帝主义者”，并且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很大一部分埃及青年，尽管自己出身于特权阶层，却都纷纷成为了埃及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先发现民族问题，而后再发现社会问题的，然而我的心路历程却是与之相反的。

1947年，我来到巴黎，就读于亨利五世学院，主修高等数学。我很自然地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了党支部的活跃分子。而关于今后学习方向的选择，我则一直在理科与文科之间举棋不定。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文科学习的方向与我现在所关心的政治斗争更为贴近。这个选择使物理课老师以及我的父母都感到十分不快。于是，我进入了法律系学习（当时，如果要想在法国从事经济工作，就必须先进入法律系学习），并同时进入政治科学学院（Institut de Sciences Politiques）学习。我在1952

年取得了政治科学学院的毕业证书，并于1953年取得了经济法的学士学位。接着，我选择了继续攻读经济博士学位，并同时就读于巴黎大学的统计学学院，以发挥被我所丢弃的数学才能。1956年，我取得了该学院的毕业文凭。最后，我在1957年6月递交了我的博士论文，并于同年8月返回了埃及。

在巴黎度过的这十年中，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斗争工作，而只把极少的时间用来准备大学期间的各种考试。我选择在海外学生运动中进行斗争工作，在这里，埃及人和其他的阿拉伯人、非洲人、越南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开始互相接近并团结起来。活跃在各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反帝群众组织中经常起到领导性作用。我们身上所体现的首创精神和这种广阔阵线所带来的开放性，与当时西方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故步自封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报纸——《反殖民主义学生报》——当时并未受到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重视^①。我们的报纸被批评为有民族主义或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我们仍然顽强地继续坚持自己的路线。这种局面促使我们很快地转向了毛泽东主义，并且开始意识到苏维埃的修正主义路线最终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苏，而这一预感，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了证实。

从个人角度上讲，这些革命斗争工作使我在独立非洲结识了许多年轻人，以及一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这些人从60年代起，都纷纷走上了新殖民主义、民众主义、革命主义等各个阵营的领

^① 《反殖民主义学生报》，在1949年10月至1953年4月之间发行了16期，雅克·维尔内主编，并一直为北非穆斯林学生组织所推动。越南人吴泽广（Vo The Quang）和都代浦（Do Dai Phuoc），留尼汪人和安的列斯人（于斯丹和法尔丹），我的第一批来自南撒哈拉非洲的朋友（马里克·桑嘎莱，阿卜杜·穆穆尼）。这份报纸捍卫越南和平，并给朝鲜和捍卫运河游击战争中的埃及给予了大力支持。

导位置。^①

而且，就是在政治科学学院的共产党支部里，我遇到了与我相伴一生的伊莎贝尔。那时候法国的大学与现在的大学非常不同，一般情况下，除了像让·贝比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课程外，我们根本不怎么去上课。但是，我们读了许多的书，而且通过这种方法学到了更深层次的知识。在当时，像我这样确实对社会经济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干脆就直接跑去读各种各样的经典著作：里卡尔多、史密斯、伯姆·巴威尔克、威尔拉、凯恩斯等等，当然也少不了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大家都认为，在萨缪尔森的课堂上和书本里是无法真正学到经济学知识的，而这在后来的学生中几乎成为了一条定律。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这种学习方式是更加严肃而严谨的，它使我们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使我们十分重视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思想进行批判性的思索，使我们了解到这些理论的思想本质。他们试图通过反历史性的诠释来赋予资本主义一种存在的合理性，并证明它的机制有能力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和谐。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世界显然恰恰是正在创造一种不和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使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陷于一种不发达的状态之中；科学学科的划分要求把政治从经济中分离出来，而帝国主义却一直禁止这种分离。所以，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科学的方法论。

于是，我决定把对于这种“不发达状态”的论述做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促使了许多亚非国家的诞生，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大特征。与世界秩序的建立相同，民

^① 在那些我所结识的形形色色的非洲人中，我至今仍然记得以下这些人：加不埃尔·达而不谢，胡布埃·布瓦涅，菲力克斯·谢卡亚，乌埃森·库里巴里，玛玛都·科纳太，都都·盖伊，森科尔，塞库·杜雷，凯塔·福德巴，阿留那·迪奥普，于班·安·尼奥贝，穆枚，他们都是安的列斯人和大马士革人。

族解放运动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个“发展问题”。一些新的专题著作从1950年起开始出现，并渐渐结合成为一种或几种理论，甚至上升成为了一种“发展主义思想体系”。

当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这些专题著作大量减少，他们的作者在40年后被世界银行称为“发展主义的先驱”。在当时，一个像我这样的学生就可以读完所有这些作品。而我则野心勃勃地试图对这些“先驱”们提出一种预见性的批判，所谓的这些“先驱”实际上是传统思想的囚徒，并一直局限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社会学的崇拜中。今天，经济学书籍的泛滥使我们无法读遍所有这方面的著作。这种出版的泛滥并没有为推动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做出贡献，即使它在增加这方面知识的积累上也起到了一些作用。现在，经济学的著作仍然层出不穷，不断地在细节问题上做文章，并做起了一种信息模型的游戏。

二

站在一定时间距离上，回顾战后最初的这十年，发现这是一个世界体制进行安排调整的时期，这种调整在60年代展开，而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即在此时出现端倪。

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是当时惟一个享受到经济繁荣复苏的国家。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军事垄断，美国决定通过逼苏联参与军备竞赛来对其进行打击，并最终通过这个策略赢得了世界霸权。这一策略原本是丘吉尔酝酿的，他一直为一战前对俄国革命进行军事干预时的失利而耿耿于怀。这时，美国开始致力于重建与西欧的联盟，并缓和与战败国——德国、日本——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对美国人民进行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也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接近于法西斯主义的麦卡锡事件（始于1951年）和愚蠢的豪森伯格方案使这种思想灌输达到了极点。

美国通过无条件地与欧日资产阶级及其包括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所有政党建立起联盟，使其在欧洲和日本的战略措施取得了迅速的、完全的胜利。（当然，这种联盟里不会包括共产党，自从它被法国和意大利踢出政府后 [1947]，就被孤立了起来。）美国同时提出马歇尔计划（1947），帮助欧洲经济复兴，从而缓解与欧洲的矛盾，并试图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建设。1949年，欧洲理事会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于1948年成立，并于1961年改名为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1951年欧洲钢煤共同体建立，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建立一个与美国相抗争的欧洲，而是要建立起一个世界一体化体系下的开放的亚体系，从而更加方便美国霸权的扩张。60年代，无论在经济方面（国际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还是社会政治方面（劳资社会历史性和解），福特主义扩张的基础已基本建立。在日本，《旧金山条约》（1951）签订后，一种限制性的民主开始建立，财阀的统治权再次得到恢复，为后来几年日本经济的突飞猛进打下了基础。

美国的霸权战略，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建立一个反苏维埃军事集团，而美国则在这个集团中占据政治领导地位。1947年杜鲁门主义形成，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952年土耳其、希腊、德国加入北约，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加入美国军事体系（尽管这两个国家仍然是法西斯主义国家），1951年《旧金山条约》签订，而后又补充以《美日安全条约》（1960年），这一切，都是以方便美国在全球霸权战略中取得军事控制权为目的的。

面对这一系列扩张，直到50年代中期，俄国都一直处于被孤立的、战略防守的地位，并不得不参与军备竞赛，以此结束美国在这方面的垄断。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获权在东欧建立一个防御前沿地带，但它所得到的权利也就仅限于此。然而，在建立

这一系列东欧政权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而这些困难一直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一方面是由于，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的社会力量还十分微弱，不足以建立强大的政权（比如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另一方面，相反的，一些地方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方式领导了国家的解放，摆脱了法西斯的控制（如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但却并没有打算成为实施苏维埃方针政策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接受了这些政权的建立。因为如果不这样，又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1945~1948年间对希腊共产党愚蠢的镇压，说明西方人除了法西斯政权以外，不会在东欧建立别的政权。甚至属于西欧阵营的土耳其凯末尔民众主义，都没有能使他们满意。这就是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在1950年通过多党选举的方式把蒙德雷推上台的原因。后来，这一伎俩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中反复使用。

1947年苏共情报局（克格勃）的建立，目的是为了“紧紧围绕”在苏联共产党周围的防御性撤退合理化。1948年，日达诺夫提出的理论声称世界已经分化为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并把这两个阵营分别对应为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从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在新人民民主问题上对左派和右派的反对者的大为不满（1947~1948年），对铁托主义的批判（1948），以及出现在各地的革命征兆（如1951年的柏林），都证明了莫斯科在巩固其前沿防御战略时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为了对付马歇尔计划，1949年莫斯科经济事务委员会成立，但它一直未能真正地协调好这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规划。1955年，为了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诞生。几年前，苏联通过对柏林的封锁回应了冷战（1948~1949年）。

直到斯大林死后，确切地讲，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苏联才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战略来打破它一直以来所处的孤立

境地，即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联盟。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就是这种新战略出现的标志。苏维埃政权虽然已经开始在军事力量上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1957年第一颗斯普特尼克卫星的发射），但是波斯南暴动和1956年布达佩斯起义的爆发表明，该政权仍然是十分脆弱的。

美国霸权战略扩展的真正障碍来自于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1945年起，民族解放运动致力于重新取得非欧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这些国家从19世纪或是更早就一直处于殖民势力的统治之下。直到今天，帝国主义势力也未能找到一个达到社会、政治妥协的办法，以巩固他们在这些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利益和权利。在我看来，它的失败恰恰说明了这种“妥协”在客观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的两极分化，使这些“边缘地区”必然带有一种潜在的革命倾向，时刻处于一触即发的不稳定状态。

在战后的这十五年中，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剧变。主权国家政治体系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事实上，这种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治体系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是仅局限于欧洲内部的（1648年威斯特法伦条约签订，这种体系已初具雏形，并且取代了以往的天主教国家联邦，在经过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而此时的亚非国家被看成是没有向发达国家竞争开放的、非主权地区。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主要是亚非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成果，而在1945~1960年间，它却使世界资本主义政治格局发生本质性的巨大变化。

上述这种变化是由全体亚非人民参与的民族解放斗争引起的。在转变中的每一次让步都是帝国主义千方百计争取来的。所以说，今天这种国际秩序的形成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更不是它所做的规划，而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进行斗争的结

果。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开始调整以适应变化，而它的调整还是取得了成功的（至少从长远角度上讲）。做为战后霸权强国的美国，与那些正处于衰落阶段的老殖民强国相比，更容易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时常表现出对变化的支持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态度是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的某种妥协，对新殖民主义和解的接受。但与此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是镇压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同盟的真正指挥，这些革命运动是由各国共产党（中国、越南、古巴等）或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并得到了激进派群众运动的支持（纳赛尔主义、阿拉伯和非洲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些革命来讲，美国是最主要的敌人，欧洲和日本自然也是它的同盟军。

当然，这里所说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并不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结束，也不代表着新的制度已经取得了稳定的局面使其得以向全世界范围拓展。1980年起，权利等级似乎开始了新的划分，稳定局面似乎也开始形成，但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历史性的社会妥协还未达成，因此也就无法获得稳定局面。

从这个角度看，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945~1975年）是以亚非取得的巨大的、无可争议的胜利，和拉丁美洲发展联盟的实现而告终的。但是这种泛泛的评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论认为它在世界范围内是具积极意义的还是具消极意义的（因为在战后周期结束时，第三世界再次沦为他人的奴仆）。怎样、何时才能为革命运动创造出可保证持久发展的条件而使它不再夭折，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1945~1957年这段时期的革命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因为它从未经历一个从发展，到突然停止，再到衰退的过程。

这种不成熟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国、越南和朝鲜，在这些地方，人们把民族解放斗争混淆为社会主义斗争。1947~1949年期间，我一直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2

年建立之初就开始宣扬毛泽东的“新民主”，认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卷入帝国主义扩张的漩涡，在该阶段的革命就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沿着一条长期坚定的路线发展起来，这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解放路线。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与农民阶层建立紧密的联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孤立由封建走狗组成的敌对势力，从而很快地创造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

朝鲜的革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当地的反帝阵线在这种路线的指引下，把整个国家从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之下解放了出来。尽管后来由于日本投降所提出的军事条件，而不得不把国家的南部地区割让给“接替”日本进行独裁统治的美国。从1945年起越南也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越南发起了残酷的殖民战争，直到1954年在奠边府遭遇大溃败。法国挑起的这场殖民战争说明，帝国主义还不想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纳入议事日程。1954年在日内瓦达成的和解与对越南的暂时性划分是合乎逻辑的，我认为，在“南部”国家（即不发达国家）所进行的斗争已完成了其第二阶段的任务。1950~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再次证明了帝国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敌对态度。而西方社会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把它孤立起来的做法，又再次让人想起了他们当时对俄国革命所采取的态度。

评价民族解放运动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是看它是否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进步。在我看来，任何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解放运动都是不成功、不彻底的。从客观上讲，亚洲和非洲都完全具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条件，埃及的成功就是一个开始。

就像当时所有的埃及青年一样，我也激动于规模宏大而激进的反帝人民运动。1946年4月21日，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把这场人民运动推到了顶点，尽管它还不是十分成熟。埃及的第一个

共产党成立于俄国革命后不久，由于在当时遭到了残酷镇压，它在整个30年代都一直销声匿迹。二战后，埃及共产党得以复苏，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埃及所有爱国者的敬仰。当时的君主政体深为众多人民群众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所憎恨，而共产党是惟一敢与之对抗的力量。于是很自然的，它具有了领导一个统一战线的能力，像中国或越南那样进行革命。在埃及的现代历史中，从未出现过一刻真正的民主，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十分害怕共产主义的出现，于是继续对其进行疯狂的镇压，但这并未阻止“红色的旗帜”在尼罗河峡谷迎风飘扬（当时的人们就是这么说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应该毫无疑问地容许共产党在政府中赢得多数，甚至是赢得选举。但是，任何资产阶级和西方大国都不会去冒这个风险。

以色列的建立和第一次巴勒斯坦战争的爆发（1948年），给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后面的文章里，我将会继续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内论述这些事件所导致的冲突。1948年的革命胜利导致了君主政体的彻底垮台，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统治支柱已彻底崩溃。1950年瓦浮德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并宣告废除了1936年的不平等条约。从那时起开始的，在被占运河周围进行的游击战充分表明，反封建主义、反走狗势力的革命运动是大有希望的。1952年开罗爆发动乱，瓦浮德政府倒台，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这一切最终促使了自由军官政府的上台（1952年7月）。它的上台给社会带来了进步的希望，为进步势力扫清了前进的障碍，使其得以带领国家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关于埃及左派对纳赛尔政权的自相矛盾的评价，我后来又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尽管曾经幻想着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并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让步，纳赛尔政府最终还是不得不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美国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从1950年的三方宣言起（美国、英

国和法国)，美国就以通过雇佣政权直接控制整个埃及地区为战略目标，依靠以色列和土耳其实现了其军事力量的延伸，并逼迫阿拉伯国家加入了军事公约（借口以此来防范根本不存在的苏维埃的威胁），以此接替垮掉的英国和法国，成为了阿拉伯的保护国。1954年，纳赛尔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巴格达条约，因此成为了反对势力的攻击焦点。而这时，正是万隆阵线形成的时刻，也是苏联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联盟，从而打破其孤立状态的时刻。1956年10月，捷克部队抵达埃及，促使法国和英国决定向纳赛尔发起攻击：法国由此行动是为了报复纳赛尔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自由阵线的支持，英国则是为了阻止苏伊士运河回到埃及手中（1956年7月）。这次进攻的失败，使英国的保守党人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从他们最后的殖民幻想中清醒过来，最终意识到，他们只有依照美国的计划、在美国的授意之下行动才能有所作为。同时，英法的失败也在埃及打开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篇章，自此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所处的环境已与10年前大不相同。在埃及和世界其他地区，资产阶级重又开始了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控制和领导（或者仅仅是看上去如此）。这与我从1945年起就一直坚信的论断截然相反。我们在后面关于万隆会议的章节里，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阿拉伯的玛史莱克政权准备破坏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中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平衡。巴迪斯党从50年代起开始掌握这个地区的命运，它的成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与巴迪斯主义在思想上的较量，使我们开始怀疑那些自称为反帝国主义者的人是否真的可靠，也使我们为这些运动有时所反映出的法西斯倾向而开始不安。从1945年的塞迪暴动和1952年的突尼斯骚乱起，人们就开始意识到，殖民势力在马格里布统治的历史已经结束了。然而谁将领导这场解放运动呢？1956年法国把统治权利交给了摩洛哥君主政权和突尼斯资产阶级（这是1954年10月1日爆发的阿尔及利亚

战争的直接结果)，然而他们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殖民秩序呢？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强大的人民运动和平民运动，是否能够克服其领导者的反社会主义倾向呢？这种倾向是从马格里布共产党人的尾巴主义中产生的，这些共产党人时刻追随着法国共产党的脚步，而法国共产党对这个地区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

尽管 1945 年苏维埃的撤退，意味着放弃了自治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和库尔特斯坦共和国，然而在伊朗，图戴党的强大仍然使我们充满了乐观的希望。沙阿得以借此机会凭借沙文主义聚敛财富，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51~1953 年间，莫萨代阿通过把石油收归国有，比别人提前很早就开始着手于开创未来的战斗。沙阿 25 年来的血腥独裁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此外，1945 年，伊朗和土耳其双双加入了美国阵营，此时美国正试图迫使整个地区屈服于它的“条约癖”下。

一种战斗友谊把我们这些埃及青年同那些来自于黑非洲的学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使我一直充满激情地关注着在撒哈拉以南诞生的解放斗争。德国民主共和国，于 1946 年在巴马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从而宣告了殖民主义的彻底终结。然而它在 1951 年的“叛变”——它疏远了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这时在保卫法国联盟上的态度依旧十分的含糊）——却令人十分不安：到底有没有一个社会力量或政治力量能够在这个地区发展得更为长远？1947 年马达加斯加暴动（被野蛮镇压），1952 年莫莫人的起义，1955 年共产党联盟在喀麦隆进行的游击战，这些都证明人们完全可以做得比一些温和派后来所想象的要好（殖民国家把运作新殖民主义的责任交给了这些温和派）。于是我们看到了“独立非洲党”的诞生。即使当 1957 年加纳赢得独立时，即使当 1958 年亚非人民大会在阿克拉胜利召开时，即使当法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在一个法国共同体中面对其殖民地的独立时，我们

仍然不会认为帝国主义已经不复存在，更不会认为西方民主突然意识到殖民主义的不公正。我们认为，这种转变是非洲人民努力争取来的，至于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只是试图抢先下手，从而避免解放运动的激进化。

从1945年起，亚洲和非洲的解放运动无疑站在了世界舞台的前沿。我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另外，由于苏联和中国都处于孤立和防守状态中，只能给我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因此，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我们再也不指望能从西方国家的意见中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甚至连法国共产党（它在越战中所采取的立场十分勇敢）都在关于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问题上逐渐地向沙文主义让步。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和法国民主党人在面对侨民法西斯倾向的骚动时行动迟缓，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倒台。这会不会导致新戴高乐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再次采取强硬态度呢？我们曾经这样担心——但我们错了。

如果以中国和越南的胜利为标准来衡量解放运动的成败，我们当时认为，从1945年起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是在印度尼西亚，还是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战争和游击战都具有同样的潜力。50年代初，当这些国家的反动势力或者温和的民族主义者逐渐开始占上风时，我们认为这种挫折将是暂时性的。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在将来的这个新时期内——即万隆会议时期，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会以什么不同的形式出现。

因此，我们曾经把1947~1948年印度的分治和印度国民议会的成立看做是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巨大胜利，在此以前，帝国主义国家似乎还有能力抑制中国式的解放战争的发展。印度尼赫鲁政府同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靠近，以及195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协议的签订，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好的消息，但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国民大会党的看法。然而，在随后的一年中，从万隆会议召开

起，事态似乎开始发生变化。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拉丁美洲对我们来说还是一块遥远的未知的土地。相对于巴西、墨西哥、或者是阿根廷的政治来说，我们更加了解在安的列斯群岛（海地、牙买加、瓜特罗普岛）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还是通过阅读拉丁美洲经济联盟（它是在罗尔·裴毕什的推动下建立的）初期发表的文章对这块大陆有所了解。

由于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共产党，我们的确忽视了三四十年代时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的意义和规模。虽然我们最初认为这种民众主义在高难度的挑战面前显得有些过时，但美国仍将它视为一大竞争对手。1945年瓦尔加政府被巴西军队推翻，1952年古巴爆发巴蒂斯塔政变，1955年贝隆政府被军队推翻，这些表明美国已经不能、也不想再单纯依靠愚蠢的独裁政权来统治这个大陆，这些独裁政权都是在1948年美洲国家组织成立时被扶植起来的。美洲国家组织的建立完善了1947年在里约签订的美洲内部防御条约，从而再次体现了门罗的学说。我们那时十分理解和欢迎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所开展的新一轮解放运动。

三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尝试着以我当时的亲身感受，概略描述了战后第一个十年中的发展演变情况。从整体上讲，我现在对此的一些基本观点仍未改变。然而，我当时显然并未意识到这种演变将把亚非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万隆会议阶段，而且也将带来与以往不同的矛盾。

另外，在50年代末，也就是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1956年），中苏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在关于社会主义性质和苏联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我与苏维埃的“马列主义”观点一致。我

那时还不了解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理论，但我在博士论文中已经开始了对它的论述，这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甚至是马列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阶段，现阶段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挑战究竟是什么。

苏维埃一直宣扬，随着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将实现像厄比纳尔那样的飞速发展，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并没有被这种宣传所欺骗。当人们到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游览时，经常会注意到其民主的缺乏，并对那里进行高压统治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还有两个事实经常被西方共产主义者所忽视，但我们却认为这要比苏维埃制度的“不完善”问题严重得多。

第一是，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敌对情绪（众所周知的麦卡锡主义，以及三十年后，里根、布什政府把苏联视为“罪恶的王国”）使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似乎代表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事实与此正相反，苏联一直处于战略防守地位，我不相信有哪个西方政治家会真的蠢到认为斯大林有吞并整个西欧的野心。我们同苏联团结一致、利害相关，但我们并不信仰这种政治制度。我们当时一贯认为，从1492年起，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干涉都不是出于什么防御的目的，而这种干涉每次都毫无例外地伤害了我们的人民。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明白了，帝国主义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违反它的旨意行事，而正因如此，他们对于苏联的所作所为十分的不满。

第二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所持的批判态度比许多西方进步党人的态度更加激进。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我们的人民被剥夺了这种民主权利，而西方国家的外交则永远以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为大前提。这种状况从未改变过。然而从心理学的监督上讲，我们的这种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社会主义或进步的人民政权从本质上讲就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更民主的。从另外一种

意义上讲，我们过分扭曲、过分激化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但是，由于这涉及我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在面对民族政权缺乏民主的现象时，我们就会变得更加苛刻。我们对于纳赛尔政权的意见和批评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对于纳赛尔政权的评价是正确的，但我们那时应该意识到，这种评价对于苏联同样适用。

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我们接受了当时苏维埃的观点，并对此表现得十分乐观。我们当时认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具有与中国相同的客观条件，因此民族解放运动激进化、并最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是后来，在万隆会议后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尝试证明，我们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除第三世界以外的地区还未真正进入议事日程。这种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挫折，尤其是我们海外学生组织（我们的《反殖民主义学生报》）与共产党关系的破裂，导致了殖民地的独立前景变为一种幻影，只能凭借着重建社会主义法国的幻想才能实现，同时也使它变得更加依赖于革命的作用。

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1945~1957年间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展开的斗争。

1949~1953年中，在巴黎出版的杂志《东方道路》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关注的焦点，但是这种反映也不是十分全面的，因为这份杂志过分强调了冲突^①的国际性。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读这些文章时，我的内心仍旧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① 《东方道路》杂志，从1949年6月起至1953年7月共出版了25期。由马克西姆·罗迪逊担任主编，伊斯迈尔·阿布达拉主持发行，图戴·艾坎达利、雷蒙·阿庸、伊夫·贝诺担任编辑。它主要刊登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评论性文章，比如说图戴的故事和《穆斯林兄弟》，而且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当时不被人理解的一种“阿拉伯中立主义”，而这比万隆会议的召开早了许多年。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我們关注的一个焦点。1947年苏联采取了支持巴勒斯坦方面的立场，接着，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加入了这个阵营。本来为了解决问题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反而又引起了更大的争吵和冲突。后来，大家都纷纷进行了比较真诚的自我批评与反省，但我觉得这种反省不够彻底而且不是十分有意义。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埃及、阿拉伯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在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妄图建立一个否认巴勒斯坦存在的移民地，而且还企图否认巴勒斯坦土著民的居住权。令埃及的共产主义运动值得骄傲的是，从40年代起它就一直致力于反对埃及的犹太激进分子中的复国主义情绪。所以，埃及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好反省的，尽管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过分宣传有时导致了“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太人”的混淆。

与这种无意义的自我批评相比，人们应当更加关注巴勒斯坦的分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记住（因为这在此问题的讨论中经常被忽略），苏联以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埃及的民主力量从一开始就主张要建立一个独立、统一、世俗的巴勒斯坦国家，它将向所有国家的居民开放，包括新近迁入的犹太移民，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了。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一直拒绝接受这个解决方案，因为西方国家曾经答应给它以武装支持，并帮助它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实际上熄灭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把局势引向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或许可以说巴勒斯坦的分治是从战略角度讲的、减少损失的最好方法（但或许也是最坏的方法）。我注意到，联合国的这个决定得到了所有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却遭到了所有亚非国家的反对，即使这些国家也属于社会主义世界。从苏维埃方面讲，它对于分治政策的支持可能是出于一种战略上的考虑：毕竟此时的苏联还处于孤立的状态之中，而且万

分急切地想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与埃及共产党在这个战略上的联盟或许是有争议的，而此后进行的反省则远远低估了1947～1948年间局势的复杂性，并且显得过于武断。

在阿拉伯的统一问题上，埃及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明智的立场。阿拉伯国家多样化的提议，以及自认为是民族解放希望的所谓“国家”的建立，都一直没有得到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承认。同时，它从未忽视各个地区的特殊性（这种区域性的历史要远远比帝国主义人工划分的区域悠久得多），也从未支持过泛阿拉伯主义的理想化提案。由埃及资产阶级（以瓦浮德为代表）和苏丹资产阶级（以工联主义者为代表）领导的民族运动抹杀了苏丹民族的特殊性，而由埃及和苏丹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运动则把革命路线定义为——兄弟民族反抗内外部共同敌人的并肩的斗争。伊拉克君主政体倒台后，给阿拉伯的统一带来了前进的新机会，1956年埃及和叙利亚共同建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的共产主义运动毫不迟疑地对纳赛尔政府正在实施的策略进行了批判，因为它违反了民主原则，并且抹杀了这些地区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历史证明了我们的正确，因为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了整个计划的失败。立场上的分歧导致了这个地区各个共产党之间的分裂，但从今天来看，这些分歧实际上只是一些非常细小的差异：一部分人（以阿代都为代表）根据时局的不同调整了对纳赛尔的批判，另一部分人（伊拉雅领导的埃及共产党为代表）则更加明确地支持当时伊拉克国家的领袖——阿布代勒·嘎金·加森。就我现在看来，这两种立场都不是十分坚定，但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从埃及共产党的复兴（1942～1945年）到1965年两党的自然解体，埃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组织，这在我们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些不同组织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十分激烈的，而且暴露出了一些个人性的冲突，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对路线和战略的不同进行审慎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在思考，对于

统一（或者说是一种“样样管”组织的胜利）的追求，到底是不是“党”在当时的领导思想决定的，而我们的党在当时是惟一的正确路线的坚持者。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无论是只有一个党，还是存在许多党，应该具有一种更加正确地对待民主的态度，这将有利于更为透明地展开论战，而同时又不会削弱他们在许多领域的共同阵线。

这种多党共存的现象还反映了在革命总体战略上意见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把民族的解放置于首要地位，我把这种立场解释为，根据他们的逻辑，埃及需要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我的这种解释或许有点极端，但我希望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去理解它。另一部分人，则强调要把现阶段的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我们恐怕还不能把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定义为两个不同的组织，即使当时的教条主义思想也不容许把这种分歧的轮廓暴露得过分清晰。因为这些共产主义组织都是基于同一种“经验主义作风”的，即以苏联的态度为指导，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著作为指导，等等。夹杂了一些个人原因的、论战的隐讳性，使本来就寿命很短的团结（1956年）变得更加脆弱，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很庆幸在那个时期看到了这种团结的实现。

1952年7月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接着，纳赛尔政权成立，并在1955~1961年间逐步发展。这一切把问题的焦点从长远上的、战略方式的选择，转变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眼下就要立刻面对的问题：是支持新政权，还是对其进行批评，还是干脆与之对抗？这里，又回到了以前所讲的问题，埃及当代的进步文学充满了关于不同立场的专题著作，肯定也好，否定也罢，都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实质。譬如，阿代都的同志们认为，他们的政党（曾在自由军官秘密组织中十分活跃）在处理纳赛尔主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更加正确的——当然这从他们的角度上讲是毫

无疑问的，但在我看来，并不是十分实事求是的。

从1960年起，我一直认为纳赛尔政权从本质上讲是执行一条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从它建立之初到其扩张的结束，都一直没能跳出这种局限。它的民众主义形势并没由于这种内涵发生冲突，建成了这种民族资产阶级路线发展的惟一可行模式。这种模式考虑到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依赖性，使它一方面主张自由解放，以此博取人民的支持，一方面又不敢超越出这个路线（这也就是纳赛尔政权顽固地执行反民主政策的原因）。以国家干涉的形式来执行这条路线，并不意味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却是它发展的惟一有效形式。苏维埃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达成的战略联盟，苏维埃自身的国家干涉主义，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导致了国家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概念的混淆。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纳赛尔政府最终让位于萨达特政府，就像勃列日涅夫让位于叶利钦一样，但是这种突然发生的转变并没有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苏联、埃及这两个政权内部，我都看到了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政权内部有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形成，而这些政权又通过国家干涉的名义使自己的性质正常化。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这种演变不会带来什么致命的变化。另一种向“左”倾方向的演变也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取决于社会主义力量在这两个国家中的成熟。后来，我还是很自然地认为，这种民族资产阶级路线是一种乌托邦似的梦想。

根据上述这种分析，我现在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评价一下埃及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立场。我认为，阿代都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尽管它也对政权的反共产主义倾向提出了批判和质疑。因为这种立场来自于一种根本错误的观点：认为民主资产阶级阶段是必需的、积极的，而且将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我的观点是，做为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现阶段

的资本主义带给所有的资产阶级发展路线一种依附性，而拒绝这种依赖就意味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沦为乌托邦似的幻影。与30年前相比，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更加清晰，因为我那时有的只是一种直觉。

因此，我在对拉雅的埃及共产党的立场进行重新评价时得到了一些不同的结论（从1950~1951年起，我就一直对这个政党抱有十分的好感）。许多人出于对纳赛尔主义路线的根本性误解，对拉雅共产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埃及共产党从1956年起也进行了同样性质的自我批判，并且令人厌倦地一再重复。这种批判是十分片面的，而且是源自于一种被历史证明了的、错误的观点。我们先把一些次要的问题放在一边不管，如语言问题，可能会出现帝国主义的干涉问题等等。现在要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应该把这条路线看成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资产阶级路线？

在50年代，左派以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代替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现在要指出的是，这两种路线虽然前途截然相反，但却都源自于对资本主义扩张所固有的两极分化现象的低估和忽视。资产阶级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与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列宁主义的立场）都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两极分化扼杀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然而，到底应该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呢？

虽然我在这里阐述的都是一些新观点，但是这些观点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我写博士论文的那个时代。在论文中，我就强调指出两极分化现象是资本主义扩张所固有的。

四

刚一获得所需的高等教育毕业文凭，我就立刻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我没有经过什么犹豫就决定了我的论文题目，因为我

很早以前就做出了决定：对于“不发达状态”的起源和原动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我甚至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想法：分析“不发达状态”的起源及其发展，证明它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结果。我选择了莫里斯·比埃做为我的导师。从我一开始提出这种写作构想起，就得到了他和弗朗索瓦·佩卢的大力支持，他们不断地鼓励我，尽心竭力地做出详细的批改，督促我做到精益求精，但同时又完全尊重我的选择。

考虑到我的写作与大学的主流态度不同，我较快地完成了这篇论文，而这也是我一贯的习惯。大学中的论文一般都是对于“完美”的虚幻的追求，有时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大量参考文献的堆砌。而我的论文则更像是一篇战斗檄文，目的是要引起一场与此相关的论战。这项工作 在 1955 年秋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稿写成，接着，我用 1956 年整个上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同年，在不久之前爆发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运动，而后在 10 月，埃及遭到了侵略。由于这段时期内形势的需要，我一直到 1957 年初才重又开始论文的写作。同年 6 月，我递交上了博士论文。8 月，在巴黎与伊莎贝尔结婚。9 月，回到了埃及。

不谦虚地讲，我对我在那个时期的直觉感到十分骄傲。我拥有一种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见解。在论文中，我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发达状态和不发达状态”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这枚硬币就是“资本主义扩张”。我曾经给论文起了一个十分雄辩的题目：《论不发达状态的起源——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由于学术上的原因，我的导师说服我把它换成了一个圈外人很难理解的题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国际一体化的结构性影响——对于造成经济不发达状态的机制进行的理论研究》。

就我所知，在此以前，关于资本主义造成不发达状态的论断

还从未被正式提出过。这个论断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的不发达不是由它自己造成的，而是因为这种不发达的经济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为了适应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的需求，不发达地区的国家永远处于结构的调整之中，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中这种两极分化现象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这就使我的论文成为了新的观点：“混乱主义”理论几乎还未被提出，拉丁美洲对于其依赖性的批判在 60 年代末才形成，经济界方法论的设想也是直到 70 年代才出现的。对立理论——发展的阶段化理论——也是在我的论文完成很多年之后才由罗斯多提出的，而这个理论最早地对我的论文进行了批评。

这篇论文长达 620 页，每页 42 行。我曾因论文形式上的要求而感到被束缚，因为这种要求与我的个性正相反。我一直喜欢那种简明、概括的文章，认为没有必要去堆砌相应的背景知识。譬如，应该用一系列的统计来证明所得的结论，但一般来讲，这些统计资料是没用的，因为它们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时，在如何选择真正意义的论据方面，我还是个不大熟练的新手。我还必须对我想要评论的观点进行阐述——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小学练习，但它充斥了整个文章。然而，我却一直十分注意把我在各种问题上提出的观点与它的基本理论源泉联系起来。因此，我决定在文章中插入一些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包括价值理论、“资本主义体系的原动力”理论（即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货币理论、循环理论以及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等等。

论文完成后，我就把它扔进了抽屉。很久以后，联系主义学派开始广泛宣扬他们的观点，而我则成为了这种观点的一个先行者。因此我应邀于 1970 年出版了这篇论文，题目定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具体地介绍，在世界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这个问题上，从写论文时起一直到今天，我的观点的演变过

程。

不管怎样，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并不想就此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是选择进入实际生活（政治的、社会的）。我感到，在经济理论上无止境的深入，既不能满足我日益增大的好奇心（我一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很感兴趣），也不能满足我在实际中运用所学知识的愿望。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具体介绍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思想的演变过程，这既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也包括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经济学家所受的教育构筑了一个必要的知识基础，但不幸的是，这些知识无法完全地被很多人所掌握，这些人成了人为的学术分工的牺牲品，而这种分工把经济学家划分为社会经济学家和历史经济学家。

同时，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万隆会议（1955年）和亚非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这一阶段的开始：这是发展主义在思想领域取得胜利的时期，是在第三世界尝试实施“发展政策”的时期。在纳赛尔政府激进化的初期，为了亲身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中来，我回到了埃及，随后，我的职业生涯使我直接体验了这些政治家们的藐视。与此同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以毛泽东主义的形成为标志的。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中国人提出了苏维埃外衣下的自己的观点，而后又第一次提出了自己不同的选择，这是以1957年的“百花齐放”政策和1958年的“大跃进”为标志的。

在后面一章中，我将进入到1955~1975年这个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万隆会议上提出的路线铺展开来。我还会介绍一下我在埃及（1957~1960年）、在马里（1960~1963年）的个人经历，以及使我能够进行深入研究的教育研究机构。

第三章 资本积累理论 ——形成与演变

第一部分：1956～1970年

1. 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①对《资本论》的阅读使我坚信，对于这类基本问题的研究应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与里卡尔多不同的是，该理论并不局限于其积极方面的特性（如社会必要劳动等），而是进行批判性的全面的阐述，并以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异化现象。价值理论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还影响着该体系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②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对价值的主观臆测基础之上的，它试图用人类偶然性的事件来解释经济行为的永恒规律，这样做从本质上讲违反了历史规律，抹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特征：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现象（T.p.38）^①。

① “T”、“E.I.L.V.”等括号中的缩写，为参考书目在文中的简称，这些书目的名称和具体资料请参见本章最后部分。

这种主观的理论缺乏内在的逻辑连贯性，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不断重复，而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通过对勃姆·巴尔科理论的失败进行重点分析，我开始了对新古典主义思想的批判。巴尔科的理论提出了“延长生产过程”的概念，这并没有建立什么独立于劳动生产率理论之外的新的资本生产率理论，因此它只是局限于资本生产率同所谓贬值之间的比较，而事实上，正是这种贬值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T.p.123）。

同时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被不恰当地定义为新经典理论。该理论以静态的、或是转移性的方式来分析经济上的总体平衡问题，抹杀了资本的长期积累，而这一问题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所在（T.p.39~40）。另外，这种主观的价值理论和总体平衡的概念相结合，产生了一种量化的货币理论，这种理论是主观臆造的，缺乏科学根据的。

③我还对上文所提到过的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阅读。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投资才能抓住市场需求所带来的机遇时，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货币控制理论就开始逐渐销声匿迹起来。因为这种控制，只有当“储蓄意识”（以投资为目的的储蓄）被“聚敛储蓄”（即储蓄并不用于投资）的意识代替时，才有意义。凯恩斯认为这种储蓄现象是由于对现金的偏爱促成的，可以通过把利率限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来把储蓄减少到最小，从而促进投资（T.p.298~300）。因此我认为，凯恩斯是货币量化主义的先驱（T.p.389~390）。当然，凯恩斯也一直被经济停滞这一现象所困扰。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趋势，关键是要增大对于过剩产品的容纳能力。因为，报酬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次要于消费资料的最终需要，而这种需要是由劳动报酬与必要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我一直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经济停滞现象，而不去求助于通过利率（T.p.302）来控制经济的手段。

④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经常性的经济停

滞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这样的问题。我不赞同里卡尔多和马杜斯的理论，因为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逐渐下降的生产率的基础之上的（T.p.122）。当时，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倾向下降”（T.p.125）的观点，但后来也抛弃了这个观点。我试图对凯恩斯的“资本边缘效益下降”（T.p.127~128）理论进行批评，并以此为出发点对上述现象进行阐释。实际上，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深刻持久和最重要的趋势是不断创造更高水平生产力的趋势，人们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为利润率的变化（T.p.128）。1966年巴朗和斯维兹提出了“过剩”理论（这是一个与“剩余价值”不同的概念），要消耗掉这些“过剩”产品，就需要增长和扩大非生产性的消费。我十分欣赏这个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它的观点（A1.p.204~205）。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资本积累理论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我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使我后来（从1973年起）摆脱了“利润率倾向下降”的观点，并开始强调，随着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也应该随之增加。然而，只有当社会阶级斗争上升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实现工资的增长，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趋势只会导致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的不足。我所提出的积累理论实际上是对于巴朗和斯维兹的“过剩”理论的一种补充。

⑤然而我的目标则更具野心：我决定要提出一个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是以适用于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出发点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有必要先从对发展主义理论的认识出发。这个理论是从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衍生出来的，在当时还没有诞生。我所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实现我的“野心”，就要走出经济学的狭窄框架，而上升到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2. 关于相对优势

①学校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和社会主流思想都认为，这是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所以才有了国际贸易。这种推测是合理的，而且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选择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

我的直觉认为，以上的这两种观点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思想偏见和一种有害的政策选择。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对这个基本问题上做了不少的阐述，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再进行重复或补充了。虽然里卡尔多模式已经权衡了这种相对优势的利弊得失，而我却发现，只有一个国家拥有一种绝对优势时（T.p.68~69），它才有可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因此，从一个动态的观点来看，通过改进生产所获得的利润要高于相对优势所带来的利润（T.p.111）。

无论是为了一种重建经济科学的尝试，或是为了去靠近一种积极的经验主义从而引入“劳动要素收益”的概念，总之人们抛弃了里卡尔多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它的推理方式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建立在一种自称是可以证明的假设之上（T.p.73~74）。

②里卡尔多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总体的先决条件之上，即贸易参与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一部分：各个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同（最低的生存保障）以及黄金价格的一致（T.p.70~71）。我怀疑接下来的推理在这方面是否有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继承了19世纪的主导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将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即在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发展的平衡。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与里卡尔多的观点相同。布哈林在“拉平国际工资率”（T.p.113）上所犯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就开始进入到本人理论的要点，这就是，做为当前世

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并不等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从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张平衡了世界经济，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在《资本论》中没有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因为这种扩张建立了一个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的世界市场（这三大特征在前文、后文中都有所论述）（A1.p.11~13；A1.p.255~257）。

一种动态的观点使罗尔·裴毕什在他最初的著作中得以触及真正的问题所在：技术的进步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表现为实发工资的增长，而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则表现为相对奖金的下降。因此，这些著作预示了混乱、依赖问题的到来。惟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裴毕什没能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走得更远，没有去深入挖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③如果说相对优势解释了现代世界的世界贸易，我那时所探寻的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市场的内在趋势（T.p.105），并且在这个论点中又加入了新的部分——世界产品市场的建立与世界资本市场的建立这两种趋势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那时只有马克思和熊彼特认为这个论点是重要而且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传统的经济理论都必然无法把这两种趋势调和起来（T.p.112~120）。为此，我使用了一种在当时十分罕见的表达方式：在世界商品市场和世界资本市场的建立中，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即“边远地区”的经济）被迫不断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发达国家经济（即“中心地区”经济）中资本积累的需求（T.p.137）。

从这种结构性调整的历史前途出发，我又重新开始思考“边缘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我认为应该把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阶段区别于工业革命阶段（1800~1950年），因为这一阶段中贸易所发挥的作用大大不同于以往（A1.p.149）。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恰恰是一个低谷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新工业中心内微薄的工资，平等贸易，以及“南北贸易”的相对边缘

化现象 (A1.p.151)。这一切表明,“边缘地区”的工业化将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尽管这种工业化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 (A1.p.82~83, p.149~154)。由此,通过对裴毕什观点的深化,我挑起了关于贸易问题的第一场论战。论战指出,“边缘地区”的贸易状况是从1880年起才开始恶化的 (A1.p.86),这就是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工资差距开始加大的时期。因此我非常重视帝国主义所体现的经济鸿沟,而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列宁定义的 (A1.p.167~169)。

后来,1969年阿日里·埃玛约勒提出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再次挑起了论战。我在这次论战中所持的观点是:北南双方贸易关系的恶化是由不同的社会动力所决定的:在“中心地区”,工资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而在“边缘地区”则不是 (A1.p.174~175)。这种贸易关系的恶化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价值转移。

④在断言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市场的内在趋势的同时,我又遇到了“出口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我一贯的立场,就是说动态中的资本积累并不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外的市场进行任何出口。我还对罗萨·卢森伯格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以此推出了另一个观点,即资本积累的推动实际上只需要信贷发挥其积极作用 (T.p.25~26; p.43~49; A1.p.164~165) (我在以后会继续这个问题的论述)。新战场的开辟对于资本主义扩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对于非资本主义地区的征服和它所带来的资本主义边缘化现象就是例子,之后不久对于东方的再次征服以及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也将证明这种作用 (A1.p.164~166)。19世纪中期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低谷时期,我把这个时期看做是欧洲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后退现象。因此我得出结论,马克思之所以低估了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所固有的两极分化现象,有可能因为他把这种现象看成了一种偶然,认为

这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扩张历史中的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

3. 关于货币理论

①量化主义渗透于里卡尔多之后的所有资产阶级理论之中，我则一直对它持反对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断言恰恰相反，我认为里卡尔多的理论并不是量化主义的。我的理论基于对信贷制度积极作用的肯定，而这种作用也就是对于供求关系的调节。凯恩斯忽视了这个问题（T.p.390），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和那些反对量化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把它摆在很重要的地位（T.p.393）。

②直到1914年，汇率都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这不仅造成了价格的稳定，同时也导致了长时期的价格下降趋势。这种趋势是由于生产力的改进造成的，然而黄金生产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美洲金矿（19世纪中期）和南非金矿（19世纪末）的开发却阻止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以此理论为基础，我驳斥了孔塔切夫的长期循环理论（T.p.395；p.464~470；A2.p.162）。汇率固定性的取消改变了价格长期不变的状况，并且使信贷终于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种变化是垄断资本主义所希望的：通货膨胀（不同于价格上升）成了一种经常实施的政策，并以此服务于垄断竞争的新形式，在兑换率稳定的条件下，这些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然而这就需要废除黄金兑换率的稳定性（T.p.464~470）。

③主导思想认为相对价格制度体现了市场的合理性，而事实并不是如此。就向沃尔拉所说的那样，市场的合理性需要一种绝对的资本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应该把所有获得的利润都放进新一轮的投资中，这就意味着取消了个人财产（A2.p.171~173）。苏维埃改良主义者所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了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乌托邦。

④尽管货币和信贷制度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它仍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批判罗萨·卢森伯格理论的基础上，我证明了资本积累的推动需要注入与之相称的信贷资金：这就是信贷的积极作用（T.p.397~398；A2.p.77；p.95~97），我把它称为一种调节模式。

4. 关于循环理论

①“循环”并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不平衡的一种周期性体现。这种不平衡是一种永久性的倾向，但又一次次地被克服（T.p.484~487~495）。于是我提出了一种自我推动的发展模型，它以《资本论》中的概念为基础，被现代语言称为经济发展的乘数或加速器（T.p.492）。尽管我还在这个模型中分析了信贷、工资变化、利润率等所产生的影响，但我仍然不同意“循环”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说法，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如哈罗德、锡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批判（T.p.493~494）。

②二战后的新阶段宣告了新的调整模式的开始，这种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的模式，为抚平整个19世纪（1800~1950）过程中大规模、经常性的经济波动提供了可能（A2.p.251~254）。

5. 贸易差额的平衡理论

①在所有传统经济学观点的背后，一种共同的关注渐渐显出轮廓，这就是通过证明资本主义体系是自我调整机制（这种自我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重建经济平衡）所决定的，从而使资本主义体系合理化。这种关注最明显地体现在关于贸易差额的理论上，所有理论都竭力证明市场中的各种力量正在逐渐趋于平衡。这种徒劳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世界和谐的空想”，它所提出的观点也都是缺乏科学基础的（T.p.548及后面内容）。

以下这三种调节方式是在经济规律下自然产生的

(T.p.548~561): 价格调节(它缺少应付反常状况的灵活性), 汇率调节(这只是价格调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收入调节(这种平衡作用只是倾向性的、趋势性的, 就像销售规律中所讲的一样)。

这些观点都产生于金本位、外币本位、汇率波动所组成的框架之内, 固定金价被取消后, 常规汇率的概念也随之被废除, 对于汇率平衡的追求带来了量化主义的货币理论, 该理论缺乏科学基础, 没有成功地对汇率机制做出定义。其中的一些异想天开的观点认为, 平衡的汇率能够保证充分就业——这是由约翰·罗宾森一手制造出来的理论。我则再次提出了汇率控制概念, 即以汇率来保证赢利税可以适应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中的结构性调整的基本需要(T.p.589~593)。

②我当时还建议应该转移讨论的焦点, 而真正地采取措施去解决一些具体机制问题, 通过或大或小的结构性调整, 尝试怎样有效地重建一种平衡(T.p.562~592; A2.p.316~317; p.355~356)

6. 新兴的发展理论

①发展理论在当时刚刚萌芽。我从一开始就试图指出, 由于选择了经济学的传统观点, 而传统观点存在内在的逻辑错误, 这种理论将会以失败告终, 并带来一场发展主义的理论危机(Postf, 1971, p.438)。在研究了他提出的错误观点(关于货币机制等)后, 我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对外贸易差额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必然要求抛开传统理论, 从而系统地分析“边缘地区”为适应世界资本积累所做的结构性调整。这样的分析使我们跳出了经济学的狭窄范畴, 进入更大的领域——历史唯物主义。

②我十分关注一些国家中的货币管理机制不连贯问题。这些

国家往往是新近独立的国家，并企图把货币运营变为一种发展的工具。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系统是建立在外币本位基础之上的，在这些系统内发行债券可以起到与在“中心地区”相同的作用。

我所提到的那些汇率理论（价格调节、汇率调节、收入调节），无论是在“边缘地区”还是在“中心地区”都是站得住脚的，在“边缘地区”的经济体系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常因素的影响（T.p.399~426）。然而我认为，应该把分析的焦点从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转移到真正的问题上去。而真正的问题就是服务于结构性调整的不发达国家之间银行的一体化——这一直是我的核心问题。要想做到货币上的独立，就要从国际一体化的复杂局面中抽身退步（T.p.380）。但是这需要人们坚持到底，不要幻想能够获得贸易自由——19世纪拉丁美洲货币独立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T.p.419）。这就必须从银行的一体化中走出来，建立一种对汇率的控制（T.p.421~426；A2.p.98~136）。

③在关于局势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论战中，还存在一个共同的错误：人们总是把这种局势的转移归入货币量化机制（T.p.501~502）或外贸的倍数论（T.p.502~503）。我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我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总是把他们放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局势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循环成了边缘地区为适应世界资本积累的需要而进行结构调整的一种手段；边缘地区的经济还不太发达，并且处于从属地位，它没有被看做是世界体系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而是成了中心地区的经济在海外的延伸（T.p.509~514；A2.p.297）。然而，边缘地区经济却在资本的世界扩张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通过促进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地区的瓦解，为中心地区的出口提供了渠道（T.p.509~514）。我认为这种分析还应该进一步同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突出边缘地区在殖民时期的重要

影响，指出从1945年开始的转变是由欧洲的现代化发展引起的，这种发展成了资本积累阶段的核心。另外还要注意到，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东方国家的一体化发展将在未来的资本扩张中发挥主要作用（A2.p.302~303）。

④结构性调整所体现的发展压力，实际上是来自于不发达地区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趋势（T.p.562）。绝对优势为中心地区带来长远的发展，边缘地区的生产范围受到严重局限，新资本的起伏涨落带来巨大的压力，世界的两极分化引起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如城市化问题、社会再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政府行政开支的增大等），这一切问题最终都表现为对外贸差额的压力（T.p.574~576，A1.p.36~37）。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还指出，投资的倍数化作用（这是倍数论和加速论相结合的产物）开始由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转移，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从边缘地区进口原材料，然后向国外输出资本（T.p.304~309）。在此我再次得出结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是一种落后的地方经济，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发展出一个分支（T.p.305）。

裴毕什的理论认为，20世纪中，边缘地区长期的贸易逆差现象是由于其进口时的倾向性造成的。从19世纪开始这些地区就习惯于从英国进口，相比之下，从美国进口的倾向则比较微弱。我认为这种特殊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欧洲和日本的复兴造成的。这种复兴一旦实现，美国就不得不对外国对它进行的出口（T.p.567~570）。

在边缘地区的贸易逆差倾向中，应该清楚地区分一下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对外债务与债券的结算（由此体现的力量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的结构调整），二是银行资本的流动以及相应的银行一体化（T.p.547）。人们经常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还在继续这种混淆，这实际上是在回避真正的

问题（即结构性调整问题），而错误地关注于一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即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问题）。边缘地区经济的不对称性和长期的结构性赤字现象，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得到解决。货币贬值现象十次有九次是以价格的上涨告终，价格的上涨抵消了贬值带来的影响（T.p.555）。这就涉及价格结构在世界范围内互相影响的问题，而这样所形成的货币制度（A2.p.151～156）将成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一个工具（A2.p.211）。即使脱离于国际关系，人们也可以想象出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然而对于边缘地区的经济而言，如果离开了国际关系，就没有了任何意义。“自我为中心”的概念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T.p.574）。

⑤为了展开对结构性调整的分析，我谈到了经济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以及从“前资本主义”模式继承下来的经济领域，从外部侵略（进口）到来后开始，开始逐渐受到货币机制的影响，并由此导致了经济的退化。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这有利于国外工业而并不利于本地经济），更加顺从、更受剥削的新的生产模式产生，我们后来把它称为非正式经济（T.p.158～173）。

——围绕矿业经济和出口型农业经济进行的海外投资的波动，必然会导致利润的波动，一系列“经济奇迹”突然终止，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稳的态势。这些都体现了边缘地区经济的不自主性，它只是中心地区经济在海外的阶段性突进（T.p.315～324；A2.p.356～358）。在此要把边缘地区的波动现象同一些表面上与它类似的现象区别开来，它其实是由年轻的经济中心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动力所决定。这种动力体现为，从年轻的贷款者，到成熟的贷款者，再到债权人的过程。而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在第二阶段中停滞不前，并随时有可能退回到第一阶

段 (T.p.325~332; A2.p.173~175)。

——边缘地区资本积累的活力是由出口行为的活力所决定的，而在中心地区，最重要的环节则是如何使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联系起来，平衡发展。在这里，我要把出口型生产的推动作用与边缘国家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联系起来，这种不平等愈演愈烈，时常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失调，这已经成了现代“不发达状态”所特有的征候：农民越来越贫穷，地租的地位愈发巩固 (A1.p.307)，人们开始倾向于小型的投资 (T.p.256~264; A1.p.308)，最后演变成为劳动的增加与生产率的提高脱节，经济发展失调，没有未来的、暂时性的经济“奇迹”诞生的同时，许多地区还处于未开发的荒芜状态 (A1.p.465~483 以及之后的内容)。

——然而，新经典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观念无法正确地分析这些问题。譬如，在关于第三产业飞速发展的论战中，人们把它误认为是一种不合常规的怪现象 (T.p.224~237)。而经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旧的观点在这里似乎更加适用 (T.p.250)，比如关于有收益的劳动 (用来换取资本的劳动) 和非收益性的劳动 (用来换取收入的劳动) 的概念。在关于投资选择合理性的争论中，从勃姆·巴威尔科的理论起，新经典主义经济走入了歧途。除了未来贬值的概念外，巴威尔科没有建立起任何关于资本生产效率的理论。于是新经典主义经济学派退出了关于投资选择合理性的讨论，这种讨论就是，投资和消费的分配是否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 (表现为工资和利润的分配) (T.p.256~264)。

⑥我在文中对新兴的发展主义经济所进行的论述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这段时期是一个新旧两极分化现象相交的时刻，旧的两极分化是以工业化的中心地区与非工业化的边缘地区的反差为标志的，而新的两极分化则是伴随着边缘地区的工业化而发展的。我的研究所基于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是属于世界两极分化的机

构之中的，而这种结构正在处于不断的超越过程中。通过对这些研究的总结，我将重新探讨客观论据带给它们的局限性。

7. 理论和历史

①对于新兴的发展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的双重批判，曾经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这种被异化的、缺乏严谨逻辑的理论，促使我把不发达状态问题转移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各种学科都对立了起来，使他们彼此独立、失去联系。显然，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对这些学科的补充，而是一个理论与历史的统一体，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统一体。

以此，我无法接受文化理论和人口统计学理论对于不发达状态的解释，也不接受它们所谓的经济学的解释（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我并不想在文章的主题之外发展更多的观点，我只是要指出，人口学的解释也不严谨：它提出的人口最佳状态的概念，除了对生产模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的忧虑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并没有解释真正的人口统计学的历史，真正的历史是资本主义人口巨变的历史，这种巨变首先在欧洲人民中产生，而在其他地区传播开来（T.p.46~50）。人口统计学至今也未取得什么大的发展，仍然是与资本主义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无产阶级化理论相脱节的。

②要建立一个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理论，需要先建立起一个社会形成的历史。我从论文的第一页就指出了这种需要。资本主义的世界一体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边缘地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发展，这种发展阻止了人们把不发达状态同前一阶段的发展混为一谈（T.p.1~4）。经济学教育中，有些理论没有割裂理论与历史的联系，通过这些理论，我开始超越“系统内的动力”，去思考各个系统本身的原动力（T.p.41）。

下面我将概括一下我一直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在我的论文中，我曾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结论，并以一系列观点进行论证。

——不发达状态的产生源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领域 (A1.p.19)。

——理论上的统一意味着人们把资产阶级（或资方）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生产阶级（这里的理论是针对与整个世界体系的，而不是针对于组成体系的各个国家的） (A1.p.47~50)。

——我以劳动报酬水平的不同来定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两极分化，在劳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后者的工资水平要远远低于前者 (A1.p.220)。这种现象是从边缘地区的工业化阶段开始出现的，我们应该对它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A1.p.225)。

——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中心地区的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而在边缘地区，则是列宁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政治现象，只有放在两极分化现象中考虑才有意义 (A1.p.230以后，p.423~428)。（这种两极分化是由资本积累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所导致的）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给资本主义和之前的社会做了相同的定义，而实际上，这种理论的普及掩盖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特征的最重要发现——经济的异化。而且这也延迟了关于资本主义形成理论的建立 (A1.p.423~428)。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一种从历史角度出发的观点。它是建立在各种基本生产模式的复兴基础之上的（如与亲属关系相应的原始的共同生产模式，拥护奴隶制的生产模式，封建性的或是隶属性的生产模式，简单的商品生产模式）。这些模式相继出现或是同时并存，有时在远距离贸易中，还会同时被使用

(A1.p.245~248)。这个观点的提出在随后的许多年中，都是不断争论的焦点。

关于边缘地区资本主义的形成问题，我一直都不接受二元论的说法（现代化与旧时代残余的并存理论）。我认为，应该以它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来进行划分。在这方面，我要突出强调土地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现在这种主导地位逐渐被新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所取代（A1.p.10~41）。但是无论两极分化以何种形式出现，从根本上讲，边缘地区的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主义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他们的民族自主理想也只停留在一些没有行动的愿望上（A2.p.49）。第三世界中一些激进的民族政权所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而是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一种新形式（A2.p.63）。

8. 结算

①我在1957年所交的那篇论文，在那个时代里是十分超前的。它的题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前资本主义经济国际一体化的结构性影响——对于造成经济不发达状态的机制进行的理论研究》）。

从那时起我就坚信，不发达状态并不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产物。这种扩张一方面带来了中心地区的发达状态，一方面又造成了边缘地区的不发达状态。在这里我再次使用了裴毕什提出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概念，但同时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当时，罗斯多的论文还没有出版（它在1960年才得以出版），他试图推广一种线性发展理论，其分析经济的方法极其的简单化、机械化，从60年代起受到了许多批评。另外，拉美学派的研究在那时也还没有开始，罗尔·裴毕什还未提出“混乱主义”的观点，当然，这一理论与罗斯多的粗略理论相比要细腻得多了。“混乱主义”在六七十年代成为

了发展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体现了在第三世界掌权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我们也把它称为“万隆路线”。然而我对新兴的发展主义理论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大大早于“混乱主义”理论的出现。该理论刚一出现，我就对它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在70年代，自称为“依赖主义理论”的左派开始对“混乱主义”提出批评，但我认为这种批评不可能接触到发展主义理论批评最本质的问题。从60年代初这一理论形成开始，确切地说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我接受了毛泽东主义的批评思想。从1957年起，我一直把世界体系看成资本积累的一个整体，这一观点，要早于所谓“世界体系”（世界体系分析）派思想的提出。

从论文一开始我就指出，不发达状况是由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所导致的，这种调整并不是源于以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和自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标志的经济突进，而是一种不得已的对外部经济扩张的屈从（T.p.608~615）。在这个观点中，我们应认清边缘地区和新中心地区的最本质区别。不发达状态的种种特征和与中心地区大相径庭的社会活力不足现象（就像我们以前谈到的那样，在中心地区，劳动报酬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而在边缘地区则不然），并不是暂时性的问题，而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必然结果。资本积累和赤贫化的规律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不只局限于中心地区（A1.p.117；A2.p.59, 169）。因此，两极分化现象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由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如文化、人口等方面）所引起的。它的出现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这一发展体系范围内无法被消除（Postf.p.433）。

我对发展主义思想的批评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本质。发展主义政策处处受到与外部关系的制约，如果不脱离这种影响，结构改革所造就的企业就注定为走向失败（T.p.616）。

我并不属于世界银行所推崇的那些“发展主义先锋”，恰恰

相反，我是批判发展主义的先驱之一。由于人们渐渐失去了耐性，对发展主义的批评几乎成了现在的一大潮流。

我在1957~1970年间提出的观点还远远不够成熟和完善，这些不完善之处成为了我在随后的岁月中所努力研究的问题。

②我的理论还涉及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的根本性批判，这种社会思想确切地讲就是为了对抗历史唯物主义而建立起的经济方面的伪科学。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对这种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逻辑的不连贯性。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对这种笨重和荒谬的思想进行研究，也大可不必没完没了地对它进行批判。这些经济学家，试图把他们的科学建立成为资本主义体系运营管理的一种工具，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种努力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对此从来不感兴趣，也从不想为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我写论文的时候所持的有关经济局面的理论，现在看来并不十分有说服力，也不十分完善。我甚至是对一些理论进行解释的先驱，但现在看来，我的解释却可能是错误的。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我认清了自己理论的这些局限性。我在论文答辩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中都提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义对苏维埃经验的批判是一种“左”倾的批判，与之相对立的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右倾主义的批判。就像罗萨纳·罗桑达所宣称的那样，毛泽东主义提出的批判可以说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渐渐地被欧洲工人运动和苏维埃主义所冲淡。毛泽东主义主张对过渡阶段进行深入思考，并在相互矛盾的目标中重新找到平衡：要想追赶上发达国家，就要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即使这将带来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特征，或有可能导致另一种社会的建立。其他方面的冲突带来了技术的非中立性问题，在这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中是没有的。我在这方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必要的解释，

在“发展经济和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之间的矛盾中，关于两极分化现象的意义和范畴最本质的论战开始逐渐显现出轮廓，这一直是我研究的核心问题（Postf.p.448）。

在这方面，我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则是局限于对一种对两极分化现象的不完全理解。我当时一度把赤贫化现象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资本积累，这恰恰证明了上述的这种局限。在此我再次运用了列宁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模式的抽象模型中）并不会带来实发工资的增长，因为对生产设备的需求还可以带来市场的继续扩大（T.p.49）。1973年，我脱离了这种思想框架，而转为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再生产的扩大必然要求工资的增长。也就是从此开始，我放弃了一直坚信的“利润率倾向下降”的观点（Postf.p.422）。这种思想上的突变促使我更深入地去研究两极分化现象，从而推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的规律，认识到赤贫化就是这种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体现。

③在随后的几年内，我一直致力于重新推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的规律，并把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同资本主义模式内部的积累严格地区分开来。这种关注又促使我重新审视在资本主义历史分期上的观点，无论是关于过去、现在，还是正在建设的未来。

在博士论文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中，我都强调了1880年这一历史分水岭的重要性，它标志着历史已经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直觉是正确的，它所使用的方法也是非常先进的，尤其先进于那些激进的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点），我试图通过对尚拜尔兰、约翰·罗宾森和卡莱斯基（T.p.346～356）的批判，来证明这一点。与此相反的是，我非常赞同和欣赏巴郎和斯维兹提出的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发生

转变的理论。

我在论文中提出的对垄断之前的几个阶段的分期成为了我对两极分化概念的深入研究中重新考虑的问题。

边缘地区的工业化从 50 年代起开始萌芽，对于在这一新阶段内所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应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当然也要考虑到尽管这一切在我看来将开启一个新时代——万隆时代，但它毕竟还刚刚起步（T.p.624~626）。尽管如此，我还是带着对这条发展路线的满心疑惑走进了这个时代，我在 60 年代对一些国家的经验（如埃及的纳赛尔政权，非洲——即马里、几内亚、加纳——的社会主义尝试，在象牙海岸、中西非和马格里布的新殖民主义等）所进行的论述证明了这条路线演变的速度之快。

在下一个章节中，我将再次阐述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两极分化理论的演变过程。

④走出经济学的束缚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各种潜在可能性的领域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随后几年的关注使我学到了以下这些内容：

——用论文中从未使用过的方式来阐述价值的世界一体化规律；

——把从属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进行详细的历史性的对比，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经济基础与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提出一个对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等问题的论述；

——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它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特性）的批评定位于这个框架中（即历史唯物主义）。

⑤在我写论文的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真正严肃的去分析苏维埃政体，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这方面的经济实践都十分的缺乏。但是从 50 年代末起，毛泽东的批判理论使人们得以走出托底斯基（一个被官僚阶级推翻的工人政权）肤浅理论的束缚，我

也从把苏维埃社会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误区中走了出来。我对于把经济追赶放在首位的政策批判（Postf.p.412~413），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世界特性的讨论。（A1.p.59）

第二部分：1970~1990年

50年代中期，在论文中，我已经得出了我后来一直所坚信的，对于我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结论和观点：

——不发达状况不是在发展中的一种滞后现象，而是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现代产物，这种扩张从本质上讲就是两极分化的，通过边缘地区经常的结构性调整制造了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差异：这种调整是为了适应中心地区资本世界扩张的要求而进行的。

——人类社会从1492年开始逐渐走向现代化，对于这个社会进行的一切分析都是基于整个世界体系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针对于各地方社会或各民族社会而言的。

——这个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基础之上的，它的发展逻辑颠覆了以往的统治秩序，并被称为经济的异化。这也就是说，它的统治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生活中，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一种没有科学根据的理论（它只是一种语言的重复），它只是竭力想把这个政体合理化，但却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经济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受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启发，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扩张的管理艺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十分有效。

——然而，建立在同一思想基础上的发展主义政策却从未起到过任何实际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向它所宣扬的目

标迈进（也就是没能缩小南北差距）。

我在1955~1965年期间所提出的论点是十分不完善的，也就是说还没有明确区分一般价值规律与世界一体化价值规律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两极分化的基础。

在随后的几年中，也就是1965~1972年间，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对世界一体化价值规律的诠释上，这种诠释涉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进行解释，并把它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方位的分析方法中。我在《不平等贸易和价值规律》（1973）、《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4）、《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6）中所提出的理论，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以下的内容将对这些著作进行介绍，它们都是紧紧围绕着价值规律问题展开的。

为了继续研究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发展，我在世界一体化价值设想和理论的启发下，反复阅读了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当时所处的时期正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以边缘地区的工业化（不平衡的）发展为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盛衰所带来的转变也导致了这一新阶段的产生。于是，我重新回顾了自己先前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过于依赖对两极分化前期阶段的分析，并以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对比为标志。我具体研究了这种正在进行的新的尝试，即发展主义的尝试，并试图从全球的角度对世界体系的演变进行新的、批判性的分析。这种对发展主义的评判是我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也必然会引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出路问题的论战。我将把这方面的问题留在别的章节中去讨论。

下面我将叙述一下对价值规律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分三个步骤进行的。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价值规律；

——在资本主义模式中剩余价值的分配；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体系范围中，世界一体化的价值规律。

1.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价值规律

①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核心思想（即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异化现象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的迷恋，使我久久不能接受斯拉法在《以商品为途径的商品生产》中提出的积极理论。这一理论受到了左派的热烈欢迎，因为它脱离了新经典主义经济学的那些重复的空话和妄想。我当时只觉得新里卡尔多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所有荒诞的经济理论（E.I.L.V., 1973, p.33 及之后的内容），仍然固执地要推出一套经济规律，好像它们能够脱离社会斗争而建立起所需的客观条件一样（L.V.M.H., 1976, p.33）。

②这种全方位的研究方法（也许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使我认识到，阶级斗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平衡，而只是造就了一种平衡的可能（E.I.L.V., 1976, p.10）。而这种斗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一是共产党运动（从广义角度上讲），二是民族主权社会的建立，三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我首先从抽象层面的共产党运动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生产环节决定了资本积累的动力和活力，这使我坚信，生产的实现需要工资水平随着生产力水平在这两个环节中的提高而提高（E.I.L.V., 1973, p.40；L.V.M.H., 1976, p.25）。伴随着这个总体结论的还有以下一些观点：

——我强调了信贷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在我的论文中就有过论述）并以此回答了罗尔·卢森伯格提出的问题（E.I.L.V., 1973, p.40）。

——我指出了该系统内在的生产过剩的倾向，这也在我的论

文中出现过。

——我还研究过，在缺乏足够的工资增长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是否可能通过吸收第三环节内的剩余而实现增长。这里我采用了巴郎和斯维兹在《资本主义和垄断》（1966年出版）中提出的观点（E.I.L.V.，1973，p.51及之后的内容）。

——具有活力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建立在技术得到保证这一假设之上的。这个假设抹杀了主客观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E.I.L.V.，1973，p.51及之后的内容），而且错误地认为技术与社会关系相比是属于中立性的。我提出“阶级斗争是在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并导致了这一基础在资本主义模式内在规律中的转变”，以此阐明了这种辩证关系（L.V.M.R.，1976.p.35）。

——我扩大了技术问题的讨论范围，它的发展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并深化了一种技术关系——教育与思想意识。用同样的方式，我拓展了生产力的研究领域，把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环境大会上提出的一些观点融入其中，并对资本主义吸收这些观点的能力提出质疑（我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发展了这一思考）。

——有活力的资本积累模式需要摆脱利润率下降的倾向，这就需要从具体的历史关系出发来研究这些波动现象（E.I.L.V.，1973，p.87及之后的内容）。

——受到经济评论复苏的启发，价值规律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重新恢复了地位，并分析苏维埃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时起到了主导作用，而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主义开创的。

③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概念的放弃是由所谓的价值到价格的转变理论导致的，这种转变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人们在这种转变中试图找到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平衡。然而这两种比率本来就是不同的；如果不存在这种不同，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对劳

动的剥削就变成了透明的、显而易见行为，退回到了资本主义之前的体系那样的状态。这种转变的反对理论抹杀了正在进行的异化的特征，这才是价值概念真正意义的所在（L.V.M.H., 1976, p.16. E.I.L.V., 1973, p.80）。波德娄、埃斯塔布莱和杜瓦尔谢的著作《谁为谁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也在《当代阿拉伯经济》中阐述了劳动的分配问题，从阿拉伯经济的总体来讲，这种分配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各种不同的最终生产之中。

2. 在资本主义模式中剩余价值的分配

①除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它向利润的转变外，马克思还通过引进社会劳动的概念（正是它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进一步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在这里我要提一下《资本论》中的一些章节的题目：《土地所有制》、《国家、民主、政治与阶级斗争》、《经济危机》、《国际贸易》。关于第一个题目所涉及的问题已经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得到了部分的解释，第三个题目所涉及的问题也在第二卷中得到了解释。就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卡尔多）和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经典主义经济学）所做的那样，马克思也没有解决一些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领域不属于共产党运动的范畴——这是我在论文中给这些问题提供的解释（L.V.M.H., 1976, p.41, 《阶级和国家》，1979, p.32）。

只有把研究的领域从共产党运动转移到社会的构成，才能解决剩余价值在利润、利息和租金中的第二次分配问题。

②关于利息问题，我继续了基于对货币理论的批判而进行的思考。我不接受利率由货币的供求关系决定这一肤浅的表面现象，如果是这样，资本家的两个子集——债权人和贷款者，就在市场上发生了矛盾。我曾经赞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观点——即认为信贷的提供要调整适应它的需求（需求创造了供给，这就涉及

了一个伪市场的问题)。于是我开始寻求一种不同的理论,它由资本主义集体因素的作用所决定,银行机制则代表了这种集体因素的作用。通过在生产循环和国际竞争领域中发挥作用,这个系统调节了资本的积累(L.V.M.H., 1976, p.39~41)。我在《调节》(1992)一文中再次把这个观点系统化。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垄断资本主义》中,斯维兹也再次对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对立和相互作用进行了论述。

③我在对地租问题开始分析时,首先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作的论述进行了批判,它完全通过农业和工业组成机制的差异来定义租金问题。我认为应该把租金看做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土地业主并不参与生产的过程。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明白,地主与资本家的矛盾是如何作用于现有的经济基础,并逐渐改变它的。我通过对具体的历史阶段的分析来解决这个问题,如阿尔及利亚、法国的问題等(L.V.M.H., 1976, p.50~51)。

④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分配的问题,也被更深入地进行分析。尤其是马克思在对自产自销的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进行分析时所提出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之间的对立问题,还有矿业租金问题等。

⑤一般来讲,历史唯物主义不容许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同社会冲突的历史割裂开来,因为正是这个历史造就了经济基础。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提出要把理论与历史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L.V.M.H., 1976, p.106)。我以此为出发点批判了那些所谓激进(非马克思主义的)的历史资本主义理论(如多民族化政治经济理论)。我一直强调这种同一是针对于整个世界体系的,而不是针对于各个国家相对独立的构成。

3. 世界一体化的价值规律

①论文中提到的世界一体化价值的观点,构成了1973年发

表的《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的核心思想。在世界体系内的共产党运动中，劳动力的价值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由它在地方上的构成所决定的。然而，由于资本的世界扩张造成了社会条件的不同，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我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价值的世界一体化所支配的（这就是世界一体化价值的优越性），不平等交换只是构成了“冰山的一角”。在这个框架中，我把两极分化概念的内容解释为：劳动报酬的差异远远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E.I.L.V., 1973, p.23~33; L.V.M.H., 1976, p.55）。

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差异就在于此，而不是有什么“依赖性”所决定的，“依赖性”只是这种差异造成的结果而已。世界体系就是以商品和资本组成的市场为基础的（这里不包括劳动力市场），这一事实本身导致了两极分化。然而共产党运动则提出了建立在三个特征基础上的市场理论（E.I.L.V., 1973, p.11）。

勃代汉姆提出：“如果人们赞成各个不同社会的工资应由它们自己决定的话，人们就不会去研究国际贸易的理论，而是接受相对优势的说法……”（E.I.L.V., 1973, p.29~30）我对于这种说法持反对态度。马克思的假设建立在商品、资本、劳动的流动性上。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商品和资本的流动走出了国家而走向世界，但劳动却仍然束缚在国家范围内。从这时起，又出现了剩余价值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分配的问题。我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对循环理论进行了教条主义的指责，于是就坚决放弃了对这些观点的追随（E.I.L.V., 1973, p.219~220）。

在当时（即1973年），我在研究世界体系的形成时，只上溯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也就是说在1890年左右。后来，通过对体系的形成阶段和演变过程进行了重新思考，我又更细致

地分析了一下这种观点。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的理论是具决定性意义的（起码在我看来），只有通过它才能明白：“世界体系的统一并不等于世界的和谐”（E.I.L.V., 1973, p.31）。

②在世界化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的价值转移机制（即剩余价值在世界中的分配）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出现了许多对此的研究：

——这种价值转移（隐藏于价格结构中），是从不从事销售的生产者（即自给自足的生产者）、或从事简单销售的生产者（即农民），向资本主义生产者（资本带来利润，劳动力创造出了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由此，我把家庭劳动剥削（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和农民在形式上的从属地位等问题，纳入了剩余价值的世界起源中。尽管这些所涉及的问题，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都存在，但这种价值转移机制是以两极分化现象告终的。

——体制的在世界上的统一意味着集体剩余价值是来源于世界层次，这是反流通主义的偏见所无法理解的（L.V.M.H., 1976, p.96）。米歇尔·勃德指出最近的体系演变将会导致新的世界生产体系的产生，从而代替以前的国家生产体系。这种观点揭示了剩余价值的产生是世界性的。

——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对比可以用两个图表来解释：一是强调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中的两个环节（针对中心地区），二是强调出口型生产和奢侈品消费（针对边缘地区）（E.I.L.V., 1973, 附录：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p.246）。这种对比并没有随着边缘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和生产体系的世界一体化而逐渐消失，因为马克思指出的产生剩余价值的两个生产环节，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

——世界体制的统一把赤贫化问题转移到了全世界范围内（L.V.M.H., 1976, p.35）。以收入差异体现出的两极分化已

经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在两极分化这一客观基础上发挥作用，并解释了这一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分析阶级结构以及它之间的冲突和联盟（L.V.M.H., 1976, p.55）。我还认为常备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应该在地理上分开（《阶级和国家》，1979, p.160），最近我就这一问题同 G. 阿里奇进行了讨论（《喧嚣》，1990）。在《脱离》（1986）中，我加入了世界范围内赤贫化的图表，并指出了劳伦斯曲线的移位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意义。

——矿业租金理论自然也属于我所研究的这个体系。与农业租金不同的是，矿业资金涉及的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的价格（在资本家的估算中）决定于暂时性的利润估算，然而对于一个整体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另外一回事了（L.V.M.H., 1976, p.63~67）。我建议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研究矿业租金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角度看，矿业租金在劳动范围扩大的基础上通过扩大供需，而使利润率达到了最大（L.V.M.H., 1976, p.67）。因此，我把与世界分工相联系的历史分期引入这个话题之中。在两极分化的旧形式中，由于边缘地区还没有进行工业化发展，土地租金只是用来维持当地资本家和地主的同盟（L.V.M.H., 1976, p.67~69）。边缘地区开始工业化发展后，两极分化呈现出新的形式，地租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而转化成为世界和地方上的资本利润，关于矿业租金的冲突也逐渐尖锐起来。于是我指出，石油开采租金的出现，是由于阿尔及利亚和伊朗开始了工业化，尽管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而并未独立发展（L.V.M.H., 1976, p.71）。

在租金问题的理论化过程中，我还插入了一些其他方式的分析（L.V.M.H., 1976, p.71~72），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③我对世界一体化价值规律的解释，是在世界化再生产模式、苏维埃主义中的孤立的再生产模式，以及孤立的民族主义方

向的再生产模式这三者之间的对立中的，这一点是我在《毛泽东主义政权的未来》（1981）（p.7~37）中就已指出的。

④对于世界化价值规律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关于不平等交换的论战带来的。而这场论战是由阿日里·埃玛约勒在1969年出版的《不平等交换》挑起的。

我后来又重新对论文中提出的贸易增值概念进行了思考，因为这一概念既包含了收入比问题又包含了生产效率比的问题。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不平等交换进行了定义（E.I.L.V., 1973, p.57）。因此，我在这方面比埃玛约勒走得更远些，并反对一切需要借助于相对优势理论进行分析的观点。譬如，对于国际交换需要各地生产有特色的产品这一假设，我就持否定态度。于是这也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需要解决：既然在边缘地区可以从更高的劳动剥削率中获利，那为什么资本不能在边缘地区完全的实现转移呢？答案是，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剥削率将会导致大量无法销售的过剩生产，既而导致全球供需平衡的脱节（E.I.L.V., 1973, p.63）。我提出了一个能在世界范围内总体平衡的结构模型，该结构是由不同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价格的布局决定的。它把不平等交换的概念——这只相当于冰山露出水面的顶部——发展为对边缘地区的结构调整和不平等的世界分工问题的思考（不平等的世界分工实际就是结构调整的一种表现）（L.V.M.H., 1976, p.55），从而保证了贸易结算的平衡（E.I.L.V., 1973, p.63）。阿里日在一篇论文中谈到了关于世界一体化的新阶段，以及中心地区垄断“贵族”操纵下的两极分化及其再生产等问题。我就这篇论文展开了讨论，并继续发展了我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

最后，回到狭义的不平等交换概念上来，我仍然要保留我最初的论点：这种不平等是在帝国主义才出现的。在另一个章节中，我将会更仔细地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问题。

本章参考文献

1. 论文(文中简称 T):《前资本主义经济国际一体化的结构性影响——对于造成经济不发达状态的机制进行的理论研究》,巴黎,1957。

2.《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第一版,人文出版社,1970。参考详见近期的第10版至第18版(1976),分上下两卷(文中简称 A1/A2),后记(简称 Postf)。该书前言引自1988年经济出版社新版。

3.《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文中简称 E.I.L.V),人文出版社,1973。新版出自经济出版社,1988。

4.《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文中简称 L.V.M.H.),午夜出版社,1976。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两极分化 性质的世界扩张

在第三章中，我介绍了全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理论形成的几个阶段。两极分化现象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所固有的，伴随着资本主义长达5个世纪的历史——从1492年至今，而且，只要世界秩序仍以资本主义原则为基础，两极分化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从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这种两极分化现象一步步恶化，因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令人印象最深的紧张局面，以及资本主义最可悲的历史局限性和另外两个局限性——把人变为一种劳动力商品的人类的异化和对再生产的自然基础的破坏，这两个局限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质所固有的。

两极分化现象证明历史和理论是不可分割的。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思想拒绝把两极分化做为研究的中心问题，而只把它看做世界局势和地区特性的一个附带现象，因此，这种传统的社会思想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然而，这个理论却给当权者及其使用者带来这样一种持久的启示：“要想做到经济上的超越，不一定非要对资本主义制度发难，而可以反过来聪明地利用这些制度，并把自己融入到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去。”如果一个世界银行的专家有机会回到17世纪在美洲游历的话，他一定会惊叹于“圣多明各的奇迹”，也一定会嘲笑新英格兰的侨民建立自我中心经济

的选择。他一定不会想到海地奇迹似的转变，更不会相信新英格兰那些可怜的穷人们后来竟然缔造了美国。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都有一些走在浪尖的国家，众所周知，今天的这些国家就是韩国和一些独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如果边缘地区新的工业化使两极分化在未来愈发严重，那么上面的那种启示又该如何解释？我敢打赌，那些世界一体化的捍卫者，那些对于分化理论的抨击者，一定不会去反省。因为，六七十年代非洲的发展政策是由世界银行起草的，这些政策除了导致了今天所看到的灾难外，什么也没有带来。但是人们永远不会看到世界银行在整个问题上做出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在这章中，我要全面地介绍一下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不是把它当做资本积累理论的补充，而是把它看做该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这就面临着一系列的历史问题，如：重商主义时期（16~17世纪及18世纪），美洲在这个时期里所发挥的作用，欧洲强国之间的冲突，世界现代史中延续的关于霸权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位（英国、美国、法国的革命），工业革命的地位，孔塔切夫所说的长周期理论，列宁定义的19世纪末从垄断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为迎接新的世界一体化而发生的转变，等等。

这一章就是用来阐释这些问题的。那些反对现有体系的力量发展起的策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各个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冲突，上述的那种对于历史的阅读，也会同时涉及对这些策略的批判性的阅读。另外，这还有其会涉及对二战后的发展主义概念和实践进行的评述，从1955~1992年这一直是一个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我在第六章中研究的主题。这种评述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其他的替代观点。我将在另外一章中讨论民族解放和发展的替代政策，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和思想。

1. 世界资本主义革命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

①回顾历史时，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每个历史阶段都看成是在为了后面的阶段做准备。这样似乎掩盖了那些突变的时刻和那些很快发生、或突然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社会、政治、技术、思想上的革命。这种回顾历史的方式经常会强调在突变之前漫长的成熟酝酿过程，以及与它相关的一系列变化。通常这种变革的规模要比其发起者原来所想象的要小（因为革命发展会逐渐缓慢下来，而旧势力就有机会卷土重来……）。

这种看待历史的倾向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乐观主义者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缓慢的“进步”的过程；悲观主义者把历史看成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无止境的重复。这样就抹杀了各个阶段的不同特性：譬如，资本主义阶段（它与之前的阶段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阶段都是对立的）。我一直反对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例如 A.G. 弗兰克的理论（《旧的地方体系和世界体系》，1991；《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1992），我就认为是一种很大的偏差。与这种历史观相反，我一直坚持要突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色。我甚至特别强调对于那些社会转变加速的历史时刻的研究，尤其是革命时期（《喧嚣》，1989：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因此，我给以下这四个划时代的时刻赋予了及其特殊的地位：1500（欧洲殖民强国征服全球，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两极分化的同时诞生）；1800（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结束，工业革命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完全形成，法国大革命爆发）；1880（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1990（战后时代结束，波斯坦时代开始，苏维埃时代的终结，世界一体化的新阶段渐露曙光）。我之所以用这种近似的时间来标志这些突变，是为了避免以后还要做出具体的时间划分，来解决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了质的

飞跃。

很显然，这三个阶段（1500～1800年，重商主义过渡时期；1800～1880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1880～1990年，垄断资本主义的初步形成）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用单纯的经济学观点来分析，而是要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中去研究。另外，上述这些巨变并不是现代历史上惟一的重大时刻。根据不同的看待历史的角度，应该有不同的历史分期观点同时并存。例如，孔塔切夫提出的可能发生的长循环周期的观点，或者一系列的霸权主义观点，强调应突出技术革新集中的时刻，政治和社会革命时刻（1917年，俄国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边缘地区反抗斗争的盛衰反复（美洲殖民地的拓殖，1500～1800；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地，1950～1970年；从1980年开始的边缘地区的再次隶属化），等等。

在下面，我将试着回溯这个体系形成的各个阶段，其中，重点强调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两极分化现象，上述重要阶段和其他历史分期方式之间的联系。我还将在这个历史框架中，研究边缘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从而检验世界体系当代所面临的危机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②我的这种历史分期方式，逐渐在各个方面涉及一些对理论问题的回答，特别是关于重商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性质，长期循环，霸权主义系统等。

——早在我的论文（1957年）中，我就把美洲的殖民化和相伴的重商主义看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序幕。在对边缘地区形成的概论中（《资本积累》，《不平等发展》，1972）我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并指出，美洲殖民地区对于大西洋地区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有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它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奏响了前奏。

这种历史角度的选择，可以对两类问题做出解释：一类是，

重商主义的三个世纪中（1500～1800年）欧洲社会的内在转变与美洲殖民地区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欧洲（或其他地区）封建制度内部1500年之前和之后发生的转变的成熟过程。

关于第一类问题，在朵普夫人、塔卡沙伊、P. 斯维兹发起的论战（1977年）中，我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最初的观点是，欧洲的内在转变和大西洋地区的重商主义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但是，这种结论现在无法让我满意，因为我一直在想，封建主义内在的转变和资本主义关系在其内部的诞生并不是新现象，也就是说，这些现象在1500年前就出现了——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另外，它也不是特殊现象，因为类似的演变也在其他社会——即非欧洲社会——中出现，有时甚至比欧洲还早几个世纪。直到后来，当我把封建主义的特殊性表达为一种臣属模式的边缘形式时，我才找到了一个比较令自己满意的结论（《不平等发展》，1972；《阶级和国家》，1979）。与已经十分完善的臣属模式（如中国的封建模式，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模式）的僵硬性相比，这种封建主义的边缘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为欧洲内在转变的加速发展或发生质的突变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权组织形式及其社会内容方面。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章节中，我将再次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

“内外部”关系的表述已经十分明确地给出，因而，我认为资本主义成熟的加快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加速是由对美洲殖民地的剥削带来的（参见《世界体系的形成》，1975；《对欧洲发展与第三世界的研究》，1988；《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上升》，1990；《1492》，1990）。

因此，我一直坚持重商主义过渡阶段的特殊性，并强调要把它从本质上区别于在封建主义的欧洲，意大利城邦（1200～1500）以及其他地方（伊斯兰在公元80～1200年间的第一个兴盛时期，明朝时的中国）在此之前的一些时刻。在此之前的那些

时期里，处于发展阶段的最初的资本主义模式与封建政权（或者它的边缘形式）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一个一般规律，这就是所有封建社会中（不仅局限于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与生产关系的更新之间的普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名称仅授予欧洲的这个重商主义时期，而不给其他别的时期（参见《旧的地方体系和世界体系》，1991；《资本主义和体系化世界》，1992）。另外，一方面，在封建欧洲出现了新兴资本主义与君主制度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在东方的其他封建社会也出现了这样的冲突。我把这两方面进行类比，以此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即强调欧洲的近乎神秘的特殊性）和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体现，它有时以“两条道路”（欧洲、亚洲）的形式出现，有时以“五个阶段”的形式出现。我当然还会在后面的章节里更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

——工业革命构成了第二个决定性的巨变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建成——即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仅包括雇佣劳动，还包括资本在重要工业设备中的凝结，而这些设备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只有在这时价值规律才在三维市场（产品市场，即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作用。所以，必须在建立了大型机器工业之后才能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问题。我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特征（异化现象和经济思想的统治地位，经济扩张，大规模城市化等），从这一时期起才开始显现出来（《不平等发展》，1972，p.19~22 和 p.49~65）。

然而，工业革命同时也导致了两极分化现象开始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化起来，并在随后的这一个半世纪（1800~1950年）中逐渐成为现实，表现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对比，也就是实际上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同未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对比。这些未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后来逐渐融入国际分工之中，成为了农作物和矿山的出口国。同时，工业革命还赋予了这些工业国家

一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这帮助他们花很少的钱就圆满完成了其对世界的征服。

工业革命首先于 18 世纪在英国展开，然后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接着在欧洲西北部和新英格兰普及，后来又在 19 世纪上半叶散布到欧洲东部和南部。中部欧洲在 1850~1870 年间也很快追赶上了这种发展，而日本后来也进行了这种革命，并成为对该模式进行复制的最后一个国家。

英国在这场革命中超过了它在重商主义时期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主流观念认为这种超越的原因来自于英国社会内部的动力，即农业革命和 1688 年革命带来的政治民主化。而我在这方面则赞同像 I. 沃勒斯坦这样的少数派的观念，它指出英国在农业和技术革新上的优势是相对而言的，甚至是有争议的，同时强调了英国依靠其在殖民掠夺上的霸权地位，从美洲直接或间接地夺取了巨额利润。正是凭借当时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中所占据统治地位，英国才拥有了在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

——垄断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末的出现，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史上的第三个巨变时刻。

列宁在这里强调指出，在新形势下，各国卖方市场的竞争支配了主要的中心国家的生产体系，它们之间的冲突蔓延到经济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必然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传统经济在买方市场的竞争问题上过于钻牛角尖，但却从未真正关心过垄断现象在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上产生的深刻影响。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巴郎和斯维兹提出的，针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过剩生产的吸收概念。

另外，列宁还把殖民现象与垄断帝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关于 19 世纪末的殖民扩张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地方，然而这个殖民现象并不是新出现的。因此我要强调不能混淆扩张主义和垄断时代的帝国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扩张主义是

资本主义一直的内在特征，它在 1880 年前就造成了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互补的不对称性（《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p.111 及后面的内容）。

在边缘地区中，什么是新兴事物呢？我在第三章中就说过，不平等发展是从 1880 年开始的，因为只有从那时开始，中心地区的工资才开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在以往的阶段中，实发工资总是处于停滞状态，有时甚至还会减少，这种工资与生产力的脱节则正是资本积累飞速增长的源泉，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在短短半个世纪中彻底转变了欧洲和北美的社会面貌。这种转变腐蚀了资产阶级与工人相对抗的社会联盟，在工资增长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劳资双方的妥协关系。

列宁在论述“工人贵族”的出现时指出，工业化的中心地区和农业、矿业为主的边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是这个新的调节系统的补充部分。

也就是说，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前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无论有没有不平等交换问题。两极分化永远会导致不对称和不平等问题。譬如，重商主义时期的美洲，它并“没有与大西洋地区的欧洲进行过贸易往来”，“它被塑造成为了一个专门为资本积累服务的生产机构”（《不平等发展》，1972；《资本主义和系统化世界》，1992）。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被塑造成这种形式的地区——如新英格兰，或者说那些脱离于当时剥削系统的地区，在后来经历了惊人的发展，并成为了新兴的中心地区和当代世界体系中的一极。

工业革命后，边缘地区被塑造成农业、矿业产品的供给者，他们提供的价格使中心地区生产成本得以降低。这种方式并没有体现市场中自由竞争的经济规律，而是政治力量对经济施加影响的结果（参见以边缘资本主义的形成为主题的章节）。就像以往所有时刻一样，这种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市场

规律造成的，因为这个市场本身就是由超国界的或地方上的社会联盟，根据两极分化状况而建立的，这些联盟构成了强加在边缘地区身上的结构性调整的基础。

我曾经指出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是出现于这个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关系紧张阶段。就在工业革命在欧洲普及时，这种关系却暂时被边缘化，尽管它在以前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随后的阶段中将再次起到这个作用。马克思的错误在于把资本的原始积累搁置在了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阶段，而忽视了两极分化的作用，它所提出的贫穷化规律是在作用于世界范围内的，但却把一些中心国家人为地从世界体系中脱离出来。

现在，人们似乎又要回到一个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似的体系中去。我认为世界一体化在最近几年更加深化了，这是由于中心地区的经济渗透造成的，它把那些“部分世界化”的边沿地区进一步推向边缘，而与此同时，那些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正在进一步地融入世界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然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种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没有一个同步的世界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最终将成为未来的新边缘地区。至于第四世界，它是在不久前才被边缘化的——相对而言的边缘化，就是说，只涉及经济方面，而不包括其他方面。综上所述，我认为1990年大概代表着一个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巨变（我在以后会继续论述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社会现象，甚至任何自然现象，会一直有规律地、持续地、无限地发展。因此资本主义扩张的那些阶段必然就会伴随着艰难的再调整时期，这或许会让人有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这就是说，认识到这些前后相继的阶段，并不意味着要承认历史循环理论。因为，只有在社会机制自动地重复这些运动时，这些观点才有意义。

就像我在所有研究中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带来了

一种持久的生产过剩的倾向。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对于表象循环进行的讨论与世界系统中其他问题的讨论有所不同。

在传统经济严格定义的领域中（生产、投资、价格和收入），人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长期的浪潮。价格指数确实在 1815~1850 年间显现出了一个下降的趋势，而 1850~1865 年又开始上升；1865~1900 年在下降，1900~1914 年在上升。然而，我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理论与循环论毫无关系。1850~1900 年这段时间，正好是北美和南非新发现的金矿投入开采的时期。在一个以黄金价格稳定（从 1815~1914 年间一直如此）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内，绝对价格的演变，是长期的价格下降倾向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要求的。这个倾向由于生产黄金的效率提高而被阻止。在 1850 年和 1900 年，伴随着新金矿的开采，就曾突然出现过这种下降的倾向。它所导致的价格的提高，用了 15 年的时间才被消化。同时它也留下了这种长期的下降趋势。

长期循环影响着生产的增长，而它的增长必然与投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于长期循环的研究不需要依附于什么循环理论。因为，每个经济飞跃的阶段，都对应着重大的体系更新和以扩大市场为目的的政策变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应着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那些战争；

——铁路的建立，对应着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

——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对应着汽车文明和冷战（因为美国靠着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庞大军费开支才走出了 30 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

在反对孔塔切夫的问题上，我并不把自己划分到托德斯基那一派中。托德斯基认为一切技术革新、新资源的开发、战争、对外扩张、甚至阶级斗争的成果都是出自于经济循环论的因果关系范畴，从而人为地撕裂了政治经济学与更广阔的历史唯物主义领

域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孔塔切夫在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上，具有一定的直觉，把狭义的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领域中的变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方面的事实也是资本积累现象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带来任何循环理论。

我在这些方面的旧作有：我的论文《资本积累》，《不平等发展》（1972），《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4），《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1975），《什么是经济危机》（1982），《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1992）。

我认为对于以往——1500～1800年——长期循环理论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理论带来了很大的混乱，以为，资本主义模式特有的矛盾显然在其他阶段中都不存在。譬如，如果在那些时代中谈论生产过剩的倾向，就会显得很荒谬（《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1992）。

——同时，还存在着一种看待历史的倾向，就是把资本主义的历史看成一个霸权更替相继的过程，在一些人看来这段历史是从1500年开始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大概从1350年就开始了。任何一种这样的观点，即使是一些现代的观点，都没有赢得我的赞同，更不用说以前的观点了。这些观点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研究做出任何补充，对我的研究更是没有任何意义（《不平等发展》，1972；《世界体系的形成》，1975；《世界系统控制权的斗争》，1980）。

一般来说，世界体系学派过分向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倾斜，试图通过整体（世界经济）去理解各个部分（各个国家）做出的决定。这使我立刻想到要具体说明一下，这些不同的霸权阶段是前后相继的，但却不是类似的。首先，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的所谓霸权并不是世界霸权。从16到19世纪，世界并不只局限于欧洲和它在美洲的延伸。威尼斯或者荷兰的霸权地位在当时那个时期的现实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即使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经

济的形成时期，即我所说的历时3个世纪的重商主义过渡时期，我也不认为可以把威尼斯或者荷兰称为霸权国家。他们虽然是著名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但却不得不处处受到农村封建社会的制约，而且还要通过各大君主冲突来维持政治的平衡。1648年的维斯特菲力条约并没有造就荷兰的霸权，而是创造了欧洲的平衡，从而削弱了荷兰的霸权。

我甚至怀疑18世纪的不列颠是否可以称之为霸权。在击败了它的对手法国后，英国赢得了当时的海上优势地位。但是，它还没有能力在欧洲大陆事务上确立强权，也没有能力真正地统治那些海外的殖民地。它的霸权是在很久以后才取得的，直到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国门被打开（从1840年起），印度暴动被镇压（1857年）。大不列颠在工业上的先进和金融上的垄断，并没有给它带来真正的霸权。因为这种所谓的世界霸权，还受到欧洲的限制，而欧洲还没有被英国所统治。大不列颠的霸权刚刚建立（1850~1860年），就因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的出现而遭到质疑，他们崛起于1880年，在工业和军事方面都对英国产生了威胁，虽然伦敦已经将其在金融上的特殊地位保持了很久。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霸权远远谈不上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史上的什么规律，而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短暂的、脆弱的现象。整个体系的规律才是更具有持久的。

那么现在事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呢？或者是否正在变化过程中呢？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的霸权从1945年后，的确确实具有了一个新的特性。美国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拥有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干涉能力（尽管这是通过一系列的毁灭和种族灭绝实现的）。尽管从1945~1990年受到与苏联共享军事霸权的制约，美国或许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世界的主人（军事上讲）——以前除了希特勒外，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不过这种霸权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再次回顾一下涉及上述问题的旧作：《不平等发展》（1972）；《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1974）；《什么是经济危机》（1982）；《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1992）。

就像反对循环理论一样，我一直反对把霸权现象放回到以前的历史中讨论，因为这等于是抹杀了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的君臣制度的特征（《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1992）。

——现代历史中的两极分化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被各个强国之间在国际上的政治竞争而扩大延伸。因此，我一直关注社会再生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发生的质的转变。我在《调节》（1992）一书中对此做了全面介绍。

在意识形态方面，我认为对以往历史的回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由现代世界的三大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所代表的历史。

2. 两极分化和边缘资本主义的形成

①我曾提出用一个双重图表来表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对立。一方面要体现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它决定了资本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要体现出口与奢侈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决定了边缘地区社会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资本积累的理论模型》，1972）。尽管这种说法已经有点老套，但我还是要指出它的普遍意义。这里所研究的边缘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以边缘地区缺乏工业化发展为标志的资本主义阶段，还涉及第三世界开始进行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关于进口工业和出口工业的传统讨论阐明了两极分化的新阶段与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之间的关系。前者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刚刚开始时就已隐约出现，后者则是世界范围内积累规律与贫穷化规律的体现。世界银行就一直沉溺于上述这种讨论中，并因此回避了自我为中心建设中的工

业问题（即工业发展为农业革命服务等，参见我在此问题上的旧作），尽管这些工业也都是面向外部的（相互依赖，但却是不对称的依赖）。

这个图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发明，而是对我的许多具体研究的一个概括。其中包括我对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社会形成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于阿拉伯和非洲地区的；还包括我对美洲和亚洲社会形成的分析。这个图表是一个社会构成的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

②我把两极分化定义为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历史和理论的中心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边缘结构的建成和演变，以及它们相对于中心结构的特征，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对于这些问题的最初研究出现在《资本积累》中，而后又在《不平等发展》（1972）中有所延伸，它的副标题为《关于边缘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成》，这表明了我的研究兴趣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而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广阔领域。

如果不能对一个问题推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固执于这个研究，而应求助于他山之石。在关于美洲社会构成的问题上，我就从拉美学派（以卡尔多索、利贝罗、弗兰克、费尔塔多、吉迦诺等人为代表）中吸取了许多观点：它的社会构成从一开始就是与众不同的，它具有“伪封建性”和奴隶制的双重形式，然而这种形式只有在隶属于重商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才有意义；大庄园农业（非封建性的）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些独立的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也支配着当地统治阶级和英国帝国主义的联盟；对于混乱理论的批评，体现了建立新工业资产阶级的愿望，而我认为在世界体系中，这种新资产阶级的建立只会造成和加深两极分化，而它本身也会很快地衰落下来（参见《关于罗尔·裴毕什的讨论会》，1988）。

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以及它所带来的世界体系重组后的新形

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认为，1990年或许代表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第四次巨变，并具有同以往相同的重要性。然而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开始得更早些，我曾认为，它是在30年代经济危机和工业民众运动中开始的，一次新的质的巨变（《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p.89及后面的内容）。

关于阿拉伯和非洲社会构成中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从我60年代中的具体研究或经验性分析中发展出来的（《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1964；《现代马格里布》，1970；《发展中的三次探索：马里，几内亚，加纳》，1965；《塞内加尔事务》，1969；《象牙海岸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封闭的西部非洲》，1971；《法属刚果——特许独立集团》，1970）。我的60年代是在埃及的马格里布地区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度过的。后来我把上述一些文章中得出的结论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非洲的阶级斗争》，1962；《黑非洲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黑非洲地区的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1972）。

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以及我对此提出的问题及回答，都预示了我后来的著作（《阿拉伯国家》，1977；一套关于阿拉伯的丛书；《国家——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1992）。阿拉伯前资本主义构成的特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远距离贸易，伊斯兰教的复兴——纳达政权等）。我把地产看做是一种融入世界体系的新型资本主义种植园经济，而不是相当的理论潮流那样，把它看成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我提倡把1800年起埃及的历史看成是一系列对于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的尝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才对瓦浮德政权做出了判断：它是来自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我不能称它为民族政权），建立在纳赛尔政权基础上的政权。

在研究撒哈拉南部非洲的问题时，应该回顾一下贩运黑奴活动及其相应的影响（在这个框架中，我要指出一种“东方重商主

义”，即在桑给巴尔历史上，苏丹的穆罕默德·阿里采取的政策），以及殖民主义之前（1800~1880年），对复兴的尝试和为适应新的国际贸易进行的调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我指出了非洲的三种殖民剥削形式（《黑非洲地区的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1972），并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前提条件的理论（《黑非洲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欧洲经济共同体实施的政策，使非洲直到60年代都未能进行工业化发展，并导致了它后来的部分现代化状态。通过对这些政策和新殖民主义的批判，我对非洲社会构成理论进行了补充。

我从边缘资本主义结构的历史形成中，总结出了四个结论：

——农业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不是“封建主义的残余”；

——追随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它不是民族性质的资产阶级）；

——适用于当代边缘地区经济的，新型官僚主义的发展倾向（它标志着向两极分化新阶段的过渡，新阶段建立在边缘地区工业化的基础上，会导致社会内部两极分化的出现和加深）；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运动极其特殊性（我把“社会的边缘化”分析为边缘地区无产阶级后备部队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

同时，我把一些特别的发展地区称为欧洲扩张框架中的“新中心”，欧洲的扩张也由于自我为中心的社会而开始了世界化（也就是说脱离对两极分化体制的结构性依赖）。我特别指出不能把这些发展地区与边缘地区混淆。

我在《不平等发展》一书中提出了要对一些理论进行总结的目标。其中包括资本积累理论（这个理论一直没有完成，这在第三章中已经提过），还有中心地区社会构成与边缘地区社会构成之间对立的理论，它的研究整体——世界体系——可以被看做是与此范围相一致的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从中我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关于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关于封建社会的闭关自守

和远距离贸易问题，民族概念问题，这些我们都将在历史唯物主义一章中予以研究。

3. 当代经济危机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

①世界体系的思维逻辑，就是一种资本主义逻辑，它永远把经济危机归结为世界范围内供需关系不平衡的体现，这个世界范围也就是指我们和当代世界关于结构危机的问题。这里涉及了世界化价值规律的机能障碍问题，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了生产过剩现象，而这种机能障碍就是通过生产过剩体现出来的。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过剩倾向的最佳体现。在所处的这个体系中，只有建立起一套与资本的自发倾向相反的、能够保证再分配合理性的社会政治机制，才能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而这种调节机制的建立就涉及了国家干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结构危机如此难以克服。因为没有国际调解机制的存在，经济危机只能通过长期的结构再调整的摸索才能被克服。这种结构调整最终也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冲突、地方冲突以及国际冲突而进行的。

当代的经济危机可以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甚至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有利于边缘地区人民的收入再分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不结盟国家在1975年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这项提议是从抽象的角度提出的，但却是十分合理的。然而，由于世界政治体系不能像国家体系中的各个国家一样行使权力，这项合理的解决方案遭到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拒绝，因而一直没有得到实施。我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议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并把它们归纳为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幻想（《“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未来》，1978；《贸易和工业在发展中

的作用——勃兰特报告》，1989）。

在这种局势中，经济危机是对其弱小的合作伙伴的负债进行提前清算的一个机会，这里的合作伙伴就是指边缘地区和国家。这种关系在客观上加剧了经济危机，并带来了潜在的帝国主义社会集团与反对买办势力的民族民主社会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一方面，帝国主义集团包含中心地区的所有社会集团，只要该集团不脱离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地方买办势力集团属于边缘地区的下级集团）。更有利于解决经济危机的观点，还会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放弃与本国资本家达成的团结，而与边缘地区的反买办集团结成“国际主义的”联盟。

当然，这种可能性离我们还很遥远。与此相反的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左派在中心地区的地位逐渐被削弱，资本家于是选择了一条强硬路线——新自由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最终将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恶化。而且，因为没有有一个世界范围内共同的调节机制，随着中心地区（美国、欧洲、日本）世界一体化的深入，经济危机只会由于他们之间的竞争而不断加剧。

从1978年起，我就是在这种方法论中研究经济危机的发展及其矛盾的变迁，评价已经实施或正在起草的各种政策，以及提出我自己的建议（《阶级和国家》，1979；《脱离》，1985，p.127）。

②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第三世界还没有进入工业化阶段，因而它的社会构成是以农业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为标志的，而该阶级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传送带。然而，我在那时就意识到，这种秩序需要被推翻，但不是像资产阶级思想常说的那样，由经济演变的力量自然力量推翻，而是通过一种积极变化动力的介入而实现的，这个动力就是民族解放运动。

我认为帝国主义阶段是由三个前后相继的时期组成的：

——胜利扩张时期，直至1914年，以它与农业资产阶级和

第一批重商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结成的联盟为标志；

——由于各种革命的爆发，这种扩张很快就遭到了质疑。俄国革命（1917年）、中国革命（1927~1949年），以及一系列的反帝国主义革命，如：墨西哥反帝革命（从1910年开始），中国反帝革命（1911年），土耳其和埃及反帝革命（1919年），这些革命普遍具有二战后的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征。

——从50年代起，第三世界国家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开始了工业化发展，而这种发展引起了世界体系的再次调整。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1975；《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p.111；《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6，p.68~69），我对第三国际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它过早地把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时期定性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时期”，忽视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发展，而正是这种发展最终构成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我同时也对新兴的苏维埃论调进行了批判，这种论点后来把这种发展归结为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

我指出应对美国夺取的霸权予以重视，这种霸权的目标是要重建市场，并导致了美国与旧殖民主义国家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由此我得出结论，边缘地区的资产阶级做为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的煽动者，伴随着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上讲也进入了资本主义阵营，即使它的一些派别具有反帝的性质（《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p.125）。

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平等状态，造成了第三世界中“亚帝国主义”（我一直反对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应把这些新兴的边缘地区称为帝国主义的接班人）和“被抛弃地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第四世界”）的突然出现，提前预示了后来出现的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

我认为，由于内部的矛盾和局限，以及外部的压力，这种类型的工业化，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私人也好，传统也好，国家

干涉主义也好，都会很快地丧失发展活力，而1968年就标志着“这段短暂的幻影时期的结束”（《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1974，p.19）。从那时开始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两极分化加剧，而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又再次造成、并伴随着这种两极分化；二是，新的民众斗争的趋势再次抬头，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主义的压力下再次复兴。（这两种可能性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为1984 A和1984 B，这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用到。）

1976年（《帝国主义》——《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的附录，p.121和p.133），我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议总结为万隆时代的一个绝唱，这个时代于1955年被命名，提出了在相互依赖中发展世界一体化和工业化的民族资产阶级路线。重建世界体系的尝试给了这种发展最后的一线生机。我后来把对这个时代和路线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1985年是万隆会议30周年，1986年我出版了《脱离》，p.34）。在此期间，我参加了许多论战，都是关于这条路线的未来，和关于非洲激进政府（自称社会主义政府）的脱离尝试（我当时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以及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类似的探索。我当时觉得出现这么多的尝试都是正常现象，为适应新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而进行的调整，在1948~1968年的扩张时期频繁出现，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便停滞下来，因为这条路线客观上的困难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在非洲，那里连必要的农业革命都很难实现）。我在《调整或脱节》（1990）的前言中又提到了这些论战。

③一般意义上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始于60年代末。我得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斯维兹、马格道夫、阿里日、弗兰克、沃勒斯坦一样属于少数派，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始于70年代初，更确切地说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前（这是一场结构性的巨大危机）。然而直到20年后的今天，传统的经济学家和政府依然使用那些只能描述短期现象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危机（如衰退、复兴

等)。我们在合集《喧嚣》（1990）的前言中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的著作《什么是经济危机》（1982）中也对此有所论述。

1972~1990年标志着经济危机时期的结束，我在这段时间里试图从各个方面去分析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边缘地区社会的内部危机，南北关系的危机，西方世界内部关系的危机（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以及美国的衰落），东西方关系的危机。

在《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一书中，我开始着手重新审视南北关系，正是这一关系给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一线生机，尤其是从1974年开始的那些国家干涉主义的国家。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中，我指出，南北关系中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北方阵营，根据这一体系的逻辑，这将导致从属工业的再次发展（即1984 A），或是第三世界的边缘化（即1984 A），或者是导致这两种现象的混合产物，即第三世界内部的分化。

A. 弗兰克和我参考了G. 奥威尔的《1984》，并把这部作品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带了出来。资本长期以来愈演愈烈的集中趋势似乎要自然而然地把它引向国家干涉资本主义。日本强大的竞争力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脱离》，1986，p.33）。考虑到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实用化理性和统一化，以及通过对《同化的人类》的阅读，我对西方世界民主的退化产生了担心。在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苏维埃的国家干涉主义，也许代表了一种普遍而强有力的未来趋势，即使它所追求的是一种十分原始的社会形态。国家干涉主义是对于资本分离的一种否定，也就此对价值规律提出了质疑，提出应该在这个框架重新思考这一价值规律。这里，我参考了罗伯特·弗萨尔特提出的“发展中的价值”概念，以及自动化的产生导致“价值规律的消失”这一观点——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价值规律的转变。显然，后来发生的演变，也就是

说苏维埃政权的崩溃和自由主义“反国家”思想的胜利，却都是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将会从社会主义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

然而，我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路线遇到了许多的障碍：

——南部国家与美国建立同盟，1973年的石油危机体现了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竞争予以回击。

——很难再找到别的途径解决经济危机，东方国家的一体化在那时让人觉得似乎有可能成为一种解决办法。苏联尽管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独特的思想意识形态，但仍然显示出了许多“亚帝国主义”的特征。

——脆弱的南欧地区已经成了世界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欧洲左派的犹豫不决在此时愈发严重，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看到了一线复兴的希望（然而我也十分担心德国地区会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独裁路线）。左派对付经济危机的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思想意识上的障碍：思想上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适应；帝国主义行为；国家集体主义经济（《帝国主义》，1976，p.137~138）。

在《阶级和国家》中，我把帝国主义（再次扩张和买办化）和在南部国家遭遇挫折的资产阶级对立了起来，我原以为会看到更为突出的反抗能力，通过南南合作重建南部阵线的愿望，以及来自苏联的更为有效的支持，因为这些地区的统治阶级似乎仍然希望重组该体系，并成为中心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边缘地区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些尝试的结果不怎么尽如人意，无论是在能量规划、技术规划方面，还是在农业规划、合作规划方面等等（《非洲矿业面临的挑战》，1987；《地中海地区在能量方面遇到的挑战》，1992；《技术革命中的地中海地区》，1992；《非洲农业危机》，1990；《南北关系中的地中海农业》，1992；《非洲与阿拉伯的合作》，1988）。

通过参与《什么是经济危机》一书的创作，我系统化地整理出了一个经济危机逐渐演进发展的历史（1968年的思想危机是

一个起点，接着就是1971年美元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1975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南部欧洲不同路线之间冲突不断（以及这些国家中右倾倾向的平稳状态使左派有机会复苏，其实我一直把这些国家看做是一些薄弱的环节），美国呈现衰退迹象——考虑到欧洲建设的脆弱性，这种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衰退（欧洲一直被可能出现的德国的威胁所困扰，德国则想独自行动），这一些现象都在排斥对于国际竞争的技术性的分析（“社会的进步和飞跃，不是依靠技术，而是依靠社会把技术投入应用的能力”），而是不断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军事领域是美国反应最有效的领域”）。

我当时大概高估了在南部迅速出现民众主义路线的可能性（我把它称为民族民众沦陷，被在尼加拉瓜和南非的斗争带动）。这条民族资产阶级路线是非常落伍的，而且没有能力实现革新和复兴，这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能够应付所面临的挑战。

我对苏维埃战略进行了开诚布公的研究：苏维埃资产阶级拒绝被边缘化，恐怕很可能在他们的军事冒险中出岔子。但是在我看来，在东方和西方仍然存在一种“左”倾联合的可能。但人们必须试着解决一个两难的选择：是要智利，还是阿富汗？

无论如何，世界局势看起来仍是变化无常的，各种试图稳定局势的地区性重组规划都十分无力（有些规划高估了日本和东亚的崛起，只要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没有固定下来，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集团的不稳定性上，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金融崩溃的危险时刻都存在，它造成的影响将是无法预计的，但一定会使国家干涉主义政策焕然一新。

在“部分世界化”的撒哈拉南部非洲，经济危机愈发恶化。对此，我一直认为造成这种退化的一个深刻的原因：欧共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建立联盟，保持了其在殖民体系中

化发展（《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p.85；《第三世界农民遭受的剥削》，1981，p.141）。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特别研究南非问题，同时对上述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我一直尝试着把经济危机的应对策略问题，放在国际对比的框架内分析，这种巨大的对比占据了世界舞台的前沿。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作品有：1973年的《经济危机》、《第三世界》、《北南关系》、《东西关系》，1986年的《脱离》，1989年的《另一种“西部—东部—南部关系”是否有可能出现？》。我认为，资产阶级的进攻的主要目的是使南部国家买办化，缓和西方世界内部的竞争（通过“大西洋联盟”的建立），通过延长美国的霸权来操纵与东方之间的冲突。这种进攻的可能性是依赖于东方和南部地区的人民，那么它是不是有一点消极呢？

④1988~1992年这段时间是一个各种演变加速进行的时期，因此意味着在此之前的那个战后阶段已经结束。我认为1990年是一个新的划时代时刻，它的重大意义不亚于前面的那些巨变时刻。

我以前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现在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其中有一些，显然就是通过苏维埃主义时代的告终而得到解决的。它的终结带来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变化，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各个社会内部演变的前景。我在《脱离》中还在思考苏维埃的国家干涉主义是一个稳定的机制还是过渡性、暂时性的方案，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被历史超越了。

然而，在苏维埃时代末期，并没有形成导致1990年巨变的质的转变。在《混乱的帝国》中，我把这个转变分析为三个方面：

——福特主义社会和解的崩溃，这受到了美国、日本、欧洲之间资本相互渗透的影响；

——万隆会议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路线的失败；

——苏维埃主义的垮台。

苏联的解体结束了西方强权对于这个地区长达 70 年的敌对，因为它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给西方带来了很大威胁。这种敌对先表现为干涉战争，然后是希特勒发动的入侵，从 1945 年开始又变为冷战。我把这段战后时期（1945～1990 年）称为波斯坦会议时期，而不是雅尔塔会议时期。但是苏联的解体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做为一个边缘地区，资本主义为东欧和前苏联人民准备的命运并不十分令人向往。

边缘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路线失败后，出现了一种思想意识上的反攻，即宣传在资本主义扩张中没有其他的替代选择。这就回到了我在《脱离》（1986）中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无论如何，万隆会议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路线的失败，以及它所体现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路线的失败，留下了一个空白，等待着另一条民族的、民众的、民主的新路线来填补，它将涉及一些新的挑战（如环境问题等），这也是我将在下一章中阐述的问题（《不可逆转的分裂》，1992）。两极分化继续加深，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并没有起到缓解两极分化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它的恶化。这种输出型的工业化模式使边缘地区社会处于从属地位，中心地区国家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垄断强行操纵着第三世界：技术垄断、金融系统垄断、全球自然资源垄断、通讯垄断和武器垄断。

福特主义和西方福利国家也在一片喧嚣中瓦解并宣告结束，欧洲路线遭到质疑，然而美国、欧洲、日本周围的权力下放和地方化路线还十分脆弱（《混乱的帝国》，1991）。

在这样的条件下，世界局势短期内有利于美国以军事垄断为中心的霸权路线的再次扩张，它再次使争取东西欧靠拢的选择遭到失败——我把这个选择称之为“欧亚计划”，它从 1945 年起曾经一度是华盛顿的一个噩梦（《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冒险》，1992）。这种局势同样还使惟一有可能实现的一个进步选择遭到

了失败，即建立多极化世界——它是打开众多自主发展的空间，给民众斗争提供实现领域的惟一的途径，尽管这些斗争在开始阶段并不怎么轰轰烈烈。我将在下一章中重新讨论在《喧嚣》(1989)中所提起的问题。

本章参考文献（按照出版时间先后排序）

1. 《非洲的阶级斗争》，1962
2. 《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1964
3. 《发展中的三次探索：马里，几内亚，加纳》，1969
4. 《塞内加尔事务》，1969
5. 《象牙海岸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
6. 《黑非洲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
7. 《1880~1968年间的法属刚果》，1970
8. 《现代马格里布》，1970
9. 《封闭的西非》，1971
10. 《黑非洲地区的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1972
11.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资本积累的
理论模型》，1972
12. 《不平等发展》，1972，p.19~20；49~65；257~324
13. 《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p.85；121
14. 《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1974
15. 《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6，p.68~69
16. 《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p.111
17. 《阿拉伯国家》，1977
18. 《世界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未来》，1978
19. 《第三世界农民遭受的剥削》，1981
20. 《世界体系控制权的斗争》，1982
21. 《危机，什么危机？》，1982，p.164~228

22. 《危机——第三世界、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1983
23. 《万隆会议 30 年》，1985
24. 《脱离》，1986，p.34~35；46~49；67；90~93
25. 《非洲矿业面临的挑战》，1987
26. 《非洲与阿拉伯的合作》，1988
27. 《对欧洲发展与第三世界的研究》，1988
28. 《泽帕主义》，罗尔·裴毕什，1988
29. 《贸易和工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勃兰特报告》，1989
30. 《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是否会呈现出新的局面？》，1989
31. 《非洲农业危机》，1990
32. 《调整或脱节》，1990
33. 《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上升》，1990
34. 《混乱的帝国》，1991
35. 《旧的地方体系和世界体系》，1991
36. 《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冒险》，1992
37. 《调整》，1992
38. 《1492》，1992
39. 《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1990
40. 《地中海地区在能量方面遇到的挑战》，1992
41. 《技术革命中的地中海地区》，1992
42. 《北南关系中的地中海农业》，1992
43. 《阿拉伯世界中的国家、政治和经济》，1992

第五章 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 路线的盛衰

—

1957年我完成了学业，回到埃及，两年前的万隆会议召开，一年前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我们从1945~1955年间一直坚持的观念在此时开始遭到质疑。我们曾经认为，通过阶段性的、不间断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展开，中国、越南的武装斗争就在东南亚为我们树立起了这种榜样。我们还认为，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再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了，它具有买办性，只是美国战车的车轮下，帝国主义统治的一个延伸。

除中国、越南、朝鲜外，其他的亚洲民族独立政权都已经稳定了下来，而同时游击战斗也渐渐开始衰落。尼赫鲁的印度国民大会，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他们在内部事务上，在与帝国主义、与苏联、中国的关系上都采取了新的积极措施。这些政策让人觉得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似乎还没有完成。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民族性，在新的条件下，在权力所及范围内，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它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斗争（比如苏伊士运河的收归国有），拒绝屈服于美国军事强

权的胁迫（拒绝限定巴格达协议等），紧密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着手社会改革。人们无法忽略掉这些事实。

1955~1990年，这个随后的35年中，一直充斥着关于下面这个中心问题的论战：一条民族资本主义的出路能否在第三世界实现？它能实现什么？它的局限又是什么？它能自己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吗？这并不是书本理论的论战，而是历史舞台上演的一个个事实。从个人角度讲，我也曾投入这种讨论之中，并把它与我的职业经历和战斗生涯紧密地联系起来。我将再次论述做为一名社会主义战士的关注与我那时的政治野心之间的关系。

现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已经结束，它是在两个连续的阶段上展开的：先是万隆路线（1955~1975年）的扩张阶段，然后是衰落阶段，崩溃阶段，同时买办势力的崩溃阶段。1975年的巨变十分突出（1975年，不结盟国家和77国集团提出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提案），而且范围很广，然而第三世界各国的内部演变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距。有时，该路线的展开，或是激进化，是从1975年以后才开始的，而这时在其他地方，该路线可能已经开始衰落，甚至已经进入了更大的转变阶段。

此外，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路线在第三世界的盛衰反复，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演变，反映了在两极军事霸权和苏联干涉支配下的国际政治，而且也揭示了毛泽东主义与苏维埃主义、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对立。

我将尝试着从今天的角度去研究这些历史事件，分析这些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分歧。通过把理论研究和个人职业经历联系起来，我从中吸取了许多理论教训，这些经验应该值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二

我把中国的演变做为这次讨论的核心，因为这次演变除了对该国具有重大意义外，在其他方面也有重大作用。从1960年起，它提供了一种走出苏联常规的发展前景，毛泽东主义批评苏维埃主义实际上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苏。中国政权从以下这些方面得出许多重要结论：第三世界这个“风暴地带”的革命战略方面；对于国际局势的分析方面；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战略分析方面。

下面的分析将围绕着以下历史时刻展开：1957~1961年中苏冲突爆发，1966~1970年“文化大革命”展开，1969年乌苏里江军事冲突升级，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开始拉近与北京的关系，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去世意味着毛泽东主义尝试的结束，1985年邓小平上台后选择实行一条向资本主义开放的路线（1984年人民公社被取消）。我要说的是，从1957~1980年，我基本上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从1980年起，我开始用一种审视的眼光观察中国正在实行的开放政策。

上文中提到的朝鲜战争（1950~1953年）和第一次越南战争（1945~1954年）已经说明了西方帝国主义集团能力的有限。第二次越南战争（1965~1975年）和柬埔寨战争（1970~1975年）充分表明，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化完全有可能、有能力打败美国军队。这些胜利在第三世界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比最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体做得更好。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在1967年以色列问题上的失败就更加明显。在“黑色9月”前后，人们开始理解激进化开辟了巴勒斯坦运动的道路，同时也开始理解格瓦拉主义的口号（它在拉丁美洲诞生）。此外，葡萄牙殖民统治在非洲的瓦

解（1974年）也是长期武装斗争的结果。阿尔及利亚战争以一个激进的民族政权的建立而告终，然而，布梅迪恩政权与纳赛尔政权一样，无非就是一个轻言寡信的许诺者。

历史并没有停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柬埔寨1975年胜利的那一刻，在这些胜利过后，一个衰落时期开始到来，就连那些看起来最有希望的尝试也不例外。从1975年起，人们渐渐发现了毛泽东主义的局限性，我在《毛泽东主义的未来》中阐述了这些观点。在中国的这场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又将找到新的方式去开辟它们的道路。

在医治好美国的大规模轰炸带来的创伤后，朝鲜成功地度过了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阶段。至于越南，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后，就一直封闭在亲苏维埃性质的教条主义中，更加令人担心。柬埔寨的军队入侵并占领老挝（1979年），在与中国的边界战争中，越南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国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统一南部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这一些证明激进化运动将困于这种僵局之中。

无论如何，越南、柬埔寨等国社会主义力量的盛衰都是由其社会内部导致的，并不是外部因素干涉造成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十分先进的解放运动，削弱了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重建了内部阶级斗争的决定性地位。但是，外部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1975年，柬埔寨被完全孤立，由于战争造成的人口过剩，首都金边面临着饥荒的威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当政者决策的失误造成的，在某些人看来，他们的决策等于是默许了越南的进攻。越南的停滞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越南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政策导致的，当然，西方对它的孤立也是原因之一。河内政府领导人选择依附苏联，而不是中国，这种选择也加重了它的孤立处境。

在东亚社会主义力量衰落的同时，他们开始了惊人的资本主

义发展，这一点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恐怕也出乎全世界的意料）。韩国的建立始于“帕克政变”，推翻了美国傀儡政权辛格曼·雷的统治（1961年）。1979年，帕克遭到暗杀，这是否意味着“朝鲜奇迹”已告终结？此时，首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已经开始（1980年）。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探索体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然而，外部因素却一反常态地起到了积极的积极作用。像以色列一样，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接受了主要来自美国的援助，这些援助帮助他们度过了艰难的起步阶段。由于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两个地区的政体都着手进行了改革，尤其是农业改革，建立起了同农村资产阶级，甚至是大地主之间的不可思议的同盟（就像印度北部一样）。同样是由于这个“威胁”，使这两个地区得以把自己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在美国“兑现”，以此博得美国的援助：美国在这里接受了一个它在其他地方都反对的“民族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地区可以违反世界银行强加给其他地方的法则，采取国家发展战略和工业保护主义。

②埃及、中东、非洲地区，永远是我关注的焦点。万隆路线在这里也发展起来。对于埃及来说，万隆路线发展的黄金时期是1955~1967年。这期间，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956年），外国资本和埃及资本纷纷投入（1957年），第二次农业改革完成，社会主义道路在宪章中正式确立（1961年）。然而，其中也有不少缺陷和弱点：与叙利亚的联合失败（1958~1961年）；反共势力一直存在；1965年各个共产党自动解散后，出现了一种排斥革命者的潜在趋势；拒绝民主化的倾向开始在政权中渐渐抬头；可以忍受伊斯兰保守主义的言论，却禁止进步的、市俗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腐败造成的经济失败。美国和以色列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举事机会，于是，所有这一切发展尝试都以1967年的7月的大失败而告终。

从1960年开始，早在上述这一政体垮台之前，纳赛尔政权发展3年后，我就断定这一政体很难超越它的局限性（参见《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1963）。我坚决否定了莫斯科的机会主义论调——即所谓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1967年溃败后，我很高兴看到很大一部分坚信社会主义的埃及年轻人，向“新阶级”发起了进攻。但有许多事情令我十分担忧：埃及政体没有在年轻人提出的激进战略下团结起来，而是开始向有利于（埃及总统萨达特 [Anwar Al - Sadat] 执政时期的）对外资开放政策，纳赛尔死后（1970年），萨达特发动政变，摆脱了纳赛尔左翼势力。这种所谓的对外资开放政策的实质就是对外开放和买办化，这一实质在当时还很隐讳，1973年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这一实质完全表现了出来：与美国阵营建立同盟，访问耶路撒冷，签订戴维营协议（1977年）。我觉得这种政策并不是“反革命”的，而是纳赛尔体制本身的一种加速演变。20年后，我以同样的观点分析了前苏联地区资本主义的复兴。

不管我对纳赛尔政权持什么保留态度，它在阿拉伯人民眼中一直是解放者和进步者。

叙利亚社会党并不是纳赛尔主义的产物，它甚至比后者早出现几十年。经过相互接触，这两个兄弟力量逐渐敌对起来，毁坏了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团结。1958年的伊拉克问题为它们的复合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但是它们没有珍惜，使彼此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冷静客观的分析下，纳赛尔主义、叙利亚社会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勃姆迪恩主义的探索，在这些体制的束缚下，都很快失去了活力。从1965年开始，埃及爆发了经济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选择这一时刻进攻）。在叙利亚，经济危机早已潜伏存在了很长时间。叙利亚社会党的激进化运动从1963年开始，但是还没等在大马士革取得政权（1970

年)就已经衰落,此后社会党很实际地选择了可耻的对外资开放政策。在伊拉克,1963年巴斯·德·阿布戴尔·萨拉姆·阿雷夫(得到了纳赛尔的同情)在阿布戴尔·卡利姆·卡森死后建立了政权(后者接受了人民联盟的观点,这个联盟包括共产主义者和库尔德人)。在阿雷夫政权出尔反尔的统治时期后,政体在哈森·阿尔·巴克的统治下僵硬起来。接着又是萨达姆·于森的统治,它的狂妄自大把伊拉克卷入了长期的针对伊朗的海湾战争(1980~1989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承认萨达姆使伊拉克实现了当代阿拉伯世界无可匹敌的工业、技术、军事现代化,可是,也正是因为它的罪行,决定了1990年伊拉克遭受的毁灭性打击。

所有上述这些政权都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对于未来的资产阶级幻想;本质上的反民主性(隐藏在反民主身后的,是本质上的反共性质);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于苏联支持的高估(主要是指军事支持);一种廉价的玩世不恭,即相信在必要的时候,它们可以打“美国牌”。

于是,我把希望寄托在了阿拉伯世界贫困人民和巴勒斯坦斗争身上。

1964年喀土穆人民推翻了阿布将军从1958年起的新殖民主义独裁统治,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民主同盟,在阿拉伯世界独树一帜,承认了共产主义运动、工会和民众组织。不幸的是,对新政府寄予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面对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带来的巨大困难,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怎样才能保持并加强群众的能力呢?在这种条件下,正常的大选会导致议会中农民力量占大多数,事实上农村道路一直依附于“封建马赫迪主义”的领导。腐败和政府的无能为再次回到独裁统治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在苏丹反复出现,奈枚利于1970年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1970年,他声称共产党人企图制造政变,从而摆脱了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被处决),并从此开始遵从伊斯兰教义,依靠沙特阿拉伯

和美国进行统治。奈枚利政权于1985年被群众民主运动推翻，然而民主运动又为它自己所鼓励进行的大选结果所累，处于停顿状态，这样历史又一次进入了独裁统治，这次是由军队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共同进行的独裁。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这个国家内部一直内战不断，它拒绝授予南部非穆斯林地区自治的权力，结果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裂。

1962~1965年，伊曼和北部也门地区旧政权倒台后，埃及对其进行了军事干涉，这种干涉是否把国家从沙特阿拉伯的复辟企图中拯救了出来？它是不是把国家引上了群众运动激进化的歧途，最后走向在利雅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授意下的妥协？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因为从1967~1968年来，在南部也门的运动激进化，并试图要建立一个阿拉伯世界中最名副其实的人民政权。由于其社会内部及其先驱者（包括毛泽东主义者）的弱点，苏维埃的影响不幸使该政体失去了控制，使它在毫无意义的内部斗争中耗尽了能量，直到1986年，通过亚丁地区令人怀疑的斗争才结束。1989年起，做为两个地区的共同选择，也门的统一也许是那种条件下的一个光荣的结局，从而保证了国家今后发展的可能。

1964年巴勒斯坦人民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从此脱离于该地区的阿拉伯政权——这就是在雅瑟·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诞生。与当时的许多群众运动一样，巴勒斯坦的人民运动也开始激进化，因此，我们期待着看到它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一些巴勒斯坦力量失去了控制（并不是整个巴解组织失去了控制，事态并不像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所宣扬的那样），偏离了原有的轨道，又上了恐怖主义道路（劫持飞机等），他们在约旦、黎巴嫩等国的行动方便了当地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反击。1970年，巴勒斯坦公民在约旦遭到大屠杀，随后撤退到黎巴嫩境内。后来，巴勒斯坦人民直接把斗争引向了恐

怖主义路线，通过起义和暴动（从1988年起），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前景。

在巴勒斯坦对其进行的恐怖主义进行反省后不久，黎巴嫩又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内战时期，从1975年开始一直到第二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后代顿协议的实施。这些战争，首先是在西方支持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入侵引起的，他们希望这些地区爆发战争，从而建立起一个马龙派统治的、“亲资本主义”的小黎巴嫩，继而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这样就可以控制水源，这对以色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哪怕要驱逐该地区的居民，他们也不惜代价）。1982年以色列的进攻差一点就实现了上述计划，然而，由于黎巴嫩人民的斗争以及叙利亚微妙的行动，这次进攻还是以失败告终，但最终的原因还是西方主流媒体对它抱有的敌视态度。在此之后，黎巴嫩人民有必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黎巴嫩社会脆弱性的内因，60年代舍哈比的资本主义路线并没有使社会现代化。

我们并没有预料到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的奇迹，但我们一直认为，长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为该地区群众运动的激进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甚至或许影响到了南非。布姆迪恩政权的尝试充分说明了这种运动的局限性。它与纳赛尔政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由于石油为其带来的财政上的富裕，拖延了它走向失败的脚步，但这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欧洲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热情冲动，我总是十分困惑，并对苏联提出的专家治国理论产生了极大怀疑。与当时的潮流相反，我强调指出了阿尔及利亚的演变与突尼斯、摩洛哥演变的相似性——前者是从左倾转向右倾，后者则正好相反（参见《现代马格里布》，1966）。随后的事件证明了我的观点。突尼斯本·萨拉阿政权于1969年被消灭，之后不久，阿尔及利亚的沙德利政权转向右倾，这一些在我看来，都不能算是“反革命的”，就像我当初

没把萨达特政权的建立归为反革命一样，这里只涉及一个社会演变过程中的再次买办化。因此，在摩洛哥国王决定吞并中部撒哈拉后，刚刚把毛里塔尼亚收入自己怀抱的阿尔及利亚，试图反对这一举动，而这一系列事件发展下去，恐怕就要威胁到马格里布和阿拉伯地区的团结。

利比亚君主政体于1969年被卡扎非推翻，人们并不期望这个国家的革命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只是对它抱以同情罢了。我对于新政权犯的错误并不感到十分吃惊，1970年奈枚利赶走了苏丹共产党，政策出尔反尔，一会儿和这个结盟，一会儿和那个联合，一会儿又进行一些软弱无力的干涉（如1980年对卡夫萨的干涉），还有它对乍得地区进行的注定没有希望的冒险。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减轻法国殖民者的责任，他早在利比亚之前，于1968年就对乍得进行了干涉；当然，还有美国对的黎波里地区进行的轰炸（1986年）。同时，我还要强调，我们要以最大的同情来评价利比亚政权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它在民主化和人民参政议政方面的努力。

③从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开始，我就与非洲运动中的同志们建立了联系，密切关注着马达加斯加的暴动、肯尼亚毛毛人的斗争以及喀麦隆的革命运动。我一直坚信，非洲是一个整体，埃及是它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的进攻要求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我从不接受那些种族主义偏见，撒哈拉南部非洲的人们很容易就被这种偏见所影响，并很难从中走出。我也一向反对非洲应该接受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说法，也反对把欧共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盟看成是“这个大陆最好的选择”。

因此，在我选择“着陆点”的时候，丝毫没有犹豫，在1960年时离开了埃及。同年9月，巴马科政权在非洲民主同盟于苏丹举行的大会上宣布支持社会主义激进化，于是，我决定接

受人们在这个国家给我提供的职务。

1958~1960年间在开罗，我一直追随着非洲独立准备工作。1958年戴高乐上台时，我没有在法国。我曾一度担心法国会不会变成极端右倾化，实施比覆灭的第四共和国更强硬的殖民政策，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错误的。我并没有把第四共和国最后的一些有助于殖民地“自治”的举措当真，1956年的德费尔框架法则实际上是想把非洲巴尔干化，并宣布了新殖民主义政体的终结。1958年，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组织大会上，由于埃及政权反共势力的影响，气氛十分的紧张。我的“泛非主义”情感与一些来自阿克拉的同志一拍即合，阿克拉当时正在进行解放斗争。

我在巴马科度过的那几年（1960~1963年），正是非洲激进化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958年几内亚对殖民主义说“不”，同年加纳赢得了独立，马里在1960年9月做出的选择，这都是一些主要的运动，但并不是惟一的。在刚果，卢曼巴政权占了上风，从1960~1963年（这是雷奥波维勒中心政权夺取卡萨伊和卡汤加的时刻，这标志着该国内战的结束），人们期待着在刚果看到同雷奥波维勒类似的激进化运动。1963年，巴扎维勒的人民政变结束了弗贝尔·于卢的新殖民主义统治。

当然，面对这些有利的演变，也会出现一些新殖民主义的政权。1961年，在相互冲突的野心中，两个不同的集团开始形成。一个是卡萨布兰卡集团，在埃及纳赛尔政权和加纳库马哈政权背后，团结了泛非洲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另一个是门罗维亚集团，集结了所有新殖民主义政权。人们一直认为后者的力量很脆弱，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但不幸的是，那些地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它让出统治地位。另外，帝国主义的反攻也取得了成果。在刚果，从1963年起在卡萨维布背后就在酝酿着“莫布图灾难”，卡萨维布从1965年开始登上统治地位，使他的祖国在黑

暗中挣扎了很长时间，受到西方、美国和欧洲的支持（我在这里要提一下1978年法国对科尔维斯的干涉，以及对4年后成为沙巴的卡汤加地区的干涉）。面对这样的局势和外部干涉，这两个集团决定联合，并于1963年创建了非洲统一体，我认为这种和解还是可以接受，尽管我当时也有一些保留意见。为了延续激进化而进行的斗争，是不是已经失败了呢？我并不这么认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观点。

然而我丝毫不赞同某些人幼稚的乐观态度，他们认为非洲的“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新的、甚至是光辉灿烂的道路。对我而言，这只是纳赛尔主义的同类。但是只要还没投降，战斗就还没失败。不过，实际上，人们应该放弃。因为非洲斗争的失败永远源自于同样的原因：先驱力量不够成熟，苏联“友谊”维持的幻想，帝国主义的干涉，新资产阶级的贪婪胃口（尽管它还处于萌芽阶段和国家干涉主义阶段）。1966年库马哈政权被推翻，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它对于加纳脱离所在的支系起到了多大的作用。1968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墨迪波·凯塔身上。虽然几内亚政权一直维持了它可悲的统治，直到赛库·杜雷去世（1984年），但是它长时间陷于绝境，完全丧失了其进步意义。我早在1964年就对这一失败进行了分析（《发展中的三次探索：马里，几内亚，加纳》）。

非洲第一次革命浪潮过后，出现了一次新的激进力量的爆发。1964年桑给巴尔爆发革命，摆脱了苏丹统治，1967年尼日尔通过了阿鲁沙宪章，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966年上沃尔特地区腐败的新殖民统治经历了第一次动荡——拉米扎纳的政变。但是，直到1983年，才出现了托马斯·桑卡拉领导的又一次尝试，这是第一次从以前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注重在行动中采取更群众化、更民主的方式。1968年斯雅德·巴尔结束了新殖民主义在索马里的昏庸统治。1974年军人们推翻了哈雷·瑟拉谢帝国，

这是非洲革命力量最弱的一个地区。后来，他们分裂成了互相敌对的派别（就像我在埃及所经历的那样），由于军事独裁统治而停滞不前，并陷入了厄立特里亚省的战争，这场战争糊里糊涂地一会儿得到帝国主义及其委托人（沙特阿拉伯、苏丹、以色列）的支持，一会儿又得到民族政权的支持（叙利亚、伊拉克），一会儿又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尤其是1978年奥卡登战争期间，当斯雅德·巴尔转变了政党时）。埃塞俄比亚的革命者具有杰出的勇气，但是仍无法避免祖国的崩溃瓦解。德斯哈纳纳在马达加斯加的失败（1972年），昙花一现的哈斯曼达瓦政府的革命尝试（1973年），哈斯拉克取得政权后对政体的巩固，这些都为非洲的这第二次运动高潮带来了声誉。

其他一些或许不很轰轰烈烈的演变，依然说明了新殖民主义不可能克服它所面临的持久性危机。在刚果和后来变成贝宁的达何美（由于凯雷库于1972年的当政）爆发的接连不断的起义，70年代，赞比亚的孔塔政权向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干涉主义的转变，这一切都见证了新殖民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从80年代末开始散布开来，这时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它有时是真正的群众性质的要求（在马里，这种呼声结束了穆萨·托雷的军事独裁统治；在象牙海岸和肯尼亚的革命奇迹转变为一场灾难时，这种呼声也开始出现），但有时，它却具有不太好的性质，有可能是被帝国主义老板所操纵、控制的（我认为那时的许多党派民主的民族大会就是这种性质的）。

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法可以把在新殖民主义的危机中的群众运动简单地分为几类。

因为，仍然有一些新殖民政权在表面上坚持了下来，有的甚至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尽管其经济、社会危机逐年加深。塞内加尔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相对民主和政权阶层统治手腕的巧妙，使它度过了一次又一次接连不断的危机，然而

没有一次可以把它打垮。尼日利亚是另一个例子，但是它的方式比较独特。虽然民族多样，霸权主义集团的利益一致，比阿法战争代表了存在的威胁，无论如何，尼日利亚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一直没有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买办统治，政权无休止地在军人和“小民主主义”之间交替。石油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对这部古老的“机器”起了润滑油的作用，而这种资源大概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加蓬的稳定，以及刚果冲突的戏剧化特征。刚果的冲突于1992年告终，里苏巴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乍得共产党取得了复兴的希望。

但是应该怎样评价加纳库马哈政权的倒退呢？它是罗林茨一次次政变建立的（从1979年起），后来受到著名的“结构性调整”政策的侵蚀，巩固了当地的资产阶级买办势力，然而却使群众组织逐渐边缘化。还有继伊蒂·阿曼（1979年被驱逐）和奥伯特的统治后，乌干达出身于群众运动的政权也是由于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结构性调整”，而陷于瘫痪状态的。我又该怎样对它做出评价呢？

新殖民主义的危机也可能转化为整个社会的分裂。利比亚、乍得、索马里就是例子。

葡萄牙殖民地长期的战争自然而然地带来解放运动的激进化、群众化，起码是在思想方面的，尽管我在阿米卡尔·卡布拉提出的理论上持保留意见。它的理论宣称群众运动的激进化会导致小资产阶级“做为一个阶级的自我毁灭”。1974年葡萄牙殖民体系突然崩溃，从而出乎意料地加快了独立的实现，这就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上述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在安哥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并不是惟一的解放力量。即使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也不能自称为惟一的解放力量。在西方势力和南非的支持下，“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进行了长达17年的战争，最后以

1989年南非军队在卡纳瓦尔的大溃败告终，这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古巴共同战斗的成果。“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被迫签订了停战协议，为南非和古巴军队撤出后的选举做了准备。然而，战争也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 响，它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失去了成为真正的人民激进力量的机会，如果它要是能与它的苏维埃保护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它能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它就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凭借着石油经济的帮助，它同其他大陆的新殖 民主义统治没什么区别。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美国接受这项方案，放弃推举蒙博托上台，则有可能出现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共同统治的局面。

在莫桑比克，雷纳墨政权对弗雷里莫政权发起的战争，同样是由南非和它的主子美国所支持的，这场战争在长远上看，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1984年在科马蒂协议中做出了让步，弗雷里莫政权不再是社会的惟一力量，然而，雷纳墨政权就更不能称之为社会的惟一力量了，即使已经分享了统治地位，但它一直没有超越其犯罪集团的性质。现实中存在着像索马里一样的国家分裂的可能。在这里，我不认为西方政客会忽视这种可能性。但是，就像他们在阿富汗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一样，他们为了消灭潜在的人民运动力量，不惜给该地区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在选举中的失败说明了，它不仅低估了自己在民主管理方面的不成熟，而且忽略了国家的特性——它距离安的列斯群岛比距离非洲大陆要近。

非洲殖民势力的强硬核心位于南非。罗德斯省白人企图通过宣布独立，继续驾驭殖民主义这辆马车，这也得到了其祖国英国的支持——英国又把自己投入了一场伪善的闹剧之中。然而，解放运动在1980年实现了津巴布韦的独立。但这是以何种代价实现的呢？兰开斯特协议的签订，使所有社会、农业改革的努力都陷于停滞状态。祖国阵线组织走上了一条必然使他们变得极端的

道路：人们虔诚地坚守“左”倾路线，然而，结构性调整无时无刻不在加重着社会危机。

同样的解决方法在南非是否行得通呢？通过我对这个国家特征的分析，我发现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经常被人忽略。一是，白人政权试图把南非建立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他们的现代化梦想，妄图通过迫使黑人劳动力进行半奴隶制的劳动来实现，在一个世纪前，英国对当地殖民之初，这个计划就已经开始着手，并逐渐在40年来种族隔离的体制下形成发展起来。南非的工业并不具有竞争力（就像拉丁美洲和亚洲一样），而且，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南非的工业并不比非洲其他工业化国家或中东地区（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发展的好，这是对于比勒陀利亚无条件支持的西方势力一直不愿承认的——可能是出于种族偏见。这种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黑人工人阶级的斗争抵抗造成的，斗争从沙佩维尔发展到索韦托，接着又发生了大规模人民起义和暴动，迫使德·克拉克从1990年起接受了谈判。但是，南非工业发展的失败也是由占少数的白人世界惊人的浪费造成的，他们像在西方一样进行消费，却忘了南非的生产力要低得多。第二个特征就是，南非这片土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缩影：占人口少数的消费者处于第一世界的地位，一支重要的常备部队集中在矿山、工业区和殖民农业区，并住满了“镇区”，一支同样重要的预备役部队被派遣到保留地农业区，班图斯坦地区，以及城市周围的一些非正式地带。

在这种条件下，谈判又能带来什么呢？是不是又要诞生一个新的兰开斯特协议——即采取了一种类似联邦制的形式，以保证少数人的利益为目的，而这些少数人就是应对发展计划失败负责的人？内部和外部（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开始在这方面起作用，并声称，在这样一个“优良的工业基础”上，“继承”这种发展的占多数的黑人应该使这一优点继续发扬光大。于是，他们要求

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帮助自己的国家迅速增强“竞争力”。换句话说，就是让黑人劳动者掏出更多的钱，来实现资产阶级在世界财政、经济、政治支持下都没能做到的事（尽管这种支持的手段十分卑劣）！不幸的是，南非解放阵营的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将把他们置于死地的陷阱。在这个方向上发展，会导致工业镇区与班图斯特及非正式地带之间的差异继续发展，甚至更加恶化。很显然，德·克拉克和他的主子们已经开始启动他们的阴谋，并以此削弱了非洲民族会议及其同盟的地位。

④万隆路线同样也在亚洲展开。它具有更加引人瞩目的形式，并取得了值得骄傲、更为牢固的成就。

第三世界的主流观点给了印度国民大会过分的赞扬，强调了各个方面的成就：议会民主、有竞争力的工业化发展、农业革命、掌握技术的努力、甚至是军事成就（1974年印度第一枚核弹诞生）。印度左派适时地抑制了这种过早、过快的评价。印度工业资产阶级与北部大地主阶层和国家技术统治阶层建立了同盟，但是即使在尼赫鲁时期（1964年去世），他们也没有构想出一条自己的发展路线，与跨国资本相抗争。资产阶级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技术和财政统治都是表象上的，而不是真正的统治。它的议会民主，是协调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惟一合理的方式，但是它使群众阶层在政治上逐渐边缘化，而群众正是他们政权的基础。尽管印度中间派在50年代向中国靠近（与此相反的是，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这是由印度的领导者挑起的），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霸权主义势力的渗透（参见《美国的霸权战略》）。因此，这条路线的衰落，在今天看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尽管它从一开始就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出现。它的衰败造成了1975年的危机状态，使德赛的右派政府从1977~1980年，对西方利益采取了一种更“开放的”态度，从而造成了种族矛盾的激化（1984年锡克教徒事件，最后以甘地

的遇刺而告终)。新政府则体现出种种迹象，逐渐走向政体的买办化。

巴基斯坦从未真正走出过买办主义的统治，像沙特阿拉伯一样，它在这里体现为独裁统治（巴基斯坦军人统治）与伊斯兰教义的自然结合。1977年的吉阿·于·哈克政变，使布托试图摆脱这个传统的短暂尝试以失败告终，10年之后布托的女儿领导的斗争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巴基斯坦为了做出与印度争夺克什米尔（1965年、1971年两次克什米尔战争，最后以孟加拉国的独立告终）的样子，动员了各种力量，并通过为美国服务而取得了许多实惠（20世纪80年代中，对阿富汗的干涉）。

斯里兰卡则试图把它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路线同一种更好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这种探索受到了西方国家左派的热切欢迎。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目标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这次幼稚的尝试像预料中一样遭到失败，并失去控制，引起了这片土地上从1983年起的残酷内战。

在东南亚，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是万隆路线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它遭到了西方力量的敌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1965年发生了政变，无数的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从而消除了群众运动激进化的“危险”。因为这种激进化有可能超越苏加诺政权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国家处于从属地位，所以一直未能出现所谓的“奇迹”。这种奇迹更不可能在菲律宾出现。菲律宾当地的反革命力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承认了摩洛哥血腥统治的合法性，这种独裁统治直到1986年，才被起义农民发动的内战推翻。1986年，城市暴动把阿基诺推上了政权，但是该政权当时还没有能力团结起当地农村的叛乱力量，以结束表面上民主的新买办主义。

泰国取得的成就更为的卓越，它善于利用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战略地位，以此为自己赢得了许多实惠。它现在也是新第三世

界半工业化地区中的一员，尽管它的位置远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之后。马来西亚也努力向它的邻国学习，在“中国海外资本”和马来西亚国家的共同控制下进行发展。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战略，长期以来一直纠缠于中国和越南的问题上，直到1961年它才推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组织一直是地方统治阶层的工具，永远首先关注他们“内部的安全”，那这种组织在今天是否有可能转变性质，成为重组各个地方自治政权的中心力量呢？

在东亚，由于苏联带来的压力，使土耳其无条件地成为了美国盟国。然而，华盛顿从未放弃利用一切机会来消灭凯末尔政权——它是纳赛尔政权和万隆路线的鼻祖，比纳赛尔政权早30年出现。凯末尔曾先后两次登上政权，一次是1961年，当顾尔塞将军推翻了曼德尔的买办统治后，另一次是在1980年，这时凯末尔早已开始衰败，没有能力超越自己，也没给有潜力实现超越的人民民主运动足够的空间去发展。1983年的塞浦路斯事件使得该政权偏离轨道，走上了沙文主义道路。土耳其一直在申请加入欧共体，却一直遭到布鲁塞尔的拒绝。但无论如何，土耳其的工业发展成就是显著的，它的工业发展竞争力已经位于新第三世界的领先地位。苏联解体，中东力量重组，这一切是否能使土耳其断然改变对欧洲的态度，甚至重建“奥斯曼帝国”？

1953年，摩萨戴夫倒台后，伊朗建立了沙阿独裁统治，国家投入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干涉主义发展路线。虽然这一政权在社会问题上十分保守，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十分暧昧，但是它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保守的思想，财政上的反民主倾向，以及对于西方文化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造成的上述问题的恶化，这些都是该政权的致命弱点。1978~1979年的伊斯兰教徒革命，结束了万隆右倾路线的尝试，然而，这次革命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找到替代政策，也难以逾越其自身的宗教教义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拉夫桑贾尼团伙自然而然地开始向当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方向发展，把买办主义（这使伊朗的地位比沙阿时期还低）同宗教教义（这比它表面看起来的要更加极端）结合起来。

如果说伊朗还算不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威胁的话，阿富汗恐怕就极有可能对其造成威胁。1978年一次小型的革命就推翻了古老的多德政权，而代之以一个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民众主义领导班子，也许在这时，他们就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性。这些拥护现代化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抵制情绪，但我认为，这将会逐渐得到改正。1979年起，苏联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这给了美国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使苏联军队在该地区陷入战争泥沼的同时，又得以把阿富汗的现代化发展路线扼杀在摇篮里。伊斯兰教徒在1992年取得了“胜利”后，把国家拖入了长时间的战争深渊，而且比以往的战争都要残酷。西方列强对这些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再次体现了它们对该地区人民的厚颜无耻，以及它们所宣扬的民主口号的虚伪性。1986年，纳吉布拉的反抗尝试正处于其盟国“苏联”改变方向的时期，它的革命到来得过早，也就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

⑤拉丁美洲没有出席万隆会议，也从未打算加入不结盟国家组织。这有三个原因：首先，拉丁美洲从19世纪起就是由各个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其次，欧洲文化在拉美占统治地位，再次，其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深受美国的影响。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亚非在万隆旗帜下的发展同步，拉丁美洲也投入到了相应的演变之中。这里存在着一个深刻原因：它的边缘资本主义制度使它在面对世界体系的时候，处于与亚非相似的处境。

其中，有三次探索行动应该划入第三世界激进派尝试的范畴。

第一次是古巴的探索。它从美国走狗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并于1959年把巴蒂斯塔赶出了哈瓦那。美国很快就注意到卡斯特罗政权是他们的一个真正威胁，他们早期失败的、妄图再次征服古巴的尝试（1961年猪崽海湾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施加的威胁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且因为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对古巴进行了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从而也加强了古巴对苏联的依赖。1962年的古巴导弹事件，是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精心策划而来，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古巴从迫在眉睫的军事入侵中解脱了出来。但它也使卡斯特罗政府走上了模仿苏联模式的道路，这不利于挖掘其更为民主、更加自然的发展潜力。

第二次探索，是智利阿兰德政府的民主尝试（1970~1973年）——这是在传统的议会民主的意义上讲。由于这种局限性，智利民主政权还是在美国组织的进攻下崩溃。皮诺切特血腥独裁统治之前，买办势力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支持，超越了世界银行的控制，这种胜利算不算是为后来华沙和莫斯科的新资本家们树立了榜样呢？当然，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仅因为这种“调整”的牺牲太大，还因为从世界化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讲，智利永远都是出于从属地位的生产者，无法走出为统治阶级资本家及其同盟利益服务的、“输出”型生产的限制，也就无法给广大群众阶层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三次探索，是桑蒂诺政权进行的尝试，1979年桑把索墨扎赶出了尼加拉瓜。桑蒂诺政权的斗争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努力避免国家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概念的混淆，尝试实行更真实的民主政策，注意保持多样的对外关系。然而，这也没能使它躲过美国的敌视，它支持了反对马那瓜的游击战争，同时认为欧洲对尼的态度由反对转为赞同，是一种怯懦的表现。1989年大选过后，桑蒂诺势力从政府中退出。在这种局势下，它的退出为尼加拉瓜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出路，或许能够为今后的斗争保存群众力

量。

对于整个拉美大陆而言，六七十年代就是在“争取进步同盟”支持下的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这个同盟是由民主党人肯尼迪于1961年创建的。这些独裁政府用事实驳斥了60年代中混乱主义的论调，根据这种论调，现代化就必然应该造就社会的民主化，而独裁政府就是凭借着现代化发展而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个理论忘记了，在世界化资本主义中发展的现代化，会加深社会的两极分化，有利于中产阶级——即这些独裁政体的支持者，而有损于广大群众阶层。世界银行所吹嘘的众多“奇迹”，其中首推巴西（1964年推翻了古拉尔政府后，于1968年建立的独裁政权，一直执政到1985年大选），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模式的右倾“版本”，而万隆路线则是这种发展的“左”倾民众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存在着共同点。类似的发展愿望也在阿根廷出现，它是建立在民众主义（贝隆主义）的基础之上，由维德拉军事政权（1976年夺取政权）发展起来；该政权很快就走向了衰落，在1982年进入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失控之中（马鲁伊纳战争），并一直没能走出这种状态。与此相反，秘鲁政变（1968年）则更靠近万隆路线的民众主义模式。人们很清楚这个模式是怎样衰落的，因为它将导致社会的分裂，并引起“前途光明”的运动。

80年代是民族资产阶级路线、法西斯化路线和民众主义路线普遍遭遇危机的十年，它们都被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来（第一次大的财政危机出现在墨西哥）。这时，美国认为自己担负着“维护民主”的使命，希望通过把负担转嫁到人民阶层和中产阶级身上，来解决危机。这些民主国家的脆弱性（1983年阿尔芬森在阿根廷的一片热情中当选，而后又在1988年丢掉了政权，带来了墨泰姆的上台），清楚地表明了买办化政权在这方面的历史局限性。

在安的列斯群岛，不同历史发展出来的社会，在面临新的挑战时，都选择了亚非发展的路线。于是，牙买加就产生了万隆民众主义运动（那时的第一任总统是曼雷，1972~1980年间）；格林纳达也进行了同样的尝试，但却被美国海军的干涉扼杀在摇篮里（1983年）；群众运动的胜利使阿利斯蒂德于1990年在海地当选，但是，由于后来的军事政变，这最终也是一个短暂的胜利。这些干涉再次说明了西方国家只在他们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会实行民主。

三

我在这部自传的开始就提出，要通过对万隆路线的盛衰变迁来阅读这一时期的历史。

我在书中其他地方，更细致地分析了我所关注的一些探索和经历，以及一些关于万隆路线的普遍性问题，在这里我把它称为“对于发展的概念和实施的批评”。

这个时期的确是发展主义思想展开的时期，它也成了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支柱。标志着这个阶段开始和结束的两个日期是：万隆会议（1955年），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出（1975年）。万隆路线的那些政权，无论使民众主义的（“左”倾），还是保守主义的（“右”倾），都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路线要想得到一丝发展的机会，就需要北方国家在能够接受的条件下，适应世界资本扩张的要求，进行调整。它们所提出的改革国际秩序的要求，也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否定，使人们看到，在世界体系边缘的民族资产阶级建设，实际上只是一个幻想。随之而来的，就是边缘地区为了适应世界资本的要求，而进行的单边调整，换句话说，就是边缘地区的再次买办化。

上述两个日期之间的时间，就是万隆路线铺开发展的时期。该路线在民族探索中发展，被民族探索推动，同时也受到了不结盟国家“共同阵线”和 77 国集团的鼓舞（从这个侧面讲，是 77 国集团把拉丁美洲拉向了亚非一方）。1960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建立（最开始默默无闻，直到 1973 年，政治经济形势为它带来了第一次重大胜利）；不结盟国家召开了一系列首脑会议，首次会议是在贝尔格莱德召开（1961 年），最后一次是在印度尼西亚召开（1992 年）；77 国集团在联合国大会上接连提出有建设性的提议——尽管都遭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否决，总之以上一切成就都歌颂了这个时期的历史。

围绕着边缘地区民族资本主义路线的发展，来探讨那个时代的历史，有些人或许觉得有些过激。然而，我坚持我的观点：战后时期世界秩序的组成，是围绕着政治、社会的巨变展开的。这些变化改变了三个大陆的社会面貌，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它们所代表的整个世界的面貌。这里涉及的是大规模的质的变化，与中心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相对平静的变化相比，这些巨变的规模是无可比拟的。

从其他方面来说，中心统治地区内资本主义的转变，在世界体系的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包括：信息技术革命，通讯的世界化，媒体的世界化，文化的世界化，核武器和导弹的发明、使用，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破坏。但我认为，可以把这些转变归结在两个主要核心周围：

——福特模式开始衰落并最终解体，这种解体在资本再生产范畴和再生产条件的社会、政治管理十分有效。然而此时，这种模式在刚独立民族国家仍在发展和使用，这种解体侵蚀了国家政策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正是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建立的基础。这就产生了欧洲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其他中心（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差

距缩小。它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人们开始觉得“美国衰落了”。欧洲试图把自己建立成为开放的世界资本主义下的一个亚系统，这是否能使它成为美国和日本的竞争中心？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在面对南方国家时（以及面向东方国家时），西方集团从未出现过一丝裂痕，尽管戴高乐试图与欧洲苏维埃势力之间拉进联系（1984年，法国军队撤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挥，现在这一举动遭到了质疑）。苏维埃战略一直以破坏、分裂大西洋集团为目标，它时而采取友好政策（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时而又采取强硬政策（勃列日涅夫的政策），但所有政策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危机从1970年开始扩展开来（我认为应该由美元稳定汇率的取消算起，即从1971年开始）。生产投资瓦解，而且再也没有重建起来。美国军费开支的巨大增长和金融投机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无论如何，中心地区的团结未受丝毫损害，仍然保持立场的一致（除了几次巨大的美元波动，1978年跌到1美元兑换4法郎，1985年，又冲破了1美元兑换10法郎的大关，1992年再次跌到5法郎），因为中心地区资本的互相渗透，使国家的单独解决方案逐渐过时。

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就必须在西方重组新兴的社会主义力量，让他们在欧洲大陆范围内发挥作用，取代日渐衰落的民族国家，而建立一个能管理新的社会和解的跨民族国家。

在1968年的思想动荡后，这个发展前景开始在70年代出现。1968年，威利·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1970年工党重掌英国政权，1975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西斯统治崩溃，1980年希腊从始于1967年的军事独裁中解放出来，1981年，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这个时代人们抱有的一切希望似乎成了泡影，西方左派错过了复兴的机会。几年后，东欧政权和前苏联倒台（1989~1992年），欧洲的全面重组此时还不具备条件，因为它

是要建立在进步的社会和解基础上的。然而，右派主导力量则认为，这是在东欧建立“它们”的拉丁美洲的绝好时机。统一后的德国，在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新前景中，处于优势地位。它只是把欧洲计划当做自己的垫脚石，随后便默默地退出了该计划。后来，它又错误地认为，欧洲计划已经通过“马斯特里赫特协议”越过了这个新的历史阶段。

由于缺乏了左翼势力的力量平衡，资本主义战略中的一些目光短浅的观点占了上风，从而导致了混乱的出现。这种混乱震撼了欧洲大陆，就像人们在南斯拉夫见到的那样。这同时也是一个美国进行反击的机会，使它得以在资本主义世界充当国际宪兵（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显示了这一点）。这同时也证明了以市场来管理世界是不可能的，这种管理需要强大的军事干涉做为后盾，令人担心的是，随着这种管理中的灾难性因素开始不受控制的爆发，军事干涉会变得越来越频繁。

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苏联路线的衰落和崩溃，构成了战后时期历史的第三方面。

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1956年）以来，从斯大林时代继承下来的制度就一直试图进行自我改革，然而却一直未能实现。我认为，苏联的失败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对现有制度的批判造成的，这种批判是根据统治阶层的资产阶级野心进行的。因此，苏联最终的解体从性质上说是体制演变的加速，它在某些方面似乎比一次“反革命行动”更甚。在干涉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波兰起义后，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着手进行的第一次改革探索就已经失败，从1985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开始着手进行改革，而这场改革把苏联引向了解体。我对于这场改革一直抱批判态度，我与《革命》杂志的合作，以及选择赞同毛泽东主义的观

点，都证明了上述态度。^①

从1955年开始，苏联开始走出孤立处境，它意识到与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的结盟将成为它的一张至关重要的王牌。尽管人们对苏维埃体系的性质颇有微词，但无论如何这次结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起到了牵制帝国主义干涉力量的作用。苏联解体后，随即就爆发了海湾战争，并出现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这就是帝国主义势力失去牵制的结果。

然而，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也具有非常消极的一面。这倒不是因为苏联时刻企图“拓展社会主义”的影响范围，使其邻国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因为，苏联一直试图以社会主义为借口，使它的干涉合法化。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时，它宣称民族资产阶级是“进步力量”的一个支柱，有可能“向社会主义方向演变”。还有那些关于“非资本主义化道路”的含糊理论，其实也是为此炮制出来的。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左派势力，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又一再重提这样的说法、论调，造成了人民群众中概念的模糊和混淆，以至没有对万隆路线的衰落和垮台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在这种条件下，尽可能严肃、科学地研究苏联国际政策的性质和目标，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苏联的战略是否一直是防御型呢？它表面上的一些主动进攻是否只是为了给西方列强施加压力？我一直认为，苏联的战略目标，一直是在于分裂瓦解大西洋集团，它并不是要控制欧洲，而是想增大美国和欧洲之间的

^① 《革命》杂志：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发行了13期。主编：雅克·维尔日，编辑：M.A. 巴布（桑给巴尔），维利亚多·德·克鲁兹（安哥拉），玛玛杜·戈罗格（马里），桑巴·蒂耶（塞内加尔），拉巴哈·毕塔（阿尔及利亚），卡洛斯·弗兰克（古巴），切蒂·迦甘（圭亚那），雷卡斯克（南非），汉穆萨·阿拉维（巴基斯坦），N. 昆（越南），H. 里雅德（埃及）。该杂志一直处于时代前沿，对苏维埃主义进行批判的分析。它也在伦敦以英文发表。

矛盾，甚至在共同的资本主义前景中（对于苏联来说，是指新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拉近与欧洲之间的关系。然而，我承认这种战略有可能失去控制、偏离方向，从而走向一种“社会帝国主义”，就像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一样。

无论如何，战后这一阶段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告一段落。

万隆路线的失败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一些经验教训呢？1945~1955年间，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边缘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路线已经过时，而且只是一种幻想，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不是都错了呢？对于万隆路线出现的僵局，它的资产阶级特征，以及“非资本主义化道路”的伪科学概念，都统统批判为“左倾主义”，这种论断是不是过于轻率了呢？

我并不是说我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完整的。在对以前的著作进行重新审视后，我认为从大的方向上来说，这些分析还是正确的。有些论断甚至可以说是很有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尽管这种评价或许有些不够谦虚。我可以举一些例子：

——1960年，我对于纳赛尔政权结局的判断几乎是一种预言。

——我对于在中东出现的新买办主义出路以及以色列的统一都抱怀疑态度（这使我的许多朋友都十分不理解）。

——我对于1965年开始的象牙海岸发展“奇迹”所进行的分析，与世界银行对其的预测背道而驰，但事实证明世界银行的论断是错误的。

——1975年，安哥拉试图建立的解放运动联合政府，认为这是它最好的出路。我对此抱怀疑态度。我不肯定它这种努力是否能有效果，也不确定它的社会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今天，经过17年毫无意义的战争之后，这种探索终于得到了实现，不过看起来却更像是一场闹剧！

——1972~1974年，在津巴布韦和南非有可能出现一种取得和解的出路——1980年为津巴布韦提供的兰开斯特议会，以

及在谈判中提出的“联邦制解决方案”。

我并不是什么高明的预言家，也从不试图成为预言家，我只是一直坚信未来可以证明一切。我认为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向最好的方向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向不好的方向演变。这种观点曾遭到了一些左倾主义者尖刻而恶毒的“批判”（这种批判经常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渐渐地，我开始尝试从具体事件出发，进行深入分析，以掌握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理解它。现在看来，我的这些努力经历了许多阶段。1960~1975年间，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但却忽略了它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我的思想一直陷于“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两种路线选择的框架内。当时，我否定了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即使这种路线披着“非资本主义化”的外衣），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在客观上是可行的。同样是因为陷于这种思维中，我认为苏维埃主义是对于原有革命道路的一种偏离，原有的革命应该是以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尽管困难重重，但这个目标是现实的、有可能实现的。后来，从1980~1985年，我开始对这种观点产生了质疑。通过对两极分化现象的分析，我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挑战和问题或许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选择问题上，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实际上是两个平行发展的空想，两者都没有对两极分化问题予以充分的分析。

我觉得现在应该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一下后来遇到的问题。

边缘地区的再次买办化已经成为了事实。世界银行一手炮制的“结构性调整”就是这一事实的体现。但买办化的出现也不能抹杀历史，万隆路线拥有多种表现形式。根据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的不同，根据世界力量与地方力量的对比不同，我们看到在战后时期中，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别的转变。

①直截了当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想意识，尽管经常会以国家干涉为标志，但它确实是致力于现代化的发展，面向世界体系开放（但一直试图对这种开放进行控制），在它的实施中经常是反民主化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同时，巴西、墨西哥、土耳其、沙阿领导下的伊朗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也都是属于这一模式的二流国家。

②民众主义探索模式。它具有浓厚的国家干涉主义色彩，从来都不是民主制的，在融入世界一体化的问题上态度含糊（比第一种模式更加注重对外关系的控制，至少它们是这样宣称的），并且普遍自称为社会主义模式，经常得到苏联的支持。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有的则相对成就较小。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是采取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加纳和坦桑尼亚是属于这一模式的二流国家。

③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模式，如中国、朝鲜和古巴。就像苏联的尝试一样，它们受到第三国际的启发，在一开始就进行了激进的革命。现在，这种探索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并企图控制它与世界统治系统之间的关系。坦率地说，中国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④从未走出新殖民主义范畴的探索和尝试。在被动的从属地位中，在外国力量的控制下，这种探索在有些地方得到了发展（如象牙海岸、肯尼亚等），在有些地方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如萨埃拉国家等）。

当然，也存在着这些模式的混合体，有时候还会根据当代历史中政治阶段的不同，而从一种战略转移为另一种战略。以印度为例，它就是模式①和模式②的混合体，但是对于这块次大陆的整体而言，它还属于“第四世界”国家。有的人竟然把南非归到了模式②中，它显然是忘记了具有国家干涉主义性质的这种非洲的民众主义，是少数种族主义者的民众主义。南非的尝试曾是评论的焦点问题，尽管它的尝试最后都遭到了失败。越南的变化绝

对是属于模式③，它也是一个第四世界国家。

无论如何，这些巨变给我们留下了与1945年时完全不同的世界局势。我们应该把世界化资本主义的准则做为研究的关键。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地方生产体系中，有的具有这种准则，有的则没有，而这些生产体系有的是自由竞争性质的，有的则有潜力发展为竞争性的体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清楚区别“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了。

新第三世界是由模式①、②、③中的国家共同组成的，根据世界竞争性的准则，已经有效地进行了充分现代化发展。总体上来讲，主要包括拉丁美洲的所有大国，东亚大国或地区（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未来名副其实的边地区。显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会愿意接受野蛮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上为他们安排的命运。

新第四世界国家是由上述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组成的，总体上讲，就是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其中，各个国家所表现出的形式又大相径庭。有些国家越过了工业化发展的几个阶段，但却没能实现自由竞争（例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南非），有些甚至还没有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如所有南撒哈拉非洲、中美洲的安的列斯群岛、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财政上的“富国”，比如那些人口稀少的石油国家（海湾地区国家、加蓬），也有程度不同的“穷国”（从象牙海岸到索马里）……我在这里使用的衡量标准并不是人均收入，而是自己的生产进入世界体系的能力。

当然，有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集合了上述各种特征。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些国家则很难为其划分属性，他们在有些方面能够跨越第四世界进入第三世界：如津巴布韦、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越南等。

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所有人民——是指占人口大多数的群

众阶层——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但他们的斗争条件和环境却不尽相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边缘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政治上，边缘资本主义都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期望得到的东西。然而，就像我在文章一开始所讲的那样，第三世界边缘社会的构成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常备部队和一个难以吸收的预备役部队的并列存在。客观条件允许建立一个强大的人民社会联盟，这个联盟可以通过在生产体系、民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的管理问题上展开斗争，从而逐步地建立起来。当然，它的建立必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障碍。思想意识上的障碍——苏维埃主义的影响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局限——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东方国家面临的就是这些问题。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否从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中走出，避免陷入沙文主义的误区？中国也属于这个范畴之内。它的先锋力量能否再次复兴毛泽东主义，并在其中加入真正意义的民主成分——即建立人民自治组织，以平衡对于资本主义做出的让步？

与第三世界情况相反，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无论是否工业化国家，还是工业化发展不理想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工业面临着被买办化政策摧毁的危险），第四世界国家的社会构成都可以归纳为“人民”（这种定义是不对的，它没有定位在一个有价值的生产体系中）与“政权”的对立。冲突开始向虚构的范围偏离，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灾难性的事实。在阿拉伯世界、中东和穆斯林世界中，这个现实已经成了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政体的主要障碍。石油财富和其古老传统的言论、规划的结合，是当地帝国主义规划取得胜利的最佳保障。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规划已经开始实施了。因为这种规划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所以从这个侧面，我们会看到出现一种对社会冲突的非民主化管理，并且以宗教传统为借口。在南撒哈拉非洲，这种政策的借口经常以其他形式出现。比如，种族主义，它有可能走向国家的分裂（就像埃塞俄比亚），从而损害未来的发展。社会的这些弱点也体现在“为争取

民主进行的斗争”的定义的模糊中。如果没有形成足以赋予民主以进步涵义的人民力量，那么，多党制和选举又从何谈起呢？

四

博士论文一通过我就回到了埃及，1958年1月，我开始在经济发展组织工作（在阿拉伯语中叫“穆阿萨萨”）。这个组织创建于1957年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后，它的使命就是管理国家各个生产部门，在工业、大型贸易、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方面发挥了决定作用。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就是伊斯玛伊·萨布里·阿布达拉，他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同志。伊莎贝尔以地方职员的身份在法国学校教书。我的父母一直住在我们家在萨伊德港的祖屋中（我的父亲于1960年10月去世）。

在穆阿萨萨，我负责整理研究所用的各种各样的卷宗和文件，并决定要仔细研究一下埃及现代经济中的几个部门——棉纺织业，食品工业，建筑材料，化工业，矿业，冶金和机械，银行和保险，运输业，等等，挖掘它们的历史，分析它们的问题，寻找它们的发展方向。我把这些大量的卷宗都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许对于那些对国家历史和纳赛尔统治感兴趣的学生们还有点用处。我还研究过关于大水坝的资料，在大坝已经投入使用后，在人们战胜了沙漠赢得了新的土地后，又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埃及的这些出色的技术人员早已想到了这一切。他们为了这个浩大的工程工作了很长时间，应该说，如果没有大坝，埃及和它的5000万居民就无法从容面对在随后的几年中震撼了全非洲的干旱。美国满怀嫉妒地声称拒绝世界银行的贷款是不会有有什么好处的（世界银行曾经非常愿意对这个工程进行资助，但他们想借此机会向埃及施加纯粹的政治条件——这还不包括捷克的武装干涉！实际上，在苏联的帮助下，这个工程的费用比世界银行先前预计的要

少得多)，当时的一些生态学家也反复发表一些轻率的言论，但都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埃及，离开了水，人们根本就无法生活。

我的职责要求我密切关注一些新兴公共部门的运作方式，以及企业委员会的讨论和决议。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十分具体地了解了那些先生们（因为在这一领域中很少有女性存在）的个人利益是怎样控制操纵了企业的决议，而工人代表（这是纳赛尔政权的革新，最初还是一项十分出色的政策）则是怎样被排挤、愚弄……或者被收买。

我并没把自己关在穆阿萨萨的围墙里，走出办公室，我就成了向其他人一样的革命战士，我当时十分赞赏埃及共产党——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拉雅领导的共产党。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形成（它们甚至在埃及的革命运动中始终存在），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深的体会。我密切关注着开始浮出水面的中苏论战，很自然地把我认为十分正确的左派批评同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批判结合了起来。在这方面的观点上，我一直属于少数派，其他的几个人也和我的观点相同，如法沃兹·曼索尔。

1958年和1959年是十分艰难的两年。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后，共产党人和政府之间的“蜜月”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共产党对于埃及-叙利亚联盟中的官僚作风和反民主倾向进行了批判，而这是政府所不能接受的。1959年1月1日，警察逮捕了不计其数的共产党员。第一批逮捕名单中没有我，但我清楚逮捕还会继续。于是我在1960年1月离开了埃及。我从1960年开始撰写《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但不幸的是在1963年以前，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纳赛尔正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还是不要去找他的麻烦了。

在巴黎度过的9个月中，从1960年1~9月，我在财政部财政事务研究处工作，它在当时是由克劳德·克鲁森领导的，是著

名的研究中心。是我的好朋友查理·布鲁推荐的我。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有时对一些模型十分感兴趣，如著名的价格多变的金融模型，这是我和擅长数学的纳塔夫共同完成的工作。但是我并不想在法国或是其他西方国家永远地安顿下来，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属于非洲和阿拉伯的第三世界。

于是就出现了我说的在马里任职的机会，我的朋友让·贝纳尔是那里经济方面的巡回参赞，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工作。我在巴马科又遇见了许多熟人和老朋友，好像是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老”马德拉·凯塔，苏丹同盟的骨干，还有我在这个地区认识最久的朋友，尼日利亚药剂师阿布·穆穆尼。我在这里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有的是马里人，有的是来援助马里新社会主义探索的外国人，比如让·莫洛和布兰什·莫洛，马尔塞勒·弗尔，葡萄牙同志雷·达·诺布加以及他的家人，以色列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埃里·洛贝尔。我做为一个苏丹同盟的同志而被这个国家接纳，与它的极左派一起分担希望和忧虑。

我在计划部工作，尝试着设计一种容易理解的、有效的国家账目，建立工程财产清单，对它的价值和协调性进行评估。我很怕被当做“专家”对待，而是希望能够加强我们（一群懂得一些有用知识的技术人员）同在国家或政党内任职的同志们之间的联系和对话。我对于这些交流的印象一直十分深刻。马里的许多同志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之间的讨论是直率的，真诚的。许多同志只受过很少的正式教育，但他们经常感到我的想法和他们非常一致。在更高的国家级别中，部长和总统并不总愿意听从我们的建议，尽管我尽量避免在建议中带有自负成分。我时不时地感觉像是又回到了纳赛尔政权的统治，只是没有纳赛尔政权那样激烈的反共举动。在马里，事态发展得更加温柔一些，但走的却是同一个方向。许多从欧洲回来的年轻干部，由于缺乏经验而经常发表一些“左”倾言论，这些言论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但却

缺少批判性。在墨迪波政府倒台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继续为反动政权，却丝毫未感到不安。

我不想再说这件事了，我也不会提到他们的名字，或是一些具体的事件。我与一些马里的负责人过从甚密，他们也对我充分的信任。

在巴马科的时候，就像在开罗一样，伊莎贝尔仍然是当教师。

我开始感觉到马里的尝试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浮夸的战斗措辞（如安全旅的形成等）伴随着官僚风气的愈演愈烈。同时，做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越来越不被理解，在同苏丹同盟一些最亲密的左派同志讨论后，我决定去别的地方。但是去哪里呢？阿拉伯和非洲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在上演同样的局势。我想，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回到大学去做研究或是教书。

这时，人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在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的职位，学院就位于达喀尔，是联合国刚刚创办的机构。于是，我接受了这个工作。

我在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的第一次任职十分短暂。因为在这样的学院里，一般都是院长说了算。当时仍然是“技术援助”时期，这种援助一般都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并且不知不觉地实施新殖民主义的规划。我在当时认识的最后一个院长，后来进入了货币基金组织工作。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被设计成了一个教授技术和规划知识的廉价“学校”，不具备丝毫的批判眼光。而我却试图给我的国家会计制度和规划课程注入新的涵义，我把这些课程建立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如马里、几内亚、加纳、埃及以及马格里布地区的经验。同时，我也在研究著名的象牙海岸“奇迹”。我从中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既不讨世界银行的喜欢，也不讨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的喜欢。世界银行急忙出版了一期精美的刊物做为对我的回应——这个比我的研究要昂贵许多了。现在来重读世界银行的论点，任何一个稍具幽

默感的人都会被它逗乐。后来，我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事实比我还预计的还要糟糕。然而，我的行为引起院长的敌视。于是我决定离开那个研究院。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时，我开始十分谨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时的秘书长是 U. 萨尼。

在此期间，让·贝纳尔说服了我去参加经济方面的大学教师学衔考试。我为什么不想参加呢？我没有时间，也不想把自己束缚在条条框框的纪律之中，我一直认为这十分愚蠢，就更不要说我为了它去准备什么考试了。不过我还是去参加了考试，而且在 1966 年一次就拿到了学衔。这样，法国大学的大门就都向我敞开了……按照传统，我接受的第一个职位是在外省，在波瓦第尔任教，这对我来说只是意味着几次出差，还得到了在波瓦第尔和达喀尔两地兼任两份工作的特权。

1968 年来了。3 月 1 日我从达喀尔回到巴黎，为了 3 月 15 日在波瓦第尔开始教授我的课程。秋天，巴黎八大成立——著名的樊尚大学，我在那里找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有用的职位，我同样是同时兼任达喀尔和大学这两份工作。

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写了一些作品，以及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的评估工作得出的结论部分上与我一致，这些使我在 1970 年登上了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的位置。我终于有机会实施自己的观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本以为我的任期将会很短，以为“制度”恐怕不会长时间容许这个研究中心造就批判的、独立的非洲思想。“这恐怕要比你想象的时间长”，一个老朋友这么对我说。他是对的。我要指出的是，在最开始的 5 年里，我得到了罗贝尔·加尔蒂尼埃德帮助，他当时是原子能专员署的执行秘书。我十分地尊敬他，因为，他一致非常正直、威严，尽管它是一个保守派。它的后继者阿德巴约·阿戴吉没能抗拒诱惑，开始协助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的对手们——即美国机构及其众多走狗。

无论如何，我从1970年8月至1980年6月，一直担任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的院长。为了不变成一个官僚院长，我一直继续任教，因为这样能使我通过研究任务，继续保持与现实的接触，并且继续进行写作（见后面的章节）。

我想把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建立成为一个双重学校，既是研究中心，又成为泛非主义论战场所，主要强调从属状态、解放状态、社会变化之中的政治经济，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我也希望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能帮助非洲走出新殖民主义的孤立状态，并为此组织起非洲知识分子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1972年）、亚洲知识分子（1974年）的第一次会面。

在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我遇到了克瓦穆·阿莫阿，他很赞同我的观点。我一直很欣赏他，尤其是他的外交才华（我曾对他说，他或许能成为某个大国的外交部长），他后来也成为了我的朋友。我召集来了许多有名的教授，如弗沃兹·曼索尔，希克多·塞尔瓦·米什莱纳，奥斯卡·布朗，诺曼·吉尔万，以及一些更年轻的教授，他们表现得同样出色，比如贝尔纳·弗诺，他是我的好朋友，在第三世界论坛的领导中与我合作。

在70年代中，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做了一些我认为有用的工作。我们培养了至少上千个非洲青年，使他们有能力用批判的眼光来判断“发展”中的规划和政策。与此同时，我们还帮助建立了一个活跃的泛非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通过把研究院的活动尽可能地下放，并组织许多国家或地方性的专家讨论会，我们直接或间接地触动了不计其数的青年和一些大学教师。建立其他的非洲学院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们肩负着特殊的、或是更大的使命。其中有三个机构值得我在这里提一下。第一，非洲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达喀尔建立，在最初7年的困难时期里，它一直在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办公，因为它那时候没有资金保证。我在最初的三年里担任执行秘书的职务，后来在机会成熟的

时候，就把职位移交给了我们的朋友阿布拉达·布哈。第二，“新非洲发展学校”，我把它做为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的一个项目创建了起来，它主要关注环境方面的问题，在当时，这一主题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1972年），我把这个机构交给了雅克·布尼库尔来负责，后来它也成为了独立机构。最后是第三世界论坛，我和朋友们于1973年在圣地亚哥建立，后来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论战组织。它的办公室也在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里，直到我离开研究院。^①

① “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使我们得以建立起泛非主义论战的初步网络，为之工作的有南森，汉森，吉索，布里托，乔纳，斯卡塔，卡洛斯·洛佩兹，墨美尔·弗特，马加萨，德尼斯·塔奥雷，米歇尔·凯塔，卡方多，诺利，兹米洛，阿克，法达辛森，萨瓦内，阿马蒂·迪恩格（西非），穆巴雅，宗果拉，马利奥·德·安德拉德，亨利·洛佩兹，P. 穆萨，J. 德贝尔辛（中非），伊萨·施维吉，曼塔尼，泰耶·库尔姆，布拉，德哈兰·加，达尔加，穆罕默德·阿登，奥特曼·哈鲁布，丹·纳布戴尔（东非），伊勃·曼达萨，莎穆雅利拉，马南达非，德里克·西塔拉，G. 穆登达（南部非洲），F. 曼索尔，F. 雅西尔，埃特·阿马拉，S. 肯纳斯，穆罕默德·阿里·泰瑟尔，阿赞·马鲁布，阿里·埃尔·肯兹，A. 萨浮，埃尔·吉亚里，斯坦布里（阿拉伯非洲）。就是在这些工作人员中，又产生了非洲社会科学委员会和第三世界论坛的人马。该论坛的成立大会是于1973年4月在智利的安哥拉举行的。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与第三世界论坛都与拉美的同志们进行过合作，著名的“依赖学派”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弗而塔多，卡尔多索，马里尼，多斯·桑多，达尔希·里贝罗，P.G. 达卡诺瓦，奥泰萨，乌斯克维克，A.G. 弗兰克，热拉尔·皮埃尔—查理，吉尔万，米什莱玛，可洛斯蒂加，吉加诺。我们也同亚洲的同志们建立了工作联系：A. 把格西，比潘·常达拉，R. 穆克尔杰，帕莱什·莎托帕戴，阿里·胡森，乔莫·昆纳兰，阿玛德·埃格巴尔，雷纳多·龚斯坦蒂诺，G. 阿斯尼洛，S. 普拉萨尔特塞。70年代，“77国集团”在联合国内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在第三世界论坛的奠基人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国内、国际人士的身影，如E. 伊格莱萨，噶玛尼·克歇尔，挪鲁·伊斯兰，麦克·因第尔，J. 洛耶玛姆，奥泰萨，伊斯梅尔·阿布拉达（1975年，在卡拉奇大会后，当选为第三世界论坛主席），J. 萨耶夫，以及其他的一些人。

敌人们一直企图破坏我的努力成果。有些联合国机构内的非洲官员，十分平庸，未能被“第一世界”的反革命吸收，但他们还是不停地试图破坏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我明白他们最终将会达到目的。当我意识到我必须牺牲大部分时间去做一些官僚主义的争斗，仅仅是为了维持研究院的生存，而没有能力继续发展它时，我觉得我应该离开了。我将在另一个平台上继续战斗，这个平台将是能够继续发展的空间。1980年，我离开了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院的领导位置，把第三世界论坛的办公室安置在达喀尔，暂时在非洲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大楼里办公，后来搬进了我们自己简陋的设施内。

这样，从1980年起，我同加入的贝尔纳·弗诺一起领导着第三世界论坛非洲办公室。论坛的地点设在了达喀尔，桑格尔总统和它的继任者阿卜杜·迪乌夫总统以真正的民主精神，对我们的建议表示欢迎。政府对于社会主义思考的容忍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内，无论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所以我们对他们十分的感激。

为这些活动寻找合适的资金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却做到了。在瑞典，我们获得了在当时最强烈的共鸣。奥洛夫·帕尔姆在看过我的计划后，立刻就为我们开了绿灯。瑞典的研究机构表现得十分慷慨，在未对第三世界论坛进行任何考验的情况下，就对它进行了支持。

渐渐地，论坛不只是一个活跃的项目研究中心，而且还成为了像欧洲19世纪那样的论战社团。这有点像第三世界的国际发展学社，然而这个学社又是一些世界银行的友人建立的保守机构控制的，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北美人和欧洲人（总之是“北方”人）。论坛提出的理论回答了许多其他机构无法回答的现实问题。因为，论战超过了那些受政府机构欢迎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是把自己得出的结论放在一个更普遍的意

义上，可以像一个群众机构的知识分子那样，启发政府或反政府力量中的政治家们。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论坛尝试着组织会面活动，以及对于“发展危及”的各个方面的讨论，包括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这种讨论的结果经常是批判性的，但又是十分坦率的，不存在任何宗派主义，这些结论用各种语言广为发表，其中包括 50 多本著作和许多篇文章。

我自己则密切关注着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危机的演变，各国政府的对策，各种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提出的，抵御危机、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提高人民自我保护意识的建议。同时，我们在达喀尔的办公室还协调了拉美和亚洲这方面研究、论战网络的活动。

我投身于第三世界的政治活动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尤其是在阿拉伯和非洲世界。我参与的这些活动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许多解放组织、政党和政府。我与他们的许多领导人过从甚密，有时甚至是一些最高级别的人物。受到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激励，我也开始进行讨论，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一个项目申请是以提高民族地位，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促进最有利于人民的发展为目的的，那么原则上，我就会接受这个申请，即使对这个项目到底能取得什么功效还不十分确定。我认为还不是把这些研究资料交给下一代人的时候，这些信息或许能够做为研究的补充材料使用，而对历史学家们就更没有用处了。我们也不应该扩大讨论的范围，也就是对于这些组织及其领导人的个人评价。我有选择地对一些政治路线及其理论基础进行了个人评估，我想如果走得太远的话，恐怕就会辜负这些人对我的信任。

第六章 对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 批判性分析（1955～1990年）

我在第3、4章中介绍了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两极分化的）理论形成的几个阶段。这个理论同其他的资本主义世界化理论和观点，在观察、分析、结论上都有许多共同点。以至于我竟然被划分成了依赖学派或是世界体系学派作家，不过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然而，我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的积累理论是与众不同的。

我一直强调两极分化是现行世界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产物，而不是不同社会具体状况的特殊性造成的附加现象。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于实际情况研究的歧视，与此相反，我提出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实际研究基础上的。我也一直试图超越这些具体研究的特殊性，而上升到一个抽象的层次，以适应建立资本主义一般趋势理论的要求。就像埃丹·弗斯特在给我写的前言中说的那样，凭借大量作品的出版，经验论者萨米尔·阿明战胜了理论家萨米尔·阿明。的确，我的实际研究充斥了1955～1990年的所有时间，并且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补充。

我试图绕过两个理论上的暗礁：一是，避免理论表达脱离实际，二是，避免脱离理论思考的经验的堆砌。

对于现实的分析，就意味着对30几年来，第三世界所实行的发展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因此，我一直或含蓄或明确

地提出对于这些理论政策的建议。我从来就没想到要把科学研究理论路线从实际中分离出去。我也从不掩饰我以群众角度出发这个事实，因为是群众阶层构成了人类的绝大部分。这样，我就已经阐明了“资本主义扩张”概念同“发展”概念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人们研究的一种客观事实，后者是一种路线选择的内容。

起草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工作，促使我再次审视了我在每个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内对它们进行解答。在深化两极分化概念的过程中，至少有两个系列的问题涉及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新阅读：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概念化，尤其是在他与两极分化的关系和它对此起到的效果方面。

——超越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概念（即社会主义建设及其任务），以及对这些概念的实施进行的批判。

现代世界的研究借助于一些新的问题对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

——以往体系的性质及其演变动力；

——资本主义的源泉及其在欧洲诞生的解释；

——在资本主义和以往的体系中，除了经济方面以外的社会生活，就是说，思想意识和政权之间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系统中的再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本章中，我不会分析以上所有问题，我只是就发展路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现实的、批判性的分析。我将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讨论两极分化带来的挑战，并对其应对政策进行定义。

我并不想按照出版年代把我这 35 年来的所有著作进行总结，这会十分枯燥而且过于重复。因此我只是想介绍一下我从中得到的一些经验教训的精华，我会围绕着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或论题重

新组织这些观点。

一、被研究的国家和地区

我在对发展路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评时，总是把它同我的个人经历、职业经历（我做为“专家”在这个或那个发展机构中的工作）以及政治经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60~70年代中，我在埃及（1957~1960年）、马里（1960~1963年）工作，在此期间，我也在一些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任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几内亚、加纳、象牙海岸、刚果、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等）。

1957~1963年间，在我做为经济学家参与的规划工作中，我发展出了一种对于重大经济规划和经济环节的评估方法，以此来适应必要的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这并不意味着要不惜一切地接受它，毕竟在那个时代，统计学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们要做的是从中吸取一些有意义的、可行的东西为我们的研究所用。于是我提出了一种注重收入再分配和发展投资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对于过去事件的回顾性的分析，还是提出规划政策时，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传统研究方式都经常忽略这个问题。我用这种方法研究了许多国家的探索，如埃及、马里、几内亚、加纳、象牙海岸，非洲西部和中部的其他一些国家，以及马达加斯加等。在后来的几年中，我还从中提炼出了我所教授的国家会计制度和规划课程的题材内容。

1. 埃及

做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和左派战士，我在1955~1962年间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性的文章，针对纳塞尔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开罗生活一段时间后（1957~1960年），我试图把这些文章在《纳

赛尔政权下的埃及》(1964)中做一个总结。

我的研究超越了对纳赛尔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批判的范畴,开始触及埃及问题的历史根源,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从1880~1950年间在埃及的发展),还是在它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都进行了分析。我从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同阿拉伯、埃及当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了对比:

——资本主义从根本上颠覆了埃及原有的、封建的社会结构:大地主在性质上变成了资本家,并建立起了当地的资产阶级核心,因此,也就必然很反动,并与世界帝国主义相勾结;工业资产阶级从1920年开始悄悄建立起来,实际上只不过是同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分支。其实,在埃及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定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反帝资产阶级)。

——因此,埃及的反帝政党和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没有过工人群众与农民群众的联盟,更没有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参与;这些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运动。这个结论就把论战的中心转移到了社会路线问题上,转移到了思想文化领域,即对现代化、外部挑战、政权以及它的职能和运作方式的理解认识。我把老牌的民族党,瓦浮德政权,自由军官组织,甚至是共产党运动都归入了这个范畴。

——我试图把近期的历史同在穆罕默德·阿里和纳阿达统治下的19世纪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我逐渐展开了对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思考,思考的过程呈现在《不平衡发展》(1972)和《阿拉伯国家》(1977)中。

——从此,我就开始对纳赛尔政权做出了严肃的判断,我认为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范围内,国家干涉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路线成为了不可能。1957~1967年间,主流观点认为在埃及纳赛尔政权的探索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开始，而它的第一阶段走的是“非资本主义化道路”。与主流观点相反，我认为这就是新一体化中的一种资本主义发展形式，该形式正在形成过程中，并以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为基础。我认为，这种探索的结局将会和萨达特的“对外资开放政策”得到一样的结局。我要强调纳赛尔政府的反动思想，导致了后来伊斯兰的上台，以及它实施的强烈的反民主政策。参见：《埃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1984），《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政治和经济》（1992）。

2. 全体阿拉伯世界

我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些探索也进行了研究——首先是就其经济方面的，使用了研究埃及、西非时建立起来的方法：马格里布的尝试（《马格里布的经济》，第二卷，1966；《现代马格里布》，1970）；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探索（《伊拉克和叙利亚，1960~1980》，1982）；阿拉伯世界整体的经济（《当代阿拉伯经济》，1960）。

我所得出的结论几乎是相同的，虽然他们经历的历史和政治发展过程不尽相同。在马格里布地区，刚刚从战争中走出的平民化的阿尔及利亚，资产阶级控制的突尼斯，贵族和旧势力统治的摩洛哥，都纷纷采取发展政策，开始演变。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就像在埃及一样，农业改革改变了农村的收入再分配，刺激了富农农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叙利亚的工业化模式是一种比较古典的模式（即注重替代进口的工业生产的多样化），这跟伊拉克的海湾模式很相近（注重在石油基础上的化工业）。但是这些探索在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却很接近。

一般来说，几个不同程度的结论经常出现：

——大家所说的“农业发展的失败”。农业发展在各处最后以食品依赖程度的加深而告终，这种失败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有时有十分特殊的原因。越过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原因：相对于世界的价格体系而言，在没有真正的与相对的内部价格体系（把价格建立在国家和群众的价值规律之上）脱离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收入总是低于城市居民的劳动收入，因此，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农业发展，开始衰败，不能再跟上需要的增长速度。这显然就是城市霸权集团中的城市优势的体现。

——从根本上来讲，该地区的工业化也不够独立（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投资，甚至在公共部门的建设都存在这种依赖），因此，它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于对替代进口型工业和出口型工业的选择（把农业人民和城市人民的需求所提供的支持同工业化联系起来，这也并不是原创），不平等现象开始在收入分配领域产生。工业化发展也很快就衰落了，第三产业收入的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动力高于农业和工业所带来的动力。

——这种发展模式还造成了对外抵抗的脆弱性越来越严重，食品短缺和外债就是它的体现。我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深刻的世界一体化（跨国化）中进行的，它不可能带来任何自我为中心的体制，也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我对“非资本主义化道路”的批判。

——在这种框架内，实施的发展政策加深了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对于珍贵资源使用分配状况的研究表明，珍贵资源是供特权阶层消费用的，这一点在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明显，而且，这种失调现象在阿拉伯国家更加严重，尽管他们的人均收入有所增长。

——尽管这些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太微不足道，不足以使该地区上升到“新工业化地区”的行列中，也就是说成为工业出口国（就像韩国那样）。

然而，我一直想提出一些政策来替代我所批评的政策。这些提议从表达形式上看，有可能会给读者一种“专家治国论”的感

觉。这使我想到了在《现代马格里布》得出的结论中，从1970年开始，我就提出了一种对马格里布的设想，它应是独立的、现代化的、自我为中心的，它应该开始进行农业发展，从而越过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这种工业化发展应该是由收入分配决定、并以它为基础的，而收入分配则会逐渐消除边缘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现象。我觉得这种设想是必要的，它证明了另一种政策存在和发展的可能。这种建议或许要以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为条件（如政权的社会组成）。我的这个设想加强了颇受争议的、以缩小经济差距为惟一任务的观点，而实际上，我主张以缩小经济差距为一部分任务，同时着手进行其他方面的发展。我在后面将努力消除这一概念上的模糊。

3. 南撒哈拉非洲

在这里我参考了以下著作。

《发展中的三次探索：马里，几内亚，加纳》，1965；《象牙海岸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塞内加尔事务》，1969；《刚果经济史，1880~1968》，1970；《封闭的西非》，1970；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发展》，1972；《几内亚共和国》，1973；《西非当代移民现象》，1974。

为了恰当地判断“独立非洲”从1960年起实施的新发展政策，就需要回顾和检验一下殖民开发遗留下的各种体制。这样就可以仔细地评价一下所谓的“新发展时代”，从而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旧殖民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

殖民开发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我把它们主要分成了三种形式：贩卖黑人经济，特许公司经济，以及保留地经济（这是在《封闭的西非》，《刚果经济史》，《黑非洲的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中提出的划分）。同时我也注意到，殖民地的独立开始了像一个边缘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过渡（《非洲的过渡》，1973）。

在殖民时代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基本完全来自于外部的需求。随着替代进口型工业的发展，动力的中心有可能转向国家内部，因为在这种发展中获利的中产阶级的需求不断增长。在新工业中，低工资和相对高的生产率的结合（我一直不赞同“特权工人阶层”这个说法，然而它直到今天都很流行），是否能带来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从而既有利于替代进口型工业，又有利于出口型工业？我对此做出了假设，然而事实证明我是错的：建立在粗放型农业基础上的殖民政策的延续仍然处于优势地位，反对工业化的偏见十分突出，并且得到了欧共体行动的支持。我还注意到，那些更为坚决的投入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国家，往往不得不求助于这个阶段难以避免的国家干涉的形式，而这绝不会带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导致资本主义的扩张。这种观点在当时遭到了非洲和其他国家大部分左派的激烈指责，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它是正确的。最后我还注意到，殖民主义远远没有帮助非洲的资产阶级发展，相反的，每当资产阶级的发展开始在政治上对它产生威胁时，就会被它扼杀（《塞内加尔事务》，1969）。

我的研究注重对于长期历史的审视，当觉得必要的时候，我有时会上溯到19世纪，从而了解新国家内的遗留体制（塞内加尔，达荷美-贝宁，刚果，加纳），包括两次大战中间时期和二战后的贩卖黑奴经济（象牙海岸，萨埃尔地区）。这种模式在1960年后仍在大规模地延续，但已经衰竭，并将很快走向毁灭，表现为公共财政和贸易逆差的双重危机，而这时，甚至连工业化的第一阶段都没有完成：我认为，“第四世界化”现象就是在1960年产生的。

从那时起，研究非洲大陆上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在这里，我要简单强调一下以下几点：

——相对大量的矿产资源的存在，给某些国家带来了一定的财政上的富裕，这种富裕延缓了它们的失败，但却不能使它们彻

底逃过失败。我对几内亚的批判性评价在当时被指责为过于严厉，但后来却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那些直到1960年都从未经历过殖民开发的地区，具有一个发展的余地。我以此分析了“象牙海岸奇迹”。并把它与加纳以前的发展进行系统的对比。我从一开始就预测它会很快衰败，果然得到了证实。世界银行当时大力吹捧的“十年规划”（70年代），在我看来是十分肤浅和错误的（世界银行一直也没有在这一点上进行反省）。

——殖民地区的统一体并不是建立在各个国家的团结基础之上的。这只是分散的各地区在宗主国空间内一种并存。因此，它很可能分裂成各个独立的国家，这种分裂是受到新统治阶级萌芽力量的支持的。这种分裂可能会给有些国家造成无法承受的影响（达荷美—贝宁，尼日利亚，前法属东非的腹地），并使它们中的一些成为边缘地区的二线国家，为一线国家提供廉价的人工或食品（上沃尔塔—布基纳法索）。

——在整个西非内部的移民问题也应该放在这个框架中讨论。我注意到该移民现象规模十分庞大——1920年的内地与海岸地区人口比例为2:1，1970年为1:1。它还对于移民来源地区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劳动力转移中隐藏的价值转移使这些地区愈发贫困。我把移民现象看做是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建议把移民问题同农业资本主义的扩张联系起来）。我发现，尼日利亚的每个大地区（北部、西部、东部）中都有自己的保留地，这使它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进行自我为中心的发展。

——这个地区发展的整体模式是由殖民历史及其1960年后的发展决定的。我认为这种模式十分荒谬：它放弃了大河流域提供的广阔地区和巨大的发展机会。地理位置赋予非洲的进行大陆型发展的使命经常被忽略。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体系却代之以糟糕的、人为捏造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使命。譬如，塞内加尔原

本可以发展密集型灌溉农业，并补充以服务养殖业的混合农业，然而殖民主义把它发展成了花生种植，从而无视上述的这种可能性。花生经济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和对土地的消耗，导致了沙漠化和第四世界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对于试图走出殖民化、新殖民化僵局的尝试抱欢迎态度。我毫不迟疑地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到这些努力中，尤其是马里（1960~1963年），恩克鲁玛和罗林茨当政时的加纳，后来的刚果、布基纳法索和坦桑尼亚这些地区的探索。然而，我也对这种局势中所采取的政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不要被这种批评的“专家统治论”的外表所欺骗。我只是想使用一种能够令人信服的语言，来说明一种更好的替代选择是可能的。

4. 南部非洲

非洲大陆这一地区的许多问题的特殊性，是我一系列研究的主题：《安哥拉战争》，1971；《南非》，1971；《南部非洲的前景》，1976；《面临着南非挑战的南部非洲》，1989。

我注意到，南非资本主义积累的继续发展必然会导致针对南部非洲的扩张主义，对该地区的干涉战略和货币不稳定政策也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就像皮埃尔·波戴证明的那样，接下来的事件表明南非的这种野心遭到了失败。我概述了新殖民主义给南非和津巴布韦带来的危险和机遇，然而南非的失败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就此摆脱了新殖民主义呢？

二、相同的重大问题

第三世界面临的“发展挑战”的核心就在于土地革命和农民革命问题。这种观点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的体现，而不

是对“发展技术”的研究。它意味着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思考得到了深化（过去是指前殖民主义和边缘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现在是指亲帝国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社会集团的性质）。我围绕着埃及（《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国家》）和南撒哈拉非洲（《非洲的阶级斗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我在下一个部分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通过不断地丰富从实际探索中得出的那些结论，我在一系列文章中讨论了农业革命和工业化的独立自主问题：《绿色革命的局限性》，1971；《非洲的发展与结构转变》，1973；《服务于农业的工业化发展》，1981；《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在非洲是否能够实现？》，1982；《评世界银行关于南撒哈拉非洲发展的报告》，1982；《农业革命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1988；《摩洛哥农业》，1989；《非洲的农业危机》，1990；《北南关系中的地中海农业》，1992。

在这里，或许需要讲一下我提出的一些预见性的思考：

——在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农业革命是先于工业革命进行的（或者是同时进行的）。与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不同，农业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了不同形式。

——从苏维埃主义继承下来的历史社会主义思想，总是把农民当做工业化投资的储备力量，这种看法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歪曲，它抹杀了现实发展的可能性，使以“缩小差距”为首要任务的战略再次遭到了质疑，而这种政策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有害的。

于是，我开始研究毛泽东在对苏联经验进行批判后提出的、名为“十大关系”的理论。这个理论意味着人们抛弃了以下两条发展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农民和现代化对于农业综合企业的依赖），苏维埃道路（国家控制和经营的合作社）。人们从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尝试中受到了很大启发，而这也正是这种尝试的

局限所在。这种理论带来了一种服务于农业发展的工业化，这使人们走出了资产阶级对于是发展“替代进口型工业”，还是发展“出口型工业”的争论。

上述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有些是基于我对于“（资产阶级）发展空想”的批判（如皮尔森报告、世界银行报告等），有的则是基于我对各处实施的国家政策的批判（如阿拉伯世界、南撒哈拉非洲等的政策）。欧共体通过实施欧洲农业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分离的政策，实现了食品的自给自足。然而，它却反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同样的政策，认为这将挑起欧美之间的竞争（乌拉圭圆桌会议谈判，关贸总协定的谈判）。

有一些关于工业化的特殊问题，也出现在这些战略中。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在进入世界矿物和能源市场时的外倾性问题（《非洲矿业面临的挑战》，1967；《地中海地区在能源方面遇到的挑战》，1992），把技术问题归结为技术转让问题的观点（《地中海和技术革命》，1992），以及关于国际谈判的其他著作。

人口问题与资本主义扩张及其带来的挑战是密不可分的。马尔萨斯经常提到由前资本主义体系（与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增长的相对缓慢为标志）向资本主义体系（以更大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工业生产更大的增长为标志）过渡的那个时刻。在这个过渡时刻，工业化的需求支持了农业的发展，政策也与之相配合（群众的社会分离和联合）。我以这种分析来反对传统人口学的言论（《人口过剩的非洲》）。

自主的、独立的、群众的、以社会主义为使命的战略，一体化和地区间合作的问题也都属于这个框架。

我还分析了许多现实问题，如南南贸易（《非洲间贸易》，1967），关于合作问题的理论、规划和实践（《非洲统一体》，1972；《阿拉伯与非洲的合作》，1988；《阿拉伯与塞内加尔的合作》，1988），或者是关于法兰克地区及其作用（《为了法兰克地

区货币体系的治理》，1969；《法兰克地区和发展》，1972）。

非洲地区之间的贸易，就像一般的南南贸易一样，是对不平等的北南关系的一种补充，应该把它逐渐发展成为北南关系的替代品。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起自主的、独立的、互为补充的广阔发展空间，而不应寄幻想于一个共同市场。

从这个角度上看，殖民主义遗留下的东西不应该被看成是复兴所必需的积极因素。不过，我认为它多少可以对进步改革有所帮助。该改革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带领该地区向前迈进，但不幸的是，它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三、社会，国家，政治和经济

我一直认为对于所谓的发展探索的批评，不能仅仅限于经济规划领域，而是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挖掘更深的意义。

1. 阿拉伯世界

我在《阿拉伯国家》中提出的六个论断，都摆脱了阿拉伯和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主流观点的束缚。其中，在关于现阶段的问题上，我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新型工业资产阶级和富农起草的发展规划，将会以社会的新买办化而告终；苏联的干涉并没有证明所谓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合理性，而它的这种干涉应该在国际政治方面受到抵制；阿拉伯统一体的建立需要重新实现组成者的多样性，以及建立一个梦想中的自由人民阵线，阿拉伯资产阶级是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尽管他们是激进的国家干涉主义者）。

下面我想简要回顾一下我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国家、政治和经济》（1992）中得出的结论。从1800年的埃及起，到1919年的马史来克和1960年的马格里布，最后截止于七八十年代，这

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是一系列为建立民族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的尝试。左、右派之间的冲突打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并带来了长时间的危机。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民众主义出路并不是解决这个危机的适当方法，而只是对其症状表现的抑制。这种抑制导致的政治和思想的空乏解释了后来的伊斯兰的复古统治走入的僵局，而实际上，这种民众主义的插曲将以阿拉伯世界进一步深入世界一体化程度而告终。我观察到，在世界一体化中，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并不是参与合作的独立国家，帝国主义看重的只是它的石油生产和它的地理战略位置。在对于民众主义的评论中，我还提出了国家问题、少数派问题等。通过和土耳其凯末尔政权的探索进行比较，阿拉伯世界的研究又被延伸了（《发展与移民——土耳其面临的问题》，1987）。

对于现阶段的研究跟以前的历史也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我要特别强调东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中世纪时的法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形成而导致的该关系的破裂（《世界体系中的地中海地区》，1987）。

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带来了对于以色列问题（《从世界角度上看中东冲突》，1983），以及对美苏和欧洲的全球战略与发展问题的关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冒险》，1992）。

2. 南撒哈拉非洲

这里的分析在以下4篇文章已有阐述：《非洲的阶级斗争》，1962；《黑非洲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黑非洲地区的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1972；《非洲的过渡》，1973。

与人种学的主导理论相反，我认为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新思考非洲共同体的形成，分析由殖民主义导致的国家的分裂和共同体的解体，以及工资形式的出现和对于农民的“伪封建主义”的剥削。因此，我觉得也有必要展开对于未来道路选择

的论战：是否应该鼓励乡村公社的解体，加强农民商品经济？人们能否/怎样限制住土地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的加剧？是否应该跳过这个阶段，越过传统的乡村公社，而发展到社会主义合作社呢？

在《阶级和国家》（1979）中，我指出在当代，中心资本主义使社会愈发巩固的同时，边缘资本主义却使社会开始分裂，并最终使民族的凝聚成为泡影。我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非洲的种族问题。

我认为有必要把握对于发展政策的评论，非洲出现的一系列尖锐问题联系起来，尤其是以下这些问题：

——民主问题（《国家与发展》，1988；《当代第三世界的民主问题》，1989）。通过对时下流行的韦伯的论点进行批评，我指出，实现民主的困难不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物，而是边缘资本主义的矛盾造成的。

——欧共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南部阿拉伯和非洲地区的欧洲》，1991）。我已经讲过了这一关系在非洲第四世界化上的重要作用。

——非洲的地方性冲突和地区间冲突问题（《和平——非洲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1988）。我建议根据它们在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中以及在帝国主义的战略、苏联战略、地方统治阶级的战略中各自的地位，来分析这个问题。

四、全球体系的危机和群众性的国家选择——脱离

从1970年起我一直关注着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发展。

我不再重复第四章中讲过的内容，而是对它进行一些补充。这些补充都是直接关系到77国集团在重大国际谈判中的集体战略，比如在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中运用的干涉策略。

——关于那些重大的国际谈判，我要提到：《联合国第三次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一次总结》，1972；《联合国第四次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的小结》，1976；《自主发展、集体自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1977；《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关系的未来》，1978。

我已经讲过，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以改变游戏规则，为边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争取一线生机为目的的。立足于与独立自主相反的战略中，它的要求必然会遭到失败。

出于这种思想，我对77国集团在重大国际谈判中，尤其是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中的态度和提案进行了批评。在《阿尔及利亚宪章》（1967）和《利马宣言》（1971）的基础上，77国集团要求北方为他们的工业出口开放市场，要求原材料价格的更为公平，要求建立更为恰当的国际货币体系（指关于国际流动资金的建立和对发展的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技术转让的管理规则，等等。除了对世界系统开放的角度外，这些要求毫无意义，而实际上应该努力脱离这一体系。这些提议遭到拒绝，说明既然对于世界体系的改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想，那么，脱离该体系才是惟一可行的选择。

我还注意到，77国集团关于所谓的“欠发达”国家的分析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这一组“欠发达”国家性质十分的混杂，集合了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极为边缘的国家，以及被资本主义演变弄跨的国家。

——关于经济危机中的北南矛盾和东西冲突，我提到两部作品：《危机——第三世界、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1983；《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是否会呈现出新的局面？》，1989。

在开始讨论关于选择的问题之前，先简单回顾一下我在“发展总结”方面得出的结论。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发展的失败》（1989）有这方面的概括介绍。

关于这个主题的还有以下作品：《危机中的非洲政治经济》，

1979；《从皮尔森报告到勃兰特报告——发展思想的危机》，1980；《万隆会议 30 年》，1985；《民族主义》，1989；《调整或脱离》，1990。

我的结论是，在普遍经济危机爆发前的二十几年中，发展主义的探索是站在世界一体化角度上的，而不是对它进行质疑。因此，这种探索注定很快就衰败了。简单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在两个论点上的论战：一个论点是新殖民化的自由主义（即认为，通过对世界市场的最大限度的开放，世界一体化本身就会带来发展），另一个论点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即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国家的有效干涉可以加快发展，从而该按世界一体化的结构，使之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为它们打开一个“缩小差距”的前景）。这是同一目标下的两个论点，是当时的右派和左派的两个论点。在苏维埃主义的影响下，当时的左派主导思想开始强调把基础工业的发展放在首位（譬如称为“工业化的工业”），把农业和农村世界看做是服务于工业化资金需求的主要储备力量。直到“十大关系”的提出和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些问题才被澄清。一部分左派，包括我，抛弃了苏维埃言论的以一切模棱两可的观点。后来的演变——即“发展主义的失败”——证明了我们的正确。这为“发展主义思想”敲响了丧钟，这种思想在新殖民化的自由主义和苏维埃主义的双重形式下，主宰了在此以前 20 年的历史。

通过不断提出替代方案，我的对于发展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也在不断的完善。对于该主题的综述可参见《脱离》（1985）和《发展主义的失败》（1989）。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我对于替代选择的思考所遵循的方向：

——原则上，我把“脱离”定义为外部关系对于内部发展逻辑的服从，这与边缘地区为了适应资本世界扩张的要求进行的结构性调整正好相反，更确切地讲，这是在价值规律上的对立（参

见：《脱离》，1985；《革命和第三世界》，1990；《不可逆转的脱离》，1992）。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战略的对立证明了我们的观点（《欧洲经验和第三世界的发展》，1988）。“以自己为中心”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意味着一种有效的国家干涉，它要通过一系列合作和脱离的措施，为本国在国际分工上赢得一个有利的位置。

——在发展的社会内容方面，从60年代起，渐渐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论点。在苏联的经历中，“缩小差距”的目标渐渐地抹杀了建立新社会的目标。“脱离”政策也是服务于这个战略的，而该战略却带来了苏维埃主义的资产阶级。演变的加速发展导致了国家再次进入世界体系，放弃“脱离”政策也未能使它免于边缘化。更不必说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再次买办化成了演变惟一的出路。这些国家都渴望建立现代化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但是直到它们真正实现脱离也未能做到。因此我得出结论，脱离战略的效能是由实施它的政权的的社会内容决定的：这种战略只有建立在尽量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欧洲经验和第三世界的发展》，1988）。历史表明“缩小差距”在世界资本主义框架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后来的资产阶级无法想象在世界体系之外的独立存在，而他们也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脱离”只是服务于“另一种发展”的工具，针对于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十分长期的过渡。

——于是，我开始关注关于“过渡”问题的论战的深化，这使从对第三世界（《调整或脱离》，1990）、苏联激进探索的评述、以及对毛泽东主义观点检验为出发点的。在80年代中期，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历史马克思主义，由于低估了世界两极分化导致的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以错误的概念提出了过渡问题（资本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的问题，它是民

族、人民性质的，是建立在脱离基础上，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趋势和追求社会主义的力量之间冲突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人民同盟社会基础的建立问题成为了我关注的焦点。我把民主化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问题也归纳在这一点上（《脱离——人民革命和知识分子》，1988；《人民国家战略和民主化问题》，1989）。以新概念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诠释出现在《喧嚣》（1989）、《发展主义的失败》（1989）、《混乱的帝国》（1991）中。

——对于世界秩序的问题，是从特殊的角度进行讨论的：即它与必要的国家民主与“脱离”战略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范围内，关于为争取建立多中心世界而进行的必要斗争的论点，我已经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了发展：《摆脱危机的左倾路线所需的条件》，1983；《欧洲与阿拉伯关系的政治经济背景》，1984；《共同政府欧洲》，1989；《为了一个多中心世界》，1989；《欧洲和北南关系》，1991。我一直强调对于欧洲政策的批评，在关于非洲和阿拉伯的一体化问题上，它的政策一直是消极的、从未付诸行动的。在一些最新的著作中，我试图归纳入新的、地理战略方面的问题，这种战略帮助了美国霸权新的再次扩张（参见：《混乱的帝国》，1991；《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冒险》，1991）。

——最后，我把建立称为“第三社会主义”前途的目标定义为，对人民国际主义的建设，它要求最先进的国家中向工资霸权的过渡，以及其他国家向人民国家霸权的过渡。这种立场并不能像许多对我的（肤浅的）批评那样，把我归为“第三世界主义者”，但它却揭示了我的国际主义基本立场（普遍主义的）。

本章参考文献（按时间顺序）

1. 《非洲的阶级斗争》，1962
2. 《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1964
3. 《马格里布经济》，1966
4. 《非洲间贸易》，1967
5. 《为了法兰克地区货币体系的治理》，1969
6. 《黑非洲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
7. 《象牙海岸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
8. 《塞内加尔事务》，1969
9. 《现代马格里布》，1970
10. 《刚果经济史 1880~1968》，1970
11. 《封闭的西非》，1971
12. 《安哥拉战争》，1971
13. 《南非》，1971
14. 《绿色革命的局限性》，1971
15. 《联合国第三次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一次总结》，1972
16. 《黑非洲地区的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1972
17. 《法兰克地区和发展》，1972
18. 《非洲统一体》，1972
19. 《人口不足的非洲》，1972
20. 《不平等发展》，1972
21. 《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发展》，1972
22. 《非洲的发展和结构转变》，1972
23. 《几内亚共和国》，1973
24. 《非洲的过渡》，1973
25. 《非洲的粮食短缺》，1973
26. 《西非当代的移民现象》，1974
27. 《南部非洲的前途》，1976
28. 《联合国第四次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的小结》，1976

29. 《阿拉伯国家》，1977
30. 《自主发展、集体自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1977
31. 《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关系的未来》，1978
32. 《阶级与国家》，1979
33. 《危机中的非洲政治经济》，1979
34. 《阿拉伯当代经济》，1980
35. 《从皮尔森报告到勃兰特报告——发展思想的危机》，1980
36. 《服务于农业的工业化发展》，1981
37. 《石油和非洲—阿拉伯关系上的几点诠释》，1981
38. 《伊拉克与叙利亚 1960~1980》，1982
39. 《评世界银行关于南撒哈拉非洲发展的报告》，1982
40. 《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在非洲是否能够实现?》，1982
41. 《从世界角度上看中东冲突》，1983
42. 《危机——第三世界、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1983
43. 《摆脱危机的左倾路线所需的条件》，1983
44. 《埃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1984
45. 《欧洲与阿拉伯关系的政治经济背景》，1984
46. 《万隆会议 30 年》，1985
47. 《世界体系中的地中海地区》，1987
48. 《非洲矿业面临的挑战》，1987
49. 《发展与移民——土耳其面临的问题》，1987
50. 《非洲与阿拉伯的合作》，1988
51. 《阿拉伯与塞内加尔的合作》，1988
52. 《欧洲中心主义》，1988
53. 《国家与发展》，1988
54. 《和平——非洲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1988
55. 《欧洲经验和第三世界》，1988
56. 《农业革命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1988
57. 《面临着南非挑战的南部非洲》，1989
58. 《摩洛哥农业》，1989

59. 《贸易与工业在发展中的作用》，1989
60. 《人民国家战略和民主化问题》，1989
61. 《喧嚣》，1989
62. 《共同政府——欧洲》，1989
63. 《为了多中心的世界》，1989
64. 《民族主义》，1989
65. 《当代第三世界的民主问题》，1989
66. 《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是否会呈现出新的局面？》，1989
67. 《发展主义的失败》，1989
68. 《革命和第三世界》，1990
69. 《调整或脱离》，1990
70. 《非洲农业危机》，1990
71. 《面对着南方的欧洲》，1991
72. 《混乱的帝国》，1992
73. 《不可逆转的分裂》，1992
74. 《阿拉伯世界中的国家、政治和经济》，1992
75. 《北南关系中的地中海农业》，1992
76. 《地中海地区在能量方面遇到的挑战》，1992
77. 《地中海地区和技术革命》，1992
78. 《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冒险》，1992

第七章 体制的危机：三十年间 对苏维埃主义的评述 (1960~1990年)

面对东欧和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转瞬间的彻底崩溃，除了预言家外，恐怕没有人会不感到震惊。然而震惊过后，就应该开始分析一下30多年来建立起的这些体制。就算是有点不谦虚，我也要说明，从1960年起我就加入了属于少数派的左派的行列，并且从大体上预言了1989~1991年间将要发生的这些巨变。当然，我们预见到的这种崩溃，并不是苏维埃体制危机可能导致的惟一结果。我并不相信什么历史上的宿命论，贯穿于整个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由于所涵盖的社会内容的不同，有可能导致各种不同的结果，这就是说，苏维埃政体既有可能走向右倾（就如现实所发生的一样），又有可能走向“左”倾。这第二种可能性虽然已经被历史否定，但是仍然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不仅因为，历史是没有终结的，而且更因为我强烈怀疑现在实施的右倾出路是否能够稳定东方社会。因此，为了实现另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斗争仍会继续。

现在回顾我在这30年的问题上所写的作品，也从中发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历史的演变使我看到的。

首先要提到一些分析、判断和预言，即使这些经常受到各种可能性的影响，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演变的发展。在这30年中，苏维埃体制本身也在变化，并一直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它经历了下列不同的阶段：

——从斯大林去世（1953年），特别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1956年）开始，到赫鲁晓夫的失败（1964年），这个时期的标志是超越斯大林主义的尝试，和苏中之间思想、政治冲突的爆发。

——接着就是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的冰封时期”，它一直延续到戈尔巴乔夫的上台（1985年）。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尝试，从1985年开始进行，后来逐渐衰败，在几年后以苏维埃体制的崩溃告终（1989~1991年）。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寻找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出路。他们的探索相继展开，但却各不相同。毛泽东的探索（1961~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始于1966年）达到了顶点，后来又逐渐转变成了邓小平的经济、政治战略，并成为了整个80年代的特征。

这些相继的演变和发展阶段，也是和当时世界上的各种演变相联系的，比如资本主义的扩张（尤其是欧共体在欧洲的建设发展，美日欧之间的竞争，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式等），又如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平衡问题，和与之相应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于第三世界采取的政策，或与中国之间的冲突，还有美国的冷战战略——最后结束于1980年里根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因此，内部政策和国际政治，在这30年的过程中相互交错，混杂在一起。

当然，苏维埃政体并不是开始于1960年，我们的思考是建立在对1917年革命、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但我们并不是要重新诠释苏联这75年的历史。我们也不想

就1917~1957年这三十年进行长篇大论，这三十年中苏维埃体制的演变是与世界的演变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也不会对战后斯大林时期和第一次冷战阶段的历史大加发挥。

我还要在这里插入一些个人的解释。做为一个埃及人，我曾亲身经历过纳赛尔政权的统治，一点不夸张地说，从1960年起，我就认为纳赛尔政体会逐渐走向萨达特的“对外开放”（始于1971年）所带来的局面：向买办化的倒退。（我也十分担心20世纪上半叶非洲的那些社会主义探索——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加纳）。我的这一判断在当时遭到了绝大多数埃及左派和世界左派的否定，这使我开始欣赏中国共产党1957~1958年起对于苏维埃的批判，这种批判在“25点声明”中明确提出，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了对“社会主义危机”的正确应对观点（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但直到1968年，这些观点才在西方散布开来）。

—

从1960年，甚至从1957年起，我就不再把苏维埃体制当成是社会主义政权或是工人政权，尽管按照著名托洛茨基的说法它只是“被官僚主义扭曲了”。我还把领导“阶级”归纳为资产阶级剥削者。这个阶级（特权阶级）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可以在“西方”找到自己的影子，而它本身也希望模仿西方模式。毛泽东曾在这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说：“你们（也就是指某些中共干部）现在变成了资产阶级。别忘了，资产阶级是不要社会主义的，他们要的是资本主义。”

从这些分析中，我推出了一些结论，是关于在苏联政党和人民阶层对政权的态度。我认为，人民群众阶层显然没有参与到政

权当中（尽管它一直把自己宣传为社会主义），并且把政府当成了他们社会生活中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实际上是“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成了剥削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工具。通过镇压机构的工作（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苏共组织起了群众支持者的网络（通过控制社会利益的分配达到的），这就摧毁了群众起义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样的政党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单一政党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比如在民族主义名义下的纳赛尔党，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叙利亚社会党，以及在马里、几内亚、加纳、坦桑尼亚的一系列当过权的政党，如果抛开民族主义的名义不谈，那还包括一些公开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如在象牙海岸等地的政党）。由于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建立它的思想霸权（马克思在谈论成熟的资本主义时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因此，也就还不能以合法政权的身份出现，尽管他们已经在行使政权（这就要求要使全社会的思想同统治阶级的思想相一致）。

这种政权的形式，通过煽动收买政策拆散了群众阶级，产生“使其非政治化”的结果，它引起的破坏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证明，在苏联的这种非政治化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人民认为他们要摆脱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因此天真地相信资本主义会更好。

当它们的领导人丢掉了国家政权，所有这种模式的政党就像纸搭的建筑一样纷纷崩溃：没有人想冒生命危险去保卫这样一台机器。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政党内部的高层斗争，总是像宫廷政变一样，没有基层人员的参与，而基层人员也必然会接受得胜者的裁决。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联盟”从纳赛尔主义到萨达特主义的突然转变，以及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中其他相同性质政党的自然消失，我都不感到惊讶。对于1989年起无数的苏联共产党员所

表现出的消极态度，我就更不感到奇怪了。

我认为苏维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难以给予它积极的评价。让我回过头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它没有实施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我看来，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废除私有财产，它还涉及怎样定义靠工薪生活的劳动者的地位，涉及社会关系是否保证社会可以控制社会变化，而社会变化又涉及是否能建立优于一切资本主义民主的民主。苏维埃社会的任何一方面都和工业资产阶级社会相似，而当它解体的时候，情况更加恶化，它的专制统治越来越像边缘资本主义地区的统治模式。

但是，我也反对把苏联归纳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它的统治阶级在我眼里是资产阶级的。我的依据是，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所有权的划分——竞争的资金，而资本所有权的国家集中制则要求不同的资本积累模式。而且，在政治方面，无论是从参加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性质，还是从革命领导力量的思想、路线的性质来说，1917年的革命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是绝不能忽略的。

我不认为对于该体制的积极评价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我连续用了许多表达方式来评价该体制，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认为这些表达都很模棱两可），再到最后采取的一种比较中性的表达方法，即“苏联生产模式”。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该体制的起源、形成、演变和未来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对1917年的革命感到后悔（有些人认为“不应该进行这次革命，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应该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因为，我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而边缘地区的人民群众就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因而也就必然会奋起反抗。在革命中，人们只能依靠人民群众，而且，如果把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就等于是对人民群众的背叛，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建

立的边缘资本主义，不可能为造成革命的各种问题找到人民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开启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而它的结局是非常不确定的：它的演变动力会把它引向资本主义，它同时也可以在自己的社会内或在世界范围内，把发展推向社会主义方向。从这个角度上看，重要的是分析人们在朝哪个客观方向迈进。以下就是关于苏联演变的两种我认为十分重要、而且十分赞同的观点：

——1930年斯大林实行的集体化打破了源于1917年的工农联盟，而且通过加强国家机器的专制统治，打开了新阶级形成的道路——苏联国家资产阶级。

——由于本身的一些历史局限性，列宁主义（不自觉的）导致了最后的致命抉择。列宁主义并没有彻底地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决裂（也就是没完全脱离西方工人运动）：其中例如，它关于技术的社会中立性的概念就证明了这点。

过渡阶段的社会面对着互相矛盾的需求：一方面，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差距”，也就是说要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方向上“建立另一种社会”，即建立脱离于经济异化的社会，这种社会放弃了“两种财富来源”：人（即劳动力）和自然（被当成人类用之不竭的东西）。列宁的经济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有这样的选择：即使“缩小差距”的目标渐渐胜过建立新社会的目标。

我从1958年就开始支持毛泽东主义，后来从1966年起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来自于上述这种分析：列宁主义没有完全与西方经济主义脱离（列宁自己对于科特斯基在1914年的叛变也很吃惊）。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建立起了向马克思主义回归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以前已经被西方工人运动（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后来的列宁主义所歪曲。

毛泽东从左派的角度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批判，而赫鲁晓夫则是从右派角度进行这一批判的。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主义没有对经济约束（技术和科技革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政治要求（给企业领导者，也就是苏维埃资产阶级，更多的权力）做出足够的让步。它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迅速地缩小差距。毛泽东认为：在每一阶段的发展中，都不应忘记最终的目标。这也就是“把政治放在支配地位”（这跟唯意志论毫无关系，不能轻易地这样指责它）。为了忘记最终的目标，毛泽东主义注重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苏联在1930年时的重大问题），加强（而不是打破）他们之间的联盟。我用“实行什么价值规律”来解释这个目标：是要屈服于世界化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因而接受边缘资本主义发展），幻想着能够建立自主、独立于世界系统的民族经济，但这种经济却同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相似（“价值规律支配着苏维埃国家干涉主义的生产模式”），并通过这些建立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苏维埃主义的），还是要以“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价值规律”为基础，建立人民群众阶层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坚信，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权层次上解决：这就对共产党垄断和新资产阶级的形成提出了质疑。也就是从这里发展出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这句毛泽东的口号：“炮打司令部”。毛泽东认为这是加强劳动人民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和赶走官僚主义的惟一方法。（他错了吗？）他没有想到对市场规律的让步重大问题也能加强人民的这种社会权力（即让企业领导者有更多的权力，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苏联新经济政策就做出了这种让步，并在当时取得了成功。现在要这样做就需要比以前更大的勇气。但是，主要应该做到：

——对市场规律让步的同时，发展政治的民主化；

——在这种民主中增强劳动者的实际权力，同时牺牲“以技术治国的”资产阶级的权力；

——以建立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坚定的国家政策来管理市场。

南斯拉夫曾经试图做到这些要求，但是非常失败：对外开放过大；做出的让步过大，等于以竞争的名义加大了各个共和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趋势；权力的过度下放把一个个自主管理的集体放在了相互竞争的位置。在苏联和中国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除了毛泽东时期的一些计划打算，但这些计划后来也被放弃了。我一直认为毛泽东主义是正确的，尽管中国后来的演变似乎与它背道而驰。事实上这种演变也没有驳斥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反而证明了它的正确：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巩固了资产阶级，削弱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现在，站在一定历史距离上，我们应该再次发起关于毛泽东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讨论，就像人们以前对列宁（与经济主义的不完全脱离）、甚至是对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本身所固有的两极分化现象）的讨论。

我认为，“苏联生产模式”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这是过渡性的、不稳定的解决方式（它会走向资本主义，也会走向社会主义），还是稳定的、新的、勾画出另一种社会蓝图的解决方式（一般都是资本主义的）。

在这一点上，我要自我检讨。在1975~1985年间，我曾一度认为苏联模式是稳定的、甚至是前卫的形式，会从中产生资本主义趋势，通过把资本集中化的手段，使私人垄断转化为国家垄断。在那个时期，有一些这样的迹象。我指的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表面上的稳定。我在这里既参考了前人的理论（布克哈利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又借鉴了当代的一些观点：简·延伯根提出的“世界体系的缩小”，不仅把苏联拉向西方，还使西方也向苏联靠近，这是社会民主党派的立场（譬如在瑞典的工会赎买企业计划）；还有欧洲的共产主义等。资本的国家集中制通过取消了竞争——造成了市场的不透明（垄断控制的价格和国家计

划委员会控制的价格之间的接近，就是它的开始)，开始了向思想统治的一种回归。这种思想并不是向君主制时期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回归，但是一种“商品取胜”思想。在奥威尔的《1984》中（这是对我在当时提出的观点的一种平反），对于西方声称的自由、民主社会的一致性的分析，使我想起了读过的波拉尼的书。“国家模式——资本主义的最高模式”——为什么不呢？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苏维埃模式还有许多很原始的地方（啊！为了创造观念的坚定统一，斯大林本应梦想有 C.N.N. 这样的电视台——在海湾战争中大放异彩，而不是俄国《真理报》这样的东西），但它勾勒出了未来的蓝图（可悲的）。我要补充一点，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并不是以被压迫者的胜利告终的，而是导致资产阶级坐收渔利，地位上升。那为什么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不是在为“新的阶级”服务呢？

事实证明我是错的。不仅苏维埃政体被证明是不稳定的，而且世界右派从 1980 年起的反攻也与稳定的道路截然相反：推翻原有规则和恢复私有化就是他们反攻的主题，这些进行得都十分顺利。

为了更具体的阐述，我再次进行自我反省。我认为苏维埃模式根本没有能力充当决定性的政策抉择，而它又渐渐地被其他人所效仿。事实证明这些都不对。这是由它本身的弱点决定的。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在发达世界中，在自由主义空想的浪潮过去后，人们向苏联本应体现的这种古老的模式演变。

我的观点是接近现阶段的、以过渡阶段的不稳定性为中心的，苏联模式是这个已经结束的历史周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对“社会主义阶段”的定义和修饰与其说是有用的，不如说是迷惑人的。还可以把它形容为初级原始的。在我看来，苏维埃政体彻底瓦解之前的最后几年，是这种过渡的特征最为丰富的时刻。它强调该阶段目标与资本扩张规律的矛盾，以及人民集团内容的矛

盾。因此，把漫长的过渡时期分析为不稳定的时期。它可以走向资本主义（就像苏联一样）。但它也可能向其他方向发展。

对于已经结束的苏维埃周期的总结。这种总结并不是完全积极的，也不是完全消极的。苏联、中国和东欧一些小国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现代经济，这是任何边缘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做到的。原因在于，苏维埃资产阶级是由民族群众革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然而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缝隙中产生的，是买办性质的。同样，这种性质含糊的革命所创造的社会，赋予了劳动者许多社会权力（劳动权、社会福利等），而这些甚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都不能看到（在中心地区，劳动者通过激烈的斗争，在1918年甚至是1945年后才赢得这些权力），更不用说原始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区了。

但是，现在苏联公开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东欧重又使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边缘化，这是由于国家干涉主义独裁而变得盲目的人民群众所始料未及的。曾经低估了“非政治化”的危害，今天的人民和统治阶层应该有能力通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控制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这正是统治者所希望的。我曾经认为，人民群众阶层又可能引导社会演变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渴望（不仅是社会权力，还有对国家和企业管理的更积极的参与）与市场需求（它尤其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愿望，但又不仅限于此）之间的更好的平衡，这有可能引起世界范围内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我要自我批评，因为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排除，而且右倾的、向野蛮的资本主义的演变已经成为了定局。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当两极分化的结果出现时，当劳动者发现他们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并不是过渡时期的暂时现象，而是不会改变的事实时，我的观点还是错的么？

苏维埃体制的严重危机，在导致苏联的解体前，就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我从劳动者的社会斗争的角度上（幸亏有了劳动

权，企业领导者没有了西方那样的权力）来分析这种危机，一次次的失败表明，它难以也没有能力从粗放型积累上升到集约型积累。也就是说建立起第一阶段，并完成了粗放型积累的社会和解已经开始衰落（在粗放型积累的背后，就是一种“人民群众的现代化”：群众教育，强劲的社会能动性等等。托格里亚第和后来的伯凌格也做出过这样的分析。这就需要进一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左”倾批判，或者进行“右”倾演变，向资本主义、“精英制现代化”和第三世界发展和靠拢。资产阶级选择了后者：市场和私有化。（市场是为了使人民群众在失业的威胁下进行劳动——这种表述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私有化是，通过巩固社会能动性所给予的广阔出路，稳定资产阶级——这种要求直到苏维埃体制的最后几年才被意识到。）

我一直认为，不应该把这种“苏维埃模式”的特殊危机混淆于资本主义危机，造成这两种危机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我还一直反对以资本主义媒体所普及的宣传来分析该体制，而且现在依然反对。

——“贫困经济”（社会主义地区的）与“富裕经济”（资本主义地区的）间的对比形成了思想言论上的空洞。当然，贫穷匮乏现象是由价格的固定（自愿进行的价格固定）引起的，但它也满足了更多的消费需要，是对人民阶层和中产阶级施加的平均主义压力的让步。当然，提高了价格以后，就不会有排队购物的现象，物质匮乏现象虽然在表面上消失了，但实际上对于那些得不到消费品的人来说，物质匮乏仍然存在。墨西哥和埃及的商店里堆满了商品，肉店前没有等待购买的长队，尽管当时这些地方的人均肉食消费远远低于东欧。然而，这个幼稚的观点，在世界银行推动下，促成了匈牙利人科尔奈的发迹。

——美国大学教育界提出了一种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相对立的“指令经济”的时髦观点，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思想的简单

化。苏维埃经济是以市场调节（这种调节是按国家事先安排的计划进行的，不论计划是对是错）和行政指令（特别是通过投资）的结合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把市场看得过为理想化，其实，市场的自我调节永远无法超越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的限制。真正的问题在于：积累的原动力来自于资本的国家集中制，这不同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动力。后者并不像理论上那样由市场规律所决定，而是由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决定的。

——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从 1935 年开始，经济机构就屈服于军事部门的优势地位以及它所提出的要求。这是不是意味着苏维埃体制是一种军事政权，它是不是致力于一种暴风雨似的对外扩张？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必然的简单化思想，根据这种思想，资本主义本身就一直是一个“战争因素”。军费开支是社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纳为生产模式，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全球、国内和国际的结构和局势。从这个角度上看，军备竞赛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施加给苏联的，他们同时也一手策划了冷战政策。

——那些矫情的大学专家和那些被媒体所愚弄的人的言论就更不可靠了（西方媒体把苏维埃体制看做“罪恶的国度”——这种措辞是一位美国总统曾经使用过的，人们一直避免把这种说法与卢霍拉·霍梅尼的言论相提并论，但实际上这两者是一致的）。他们曾经声称，苏维埃社会是萎靡不振的，而且永远走不出专制统治的牢笼。

我从 60 年代中期起，就对苏维埃改良主义者的提议进行了批判。我认为这种尝试是想以右倾路线超越斯大林主义的僵局，而不是从“左”倾路线出发。

这种提议揭示了一种“建立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空想。新西伯利亚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戈尔巴乔夫，并且发展了沃尔拉斯的理论：它想象出了一个完全、纯粹的自我调节的

市场，这个市场并不要求财产的私有化，而是要求财产完全的集中为国有，并且增加个人购买生产资料的阻力，即使这些个人有自由出卖它们的劳动，或是成为生产组织者（即企业主）。这是一种古老的圣西门式的科学管理社会的梦想，这种梦想也曾经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所用（恩格斯是第一个设想“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人），它的局限性体现了所有资本主义思想中经济的异化，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在试图证明这是一种不现实的空想。

以上这种哲学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改良主义思想的核心，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有所淡化。历史证明这种观念是没有理论基础的，它向右倾方向的偏移还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苏维埃资产阶级转变为一般的资产阶级，即私有财产的拥有者。

这种尝试表明“1989～1991年的革命”是高层的革命，领导阶层的革命，而不是基层的革命，人民的革命。我在1971年的“萨达特反革命行动”中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它其实并不是一种反革命的行为，而是对纳赛尔时期发展缓慢的社会演变进行加速。西方媒体竭力把东方的革命美化作为一种为自由进行的革命，但却尽量避免提及民主化的弱点，以为这种民主化极有可能成为向野蛮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工具，就像我们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历史经验中看到的那样，这种资本主义必然是专制的、独裁的。我认为这些革命配不上那么高的评价，这种体制的超越是由左派进行的，而且只是加速了体制的自然演变。

戈尔巴乔夫以为能够控制改革的发展，没有想到会被它所代表的人民阶层所推翻——就像叶利钦说的那样，戈尔巴乔夫丝毫也没有想到，苏联共产党在向群众阶层传达政令计划方面，是多么的无能。苏维埃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成为了明日的资产阶级，它们直接把生产资料占为己有，直接以私有化为名义，而不用再通过国家集体所有制的渠道。这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而是

一种政治上的颠覆，它的规模之大要求领导阶层进行彻底的转变（这就是在萨达特的“反革命”行动中出现的状况）。因此也就很难避免出现以下一系列状况：一个新的富有的冒险者阶层的出现（苏联的黑手党与埃及所谓的资产阶级寄生虫很相似），旧的特权阶层戏剧性的分裂，以及对前苏联人民愿望的操纵。这一切显然对西方列强十分有利，它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以对该地区进行经济援助为名义），把苏联的边界推回到16世纪时的莫斯科维地区，并以此摧毁了这个国家未来在世界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的一切希望。

我在这里也要进行自我反省。我曾经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认为苏维埃体制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即使这是一次右派的改革，它在民主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能使群众把改革的演变拉回到“左”倾的轨道上来。我低估了非政治化带来的破坏。从群众层面上讲，非政治化使劳动者阶层变得脆弱，没有能力积极地利用民主化来为自己服务，也无法对这些改革的规划进行反抗。从统治阶级层面上讲，非政治化带来的影响也是同样严重的。统治阶层因此而分裂（分裂成为“保守派”、“戈尔巴乔夫派”、“右倾民主派”等），使这种上层进行的改革成为了泡影。我当时认为强大的民族主义起到了围栏一样的保护作用，这恐怕是低估了那些不惜一切代价，力图尽快暴富的野心家的贪婪，同时也高估了群众阶层的苏维埃爱国者。事实上，群众阶层完全不在乎它们的国家跻身于什么行列。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对爱国主义的抛弃是有合理性的，它从长远角度上保证了社会规划的再次实施。但是从短期角度上讲，这种对爱国主义的抛弃也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外部敌对势力极有能利用这个机会把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边缘化，把它们变为西欧（特别是德国）的另一个“拉丁美洲”。

二

对于苏联，以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来说，对外政策的选择都是社会内部的要求决定的。有的人认为苏联在本质上具有侵略性，但是却在一直寻求和平——我一直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相反的，我一直认为应该具体研究一下苏联、中国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地区（美国、日本、欧共体）中有可能实行的内外政策，并且通过这种分析，推出世界体系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和方向。这对于所有的政权都十分重要，无论是苏维埃政权，还是其他的什么。

当然，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种现实主义的分析结果必然是正确的。由于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它又能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一种错误的推论。我一会儿将举一些例子，当然也包括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批评。

对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分析——以及世界范围内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角度上对它进行的评价，应该参考它当时所在的历史阶段的特性。

直到 60 年代，苏维埃体制都处于相对的孤立境地和防御地位。即使站在一定历史距离上看，这个判断也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我曾发表过一些观点，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

——西方列强，无论是法西斯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从 1917 年起都从未放弃过对苏联的攻击，然而，尽管他们在 1945 年的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却在战争中被拖得筋疲力尽，而且受到了来自于美国核垄断的威胁。在这种局势下，雅尔塔协议并没有形成战胜国帝国主义之间对世界的瓜分，而是为苏联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

——向中国、越南或古巴一样，苏联从来没有打算要对外输

出它们的革命，反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非常谨慎的外交政策，出于优先权的考虑保护自己的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革命都是与它们的“老大哥”的意愿相违背的：中国革命就违背了莫斯科的意见，越南和古巴的革命也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我没有对这个现象感到吃惊，而且是希望能明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过我一直不相信后来的革命会屈服于苏联的意志行事。我认为后来的革命都应该是不同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那些取得胜利的革命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国，越南，古巴，柬埔寨，尼加拉瓜）。

——冷战路线是美国从1947年开始采取的战略。苏联严格遵循着雅尔塔协议的划分（它对希腊革命的态度就是证明），也从没有计划要吞并西欧。关于苏联好战主义的言论，纯粹是北约组织的宣传。日丹诺夫主义（即认为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就是典型的防御战略。从1945年大西洋集团开始孤立苏联，1949年开始孤立中国，它也从未放弃过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殖民战争，对以色列的侵略战争等）。

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开始，苏联和中国走出了他们的孤立处境，并意识到它们可以从对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支持中获得的利益（即使是非常有限的）。我从未指责过它们的这种支持，因为这毕竟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们一直试图实现与大西洋集团的和平共处，所以我也不对它们的支持有更多的指望。

同时，苏联的军事影响（即使是从1970年才开始的）也带来了一种威慑力量的平衡。从这时起，苏联成为了一个超级强国，因此，人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1989~1991年苏联的解体之前，整个80年代是以世界的两极化为标志的。但是，这两极是不对称的，因为苏联的强大只是体现在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它还不具有与西方帝国主义竞

争的能力。

另外，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幕僚在行动方面也是不平衡的。美国，以及在它背后的日本、欧洲，采取了目的明确的外交政策：即确保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这是原料来源、市场和军事基础的保障）。通过这一共同战略，美国建立起了它的霸权，之后不久，当它在这一同盟中的经济优势开始逐渐丧失时，它又利用这一战略力图维持正在衰落的霸权（海湾战争就是这一战略最近期的体现）。

而苏联在雅尔塔边界之外进行干涉的目的，则比较难以定义。

我认为，苏联的主要目的在于松开西方左右夹击的铁钳，甚至到最后，把欧洲和美国分裂开来，从而打破大西洋联盟。实现这一目的的绝佳的方式，就是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支持激进的民主主义政府（如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等）。苏联通过提醒欧洲自己的弱点（譬如在石油供给上对欧洲的威胁），怂恿欧洲离开美国，与它进行谈判。然而，它的战略目的并不是要削弱欧洲，而后对其吞并，而是要创造与欧洲积极的和平共处，以此支持苏联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也是右倾的）。戴高乐是欧洲惟一的理解（并接受）这种意图的人。因此，苏联的这一战略遭到了失败，无论是赫鲁晓夫的友好政策，还是勃列日涅夫的强硬政策，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然后就是戈尔巴乔夫面临的窘境，再后来的叶利钦也没有使欧洲失望，最大限度地削弱了苏联的力量，并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

从这方面说，苏联对于第三世界人民及其解放运动的支持显然是有限的。我一直是支持和接受苏联的这种援助的，但是却从来不同它在理论上的正当性（就像我从不赞同它的非资本主义理论一样），因为它对于第三世界的进步力量来讲起到了消极作

用。当然，我也因此遭到了莫斯科科学院的谄媚者，以及非洲、中东、古巴和越南的苏联的无条件支持者的诽谤和攻击。

在我看来，苏联的干涉并没有表现出要“输出革命”和施加统治的侵略意图，这更像是由于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战略，尽管后来运用核威慑赢得了相同的地位。

它的干涉行动有时还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上升的表现。关于“社会帝国主义”的论战就是这样产生的——“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人在1963年创造的一个词。这里涉及苏维埃资产阶级和它的人民之间的社会妥协问题（“修正主义的妥协”），这与西方的社会民主妥协十分相似——这种妥协使对外的扩张成为可能（就像帝国主义一直支持的殖民扩张一样）。这个概念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苏维埃资产阶级在它有能力的时候，是否想实施这种扩张。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明确的。

确实有一些明显的迹象表明，苏联政府的一部分人曾经在某一时刻想过要走上这条扩张的道路。在60年代中，确实有一个针对中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实施，并公开以在苏联、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瓜分中国为目标（中国学家于果·路易斯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清楚的论述）。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没有必要为我在那时所写的论述，以及对“社会帝国主义”设想的支持进行什么反省。但是，几年后，莫斯科退缩了。

勃列日涅夫政权在表面上仍然十分强大，大部分反社会主义的分析也是这么评价它的。然而我却对它外在的强大产生了怀疑，它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就证明了我的猜想。我当时担心这个政权可能已经开始衰落了（对阿富汗侵略的失败也证明了这种危险），它的力量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军事上的强大，然而，它也丝毫没有打算用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说服整个世界。苏联的让步证

明了它在经济上的困难，而右派试图克服这种困难所进行的尝试收效也不大。

1970~1990年间，各门各派都做了许多分析，它们对世界体系演变的可能性做出了不同的预测，它们之中总是有一些局限性和危险性的。然而其中有一种分析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解释了在一般的分析中混淆不清的问题，那些分析从未致力于推理的严谨性。

我不想再回顾在那个时期中参加的论战了。其中有一些在今天看来绝对过时了。譬如，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地位会更加巩固，并从美国的衰落中获利，实现内部的“修正主义妥协”，并通过类似的妥协建立起欧洲的左派势力。这在今天看起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除非是把它当做一个锻炼思维的游戏。在一段时间内，我对这种观点十分感兴趣。我也要在这方面进行反省，因为我低估了苏维埃体制的缺点和高估了欧洲的左派。

与此相反，关于各种国际同盟（巴黎-波恩-莫斯科轴心，华盛顿-东京-北京轴心，等）重组问题的论战，以及对于各种力量重组方案的讨论（欧洲的大西洋同盟，美欧之间分歧的加深，欧洲的“左”倾演变），则仍具现实意义。各种论点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即使暂时的局势演变会证明或是否定不同论点的正确性。有4个系列的问题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仍然如此：

——东方在世界体系内的团结，是否能成为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五年了，现在则变得更加紧迫，尽管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至少在短期内，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重建世界市场的计划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其中不包括苏联在进入这个市场后，是会成为新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还是会

成为工业化边缘地区的问题)在5年前就已经提出,但现在仍有意义。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不是一种空想(参见我在《混乱的帝国》中的分析)。

——社会斗争在不同国家内的削弱,有利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现实的和潜在的),这会不会使国家和民族成为像阶级一样的活跃的历史主题?这里我们看到了60年代论战的影子,那场论战始于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论点。我不想再重复我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观点,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不正确的。我在关于混乱的论文中又提及了这个问题,从而在当代条件下对它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现在的演变是否会建立一个欧亚集团,就像戴高乐和戈尔巴乔夫的计划那样?或者,欧洲只有愿望没有行动的政治特点,内部的矛盾,大西洋同盟地位,以及它向莫斯科—华盛顿的靠拢,是否能为美国“消除噩梦”呢?我想,在近期内,美国霸权的最后一丝力量还是超过了欧洲的力量,并且暂时顺利发展。在这里,可参见《混乱的帝国》和《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学》。

三

苏联的解体(即使早已被预料到)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事件。所有关于未来的推理和猜测都因此而需要重新进行。我建议读者在这个问题上参考《混乱的帝国》和《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学》这两部作品。

苏联的解体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呢?西方媒体竭力把这次解体渲染成为历史的终结,把它称为捍卫资本主义思想永存的胜利。我认为,虽然苏维埃时期已告一段落,但上面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

“社会主义Ⅰ”在19世纪建立，由于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党公开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同谋，于1914年宣告结束。列宁那时说“社会主义Ⅰ”已经死了。

继它之后就是“社会主义Ⅱ”，今天第三国际和列宁主义领导的“社会主义Ⅱ”在经历了漫长的艰难困苦后，也“死了”。从1963年起我就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应该与列宁在1914年建立的激进的苏维埃主义决裂。不过今天看来苏联政权公开与资本主义联盟，并加入到“反第三世界”的行列中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反第三世界”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可这意味着对75%的人类的反对。

儿子的死不能使父亲复活。孙子就要继续进行他的祖先没有完成的事业。未来的“社会主义Ⅲ”万岁！

“社会主义Ⅲ”的指导路线是否已经形成了呢？我认为是的。从这30年来对苏维埃体制和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双重批判中，我总结出了3条经验教训：

——要把“建立另一个社会”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不惜代价地缩小差距”放在首位；

——相信世界两极分化和“脱离”都是不可逆转的；

——进行系统的行动，重建多极化世界，为各国人民敞开自治发展的空间。

这三个条件需要全球人民的国际主义的复苏，它能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并打开一种社会主义的前景。这种前景虽然遥远，但有可能是世界性的——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正面临着退化和衰败的威胁。

通过对漫长的社会主义历史的思考，在摆脱了“改革或革命”的繁琐讨论后，我在十几年前就建议展开一场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讨论。我认为这种过渡有两种形式：一种涉及能够解释新社会规划的需求的、一种思想上的觉悟（这其实

就是当初向资本主义过渡时的道路，我认为它是革命性的——它的胜利也有可能是继承了进步、和谐的改革的成果)；另一种形式则不涉及任何思想觉悟问题，客观的约束自然会为它开辟出一条道路(我把它归纳为一种衰落，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旧制度瓦解后的无政府状态，这在欧洲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中就曾出现过)。

现代世界面临着下面这样一个类似的情况：罗马帝国对于贡品的集中成为了野蛮民族进步的障碍，发展要求这种集中制的崩溃，这就是封建主义所代表的要求。而在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实现的、新的剩余价值的集中，而在今天这种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集中又成为了四分之三的人口发展进步的障碍。超越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统一的世界体系的重建就必然要经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集中制的瓦解(就是“脱离”)。

人类是否能控制这种过渡呢？只有“社会主义Ⅲ”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彻底的复兴才能实现这种控制。如果没有“社会主义Ⅲ”运动的复兴，客观约束只能通过漫长的社会退化，通过不断出现的暴力冲突——也就是野蛮行为，才能开辟出一条道路。现在，我们拥有的武器力量可以摧毁整个地球，我们的媒体可以以惊人的效果愚弄所有的群众，我们在短期内的利己主义——即反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威胁了地球未来的生态环境，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野蛮会导致致命的后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认清的是：我们面对的选择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的问题。

本章参考文献

我在这部分研究中所回顾的观点，在下列我以前写的文章中都有所论述(括号中的是出版时使用的笔名)。

1. 《埃及将走向何方》，1955（萨伊德·埃尔·马斯里）
2. 《纳赛尔主义》，1960（萨伊德·埃尔·马斯里）
3. 《埃及社会的三个时期》，1962~1963（阿森·利雅德）
4. 《埃及：军人社会和国家资本主义》，1970（阿森·利雅德）
5. 《非洲的阶级斗争》，1963（匿名）
6. 《文化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70（皮埃尔·阿蒙）
7. 《文化革命和中心与边缘的辩证关系》，1971（皮埃尔·阿蒙）
8. 《结构危机》，1974
9. 《社会主义颂》，1974
10. 《马克思主义，回顾和展望》，1974
11. 《这是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
12. 《关于批评》，1976
13. 《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1977
14. 《1945年后的马克思主义》，1977
15. 《不要期待1984年》，1978
16. 《对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思考》，1979
17. 《革命或倒退》，1980
18. 《关于欧洲共产主义》，1980
19. 《对于当代世界分析方法的一些思考》，1980
20. 《左派走出危机的出路》，1983
21. 《经济危机，第三世界，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1983
22. 《非洲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1983
23. 《毛泽东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1984
24. 《世界体系的危机，战争还是和平？》，1985
25. 《脱离概念的注释》，1985
26. 《21世纪之初社会主义的前景》，1985
27. 《国家与发展》，1987
28. 《30年后世界范围内的积累》，1987
29. 《和平、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发展》，1987

30. 《欧洲与北南关系》，1989
31. 《欧洲共同机构》，1989
32. 《为了一个多中心世界》，1989
33. 《第三世界和革命》，1990

这些观点在我创作的一些主要书籍中也有所论述：

1. 《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pp.246~248（新版本中）
2. 《不平等发展》，1973，p.303~308，325~329
3. 《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p.7~23
4. 《帝国主义和非洲的不发达状态》，1976，pp.561~578（新版本）
5. 《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7，pp.95~112
6. 《阶级和国家》，1979，pp.145~146，150~151，192~196，201~217，223~245
7. 《毛泽东主义的未来》，1981，pp.122，127，132~137，141~143，147~148
8. 《危机，什么危机》，1982，pp.198~228
9. 《脱离》，1985，pp.41~49，93~97，136，179~194，342~255，264~280
10. 《喧嚣》，1991，pp.109~110，135
11. 《发展主义的失败》，1991，pp.210~212，218~219，289~302，361~367
12. 《混乱的帝国》，1991
13. 《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1992

第八章 体制的危机：资本主义 调节机制的崩溃

—

像所有现行制度一样，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整体矛盾基础上的。在贯穿它存在历史的每个时刻，资本主义都在克服这些矛盾，但并没有消除它们。社会力量、机制和机构的形成使它克服了其中一些矛盾，在某个特殊地方、某段特别时间建立起了人们称为资本主义调节模式的东西。

在人们认识到体制有克服矛盾的能力后，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就是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种能力。对于希望资本主义体制获得胜利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它对于制定反资本主义的战略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识别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在研究以前就认定，体制所体现的矛盾的结构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于调节系统经历的不同质的阶段做出定位，也是很重要的。调节理论当然对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指出了福特模式资本主

义^①的特殊性。然而，这种贡献在我看来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为这个理论像是在用放大镜来仔细研究“福特模式”资本主义，却没有看到落在放大镜以外的区域和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理论只是聚焦于资本主义发达的中心地区，而却忘记了现行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中心地区本身不能构成未来世界的全貌，而且只有把它们放在与整个世界体系的关系中，才能真正地了解它们。

在这里，我提倡大家重新回顾一下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扩张的各个阶段，并把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实行过的各种不同的调节办法列举出来。

这项工作能使我们更好地分清“什么是已经调节好的，什么是还未经调节的”，也就是说，通过把这些矛盾定位于不同的层次（国家层次、世界层次），来区别哪些具体矛盾被已经克服了，哪些还没有。我还要指出的是，某些矛盾被调节系统缓解后，它的冲突就转移到了其他矛盾上，从而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这种观察肯定对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战略十分重要。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由一个本质的矛盾决定的，这就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给这两个概念做了精确的定义：劳动就是自由个人的劳动，他们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资本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它使社会中某个特殊的阶级（资产阶级）得以把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占为己有，而生产资料是现代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平庸的时代，对于这两个概念的模糊认识经常导致人们把资本与财富、资本积累和货币积累、资本主义和交换的概念混为一谈，抹杀了资本主义生

^① 在以下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调节理论的总体论述：罗伯特·布瓦耶，《调节理论》，发现出版社，1986。

产模式带来的质变的意义^①。

我并不是说这就是体制惟一的本质矛盾，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矛盾，通过它可以理解导致演变和变化的原动力和它所表现的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主要矛盾使这种生产模式成为了一个体系，从中产生了永恒的过剩生产趋势和一个在工业革命前的人类历史上都未出现过的新现象。

对于这种现实的解释很容易建立起来^②。马克思把这种扩大了再生产模式归纳为两个产业部门，在这种模式中，剩余价值的实现要求实际工资在每个阶段按照比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调节：因为工资总是处于低于应有的工资水平的趋势。资本主义体制自身永远处于过剩生产或是消费不足的趋势中，这两个词其实说的是同一种现象：即相对于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工资收入的不足。

与为资本主义歌功颂德的言论相反，制造麻烦的并不是经济的停滞，而是资本主义体制实现的惊人的增长，尽管它一直面临着停滞的趋势。在这方面，我写了一篇关于昆塔契耶夫“长周期”理论的文章^③，我赞同巴朗和斯维兹的分析，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生产的每次飞跃都是与重大的技术革新和以开拓市场为目的政策演变相对应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铁路的建设，电的使用，战后经济重建和冷战政策，以及对东方的再次征服和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的革命。

在发达的中心地区，生产停滞的趋势导致了第三产业的发

① S.阿明，《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社会科学与社会出版社，蒙特利尔，1992年10月。

② 我对这个问题的首次论述可以追溯到我的博士论文（巴黎，1957），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和《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中也有论述。

③ 《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

展，它吸收了过剩生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事实上，如果没有世界大战和冷战带来的巨大的军事开支和消费，美国永远也无法摆脱 1930 年的经济危机。

然而，这种政治的调节只限于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范围内，不难发现调节作用的缺乏，这是由积累规律（或者说是贫困规律）影响的扩展体现出来的。由于低估了世界两极分化的现象，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在组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亚体系中，这种工资增长的调节规律也同样起作用。然而事实上，中心地区内的收入分配正在趋向稳定的同时，在边缘地区，社会的不平等却在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加剧。

二

从工业革命到一战后初期（1800~1920 年），是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大机器工业”时代。在这段时期内，资本主义体系在横向（即劳动生产力的进步）和纵向（地理上的扩展）上不断扩张发展，这说明它克服了各种矛盾，而且可以成为调节研究中的一个主题。

通过下面对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一阶段表面特征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认清什么是已经调解了的矛盾，什么还没有进行调解，也就是说，有哪些矛盾得到了缓解，哪些变得更加严重：

——这一时期是民族的、工业的、自主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建立过程，其中也离不开新型的民族资本主义管家的积极有利的干涉。

——这种民族经济体制的特征表现为：一批中小型机械工业企业开始发展（超越了手工生产方式），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削弱了原有的手工业者，由于资产阶级的致富和新兴工人阶级的

扩大，打开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农业和众多服务业（旅店、私人服务等）的现代化程度较低，表现为商业化生产中的非资本主义化或资本主义程度较低，并且受地主的控制（农民或是贵族，城市居民），或者表现为简单的小型商业化生产：市场上分散的储蓄和现金，在地方范围内由私人化网络（小型银行，公证人等）集中了起来，为企业主服务，国家市场在以下三个方面更加统一和一体化：新兴工业产品和过量农业产品的市场，资本市场（通过地方网络的相互联系建立起来），工业劳动力市场（通过城市化和农村地区的移民实现的）。

——在社会方面，资本主义体制是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这个阶级源于工业企业主、金融家以及农村和城市的不动产业主。这种生产中的劳动依赖于具备一定技术的工人阶级，他们精通生产各个过程的组织工作（这些技术工人主要来自于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接近于工程师的地位，在当时所达到的技术发展阶段中人数还不很多）。那些不具备技术的一般工人阶层负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主要由赤贫化的农民和农村中被驱逐出的人组成（很大一部分农村过剩人口移民到美洲国家，缓解了本国社会的负担，并且为它的加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国家范围内，可以看到两个有效的调节系统：一个是政治联盟系统，另一个是货币和信贷的集中化管理系统。然而在国际范围内却没有相应的调节系统。

调节机制的主要特点就表现在它的政治性上。

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要孤立新兴的工人阶级，因为由于城市人口的集中，工人阶级变得骚动、危险起来（考虑到当时的军事技术的，“街垒”恐怕是最有效的办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要么同全体农民达成了妥协——其中包括一大部分来自于激进革命的中产农民（譬如法国），要么同贵族达成妥协（英国，普鲁士——也就是后来的德国）。各种

各样的经济手段开始实施，从而形成反工人的资产阶级霸权联盟：对国内农业市场的保护，以及为保护中小产权（农业信贷等）进行的干涉政策，课税基数的失调等（有利于农民或贵族产业所有者）。这种联盟具体表现为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工人阶级。但是，这种调节也同样包括社会和政治手段：限制性选举（全国普选是后来才出现的），精英制等级化教育，政治职权的分配（在英国的贵族特权，在德国的国王特权等）。

一般来说，这种调节的运作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与基于劳资关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抽象模式相比，它的发展速度被减慢了。就是因为国家具有了实际的自治权，才使这一切调节成为可能，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思考过程中不断发现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内，同样存在着一个经济调节机制，建立在对国家货币和信贷的控制的基础上，这就填补了普遍被低估或是不为人所知的一些重要职能。

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阐述了一下论点^①：

——信贷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组成元素。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运用马克思的“两个生产部门”的模型来进行诠释。在这一理论中甚至连销售问题都是由实际工资随生产力增长按比例的增长解决的，产品的销售需要资本家在每个生产周期开始时，注入一定数量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又在生产周期的结尾得以收回，生产规模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扩展，这部分资金的数量就是由确定的、可计算的生产发展决定。这就是罗萨·卢森堡遇到的问题，她给出的回答在我看来是错误的，而列宁的回答则回避了其中的难点。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基于对信贷在资本主义积累中积极作用的认识，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信贷的消极作用

^① 这些论述可以上溯到我在1957年的论文中，后来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中再次提及，1970，第二卷，第三章。

的补充（即调节货币的供需关系）。

——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的分析也是伪科学的、重复的，它得出的结论就是信贷的供应和需求可以自发地实现必要的平衡。与此相反，我认为信贷市场加强了周期性的波动。我在两个时间段里展开推论。在第一个时间段内，生产的周期模式没有考虑到信贷的作用，只是通过操作者和加速者的作用来运转，把最终的需求和投资联系起来。这种模式揭示了在前福特模式时期的扩大再生产，采取的是“自然”的周期性模式，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作用产生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却又不不断地再次出现。在第二个时间段内，由于信贷的引进，相关的市场规律使信贷发挥了“放大器”的作用，加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规模，而不是让它去磨平生产周期中的矛盾和问题^①。

——在信贷的积极作用方面我得出结论，增长中的信贷总额的严格确定是与生产的增长相关联的，这意味着信贷体制需要一种它自己的、特殊的调节方式（我把它表达为对社会的控制），这决定了中央银行和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的作用和职能，这些职能都是独立于其他职能之外的（尤其是对外贸结算方面的干涉）。

在国际层面上，还没有出现调节功能，在不同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政治关系中都没有这种调节机制的存在。

在这个领域涉及最多的观点就是与英国霸权相联系的金本位政策，它建立起了一个约束性的调节机制，为了本国的政策服务，这些政策都必须要对外贸结算给出的信号来进行恰当的回应，它所在的这个体系对贸易的盛衰（只能依靠关税控制）和资本的流动（基本上永远是自由的）都十分的开放。

^① 见1957年论文，并参见《世界范围内的积累》，第二卷，第四章。

这里，我要再次回到贸易差额的调节问题^①。通过检验分析相关的经济理论和它们在金本位系统、或在其他的货币系统中的作用，我否定了所谓自发调节的观点。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证明市场实现平衡的理论（所谓的交换、价格、收入三种调节作用），都是在假设问题已经解决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们的结论只是纯粹的语言上的重复。因此，这些经济理论只是对于“世界和谐理想”的一种表述。我的结论是，一种国际性的调节机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涉及国家发展政策上的相互关联，这就成了一种与国际竞争观念相违背的世界性规划。贸易差额大体上的平衡只有通过永恒的“结构性调整”才能实现，而这种调整实际上就是最弱小的国家为适应最强大国家的要求而进行的调整。这样，就把这个问题从经济领域抛到了政治领域。

另外，国际政治作用也没有得到调节。这里最常提到的还是英国的霸权政策以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调节机制。今天则涉及美国的霸权，或者是在7个大国之间分享的霸权（或是3个大国分享：美国、日本、德国）。对于这种以专制霸权为标准的政治调节理论，我一直持保留意见。

在这里我又要把读者们带回本书第四章了。

关于霸权主义的言论在今天十分流行，这在当初是应该预料到的。美国自由主义者罗伯特·科海恩认为，霸权国家通过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从而赢得了稳定。我在分析海湾战争中表现出的“世界美国新秩序”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把它称为一种新的混乱的帝国，它具有巨大的不稳定性，并贯穿了一些剧烈的矛盾，中心地区内部竞争的复兴，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的动乱的再次爆发。这些都证明政治调节还没有提到日程上

^① 见1957年论文，并参见《世界范围内的积累》，第二卷，第五章。

来^①。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调节，却表现得相对自如。这里的边缘地区就是后来的亚非拉社会。

那时的边缘地区还处于未进行工业化的状态，这尤其是由于直接的殖民统治和以此为目的的外交干涉造成的（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就是典型例子）。与一般的偏见相反，边缘地区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创建起一个当地的资产阶级，反而是扼杀了当地资产阶级的萌芽^②。在帝国主义联盟的政治系统中，资产阶级所处的境地还是一样的，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还与当地的反动阶层相勾结，如拉丁美洲的大庄园主，中国的皇权，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埃及的总督等。这些当地政权同意加入世界体系，接受贸易“对外开放”（这种开放经常是由大炮轰开的国门），从中获利的统治阶级转变成了商品化、买办化的生产者。英国的霸权是从它的海外关系中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对中心地区内部关系进行有利于自己的经营而得来的（它错过了欧洲的平衡政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和帝国主义概念本身就是由政治目的决定的，而这种政治手段是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服务的（中心和边缘地区关系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并不是直接与垄断相关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做为世界体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当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各自为政的：每个中心国家都在营造自己的边缘地区（或试图这么做），并且在这方面永远处于相互冲突之中。

在国际政治方面，边缘地区那些没有被正式殖民化的国家，

① 参见我对罗伯特·科海恩的批评。

② 兰吉斯哈纳·穆克而吉，《东印度公司的兴衰》，纽约，1974；阿米娅·巴戈奇对S.阿明的合集的出版业做出了贡献，《积累和世界一体化》，拉尔马登出版社。

并没有做为一个主权国家受到承认，而只是被当做从属国。这些国家组成的地理空间被当做是一块向世界资本主义扩张完全开放的空间。这种从属国系统那时还仅仅局限于欧洲（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及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这些被后来的美国系统所补充（由门罗主义导致的北美中心地区与拉美边缘地区的对立），直到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开始在世界展开。

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方面，与这个阶段相应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之初，当民族解放运动要求独立，并在其社会内部引起了相应的变化时）完成了重要的使命。边缘地区在不平等交换下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农业消费品，它通过降低不变资本（原材料）或可变资本（雇佣劳动力）的价格，使中心地区的生产利润得以提高。

在此之前的分析表明，调节机制影响的发挥不仅依靠对生产关系的直接作用（从而成为政治经济领域研究的主题），还依靠对于社会关系的影响（这是一个比生产关系更大的概念，包括国家、社会政权、思想意识），并因此更好地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国家在调节机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评价。国家主要起到了两种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矛盾的作用：

——创造了基本生产关系再生的条件，使阶级的统治能做为一种历史形式延续下去（这里是指资产阶级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统治）。

——创造了保障“普遍利益”的社会关系再生的条件，也就是说，违反冲突的社会利益。这个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利益”中，它的内容实际就是资产阶级与农民（或者贵族）的历史妥协，在后来的福特阶段中，就是在西方社会民主的福利社会中的劳资双方的历史妥协。为了协调这些职能，国家就要自治，

并发展一种处于冲突之中的、伴随着资本积累的政权统治方式——这种冲突在中心地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在边缘地区则很严重，那里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化的局限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协调。

我们对于调节机制的理解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局限性的妨碍。马克思曾经表示过想要抛弃历史唯物主义正一基础，是它把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政权、文化、思想这些方面联系起来。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推出了一些确实体现其天才的理论基础。可惜的是，后来的研究并没有继续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设，而是去建立了一套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以前的发现和观点进行总结和普及。这种教条主义并不是斯大林发明的，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的前夕，它的大部分概念被继承并发展成为列宁主义，后来又在斯大林时期发生改变（它甚至受到了它的敌人托洛斯基主义的影响），甚至受到了毛泽东主义的部分影响，这是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开放的一支。突然，政权理论（“统治方式”）和思想意识理论在发展中陷入了一种封闭状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相比），退化成了僵化、苍白的关于“反映”问题的伪理论。

三

调节理论的提出是为了促进我们对后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分析，这个阶段被调节理论家们称为福特主义时期。这个新阶段的特殊模式是从1920年起在美国开始的，直到1945年后才在欧洲和日本普及，最后以1968年的经济危机告终。这个阶段跨越了从1920~1970年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

哈里·布瑞弗曼的杰出著作作为理论的突破做了准备，涉及了

影响“流水线生产”过程的转变。布瑞弗曼的分析同马克思当年对大工业劳动进行的分析同样的细致，而且他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新体制带来了劳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大批的一般工人代替了原有的技术工人，有利于行政人员、组织人员与实施者的分离，一群真正的“狱吏”接替了他们的工作，成为了控制生产的代理人。

资本家和劳工各自的新兴组织，共同为新调节机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过剩生产趋势的加剧，这种调节成为了客观上的必需。这种被泰罗制的“合理化”大大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制造出了一种过剩的生产，如果实际工资还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这种过剩生产就无法被吸收。新工人组成的工人阶级的成分要比上一个阶段一致得多，因此为工会的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面对这样一个工人阶级，资本的集中和寡头统治的建立，替换了原来的、单纯依靠价格的竞争形式（在该竞争形式中，工资上的压力一直非常大），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竞争形式，它强调生产力的改进（这涉及劳动者的赞同和配合）和产品的多样化、特殊化。现在已经到了资方和工会坐下来进行谈判，从而商议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政策的时候了（就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用“社会搭档”来称呼两个对立的阶级了！）。国家的职能，就是把劳资双方最强的代表商议出的政策普及到整个国家的劳动关系中。

这一新工资政策的本质就是要把实际工资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在这里，国家使平均工资（实际上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最低工资水平）与国家范围内的平均生产力联系起来，而行业内和企业内的谈判围绕着国家制定的标准进行灵活调整，达成特殊的协议。

新的调节就是上述的这些作用。调节理论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它的形成，还在于把调节的实施与社会民主制国家的出现联系

了起来（或者，在没有社会民主制过渡的国家中，就是福利国家）。

新的调节机制完善了在后一个阶段中十分重要的平均周期（通常是7年），因为它缓解了经济加速器的冲击（由最终需要决定的、超出正常比例的投资波动），换句话说，就是引入了投资规划的作用，这种规划摆脱了对需求波动做出的自发的、投机性的反应。通过调整公共开支、贷款和税收，国家干涉起到了补充性的作用。这种干涉甚至通过更广义的信贷缩小了调节的范围。

但是，新的调节机制并没有消除体制本身的生产过剩趋势。（凯恩斯很明智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国家再次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划分，第一产业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第二产业是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以此来吸收过剩生产。巴朗和斯维兹为该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系统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①。不幸的是，很多人不相信这种对再生产的控制同工资政策的作用同样重要。这反映出了对过剩生产问题的顽固的偏见，在我看来，这种偏见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对马克思教条主义的理解造成的。

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再展开一些。劳动过程的大众化和批量生产的到来具有社会和思想双方面的影响，没有这种影响作用，我们就无法从各方面理解“调节”。社会妥协导致了工人阶级根本态度的转变，他们放弃了以取消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

^① 保罗·巴朗和保罗·斯维兹，《资本的垄断》，1966；
保罗·斯维兹，《资本发展理论》，1942；
保罗·巴朗，《成长中的政治经济》，1957；
保罗·巴朗，《远见》，1969；
保罗·斯维兹，《现代资本主义》，1972；
约翰·贝莱米和汉瑞克·斯拉日弗尔，《步履蹒跚的经济》，1984；
J.B. 福斯特，《资本垄断理论》，1986。

想，而代之以新的群众性消费思想倾向。工人阶级不再朝马克思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即把社会从经济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思想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成为了社会的统治思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建立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离这一基础上的。它为政治设想了一套资产阶级民主的管理方式（自由，多党制，以选举的方式任命职权等），它为经济制定的管理方式（非民主的）是以私有财产、竞争和“市场规律”为基础的。新的调节机制结束了民主的衰败：新的调节是以政治民主和市场规律的双重一致为基础的，这种一致抑制了左右派对立的影响，而它们之间的对立是以在保守思想与运动思想、统治阶级与群众阶级的对立为基础的。调节机制还利用这个机会为中产阶级的发展打开了局面，这一阶级在社会思想形成中起着领导作用，为交际方式和社会憧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一般市民”的模式。

另外要指出的是，我们说的这种调节是严格限制在国家范围内的。它建立在自我为中心的、自主自治的生产体系中，尽管这种体系仍然对世界市场有所依赖。因此，只有当国家掌握了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资金，并控制了各种各样的对外交换（贸易的竞争力、资本的盛衰、技术），调节机制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只有在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内才能实现。还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调节，只有在那些在世界等级中占据最高地位的国家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中心社会的那些发达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弱小的国家中，协调国内社会妥协的困难和国际竞争的约束性都表现为严重的、反复爆发的经济危机，在一次次的危机中，耗尽、削弱了改革的作用和效果。

在世界体系范畴内，中心地区的调节机制意味着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不平等关系的再现。可惜的是，这方面的问题被一些人忽视了，他们从传统的角度出发，分裂了“发展问题”（“发展”仅仅依赖于每个国家自己的内部因素）和世界体系的复制问题之

间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所固有的两极分化）。边缘地区并没有构成中心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没有成为它的主要投资市场，中心地区完全可以不选择来自于边缘地区的原材料。然而对我来说，上述观点纯属无稽之谈。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抛下全球的财富——要知道中心地区消费了（或者说是浪费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财富。生态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点。最具活力的那些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强国，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垄断中获利，并吸引资本（与主流的关于“发展”的言论相反，边缘地区一般来讲是向中心地区输出资本的输出国）和技术（人才输出）为自己服务。因此，对边缘地区的接近程度已经成了中心地区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福特主义时期（1920~1970年）恰好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上升时期，从1945年起，亚洲和非洲的独立改变了国际竞争的局势，尤其是加强了地缘政治上的挑战。这一切都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而美国则根据自己的利益推动着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接着，在苏联刚刚解体后，它又建立了“反南方”的北方共同阵线（比如海湾战争），这证明了世界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从而驳斥了关于所谓的第三世界边缘化的经济学观点。

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来看，善意地讲，福特制的调节可以被称为是“社会民主制”的；从世界角度来看（一个由边缘地区人民构成了人口总数四分之三的世界），这种调节也许更应该被称为是“社会帝国主义的”。

不管怎样，福特主义时期的调节系统遭到了质疑，而且，在我看来，是没有未来的。然而，尽管它是不完善的，现在却还很难想象出另外一种调节系统来取代它，因为那么多的较量和对抗的结局目前还不能肯定。而且，未来世界的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取决于这些较量的结果，这些较量在近期内就会进行。

大部分调节理论家用中心地区的工人斗争来解释危机：工人大众运用消极的方式进行抵抗，从而抹杀了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构的努力；利润额减少，资本主义丧失了运转所必需的灵活性。在我看来，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该认识到工人斗争的作用是相对而言的，还应考虑到其他的福特制调节告终的原因。

如果说应该辩证地对待这个论断，是因为在劳动过程中的福特模式已经处于相对的衰落状态之中，技术革命促进了新型生产模式的发展。在福特制生产部门中能够实现的生产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且，对于这种产品的需求在中心地区已经接近饱和）。与福特主义的局限相反的是，新技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信息化和自动化技术更是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技术革命降低了福特时期以社会民主制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地位（加入了工会的广大非技术工人）——工人的数量开始减少。人们经常说技术革命推出了劳动的新的定性。确切地讲，这种重新定性是在中产阶级支配的社会中出现的，这种新定性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巩固了中产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继续对旧的社会民主政治管理形式进行破坏。这个因素给政治行为和国际国内较量的结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各种政治角色诸多行为的不和谐，甚至不合理。因此，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右派势力的当选上台的趋势就十分令人担忧，并应该得到严肃对待。

同时，就像以往的大革命一样，技术革命的性质是资本的储存，而不是资本的使用（铁路、电气化、汽车和城市化），它加剧了可用储蓄的供应（在一定的国际国内结构中，从收入的再分配里产生的）与生产投资需求（它通过扩大技术革命决定了生产力的进步）之间的不平衡。过剩生产的趋势进一步恶化。另外，世界金融的一体化加重了这种恶化的程度，并以资金从边缘地区

向中心地区的大量转移告终（债款是其中的一个转移途径）。斯维兹和麦多弗强调了系统对这种局势的回应，以及它在投机行为中体现的漏洞^①。保罗·勃卡拉同样也关注面对这种不平衡时资本有步骤的贬值过程：对于永恒的通货膨胀的消化，公共部门担当的责任等^②。所用这些政策都可以纳入调节的范畴，因为它们建立起了短期或中期的消化不平衡影响的途径，没有它们的话，这种不平衡就会立即爆发。

福特制调节衰落的第二个系列的原因是中心地区国家生产体系相互渗透的扩大，以及国际经济向一种世界上首次出现的经济的过渡（就像麦克·勃德强调的那样^③）。这种相互渗透削弱了国家传统政策的效能，把整个世界体系错误地抛入到了“世界市场局限”的操纵之中，由于缺乏超国家的政治要求和真正接受这种资本主义新需求的社会政治觉悟，这种局限是无法解决的。而且，在我看来，这种新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只会造成混乱，而且考虑到我先前所说的民主政体衰落的问题，这种混乱将是十分危险的。我认为有必要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它将给欧共体带来的影响，强调代表新局势的美日欧之间的不对称，以及东欧和苏联演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④。我直觉上认为，国家因素非但没有因为经济系统的演变而中性化，反而正试图再一次对抗经济演变的规律。

导致新的调节系统形成的第三个系列的原因，涉及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未来的关系（西方与南方的关系，西方与远东的关

^① 保罗·斯维兹和哈里·麦多弗，《生产和金融》，第35卷、第一期，1983年5月。

^② 保罗·勃卡拉，《调节理论和过度积累——资本的贬值》，《出路》杂志，第32期，1988，巴黎。

^③ 麦克·勃德，《80年代的世界经济》，发现出版社，1988。

^④ 《混乱的帝国》。

系等)。

结构危机从70年代开始出现,世界一体化的这种危机中加深,使一些边缘地区国家成为了工业出口国,并成为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经济一些最薄弱环节的有力的竞争者。因此,人们急于埋葬世界两极分化的理论概念。实际上,这种“新工业化”建立在缺乏社会民主妥协的、福特模式扩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一种“野蛮”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就是未来边缘地区的特点。边缘地区正在建设一种出口型的工业,但这种工业必然受到中心地区技术、金融垄断的控制,并要求建立一个独裁的国家。东欧和俄罗斯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加入了亚洲、拉美这类国家的行列。同时新的边缘形式的“上升”压制了中等强国(指欧共体、德国)的力量,从而有利于美国和日本的发展。

真正的问题在于,边缘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是否是在一个接受了世界一体化游戏规则的世界体系内进行的?

乔凡尼·阿里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声称世界一体化重建了常备部队与无产阶级预备部队之间的联系,由于苏联的脱离,这一联系在长时期内都处于割裂状态(1917~1991年)。我对这个观点持保留意见^①。阿里日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积累带来了两种补充性的影响:一是,社会政权和常备部队(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加强,二是预备部队的赤贫化(失业者,穷人,前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劳动者等等)。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世界两极分化现象的重要性(常备部队同预备部队在地理上位置上的分离——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历史马克思主义推测同样的无产者来往于两个部队之间,确保了反抗资本主义阵线的统一,以为它们在全球的行动会很快赢得胜利。与此相反的是,两极分化揭示了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存在着

^① 《资本主义和世界系统》。

两种相互对立的战略：一是中心地区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战略，一是边缘地区人民（即世界范围内的后备部队）的列宁主义战略（后来发展为毛泽东主义）。通过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一种调节的政治视角。这种视角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根本性的，即使斗争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

边缘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方国家的一体化是不是正在返回到马克思创建的世界无产阶级同盟的模式？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非一体化，将造成新的两极分化，而这将继续引起边缘地区人民激烈的反抗。新兴的工业化边缘地区的人民（甚至统治阶级），没有在这方面的决定权力。我认为，未来将再次发生的起义会使世界一体化受到质疑。国家将开始反击。我不明白的是，在中心与边缘、中心与中心之间冲突尖锐的情况下，怎么还能想象出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调节模式。对于未来，我看到的是愈演愈烈的混乱。

第九章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两极分化现象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在这种核心思想指引下，我很早就开始重新思考历史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资本主义最先在欧洲出现，而不是在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更为发达的东方地区出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探索，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的现状，找到能够改变现状的有效办法。

在本章中，我将试着回顾我的一些观点的形成过程，这些观点都是从我对积累理论的研究，对两极分化理论的研究，以及对发展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批判中衍生出来的。这些观点涉及各种不同领域的思考，有些是关于过去的（前资本主义的形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有些是关于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特性，国家，文化特性和社会挑战）。

一、资本主义的特性

在这里，只介绍一些在我的理论中比较突出的观点，也是我一直坚信的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第一个以普及化的价值为基础的社

会体系：一切社会生产，比如劳动和人力资源，都开始成为了商品。

——因此，价值不只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价值的统治地位使经济规律从以前的政权控制中解放了出来，使经济规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社会。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受经济支配的社会体系，而这一领域也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题。

——经济规律体现为价值规律，从而模糊了它们所基于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模糊了对劳动力的剥削这一事实。这种模糊决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而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异化了的思想。

——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需求之间的关系（政治、思想）。它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性与以往一切社会体系都正好相反，在以往的社会中：价值没有支配社会，经济规律（和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清晰透明的，社会是被各种政治需求所支配的，经济服从于政治，社会思想的特点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的异化。

以上就是我对资本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在我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并在下列著作中又进行了多次阐述：《积累》（1970）；《不平等发展》，1972（p.9~56）；《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6（p.7~21）；《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p.7~15, 167~183）；《阶级和国家》，1979（p.7~11）；《欧洲中心主义》，1988；《旧地区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91；《资本主义和世界系统》，1992。

这种理解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在苏维

埃主义中就更不算是主流思想了。苏维埃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异化了的经济主义思想，它模糊了资本主义的特性，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与思想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了一个惟一的模式，使资本主义无法区分于在此之前的社会制度，因此，应该在发展中理解认识历史，以及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变化。

我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它是以支配社会和自然的普遍规律为基础的。我拒绝接受在历史马克思主义中的普遍观点。支配社会的规律是在认识论层次上的，具有不同于自然规律的性质。我从 50 年代起就坚持这个立场，并在上述作品中进行了诠释。我还在《欧洲中心主义》（1988）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前资本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并在《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1992）中再次重申了我对主流思想的反对。

二、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的形成 以及历史中的不平等发展

我曾一度被马克思在这方面提出的问题所征服。因为，对资本主义之前历史的认识，不仅仅是一种科学上的好奇，而且对于理解今天、找到最有效的改变现状的方法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从 1966 年接触到《工头》系列读物后，就开始坚信这一点的重要性。然而，虽然对它抱有很大热情，我却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设想和假设，尤其是关于亚洲生产方式的推断。从东方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的历史出发，我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论断持保留意见，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通过维特弗日尔在《东方的专制主义》一书中的简化阐述变得十分著名。从第二国际以来的历史马克思主义

传统观点，通过斯大林的“五个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普及开来，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曾一度十分支持这一理论，但我并不满足于它的观点。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从来不以一种“马克思学”的态度研究，也决不从字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启发，我把从马克思开始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著作都纳入了新的对历史的诠释。于是，我逐渐接触到了公社模式、亲属意识、附庸进贡模式等概念，以及政权所实行的形而上学的统治、由各国的附庸国思想决定的文化氛围。附庸模式的中心形式和边缘形式是由各国剩余产品集中化程度的不同而决定的；奴隶制的特殊性与商业利润关系密切，这种制度只是间歇性地出现于历史之中，采取的也只是简单商品生产的模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我得出了一个主要的结论：一切附庸性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相同的，它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做了铺垫，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它解决这些矛盾的必需方式。在附庸制度的边缘社会中，一切统治手段都不很巩固，比较灵活，这就减少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从而解释了“欧洲奇迹”——这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先在欧洲出现的原因。

在《不平等发展》（1972）中，我表达了在前资本主义的形成（p.9~20），远距离贸易（p.24~29），附庸制下商业的封闭（p.29~48）。在《世界体系的形成》（1975）、《非洲的奴隶制度》（1975）、《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中对文化氛围（p.97~110）、思想科学和技术（p.167~183）等问题进行了补充。同时我又把关于阿拉伯世界的研究归纳成了《阿拉伯世界》（1977）。在一些理论形成之初，我的表达看起来十分模糊，不足以把边缘封建主义的特征清楚地提炼出来。我对其中的一些做了修改，例如：关于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上，我在《阿拉伯国家》中提出了另

一种在附庸制统治地位与远距离贸易之间的平衡，这在《不平等发展》中也有论述。

无论如何，我对于《阶级和国家》（1979）中的总体论述还是满意的，其中涉及了历史总结（p.15~30），前资本主义的形成（p.46~73），以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p.74~103）。我在下列著作中又对这些论点进行了补充：《为了控制世界体系而进行的斗争》，1982；《奴隶制和历史》，1984；《生产方式、历史和不平等发展》，1985。

在《欧洲中心主义》法文版的第二部分中，我对上述研究进行了总结（p.101~126）。

我最新的两个论著，《旧的地区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991）、《资本主义和世界系统》，推出了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整体关注。

我还建议重新研究一下国家的概念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历史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它们的思考都局限在对于欧洲特殊经验的认识中，在欧洲，国家确实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而形成的。与它们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是，在《不平等发展》（1972）和《阶级和国家》（1979）中，我提出对于国家的定义应该建立在剩余产品的集中这一概念上。

在上述问题上，我的论点和历史马克思主义论点的分歧主要在以下几点：

——我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学”范畴的。

——我没有去无休止地堆积生产模式的种类，其实这些生产模式中只有两种实质意义上的阶段：公社阶段和附庸制阶段。而除此以外的所有其他生产模式，实际上都是这两类阶段的变种形式。

——在从公社阶段向附庸制阶段过渡的漫长时期中，国家和

社会阶级还处于萌芽时期，此时的社会力量的组织形式，应该与后来涉及劳动剥削的政权组织形式严肃地区别开来。与亲属关系相应的思想意识也是在这种社会组织中建立起来的，它强调的是大家族的、氏族的和部落的团结。

——关于附庸制模式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阶级的普遍形式的观点，驳斥了两种欧洲中心论的主导观点，一是“两条道路”的观点，一是“五个阶段”的观点。所有的附庸制形式都具有一些本质相同的特征：对于经济上剩余的公开占有是由一种非经济化的、与政权相联系的方式决定的；思想政治上的要求占支配地位；与该类型社会相对应的思想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

根据政权组织成熟程度的不同，附庸制社会的各种变种形式具有中心和边缘两种特征，这种政权组织的成熟，是由剩余产品在统治阶级内部集中和分配的方式决定的。因此，欧洲（和日本）的封建主义是一种边缘形式的附庸制，它的特点就是剩余产品和权力的分散。伴随着重商主义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它向着本制度中一种更高级的形式发展——即中心形式，重商主义促进了它向附庸制中心模式靠拢（在这一时期里，欧洲的封建主义借鉴了中国的国家官僚机构）。在后来的封建制时期中，教会行使了部分的国家职能，保证了思想与制度的和谐一致。

——公社模式内部矛盾的解决，在于向附庸制模式的过渡，而不是在于奴隶制的实行。奴隶制生产模式永远是个例外，这不是规律，它与内在、外在商业关系的扩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奴隶制只有在以商业关系为中心的、地方制度中，才可以找到奴隶制社会的位置，它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演变阶段中：如在以公社化模式为主的地方体系中，在欧洲从附庸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阶段中（大西洋地区的重商主义），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中（19世纪的美洲）。

——小商品生产模式从未以一种单独的、主导的状态出现

过，经常在公社制社会或附庸制社会的间隙中发生片刻的繁荣。这同样使我们注意到由远距离贸易组成的社会网络，它经常被马克思主义的“反循环主义”的偏见所蔑视。东半球的全体附庸制社会构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三个中心（伊斯兰、中国、印度）和边缘地区（欧洲、非洲、日本、东南亚）占据了十分特殊的地位。

——所有附庸制社会的共同矛盾都涉及原始资本主义形式的自由扩张，以及摆脱附庸制政权的约束问题。这种扩张与约束的冲突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出路才能解决。这就涉及政治需求的角色转变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欧洲奇迹”的原因就在于，欧洲君主专制的集中制政权建立得较晚，也就正好处于一种封建势力下降、资本主义势力上升的平衡之上，而此时的附庸制中心形式中，附庸制剥削阶级是惟一的、完全的掌握政权的阶级。

——在每个阶段都有支配再生产的规律，但是却有一种“过渡阶段的规律”，有的只是推动超越和取代旧体系的具体动力。

——每次由政权（附庸制的国家中）或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中）渠道形成的剩余产品的集中时，国家的概念都是与各个阶段的现实相对应的。在欧洲历史中，确切地讲由于这种边缘形式，国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而诞生的。然而，先进的附庸制中心形式中，有时也存在着类似的、由剩余产品的集中造成的社会现实。历史马克思主义，由于把精力都集中在了欧洲身上，就忽视了其他地方的这种现实。

三、文化方面

对于资本主义特性的认识，使我把附庸制文化形式同资本主义文化、使命对立起来：附庸制文化由于决定它的思想（经常是

宗教性的)不同而不同,而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由产生资本主义的地区决定的,而是由它的社会内容——商品异化——决定的。在《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我开始发展这个观点,在《欧洲中心主义》(1988)中我得出结论,当代的世界文化并不是由西方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决定的(p.55~60)。

然而,资本主义不可能完全承担它所宣称的所有使命。因为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化方面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矛盾,这就是对边缘地区进行文化侵蚀与它没有能力满足这些地区人民的渴望之间的矛盾。我在《1492》(1992)中提到了欧洲征服性扩张中出现的,对多元性文化的侵蚀。后来,又在《欧洲中心主义》(1988)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补充,探讨了向一种真正的共同文化发展的社会任务(p.89~100)。

我还在《脱离》(1986)中对伊斯兰的复古主义和欧洲的文化主义进行了双重批判,我在1985~1992年间用阿拉伯语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伊斯兰社会状况的文章,在《纳达政权的终结》(1985)中,我对伊斯兰世界文化革命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而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应该为它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反省(《脱离》,1986,p.233)。

对于伊斯兰问题的深入思考,使我在《欧洲中心主义》中又开始重新思考附庸制思想意识的问题,目的就是要搞清楚形而上学思想的地位,它在绝对真理的探索中对宇宙起源的关注,它调节信仰和理智的方法,以及它在用于精英、群众和政权时的不同体现形式。我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形而上学相比,新的资本主义思想带来的巨变:资本主义思想致力于需求相对真理,形而上学的关注下降到私人信仰的层次,世俗化和民主思想开始发展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1992)中,我又把这种思考延伸到了唯物主义在人类认识中的地位问题。

在附庸体系的形成问题上,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文化时期和在

中东欧地区的各种表现形式，而它的发展则表现为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扩张。我还研究了同一时期中孔教、佛教、索罗亚斯特教的继承和发展。附庸制社会体系在整个东半球的发展跨越了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里，我要强调伊斯兰世界和中亚的“十字路口”地位，这是惟一个同古代世界各地联系紧密，并从中受益的地区（《旧的地区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91）。

为了进一步补充我的观点，我还回顾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过程和表现：古希腊深化（参见《关于黑色雅典娜》，1990），亲天主教倾向，种族主义，东方学的建立（参见《欧洲中心主义》，1988，p.61~77）。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挑战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对回顾过去、批判现在的有力武器，还是推动社会转变的必要武器。我一直很欣赏对于费尔巴哈的第21条论点：不是要理解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

因此，我一直不接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包括进化论的观点，而是从人类行动的主观性来确定它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从60年代起，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就开始缩小到经济主义领域，我对此持反对态度。我把两极分化做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中心问题，这就涉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这就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有所区别。

经济主义成为了一种严格遵循生产力发展的行为，而生产力的发展则表现成为一种自然的、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似乎取代了上帝的地位。经济主义的异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成了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形式，同时它还赞同进化论在这方面的基本概念。

我又很多次地重新批判了苏维埃从第二国际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如：《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

这种所谓的自然演变不会走向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超越，而是会走向国家干涉主义，这是资本不断集中的结果。工人运动的官僚化，也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最终只会让新的阶级渔翁得利，就像当初在农民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从中坐收渔利一样。这里我又回到了关于西方与苏维埃系统汇合的观点上（《阶级和国家》，1979，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矛盾本质，p.201）。苏维埃的国家干涉主义模式最终是在为“资本主义的重建”做准备，也就是说，加快了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自然演变。

通过对经济主义的批判，我把有意识的思想、政治、社会行为的干涉下进行的演变形式同不受控制的客观演变的形式对立了起来，比如关于“革命与退化”的思考（《帝国主义的危机》，1974；《阶级和国家》，1979）。

我不再重复对于1960~1990年间苏维埃的批评，这在第七章中已有论述。

我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与苏维埃的经济主义相对立的，这里不再重复，请参见我的著作《毛泽东主义的未来》（1981）。

这种双重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的必要的、持久的问题：如，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市场做为经济主义异化的形式的问题，这种异化形式的消除问题（通过官僚意志或是社会规划消除的），关于国家的消亡问题（即国家转变为用行政机构而不是一种人类的政府），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在双重分析中，我还尽量试图把一致和有分歧的演变联系起来考虑，比如苏联和中国的演变，一方面从它们内部的社会动力

来讲，另一方面从它们进入世界体系的方式来讲。

关于苏联问题，我主要在第七章中进行了论述，在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中东西方的冲突问题我也进行了解释。

关于中国问题，我在《脱离》（1986）和《毛泽东主义的未来》（1981）中进行了论述。后毛泽东时代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一方面以加快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开放为基础，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家和政党对这一过程进行控制，我对于这种冒险性的尝试仍持保留态度。

然而在这种分析过程中，我一直局限在“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中，直到80年代中期都保留着这种表达方式。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战略从1982年起的逐渐实施，这种概念有了新的、我称之为国家性的特质。这种观点也是从我关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中心论点中派生而来的。

对于第三世界发展尝试的批评主要出现在第六章中，它使我得出结论，不仅是公开加入世界体系的战略会复制和加深两极分化，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战略从本质上说也同样会造成这种情况，只是二者的外表形式不同罢了。

在此基础上，我对苏维埃主义关于所谓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持批判态度（参见《阶级和国家》；《危机，什么危机？》p.193）。我一直欣赏那些对于国际政治体系的实际进行的分析，譬如中国的“三个世界”的论点，我认为它在当时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是务实的（参见《阶级和国家》）。

一般来说，对于两极分化后果的分析总是会牵扯到国家是否历史成因问题，或者是永远躲在表象背后的社会阶级问题。我在《阶级和国家》（1979）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在这里，我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一些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其中一些观点由于低估了两极分化的现实影响，似乎“对资产阶级的偏爱超过了对农民的热情”。后来，在1986年的《脱离》中我又重新讨论了

这个问题，并指出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自主生产体系以及国家三者在欧洲历史中的时间上的巧合，还提到了它在国家思想的转移上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前一章中，我把对于发展主义的批判进行了总结。脱离并不像许多批评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空想”，而是实现“解放梦想”的惟一出路。当然也不排除与它同时对世界体系产生影响的行动，帮助它满足脱离的需求。

随着对发展观点批判性分析的加深，我逐渐意识到这种批判对东方国家尤其有针对性，对原来以第二国际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思想进行了质疑。在1976年（参见《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的附录《帝国主义》），我提出了“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的百年斗争”意味着与边缘状态的彻底决裂和向中心地位进发的长期的斗争，这两者也有可能是同时并列进行的。我最近用新的方式，在《喧嚣》（1989）和《混乱的帝国》（1991）中阐释了边缘地区的“后资本主义”时代。

1945~1990年这段已经结束的历史是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础上的（西方的福特主义，东方的苏维埃主义，南方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现在这三大支柱都已经倒塌，并引发了世界各地在政权组织和思想意识上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我对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范例（我要再次重申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反帝革命——墨西哥，土耳其，埃及，还有中国）和社会主义过渡的范例都产生了怀疑。在新的理论中，我提出了群众联盟、民主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等新论点。

考虑到苏维埃时代的结束和美国新军事霸权的建立，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新战略问题放到地缘政治的范畴内重新进行分析（《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冒险》，1991）。

在这里，做为总结，我要指出在《混乱的帝国》的最后几页中，对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三个阶段的论述，我把它们命名为

“社会主义Ⅰ”（1880～1914年），“社会主义Ⅱ”（1917～1990年）和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Ⅲ”。

本章参考书目（按出版时间顺序）

1. 《不平等发展》，1972
2. 《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
3. 《世界体系的形成》，1975
4. 《非洲的奴隶制》，1975
5. 《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6
6. 《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6
7. 《阿拉伯国家》，1977
8. 《阶级和国家》，1979
9. 《毛泽东主义的未来》，1981
10. 《为控制世界体系进行的斗争》，1982
11. 《奴隶制和历史》，1984
12. 《生产模式，历史和不平等发展》，1985
13. 《纳达政权的终结》，1985
14. 《脱离》，1986
15. 《欧洲中心主义》，1988
16. 《喧嚣》，1989
17. 《关于黑色雅典娜》，1990
18. 《旧的地区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991
19. 《混乱的帝国》，1991
20. 《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冒险》，1991
21. 《资本主义和世界系统》，1992
22. 《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1992
23. 《1492》，1992

三、附录：
作者著作一览表



一、书籍

1. 《前资本主义经济国际一体化的结构性影响——对于造成经济不发达状态的机制进行的理论研究》。

2. 《纳赛尔政权下的埃及》，1964。

3. 《发展中的三次探索：马里，几内亚，加纳》，1965。

4. 《马格里布经济》，两卷，1966。

5. 《象牙海岸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1966年做为补充性论述发表）。

6. 《塞内加尔事务》，1969。

7. 《现代马格里布》，1970。

8. 《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1970，新版序言（1987）。

9. 《刚果经济史 1880~1968》，1970，与 C. 科盖奇·维多维奇合著。

10. 《封闭的西非》，1971。

11. 《不平等发展》，1973。

12. 《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73。

13. 《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1974。

14. 《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与 A. 费尔，M. 于森，G. 马斯阿合著。

15. 《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6。

16. 《阿拉伯国家》，1977。

17. 《当代历史和危机中的阶级和国家》，1979。

18. 《阿拉伯当代经济》，1980。
19. 《毛泽东主义的未来》，1981。
20. 《危机，什么危机？》，1982，与 G. 阿日里、A.G. 弗兰克、I. 沃勒斯坦合著。
21. 《叙利亚与伊拉克 1960~1980》，1982。
22. 《脱离》，1985。
23. 《欧洲中心主义》，1988。
24. 《世界体系中的地中海地区》，1988，与 F. 雅奇尔合著。
25. 《非洲和第三世界发展主义的失败》，1989。
26. 《喧嚣》，1991，与 G. 阿日里、A.G. 弗兰克、I. 沃勒斯坦合著。
27. 《混乱的世界》，1991。
28. 《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冒险》，1991。

二、文集（1960~1985年）

出版在下列书中：

(i) 《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1988年版）中的文章有：

1. 《国际交换和不发达状态》，1974。
2. 《帝国主义》，1976。
3. 《自主发展，集体自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1977。
4. 《从皮尔森报告（1970）到勃兰特报告（1980）——发展思想的危机》，1980。
5. 《第三世界农民遭受的剥削》，1981。
6. 《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在非洲是否能够实现？》，1982。
7. 《摆脱危机的左倾路线所需的条件》，1983。
8. 《危机，第三世界和北南、东西关系》，1983。

9. 《万隆会议 30 年》，1985。

(ii) 《帝国主义和非洲的不发达状态》（1988 年版）中的文章有：

1. 《非洲的阶级斗争》，1962。

2. 《非洲内部贸易》，1967。

3. 《为了法兰克地区货币体系的治理》，1969。

4. 《黑非洲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1969。

5. 《塞内加尔事务中的资产阶级》，1969。

6. 《农业革命的局限性》，1970。

7. 《南非》，1971。

8. 《安哥拉战争》，1971。

9. 《黑非洲地区的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1972。

10. 《非洲共同体经济的几个方面》，1972。

11. 《发展和结构转变……》，1972。

12. 《联合国第三次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一次总结》，1972。

13. 《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发展》，1972。

14. 《法兰克地区与发展》，1972。

15. 《人口不足的非洲》，1972。

16. 《非洲的过渡问题》，1973。

17. 《非洲的食品匮乏》，1973。

18. 《几内亚共和国》，1973。

19. 《当代西非移民》，1974。

20.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1975。

21. 《非洲的奴隶制》，1975。

22. 《南部非洲的前景》，1976。

23. 《联合国第四次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的总结》，1976。

24. 《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未来》，1978。

25. 《当代危机中的非洲政治经济》，1979。

26. 《为了一种发展战略》、《服务于农业的工业化发展》，1981。

27. 《关于石油和非洲 - 阿拉伯关系上的几点诠释》，1981。

28. 《评世界银行〈南撒哈拉地区加速发展〉的报告》，1982。

29. 《为了控制世界体系急性的斗争》，1982。

30. 《世界体系，脱离和危机》、《关于 A.G. 弗兰克在危机问题上三部著作》，1983。

31. 《从世界角度看中东冲突》，1983。

32. 《地中海地区自治的条件》，1983。

33. 《奴隶制和历史》、《关于古代文化中的阶级斗争》，1984。

34. 《欧洲与阿拉伯关系的经济政治背景》，1984。

35. 《埃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1984。

36. 《生产模式、历史和不平等发展》，1985。

37. 《21 世纪之初社会主义的前景》，1985。

三、主要文章（1985~1992 年）

1. 《非洲历史序言》，1985。

2. 《经济危机，第三世界和北南、东西关系》，1985，英文版。

3. 《纳达政权的终结》，1986。

4. 《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在非洲是否能够实现?》，1986，英文版。

5. 《非洲 - 阿拉伯合作》，1986。

6. 《国家和发展》，1987。

7. 《和平、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发展——从非洲经验出发的几点思考》，1987。
8. 《南非脱离和发展的前景——序言》，1987。
9. 《边缘地区的民主和国家战略》，1987。
10. 《非洲矿业面临的挑战——简介》，1987。
11. 《非洲农业——简介》，1987。
12. 《欧洲中心主义和政治》，1988。
13. 《关于非洲发展和第三世界的研究》，1988。
14. 《摩洛哥农业——简介》，1988。
15. 《农业革命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非洲发展战略的选择》，1988。
16. 《非洲民主的漫长道路——序言》，1988。
17. 《北南关系和东西关系是否会呈现出新的局面？》，1989。
18. 《阿拉伯与塞内加尔的合作》，1989。
19. 《危机中的国家、民族、种族和少数派》，1989。
20. 《欧洲共同空间》，1989。
21. 《为了一个多中心世界》，1989。
22. 《当代第三世界的民主问题》，1989。
23. 《贸易和工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勃朗特报告 10 年后》，1989。
24. 《民族主义》，1989。
25. 《第三世界和革命》，1990。
26. 《关于黑色雅典娜》，1990。
27. 《为集中的非洲农业——序言》，1990。
28. 《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上升》，1990。
29. 《调整或脱离——序言》，1990。
30. 《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世界北方与南方的战争》，1991。

31. 《面对南方的欧洲——与阿拉伯和非洲世界的关系》，1991。
32. 《旧世界体系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91。
33. 《30年来对苏维埃体制的批判 1960~1990》，1991。
34. 《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义》，1991。
35. 《环境问题会不会受到经济考虑的支配？》，1992。
36. 《吉姆·布劳特的 1492 年》，1992。
37. 《地中海地区在能量方面遇到的挑战》，1992。
38. 《北南关系中的地中海农业——序言》，1992。
39. 《技术革命中的地中海地区》，1992。
40. 《1492》，1992。
41. 《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1992。
42. 《阿拉伯世界中的国家、经济和政治》，1992。
43. 《资本主义和世界系统》，1992。
44. 《不可逆转的脱离》，1992。
45. 《调节》，1992。
46. 《萨米尔·阿明——反经济主义字典》，1992。

主题精品图书推荐

《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J.K. 吉布森-格雷汉姆 著

大 32 开 定价：28.00 元

2001 年 10 月出版

ISBN 7-80149-689-2/D

本书是有关资本主义霸权的论述，而且反对这些论述。它殊途同归，是迄今为止人受到抑制的有关部门经济多样性论述的出现和发展展开了一片散漫的空间，希望对经济学发明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会有所贡献。

读者对象：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

《赌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英] 苏珊·斯特兰奇 著

大 32 开 定价：16.80 元

2000 年 6 月出版

ISBN 7-80149-283-8/D

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1923~1998)，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瓦维克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荣誉教授，著有《赌场资本主义》、《英镑与英国政策》、《贸

易顺差的国际政治》、《国家的退却》、《疯狂的金钱》等书。

本书作者是世界上第一个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人。书中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变得像一个巨大的赌场，它使每一个人都毫无选择地被卷入其中。美国是这个赌场的导演和决策者——即便美国没有显赫的军事势力，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仍决定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本书重点探讨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弱点；形成今天的赌场的原因；美国的国内决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为了避免今后出现全球性金融、债务危机；如何冷却现在的赌场。

读者对象：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金融证券业人士，理论宣传工作者，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威廉·哈拉尔 著

大 32 开 定价：28.00 元

2001 年 1 月出版

ISBN 7-80050-234-1/C

本书主要介绍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作者认为“旧资本主义”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企业主说了算的“独裁主义”。“新资本主义”则以说服社会为目的，雇员、工会，甚至顾客和客户参与决策和管理。作者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彼此补长取短，可使各自的经济顺利发展。

读者对象：经济工作者，国有企业厂长、经理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法] 米歇尔·阿尔贝尔 著

大 32 开 定价：17.00 元

1999 年 10 月出版

ISBN 7-80149-216-1/D

米歇尔·阿尔贝尔 (Michel Albert)，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

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计划总署署长、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

该书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内部的阉墙之争主要来源于富有魅力的“新美国资本主义”和较为完善的“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其中，前者讲究的是个成功、短期金融利润和金融媒体化，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所有讲英语的国家；后者追求的目标则与其相反，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

读者对象：政治、经济界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英] 约翰·基恩 著

大 32 开 定价：18.80 元

1999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050-326-7/D

本书详细介绍了韦伯和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本书是在国际、国内有着广泛影响的当代学术名著。

读者对象：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论宣传工作者，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帝国主义与依附》（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著

大 32 开 定价：28.00 元

1999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050-358-5/D

本书主要阐述了与“世界体系论”齐名的“依附论”。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二战后帝国主义的新征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

变化，研究了不发达国家新的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以及这种形式对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严重制约。这部著作在拉美和国际有较大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国外学者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历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著

大 32 开 定价：13.80 元

1999 年 6 月出版

ISBN 7-80149-141-6/C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教授及费尔南德·布劳代尔经济、历史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为当今世界四大社会思想家之一——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华勒斯坦，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全部历史和独特的具体现实中加以考察。他还认为，应该把整个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现实描述出来，探讨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的表现形式。本书附英文原文。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者、爱好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